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

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

Eric Jay Dolin

[美]埃里克·杰·多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埃里克·杰·多林 (Eric Jay Dolin)

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沿海附近长大，就读布朗大学期间主修生物和环境研究。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先后获环境管理硕士学位、环境政策和规划博士学位。

作品主要有：

《毛皮、财富与帝国：美国毛皮贸易史诗》

——《西雅图时报》2010年最佳图书；洛基山地图书馆2010年十大图书；新英格兰历史学会2011年James P.Hanlan图书奖；美国户外作家协会卓越技艺竞赛第一名

《利维坦：美国捕鲸史》

——《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普罗维登斯期刊》2007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2007年John Lyman美国海洋史奖；新贝德福德捕鲸博物馆第二十三届L.Byrne Waterman年度奖

美国和中国
最初的
相遇

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献给

佩妮、罗恩和萨基

中文版序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译成中文出版，笔者深感荣幸。本书用意之一即是帮助美中两国读者回顾我们频繁互动的一段历史，不仅为理解当下追摹往昔，也为描绘未来蓝图提供洞见。若能对加强两国理解略献涓埃之功，便可算是本书不小的成功。

笔者希望各位读者能与我一样，发现美中早期贸易的令人着迷之处。在这段历史中，许多情节与线索牵连交错，桴鼓相应。一方面，实力渐增的美国商船队不远万里，奔赴各地，寻找商品与中国人交易，换取美国人所需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这场全球竞逐中，新生的美利坚得到商人的有力支持，从百废待兴的前殖民地，成为纵横四海的世界强国，商人们还输入许多东方的精美器物，为美国人的家庭和博物馆提供了不计其数的珍藏。

故事的另一面，却是生态的恶化与人道的悲剧。在采集檀香木、海獭皮、海豹皮时，美国和其他外国商人搜刮无度，这些资源很快便无以为继。非法鸦片贸易泛滥，吸毒成瘾者众多，中国遭受军事重创，许多人在冲突中丧生，本已摇摇欲坠的清帝国江山更是危如累卵。此外，在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中，数万名中国人被当作商品运往拉丁美洲，挖鸟粪，摘棉花，收甘

蔗和烟草，境遇悲惨，近乎奴隶，大部分人劳累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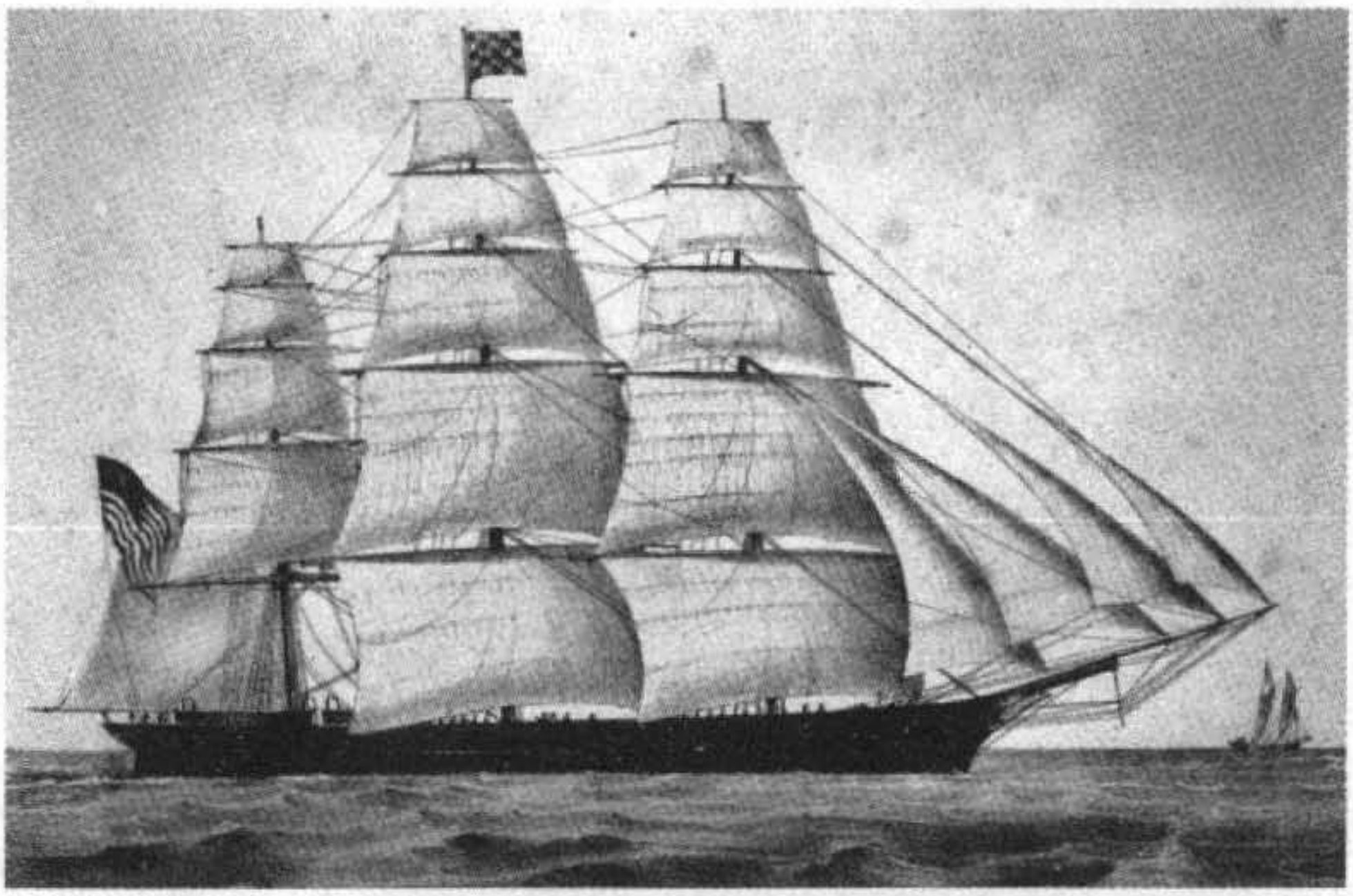
对华贸易也不乏文化的冲突，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作为最年轻国家的先行者，第一次接触到历史最悠远的文明国度之一。虽然美国人与中国人不乏深厚友善之交，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所知依然甚少，自视高人一等。而多数时候，中国人也同样轻慢美国人，对外国人以“番鬼”呼之。

本书前后描绘了对华贸易众多关键人物的形象。从美国总统到清朝皇帝，从飞剪船船长到广州行商，从部落首领到商业巨头，他们将带领读者走入现场，感受航海时代的那段奇异历史。

阅读本书时，请留意，本书叫做《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而不是《中国和美国最初的相遇》并非偶然。作为美国人，笔者更了解美国文献，谙熟美国人的观念和美国历史。因此，尽管也参考了许多中国文献，将中国和美国人的看法并陈杂叙，但这本书更加侧重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对美中贸易的看法。我很欢迎能有中国作者写出姐妹篇《中国和美国最初的相遇》，并翻译成英文出版。

尽管本书所述的是18世纪末直至19世纪中期的历史，但是许多方面依然可供今日镜鉴。在美中贸易的早期，市场力量推动了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开发利用，文化上充斥着无知与傲慢，这些问题到今天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关系。笔者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两国联系的加深，我们不仅尊重自然世界，也更加尊重对方，两国共同的历史或能展现更加普世的人文关照。

前　言



纽约飞剪船“挑战”号，N. 科利尔绘，1850 年

xv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纷繁复杂，对美国的未来可谓利益攸关。美国人每天都能在新闻上看到媒体对美中关系诸多面向的分析与解读。但这类报道往往夸大其词，令人难安。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其中的焦点莫过于经济和贸易问题。担心来自许多方面。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否过多？与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否可堪维继？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让中国产品获得了
xvi 不当的竞争优势？在这一切顾虑背后的真正问题是：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老大？或者说，中国的崛起是否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的衰落？21 世纪是否真的会变成属于中国的世纪？

我也曾有过同样的问题，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美国和中国过去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每当我看到有关美国和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冒出一个念头：虽然两国不断演变的关系令人瞩目，探索这种关系的起源或许对当下也不无启迪。这也成为本书的缘起，我希望讲述美国和中国首次遇到的故事，并描绘两国关系的最初面貌。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贸易成为故事的线索，因为这正是美国和中国互相了解对方的主要渠道。

确定故事的起点并不难，因为美国大革命之后不久，“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就到达广州，美国第一次接触中国。而确定合适的结束点却并不容易，因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延续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说明“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但在历史上却有一个转折点，可以为这段叙述画上一个句

号。那就是19世纪60年代晚期，当时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失去了早期丰富的戏剧色彩和悲剧性，而随着轮船的普及和美国横贯铁路的完工，美中贸易的根本性质也随之转变。

笔者撰写上一部作品《毛皮、财富与帝国：美国毛皮贸易史诗》（*Fur, Fortune, and Empire: 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之际，有资料显示自18世纪晚期开始，美国 xvii
商人就将海獭皮运往中国换取各种货物，并获得不菲的利润。我开始意识到，美中贸易史引人入胜，或许值得一书。而本书的研究则揭示，较之两国日后波澜壮阔的交往史，海獭皮贸易不过是太仓一粟。

合众国建国约80年后，美国船只就绕过好望角和合恩角，前往他们心目中神秘的“中央王国”。当时的货船上载满了白银、西洋参、毛皮、檀香、海参、棉织品以及其他各色货物，用以交换丝绸、瓷器、家具以及最重要的物产——茶叶，传说中的“神仙饮料”。与中国的贸易对这个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成功意义不凡，美国经济如同注入了兴奋剂，波士顿、纽约、费城、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等商埠在内战的蹂躏后迅速复苏，造就了美国第一代百万富翁，更赋予美国跻身世界舞台的信心。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还刺激了造船业的繁荣，由此制造出帆船时代最后的杰作——船身细长的高速飞剪船。此外，这段贸易还使美国得以将势力拓展到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为美国留下了遍布全美博物馆和住宅的精美艺术遗产。

本书探寻的那个时代中，对贸易和利润的渴望令美国和中

国两种特质迥异的文化仓促相遇。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文化几乎从不曾真正参透过彼此。面对大洋彼岸的陌生国度，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时时感到灰心丧气，抑或怒火难抑。这段历史中充斥着未竟的商业期望、巨额的贸易赤字，以及残酷的竞争、剥削和战争。在寻找商品时，美国冒险者曾大肆杀戮海獭和海豹，毁坏太平洋岛屿的森林，还加入鸦片贸易的行列。更有甚者，美国将中国苦力贩卖到美洲，强迫他们在加勒比海沿岸做奴工，收割甘蔗等作物，或是在秘鲁钦查群岛挖鸟粪。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远不止是一桩桩情节起伏的史事，在历史的帷幕之间，诸多令人瞩目的人物陆续登场。他们之中，有美国的建国之父、封建王朝的皇帝，也有在贸易热潮中大显身手的海员、商人、土著。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许多形形色色的角色，包括探险家、投机者、沉船落难者、谋杀犯和不循成规的女性。诸般人物让美中贸易异彩纷呈，生动真切。

目　录

第一章　“追求财富的冒险”　／001

第二章　中央王国　／023

第三章　中国梦　／053

第四章　“生番”　／069

第五章　中国热　／084

第六章　金街　／144

第七章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190

第八章　鸦片战争　／206

第九章　逐风而行　／258

第十章　褪色的财富　/ 279

后　记　历史的回响　/ 304

致　谢　/ 309

注　释　/ 312

参考书目　/ 364

关于作者　/ 368

索　引　/ 370

插图来源　/ 408

彩色插页来源　/ 413

第一章　“追求财富的冒险”

1783 年 11 月 25 日，英军撤出纽约，乔治·华盛顿入城，科利尔和埃文斯绘，1857 年

1783 年 9 月 3 日，《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的签订正式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罕见地恶劣。从缅因到弗吉尼亚，气温从 11 月中旬就开始骤降，到年底前，一连串的强风暴先后来袭，部分地区积雪达两英尺。起先只是在海港和河堤边结起薄冰，随后迅速蔓延到开放水域。次年 1 月，冰雪先后两次短暂而快速地消融，但寒冬在月底再次肆虐，“中国皇后”号船长 J. 格林（John Green）能做的只有继续等待。他原本希望 2 月初从纽约起航，孰料东河和外港的冰冻挡住去路，临近月末，水银柱多天降到零度以下，更让情况雪上加霜。2 月下旬，气温总算回暖，22 日是星期天，天朗气清，轻风不时拂过水面，起航的时刻终于到来。“中国皇后”号扬波出发，格林和 42 名船员开始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性首航。[1]

与此同时，另一艘船“爱德华”号也沿东河而下，目的地则是伦敦，船上是“大陆会议各部正式派遣使团，携带和平文件定本”。[2] 同时出发的“爱德华”号和“中国皇后”号仿佛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而这几乎是小说家梦寐以求的场景。“爱德华”号承载的可以说是美国的出生证明，宣告最年轻的国家从此诞生。“中国皇后”号的使命也绝不逊色，它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世界强国一较高下。而此中的象征意义并不限于此。尽管出发的日期本身已足以让 2 月 22 日记入史册，这一天还碰巧是乔治·华盛顿 52 岁生日。虽然巧合纯粹因天气而致，内中联系却颇为合理：新生的美国第一次远东之旅刚好在华盛顿的生日这天起航，华氏又恰恰是美国建国史上

厥功至伟的国父。这两艘船承载着对美国未来的希望，当可告慰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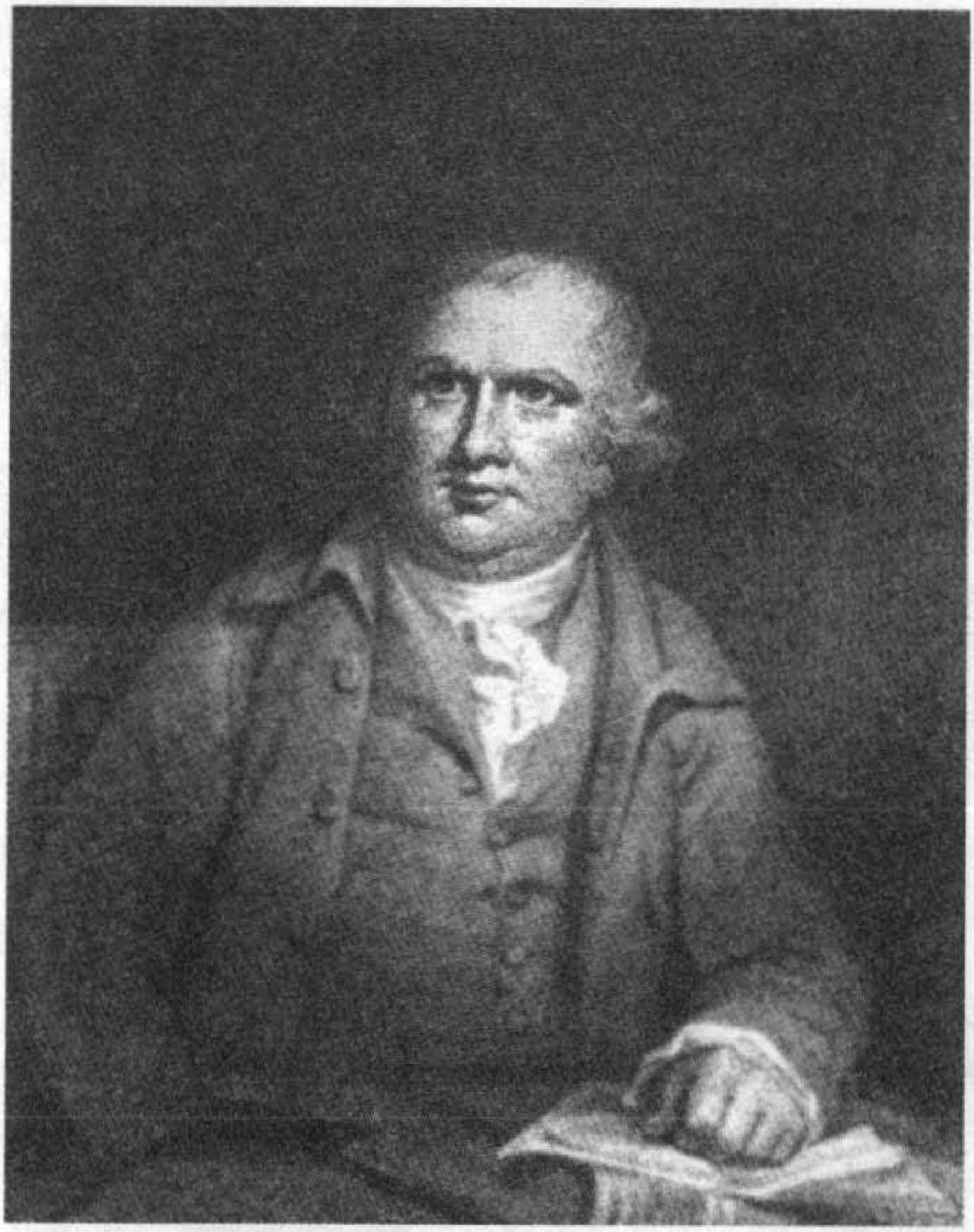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既是必然，也有偶然。《巴黎条约》的签署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纪元。美国打破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约束，为这一天长期奋斗的美国人终于迎来自由的阳光和无限机会。他们不再需要听命任何人。1783 年 7 月 4 日，在南加州的查尔斯顿，大陆会议敲定若干初步的和平文件之后，一份祝酒词传达了洋溢全国的喜悦心情：“致此吾等荣耀之日，基于自然法与造物主之赐——于尘世诸政权间为互不隶属且相互平等。”[3] 然而，这份自由得来也殊为不易。全国陷入经济萧条，商业停顿，中央政府组织混乱，各州之间权利与责任纷争不断。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国家将如何自立于世界。

许多富有魄力的商人在独立战争中积累了不少财富，此时手握商船和大量资源，他们相信出路在海外，问题是应当和哪个国家开展贸易。独立战争打破了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长期以来的商业贸易顿失所据。英国政府视美国为危险的潜在对手，几乎切断了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切经济往来，而后者是美国在独立战争前的主要商业通道之一。同时，美国还要面对以自身商业利益优先的欧洲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美国需要的不止是改善与欧洲列强的商业关系，还得发掘通往其他国家的新商路，确保可靠的经济前景。[4] 就这样，中国进入了美国商人的视线。

早在独立战争前数十年，通过英国商人或走私者，美国人
6 就已能获得需要的中国货物，包括瓷器、丝绸、茶叶和称为“南京布”的棉织品。然而，美国人此时还无法与中国直接交易。大英帝国版图中唯一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是1600年成立的垄断机构英属东印度公司。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美国商人已经不再受英帝国掣肘，可以自由前往中国。这其中的领头者就是R. 莫里斯（Robert Morris）。

莫里斯1734年生于利物浦，13岁时离开家乡，前往美国与父亲团聚。老莫里斯是切萨皮克湾东岸马里兰州牛津市的一名烟草商人。莫里斯勤勉好学，头脑灵活，很快就不满足于当
7 地的小天地，两年后，他说服父亲，来到费城。当时的费城人口达2万，是英国在新大陆最大的城市，商业繁荣，世界各地人口汇聚。短期担任图书管理员后，莫里斯开始在C. 维林（Charles Willing）的船运公司担任文员。莫里斯迅速得到晋升，成为维林的长子托马斯的好友。托马斯也在这家公司工作，并被寄望有朝一日掌管公司。[5]

1754年，维林辞世，托马斯接过公司事务，并将莫里斯作为可靠的副手，很快把他擢升为维林－莫里斯公司的合伙人。维林行事严谨，性格保守，被朋友称为“老古板”（“Old Square Toes”），但在选择莫里斯这件事上却十分精明。他们一起共同将维林－莫里斯公司塑造成美国首屈一指的商行。18世纪70年代初，莫里斯结婚成家，在费城的上层社会站稳了脚跟。[6]



R. 莫里斯，C. W. 皮尔写生，1782 年

独立战争期间，莫里斯分别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发挥影响。作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他倾向于和英国谈判，迟至 1776 年 8 月 2 日才签署《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ce）。他也借此申明了对于独立事业毫无保留的支持，宣称“我不是自己的方

案不获采纳就会大发雷霆的政客。我认为，良好公民的职责就是在不能担当领袖时遵纪守法”。[7] 大陆会议需要一个人来削减政府预算、降低公债、协调外贷，并缓解美国左支右绌的战事开支，他们选中了莫里斯。作为大陆会议成员和财政主管，莫里斯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银行，并在财政上白手起家。莫里斯屡屡利用他的经济头脑、广泛的人脉和谈判天才，再加上自己的财富，筹集了独立战争必需的资金和物料。在福奇谷和约克敦（Valley Forge and Yorktown）的战役中，乔治·华盛顿急需现金和供给保持军队运转，终结战事，莫里斯带头雪中送炭，一举扭转战局。[8]

莫里斯也担任海事代理人，整顿他眼中“命运多舛的新海军”。[9] 这一措施非常明智。莫里斯拥有不可或缺的背景，战前就长期通过商船队浸淫于海上贸易，并再次利用自己的经济手腕令濒临破产的海军重焕生机。

出入政府之余，“独立战争的财长”莫里斯也不忘打理自己的生意。他对谋取利润之热衷，丝毫不亚于身为爱国者的热忱。莫里斯不断拓展自己的贸易帝国，还为私掠船提供装备，劫掠英国船只。许多人认为莫里斯是靠战时商业活动暴富的投机商，“自己迅速发迹，是公认最著名的美国商人”。[10]

随着独立战争渐入尾声，莫里斯开始逐渐从公共服务脱身，在个人生意上投入更多精力。他首先想到的投资就是对华贸易。1780 年，莫里斯的两个商业伙伴，纽约人 W. 杜尔（William Duer）和费城的法国领事 J. 霍克尔（John Holker）曾建议他为

前往中国的贸易船队提供资金。但莫里斯认为不具备远航所需的条件，因此拒绝了提议。翌年，霍克尔再次向莫里斯提出请求，依然未果。[11]直至1783年夏，和平曙光在望，莫里斯已万事皆备，只差J. 雷雅德（John Ledyard）擦出火花。

J. 雷雅德画像，J. 斯万绘，1991年

雷雅德1751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Groton，Connecticut），独立战争爆发前的经历毫无亮点，在被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开除后，曾入过神学院，也在往来康涅狄格州和非洲、欧洲及西印度群岛运送骡子、糖浆、面粉、蔗糖的船上做过水手。他最大的成就或许是，曾经用松树的树干

挖出一只独木舟，并以此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沿康涅狄格河行进 140 英里到达康州哈特福德（Hartford）的父母家，成为已知第一个穿过这一长度水道的白人。1775 年 3 月，雷雅德搭船前往英格兰，在当地深为英军折服，遂自愿入伍，几周之后成功转入海军。不久，雷雅德就觉得普利茅斯码头的海军生活乏味难熬。1776 年 7 月 5 日，他登上英国皇家海军“决心”号担任下士，不安分的雷雅德终于踏上了真正的探险之旅。而这艘船刚好也是著名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前往太平洋寻找传说中“通往东方的西北航道”的两艘船之一。[12]

不过，那条航道并不存在，但是一项偶然发现引发了日后诸多重大事件。1778 年 3 月，库克的船队抵达太平洋西北海岸，并在今天温哥华岛西岸的努特卡湾停泊。土著印第安人划着独木舟靠近船队，库克记录道，“我们和印第安人以物易物，诚实交易。他们带来了各种动物的毛皮，如熊、狼、狐狸、鹿、浣熊、臭鼬、沙燕，特别是海獭”。[13]库克的船员把这些毛皮抢购一空，做成新的大衣，换下身上近两年的海上航行后褴褛的衣衫，给印第安人的则是“刀子、凿子、零碎的铁和锡、钉子、镜子和纽扣”。接下来的几个月，库克的船员们囤积了 1500 张毛皮。[14]

尽管库克的手下最初纯粹出于实用而买下这些皮张，但 1779 年下半年抵达中国广州后，他们意识到，巨大的财富已经在向他们招手。中国人偏爱毛皮的保暖和美观，愿意支付大价

钱购买，其中又以海獭皮最受追捧。海獭毛皮色光亮，质地柔软，密度为哺乳动物之最，每平方英寸的毛发达百万根。一名19世纪的美国商人宣称：“与其看着被假内行吹捧的画作，欣赏一张绝妙的海獭皮更令人愉快……除了美人和婴儿，海獭皮是世界上最美的自然杰作。”[15]一件品质上乘的海獭皮在广州要价达120美元。即便是破旧的皮张也一样能卖出好价钱。如此诱惑让船员们迫不及待，希望立刻重返西北海岸收买更多的毛皮，几乎酿出兵变。所幸局面得到控制，船队于1780年初回到伦敦。[16]

雷雅德对广州堪称暴利的交易念念不忘，1782年，32岁的他回到美国，将跟随库克船长的这次冒险写了一本书，也描述了西北海岸毛皮交易的利润。他写道，“6个便士购得的毛皮运往中国就能卖出100美元。我们购买的海狸和其他动物毛皮不足可购买量的四分之一，如果知道抛出以后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我们毫无疑问会统统买下”。[17]在1783年6月出版的这本书中，雷雅德预言：“通过北太平洋打通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当时笼统地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远东其他地区）[18]的贸易，这条航道极具价值，对美国特别是北部各州尤其实用。”

该书出版之前，雷雅德就已经寻找投资人支持他的毛皮贸易计划。在纽约市碰壁之后，他来到费城，并于1783年6月初获得与莫里斯会面的机会。他终于找到一位愿意耐心听取计划的听众，莫里斯已经准备好往中国的航行，而雷雅德为他指出

了通往财富之路。因此，第二次和莫里斯会面之后，雷雅德用
12 愉快的笔调给表兄写信："我常被命运捉弄，几乎不敢将这次契机看做光明前景的征兆。但事实是，莫里斯阁下已经同意给我一条船前往北太平洋……他对这项事业的果断支持令人赞赏！我有两天时间拟定详细方案和对全套装备的估计，明天我就会递交给他……我将率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探险船队，而在美国贸易史上，这也是新硎初试的一刻。"[19]

莫里斯与包括霍克尔等商人在内的纽约丹尼尔·帕克公司达成合伙，计划派出3只商船绕过合恩角，其中一只的目的地是中国，另外两只则先往西北太平洋沿岸收集毛皮，之后再前往广州。帕克和雷雅德寻找船只的同时，也和莫里斯一起筹集资金，并吸引了一批波士顿的投资者。

当年夏天，帕克在波士顿购买了一只接近完工的精良船只，设计者是著名的J. 派克（John Peck），他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第一位造船工程师。派克将这只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船长100英尺，宽28英尺，载重360吨，船底包铜，通体漆黑，流线造型，坚固耐用。这艘船以美国私掠船"贝利撒留"（*Bellisarius*）号为原型，后者在独立战争中被英军俘获，并成为皇家海军中速度最快的船只。[20]

8月下旬，《塞勒姆公报》（*Salem Gazette*）刊出一则激动人心的新闻，公众才第一次听说这次计划中的航行：

> 据我们了解，波士顿有一只船正在筹备前往中国的航

行。船上将携带总值15万英镑的资金和货物，并将于秋季起航。据称，美国各地许多著名商人都对这次从新世界到旧世界的首航兴趣十足。相比最乐观的辉格党人的预期甚至希望，以至最顽固的托利党人的担心，我们一早就对地球另一端的丰富商机十分看好。[21]

莫里斯和帕克深信有理由更冒险一点，计划将船只总数扩充到6艘，其中3只绕过合恩角后西行，其余则向东绕过好望角并穿过印度洋到达中国。但这一设想未及落实便无果而终。帕克和雷雅德寻找其余船只的过程困难重重。保守的波士顿投资者也不认同扩充计划，迫使帕克的公司和莫里斯分担费用。此外，全国的财政事务尚待莫里斯重整，他也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贸易，合伙人则陷入争吵、诽谤和互相操纵。

尽管如此，到11月下旬，莫里斯已然成竹在胸，在致友人同时也是《巴黎条约》签字人的J. 杰伊（John Jay）的信件中，他对这趟远航的前景自信地写道，“我的船队将前往中国，激励更多人投入追寻财富的冒险之旅”。即便如此，他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12月初，东海岸遭遇严寒，普降大雪，本来计划的3只商船中，只有“中国皇后”号能够出航，而且并非向西航行。莫里斯和帕克无法负担更多的船只，也不想把全部赌注押在雷雅德胜负未卜的方案上，决定走更安全的东行航线，也就是欧洲商人已经成功开辟的中国

贸易线路。[22]

雷雅德得知后愤怒不已，向表兄痛心地透露，“我在美国点起的冒险热潮瞬间就熄灭了，赞助人头脑不清、优柔寡断。”[23]但他并没放弃，而是前往欧洲，寻找能理解他的计划并愿意助他实现的投资者。

* * *

14 没有了雷雅德计划中西北海岸的毛皮，“中国皇后”号上出发时的货物是32吨铅、50吨木材、500码羽纱、12桶酒（葡萄酒、白兰地、朗姆酒）、1箱毛皮（主要是海狸皮），大约2万西班牙银币，还有近30吨西西洋参。船只和货物总值达12万美元，其中又以银币和西西洋参最为贵重。[24]

当时，世界贸易的交易手段主要是白银，更准确地说，是西班牙银元（也称为“八片币”），“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① 从16世纪开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南美的银矿中开采出洪水般的白银，总量超过30亿盎司，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大半，这些白银被铸成银币，并广泛应用于从西方到东方的商业交易中。毫无疑问，“中国皇后”号带到广州的货物中，

15 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美国人口中的“西班牙银元”。[25]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西西洋参。

数千年来，中国人都使用北方深山中人参粗大多肉的根部

① 西班牙银元被称为“八片币”是因为每个银元相当于8个瑞尔（西班牙辅币单位）。

来消除疲劳、催情壮阳，乃至治疗各类疾病，包括胸膜炎、弱视、晕眩、呕吐。因此，无怪乎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将人参命名为 *Panax*，即希腊文中的“万灵药”。对中国人来说，人参确实就是那一味“长生药”。[26]

在18世纪初期以前，中国人使用的参类只有人参。1717年，法国耶稣会教士J. F. 拉菲托（Joseph Francis Lafitau）在加拿大发现了另一种效果略逊，但也十分优质的参类——花旗参。他兴奋地挖出加拿大花旗参，并运往广州。不久之后，新英格兰、纽约和更远的南部山林中也陆续发现了花旗参，美国人也因此开始将花旗参卖给英属东印度公司，进入对华贸易的货品行列。

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主要都依靠印第安人采集西洋参。印第安人劳力廉价，熟悉西洋参，长期入药使用。美国著名神学家J.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在1752年致友人的信函中，爱德华兹注意到，近期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的森林中发现的西洋参已经“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的宗教追求”，他们将大量时间用于采集西洋参，无暇上教堂。爱德华兹更担心的是，印第安人还用他们的工钱买朗姆酒，“喝得烂醉如泥”。[27]

尽管西洋参危害着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身体，但他们以及许多非印第安人还是在美国各地的森林中继续寻觅这种宝贵的植根。现在有了“中国皇后”号的需求，美国人势必要大量买入。1783年8月底，帕克雇佣了一名费城的西洋参供应商，后者则聘请R.

约翰斯顿（Robert Johnston）医生在弗吉尼亚和费城的小镇、边远地区和印第安人的聚集地采购西洋参。约翰斯顿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西洋参展开地毯式搜索，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中国皇后”号的随船医生。除此之外，他还奔波于费城和纽约，四处筹钱，向分布于东部各地的西洋参供应商付款。最终，约翰斯顿成功地收集到大约30吨西洋参。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这些宝贵的西洋参被运上一个小型船队，从费城送到纽约，按品质分类后，存放在242个木桶中，装上“中国皇后”号。[28]

和船上货物同样重要的是船长，他关系着航行成败与否。J. 格林（John Green）船长47岁，仪表堂堂，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近300磅。他曾在遗嘱中指示自己的棺木要由“邻居的八名壮汉抬到墓地”。[29]格林少年时从爱尔兰来到费城，曾经在维林和莫里斯公司担任过船长。独立战争期间，格林在莫里斯拥有份额的私掠船任指挥，也曾担任过大陆军海军舰长。但好运到1781年晚夏戛然而止，他指挥的“狮子”号在布列塔尼沿岸遭英国驱逐舰“普鲁登特”号追击了14个小时后被俘。格林本人在英国战舰上被扣押了30天，之后在英格兰普利茅斯臭名昭著的米尔监狱待了9个月。他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造船模，照顾狱友，并不断写信希望重获自由。最后，在1782年6月下旬，随着和平谈判的进行，英国海军部批准释放囚犯，
17 格林和其他215名美国人被送回费城。一家当地报纸对格林在囚禁期间的无私赞誉有加，“在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声望所及之

处，他无不举止谦卑，应当得到这个国家的祝福和感谢”。[30]

此外，船上的另一名重要角色是负责管理所有商业活动的随船大班，这自然也包括将在中国进行的交易。“中国皇后”号的高级大班是29岁的波士顿人山茂召（Samuel Shaw），在独立战争期间，他从事过多个军中职务，包括H. 诺克斯（Henry Knox）少将（曾贩书为业，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战争部长）的副官，并逐渐崭露头角。战事结束后，诺克斯对这名副官赞誉有加，说山茂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一个机智、主动、勇敢的士官，许多友人都很欣赏他”。而华盛顿也认同这一评价。船上的初级大班是山茂召的好友，同为波士顿人的T. 兰道尔（Thomas Randall），他曾在军中和山茂召一起服役，曾经被俘，后来退伍从商，成为成功的费城商人。[31]

格林、山茂召和兰道尔，再加上约翰斯顿和“中国皇后”号上的另一名士官以及帕克和莫里斯，他们七人的联系并不限于这艘船。七人都是辛西纳提协会的成员（莫里斯为荣誉会员），这个团体的构思源自诺克斯，1783年5月由大陆军队士官正式成立。协会推动各州之间的友好联系和团结，并照顾已故成员的家眷。为纪念法国在战争期间的支持，协会也欢迎法官军官加入。协会的名字来自古罗马农民L. Q. 辛西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他接受同胞要求担任独裁官的请求，并带领他们打赢两场战役，凯旋之后，他没有保留象征绝对权力的斗篷，而是回到自己的农庄。相呼应的是，协会的首任主席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拒绝一些人称帝的建议，因此也

山茂召

被广泛地称赞为“西方的辛西纳图斯”。现在，这群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同袍，将为了美国的共同事业登上全球贸易的战场。[32]

“中国皇后”号的赞助人制订计划，张罗货物的同时，其他美国商人也急切地把目光投向远东，莫里斯和帕克并不是唯一嗅到机会的商人。塞勒姆人就对中国贸易兴趣十足，1783 年下半年，波士顿商人 I. 希尔斯（Isaac Sears）上校已将一条船遣往远东。年初，希尔斯的一个欧洲联系人称，只要能在 1784 年 2 月 20 日前将 5 吨西洋参送到瑞典港口哥德堡，就能卖到每

磅 8 美元，瑞典货船则会再将这些货物转运到中国广州。希尔斯决定接下这笔买卖，这意味着得跟时间赛跑。为了让货物按时到达哥德堡，希尔斯预计，50 吨位的单桅帆船“哈里特”号要在 12 月中旬出发。但由于没能赶上时间，最后他决定全盘更改路线。

根据历史书上常见的说法，12 月下旬“哈里特”号出发时，希尔斯告诉船长哈莱特，目的地是广州，但这艘船没能走那么远。在非洲南端的开普敦，“哈里特”号引起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官员的注意，他们意识到，“哈里特”号的使命会危及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消除威胁，官员们收买哈莱特，提出用 2 磅中国茶叶换 1 磅西洋参。哈莱特接受了提议，带着不错的利润回到美国。

这个故事颇富戏剧色彩，但不止表面上这么简单。虽然英国官员以为他们自己快刀斩乱麻，根除了竞争威胁，但真相并非如此。希尔斯的真正意图就是让“哈里特”号到达开普敦，而不是中国。他早知道开普敦是对华贸易的热门停靠点，就是希望哈莱特在那里找到买家。因此，虽然“哈里特”号的航行足为谈资，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第一艘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船只。

1784 年 7 月，“哈里特”号回到美国，生动地向美国人展示了世界的剧变，并揭示出更光明的商业前景。一名爱国公民称赞“哈里特”号的到港“一定能让每个美国人兴奋不已，怀着对全能上帝的感激，打开他们的胸怀，在上帝的恩典下，

我们的商业将从桎梏中释放，并可能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无须经过英格兰那个腐烂岛国转手”。更形象的见证则是“哈里特”号带回的茶叶，波士顿人很快将这批茶叶抢购一空。[33]

1784 年 2 月初，“哈里特”号从波士顿出发时，“中国皇后”号还停泊在港口，但已一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货物已装妥，清关文件签署完毕，官员和水手都已待命。在格林的船舱中藏有一份颇有意思的文件，文件的起草者相信，这份文件事关此次航行的成败。由于这是两国交往史上第一遭，船东们对于在中国能得到何种待遇并无把握。因此，他们认为应当让格林带上一份美国政府出具的正式介绍信，以免船只的合法性和目的遭到怀疑。这份大陆会议提供的海上通行证意在使船只所到之处便利通行，内容冗长滑稽，带着近乎谄媚的称呼。文件开头写道，“致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最尊贵、最最强盛、崇高、杰出、尊贵、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王、共和、王子、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贵宝地的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或世俗”。信函继续在文中申明，“中国皇后”号“属于”美国公民，并请求迎接格林的有关人等能“善意、得体地对待它”，同时允许格林“在合适的地点以适当方式从事交易”。[34]

2 月 22 日，纽约的坚冰终于消融殆尽，“中国皇后”号沿东河而下，经过曼哈顿一角的大炮台和乔治堡，岸上的人

群发出三声欢呼。格林命令水手鸣枪 13 响代表 13 个州，乔治堡以加农炮回礼。格林在船上看着岸边兴奋欢腾的场景，他一定不会漏掉乔治堡上飘动的美国国旗。短短几个月内，世界已经天翻地覆。3 个月前，英军还占领着纽约市，飘扬在堡垒上的还是英国国旗，而不是星条旗。英军最后于 1783 年 11 月 25 日下午撤出纽约，这一天后来也被命名为“英军撤退纪念日”。但就在离开之前，英国人再次侮辱了殖民地一回。

当天，英国人的船只一起航，诺克斯带领的美国军队就在纽约市民的欢呼声中列队前进到乔治堡，准备迎接华盛顿将军的凯旋，庆祝正式夺回这座城市。然而，人们突然看到堡垒的旗杆上仍飘扬着英国国旗，更令他们愤怒的是，英国人砍掉了升旗索，拉掉了防滑钉，将英国国旗钉在旗杆上，在旗杆上涂了油。几个男人试着爬上旗杆扯掉有意羞辱的英国国旗，但没能成功。人们随即四处寻找锯子、木头和钉子，将新的防滑钉固定在旗杆上。一名年轻的水手开始沿着旗杆向上爬，有人送来梯子，水手登上梯子，扯下英国国旗，挂上美利坚的星条旗，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并传来 13 响枪声致意。[35]

随着“中国皇后”号进入到乔治堡的视线内，美国终于将英国人和他们的鄙视抛在脑后。《纽约信息和美国广告人》（*New York Packet and American Advertiser*）观察到，“我们可以从民众的表情看到，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畅想与东印度的交

易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新财富，纷纷对‘中国皇后’号的成功送上祝愿”。[36]另一份报纸补充，“船长和水手们……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自豪地作为第一批使者，在上帝的眷顾下，将合众国的商业版图扩展到遥远的东方和我们从未涉足的国度”。[37]

有着“独立战争诗人”之称的著名诗人 P. 弗瑞诺（Philip Freneau）写过一首真诚的爱国诗篇纪念这一时刻，这里摘录几节：

女神柏洛娜[①]扫清障碍
张开翅膀迎接太阳
乔治曾禁止出航的宝地
现在已经张开双臂
……

到炽热的国度
到遥远的岛屿
她孜孜以寻
中国的海岸遥遥在望

无需英王的批准

① 柏洛娜，罗马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便可带回芬芳的茶叶
镶金的瓷器
工艺更胜一筹
……

——

货物满满！漂洋过海
一路顺风，好运常在
满载亚洲的货物
重回故乡的海岸[38]

正式出发后，“中国皇后”号先穿过大西洋，在佛得角停靠后转向非洲南端，并经印度洋于7月18日到达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在离开纽约后近两周的航程中，仅有的惊险不过是一股持续了一周的大西洋狂风，这股风频频袭击“中国皇后”号，巨浪一度拍打到舷窗，还有一次引起船只猛烈摇晃，以至格林船长抓住栏杆时擦伤了手臂和头部。除此之外，据船上的事务长J. 斯威夫特（John Swift）说，这次航行堪称乏味之至。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一路历经波折，白白辜负了天空和海水，从没见过令人振奋的风景。如此之长的旅途让我倍感疲劳，最难挨的是，还有1600英里才能到终点”。尽管斯威夫特的抱怨言犹在耳，“中国皇后”号完成的却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航行，格林利用S. 邓恩（Samuel Dunn）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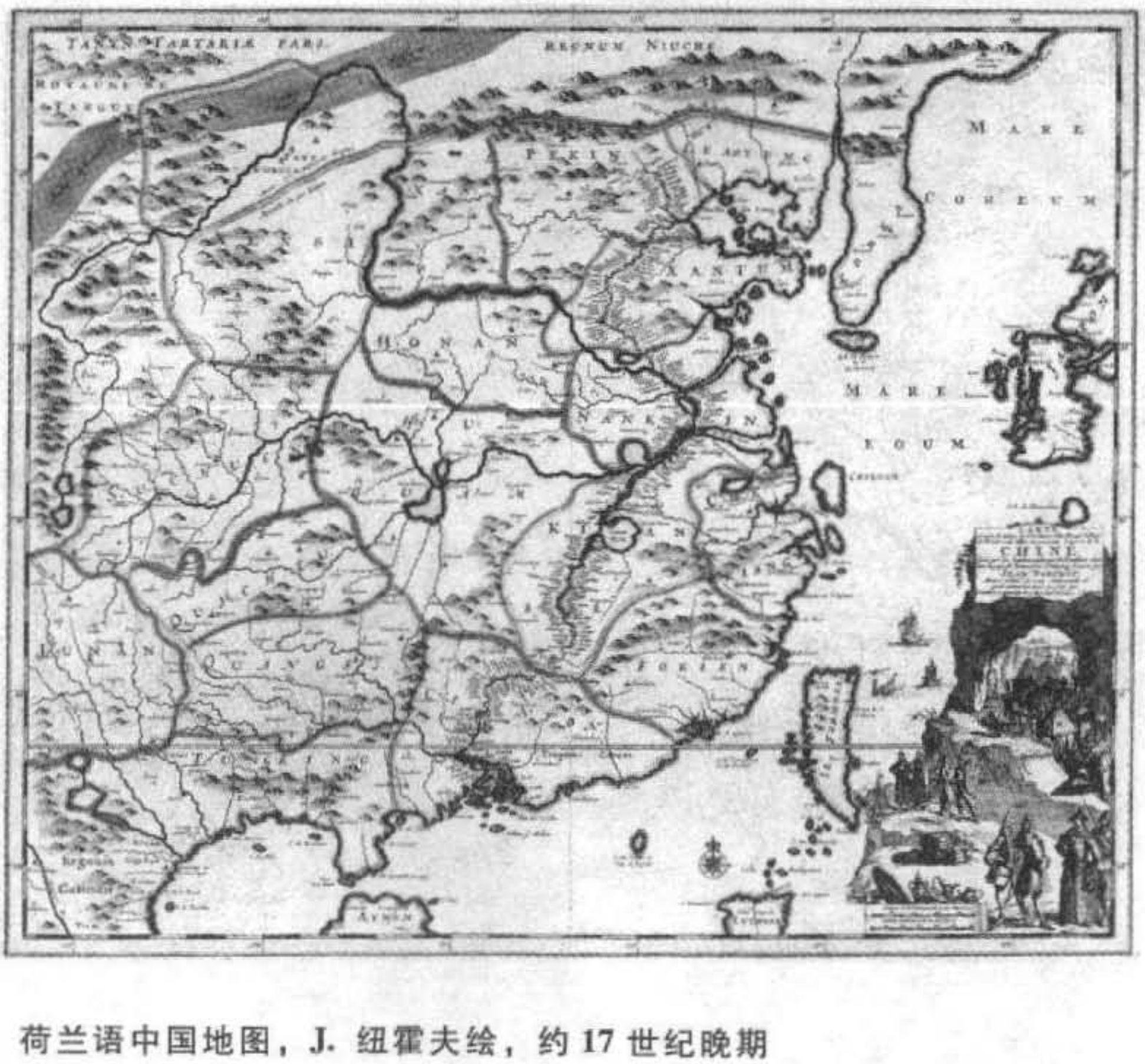
近出版的《东印度群岛新录》（*A New Directory for the East-Indies*）作为地图和航行指南。[39]不过，就当他们从巽他海峡准备穿过爪哇海和中国南海的时候，危险却悄然而至，一方面是航向的挑战，更大的威胁则是经常出没于这片水域的海盗，他们常常在航线上逡巡，一旦有机会，便凶狠地攻击商船。就在此时，友人出现了。

23

就在“中国皇后”号抵达海峡的时候，两艘法国船“海王星”号和“费比乌斯”号也停泊在其中的一处港湾。“海王星”号的奥尔德林（d'Ordelin）船长和一些士官拜访了“中国皇后”号，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并邀请他们参加次日的晚餐。在“海王星”号的晚餐上，觥筹交错间，双方说起独立战争，以及美国人和法国同盟者如何战胜了强大的不列颠之狮。奥尔德林船长还带来一则好消息，就在他离开巴黎之前，拉斐特（Marquis de Lafayette）被授予辛西那提协会勋章，法国人民“对于这个机构为美国带来的荣誉十分欣赏”。更重要的是，奥尔德林还提出，护送“中国皇后”号到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法国船长已经来过中国11次，对水道和危险之处都了如指掌。“海王星”号配有16门轻型加农炮和184名水手，足以让海盗在发动攻击前有所忌惮。[40]

7月22日，日出时分，“中国皇后”号和“海王星”号起航，30多天后，他们抵达中国珠江口。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和最古老的国家就要直面对方。美国人终于登上“中央王国”的土地。

第二章　中央王国



荷兰语中国地图，J. 纽霍夫绘，约 17 世纪晚期

著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经济研究之外，也对人性有着敏锐观察。他说，人类有一种“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天性”。[1]这种天性是何时打开了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已经无从知晓。但至少在“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2000年前，这种贸易形式就已经出现。美国人不久就发现，历经千年，中国形成了一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规则。

中国最早向欧洲输入的产品很可能是丝绸。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提到，希腊科斯岛有一妇人将丝织成透明的衣服。不久之后，罗马人就对这种轻薄的衣料爱恨交加，他们称之为“织风”（“woven wind”），重量与黄金等价。罗马的权贵用质地轻薄、色彩丰富的丝织服装装扮自己，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衣料过于轻薄。塞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就曾叹道：“丝绸衣服，如果算是衣服的话，既不能保暖也不能遮羞；妇女穿上它，就是毫无羞愧地承认，自己与赤身裸体无异。这些衣料代价不菲，而目的只是让我们的妇人像对密室中的奸夫一样，向公众展示身体！”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担心的则不只是丝绸对女性道德的影响，更忧虑穿上丝绸的男人会丧失男性气概——他们最好穿上羊毛、皮革，而不是这种轻薄、柔软的丝绸！[2]

但市场并没有理会这些批评，中国丝绸还是通过多条延伸到亚洲腹地的线路流向希腊和罗马，其中有些线路长达6000英里以上，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这项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商。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国商人随着

中国的染色和络丝工艺，T. 阿洛姆绘，约 1843 年

骆驼商队，在连通东西方的这条财富通衢上往来不息，一路上以货易货，带回的丝绸在中东的巴扎上出售，随即销往地中海沿岸各地。此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经印度、波斯湾和红海的各大港口，再由路上转运到最终的目的地。

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了解中国，只是把远东泛泛地称为“赛利卡”（Serica），即“丝之国”，当地的人民则被称为“赛里斯”（Seres），即“丝之民”。对于丝绸的来源，他们同样一无所知。老普林尼称，丝绸是一种长在树叶上的“羊毛”。农人把毛茸茸的叶子“浸过水”后，就能轻松地“刮出白色的丝”。[3]事实上，真实的故事总是有趣得多。

丝绸产自中国北方的家蚕。蚕以桑树叶为食，之后吐出蚕丝成茧，单股丝的长度可达 1 英里。一到两周内，蚕茧中的蛹变为灰白色的蛾后破茧而出。获得优质蚕丝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蚕茧的完好。如果蛾子挤破蚕茧，蚕丝就会断开，失去使用价值。因此，人们将蚕蛹投入滚水，煮熟蚕茧的同时，使粘住蚕丝的胶质溶解。只要找到整条丝的末尾，蚕茧就会散开，许多蚕丝被缠绕起来并缫到线轴上。[4]

传说记载，公元前 2600 年前后，黄帝的妻子嫘祖偶然间发现了蚕丝的奥秘。据说，嫘祖被花园中咀嚼桑叶的蚕所吸引，看到蚕丝成茧后破茧而出更大感惊奇。在细看一个蚕茧时，她失手将茧落在一杯热茶中。她拨开浸湿的丝块，发现一条条丝线慢慢散开。她从水中拉出一条丝，惊讶地看到丝纤维垂悬于自己的手指上。嫘祖很快就教会了别人养蚕、加工蚕茧以及织丝的方法，让她得到了“蚕母娘娘”的称号。但事实上，嫘祖的出场或许有些姗姗来迟。目前已经发掘出公元前 3000 年以前的染色丝和缫丝工具，而公元前 4900 年的一只象牙杯更刻画了可能是养蚕的场景，表明蚕丝业的历史或可溯及上古。[5]

无论养蚕业是如何开始的，它都很快就成为中国人最苦心经营的技艺，逐渐形成了丰富的养蚕知识，包括照顾蚕子和蚕蛹以及处理蚕茧的实用而明确的建议。但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例如，培育蚕蛹的地方需要绝对安静，不能有任何噪声和男人的喧哗，因为蚕宝宝喜欢睡眠，对尖锐的声音很敏感，会被叫喊或哭泣声惊醒。只有绝对干净的人才允许进入蚕房，

因此，一个月中有过房事或正处于生理期的女性都不准进入。养蚕的秘诀被当成国家机密小心翼翼地守护起来，任何人一旦被发现向外国人透露这些信息，或将蚕子或蚕蛹运出中国，都会被处死。[6]

如是许多年来，死亡的阴影一直有效地充当着威慑力量，但秘密最终还是流出了国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就有中国人冒着断头的风险，将蚕和桑树籽偷偷带到朝鲜。公元 3 世纪，日本人也利用中国移植的物种，或作为从朝鲜获取的战利品，掌握了必要的财力和技术，开始了本国的蚕丝业。后来，527 ~ 565 年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凭借国家资助的间谍活动，也发展起丝织业。在他统治时期，上层社会对丝绸的需求空前高涨，但在供应方面仍有一个问题。查士丁尼的死敌波斯人控制着从东方到西方的丝绸运输。罗马和波斯兵戎相见时，交通就会被切断，而承平之时，波斯人又会狠敲罗马人的竹杠。因此，当两名曾在中国传教的景教教士提出到中国偷运蚕蛹，打破波斯中间商的把持时，查士丁尼为此提供了经济资助，送两人东去。两名教士不辱使命，于公元 555 年返回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们向查士丁尼跪下，打开空心手杖的顶盖，并向大帝呈上藏在里面的蚕子。他们还传授了养蚕的知识，加上当地的桑树叶，罗马终于有了自己的蚕丝业。随后，养蚕的秘密逐渐传播开来，到中世纪晚期，印度、埃及、叙利亚、波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格兰均已能产丝。尽管有如此多的国家能够制作丝绸，并打破了中国对丝绸出口

的垄断，但中国丝绸依然以世界最高的品质向外出口。[7]

尽管欧洲人最垂涎的是丝绸，但他们渴求的中国物产并不
29 止于此。从丝绸之路的早期到 15 世纪初，欧洲人还从中国购买各类货物，包括香料、铜、珍珠、黄金、红宝石、玉雕以及用作泻药的大黄。进入 15 世纪晚期，中国陶瓷也经由丝绸之路流向西方，其中最受青睐的是瓷器。瓷器由中国人发明，将白色高岭土和细腻的瓷土石混合、加水，在模具中成型，并以高温烧制，制成精巧耐热、光洁防水的半透明瓷器。彩色釉和美轮美奂的装饰描绘更让瓷器超凡脱俗，成为人类手工艺品的巅峰之作。[8]

绘有广州风光的盖碗和碟，约 1780 年

欧洲人欣赏中国器物的同时，也着迷于中国文化，或者说，是从来往这个遥远帝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那里了解到的吉光片羽。这些旅行者中，最著名的要属威尼斯探险家和商人马可·波罗。他和父亲尼可洛及叔叔马菲奥在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宫廷中任职达 17 年。1295 年，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旋即参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后被监禁近一年，在狱中，他认识了作家，比萨的鲁斯蒂谦（Rustichello of Pisa）。一听到马可·波罗的经历，鲁斯蒂谦就知道必有文章可做。两人决定合作写作一本书，记录马可·波罗的所见所闻，这就是 1300 年前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总体而言，这本游记充满了对忽必烈的赞歌，全书开始即告诉读者，伟大的忽必烈，“万王之王，从亚当到现在，统辖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富实力的大汗”。书中描绘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华美场景，又以中国为最，包括富丽宏伟的宫殿、造型优雅的拱桥、惊心动魄的战争、大运河、奢靡的宴席和节日以及豪华的丝绸。说到杭州，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堂之城”，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华贵的城市，赏心乐事俯拾即是，令人如身在天堂”。[9]

同时代的人认为马可·波罗的故事纯属空想，因此这本书也被称为《百万》（*Il Milione*），暗示其中充斥“百万”个谎言。这种说法不无根据。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谙熟戏剧，在这本意在激发读者兴趣而非忠实记录的书中，他们加入了不少

虚构和夸张的成分。但是，马可·波罗记录的大部分故事确有其事。即便他所称的只有半数属实，欧洲人也有足够的理由为中国人深深倾倒。在他游历东方的时代，中国堪称当时最发达的文明国度。诸多伟大发明出自中国，包括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当然还有丝线和陶瓷。在艺术、文学、科学领域，中国人同样冠绝全球。一名 13 世纪中期来到中国的方济会修士写道，“中国人在每一艺术门类中的匠心天工都无与伦比”。中国人在出版方面也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印制出无以计数的历史、政治、科学、宗教书籍乃至诗歌、戏文小说等作品。[10]

虽然欧洲人有理由钦慕中国文明，但中国人对于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印象却很模糊。中国人一千多年来都深信，他们是天下最独特的民族。皇帝被认为是“天子”，根据“天命”来统治国家。有了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自认为是“中央王国”或“天朝”，仅次于上天。因此，中国人将外国人都目为未开化的蛮夷，尤其是当中国人和文化成就稍逊的近邻比较时，这种信念就更为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会对外国人关上大门，事实上，他们很欢迎并且鼓励这种往来。但接触的条件是接受中国独特论的大背景。换言之，蛮夷们得知道自己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很明显，他们的地位远低于中国人。[11]

中国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标尺，也期望所有其他国家主动接受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崇高地位。毕竟，中国人认为，只要蛮夷目睹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除了承认中国确实高人一等，

怎么可能会有其他结论？为表示对这种地位差距的认同，中国人希望外国人向皇帝派出使节、进贡礼物，并向天子叩头来确认从属地位。叩头须下跪 3 次，每次以前额触地 3 次，亦即所谓的“三跪九叩”。这套臣服的仪式完成后，使节们就会得到珍贵的礼物作为赏赐，而他们的国家也正式成为附属国，在实际上确立为中华帝国的藩属，并成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大同天下”的新分子。随这一转变而来的，是最重要的奖品——与中国贸易的权利。如果外国人没有提供足够的朝贡，或是在帝国内造成麻烦，他们的贸易特权也会被取消。[12]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使团是出现在 15 世纪，由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郑和奉皇帝之命，在 1405 到 1433 年之间，指挥七艘全副武装的宝船，到访了超过 30 个国家，一路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经爪哇和苏门答腊到红海及至非洲东岸。这一系列远航浩浩荡荡，船只常有数百艘，船上人员更以万计。一些船只长逾 400 英尺，宽达 180 英尺，比当时任何西方国家的船只都更加壮观。宝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上舰队，确保了中国作为实力最强的海上力量的地位。

尽管宝船队卷入了一些军事行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却是“展示新大明王朝的雄威”，并增加藩属国的数量。两个目标都如愿达成，遗憾的是，1433 年的最后一次远航之后，当时的宣德皇帝停止了所有海上探险，原因之一是资金问题。宝船的修造和装备费用很快让帝国的财政吃紧，许多人认为这些资金更应当用于加强边防和国内民生。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把持朝廷

的儒家官僚“不喜欢番邦接触及其对儒教伦理的影响”，并强烈地驳斥了任何与蛮夷进一步往来的尝试。[13]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明朝皇帝真的命令船队远行到大西洋或太平洋，后来的故事将会怎样。或许，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全球探索和发现的伟大时代中，主角就会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和假设相反，中国人选择的是关注自身，依然坚信自己是“中央王国”。而正当中国向内收缩之时，欧洲开始将注意力更多投向远东。这意味着，不用多久，更多的蛮夷就会敲响中国的大门。

欧洲从中世纪走出之时，通往远东的生命线几乎完全被切断。14 世纪晚期，蒙古帝国瓦解，1453 年，奥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随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地中海东岸，严重干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货物流通。尽管这些货物依然能够运往西方，但商人往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要想得到远东的商品，特别是确保价格合理，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经过其他国家的线路数量有限，而且很容易因变幻莫测的政局而随时中断，因此，欧洲人希望建立能方便控制的海上线路来抵达东方。[14]

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许多欧洲强国纷纷开辟出通往远东的海上线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烹调食物用的东方香料，其中大部分从一开始就是欧亚贸易的货物。西班牙是第一个试图找到海上东方航线的国家，1492 年就派出哥伦布带领的船队。尽管哥伦
34 布自己深信他发现的是“印度”，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项荣

誉属于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他于1497年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这是东方香料贸易的一个重要交通点。其后几十年中，其他探险船队将葡萄牙人的路线延伸到马来半岛和著名的“香料群岛”（今天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

西班牙并不是第一个到达远东的国家，自然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因此，当失意的葡萄牙贵族麦哲伦来到西班牙，提出西行绕过非洲南端到达香料群岛时，西班牙国王决定赞助他的航行。1521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不幸死于当地土著的斗争，但他的手下继续前行，在香料群岛交易到香料，尽管开始出发的五只船中仅有一只回到西班牙，但他们却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的壮举。接下来到达远东的是荷兰人，他们在16世纪末抵达爪哇，几年之后英国人也到达这里，并在爪哇与香料群岛开展贸易。

就像寻找水的植物一样，欧洲人将他们的根系伸向远东，踏上任何能找到香料的据点。除了主要目标香料之外，中国的珍宝也是搜寻的对象。最初，欧洲人在多个交易香料的港口购买中国货物。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整个远东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市场，数以千计的大小船只穿行东西南北，寻找货物的买家，并将其他国家的丰富物产带回本国市场。中国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繁荣的贸易体系中，因此整个地区到处都可以找到中国货物。[15]

但欧洲人并不满足于和中国的间接交易，他们希望直接和中央王国建立贸易往来。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人对

35 欧洲人十分警惕，原因不难理解。中国过去接触的外国人大体上恭顺平和，感兴趣的只是做生意，而新来的欧洲人则孔武好斗、难以捉摸，在交易货物之外，有时还试图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对于葡萄牙人肆无忌惮的行为，历史学家 C. P. 菲兹杰拉德（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曾评价说，“贸易只是掠夺不成的次选方案。如果对手实力较弱或准备不足，葡萄牙人就会攻击对方的船只和城市，屠杀‘异教徒’，并将港口作为贸易基地。如果对手实力强大或备战充分，葡萄牙人则会与之贸易，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更愿意充当掠夺者的角色”。欧洲人还没有威胁或杀戮亚洲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互相攻击。为了满足获取东方货物的贪欲或是阻挠对手，他们还经常诉诸海盗甚至谋杀行为。[16]

最开始，中国人拒绝了欧洲人直接贸易的要求，但是后者极其固执，中国人逐渐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要欧洲人用来支付货款的白银。因为中国的赋税以白银征收，白银愈多，政府和军力也就会更加充实。但是，中国无意让欧洲国家成为附属国，而只是希望欧洲人安分守己，尽可能远离京城。因此，虽然几个欧洲国家向皇帝派出了正式的朝贡使团，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仍然是纯粹的贸易往来。无论如何，在皇帝眼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附属国，无论他们向北京进贡与否。

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半岛，首先取得了直接贸易权，并以此为基地将贸易扩展到广州——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尽管葡萄牙人素以好斗见称，名声不佳，但鉴于

他们许诺驱逐海盗，中国还是允许葡萄牙人在当地开展贸易。17 世纪晚期，英国人和荷兰人也逐渐得手，开始在舟山、厦门、台湾岛开展贸易。到 18 世纪初，对外贸易越来越集中到广州，商人不仅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国，还有法国人、丹麦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瑞典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人开始将外国人称为“番鬼”，并使用不同名目的“鬼”称呼他们，以作区分，例如，英国人是“红毛鬼”，葡萄牙人则是“西洋鬼”。[17]

36

作为贸易中心，广州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所有中国港口中，广州到欧洲的路程最近，与外国人贸易的历史最久，规则也最清晰。珠江及众多支流横贯广州，使之可以方便地汇集各地的供应商和原材料，交易来自内陆的货物。而大量的手工艺人也提供了修船、建屋所需的技能以及一般的商业服务。

37

1757 年，乾隆帝下令将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限于广州一处，并根据所谓“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开展交易（不包括另有安排的俄国人和日本人）。由于事实上所有的外国人都利用广州作为贸易据点，这道命令切合实际，但同时也不乏政治上的考量。在与傲慢、危险的欧洲人经过近两百年的直接贸易后，中国人已经看出，欧洲人绝非安分守己之辈。将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中国当局就能严格控制外国人，从而确保天朝的平静与安宁。此外，中国担心的不仅是欧洲桀骜难驯的商人可能带来的近患，更有外国人进犯中国的远虑。早在 1717 年，康熙帝就敲响警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

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8]

根据“广州体制”，外国人在中国的商业之路从商船碇泊澳门水路（位于澳门东侧的珠江浅滩）开始。首先是船长拜会澳门海关，知会到港，面见当地官员，并获得部票，即被放行到下一程的官方许可。澳门海关提供引水船将船只引至 40 英里
38 以北的虎门海关。虎门的检查官记录下船员和武器的数量等信息，并发往广州。

商船带着新的引水员驶向广州以南约 12 英里的黄埔。黄埔位于珠江中心，地形狭长，海关两侧是稻田和橘子林，岛上的小村庄有居民数千人，岛上最醒目的则是九层石宝塔，同时也是来往珠江船只的导航标志。外国商船在这里停泊，由朝廷指定管理贸易的商人行会——公行关照和保护。公行最多由十三行商人组成，但通常只有不足十行的商人。每只船都会被安排一名行商，对该船外国人在广州时的行为全权负责。

行商需要确保洋人行为得体，如若不然，地方长官则会唯行商是问，并要求行商清偿一切债务。除支付海关费用、为商船采买货物并供给物资，行商还要负责招募通译，以便外国人与中国官员沟通。但这些通译往往名不符实，因为极少有人通晓欧洲语言，他们多半使用混合了走了音的英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洋泾浜英语，在外行人听来近于胡言乱语。解决沟通障碍的办法之一是教洋人粤语，但被抓到的中国人都会被问斩，这一点恐怕也殊非高见。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些外国人找
39 到愿意冒险的中国人，逐渐掌握了当地方言，也有些中国人粗

通类似程度的外文，因此至少双方高层官员的沟通能够互相达意。

行商还会雇请买办从事多项服务，包括维持外国人在广州的住处。买办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担任看银师的工作。广州的对外贸易多使用白银，由于没有中央金库或银行系统，商人们就需要找看银师称量并化验交易中使用的白银。每个看银师都有私人独有的印章，加盖在银币上，验证银币的成色和价值。经过这一程序的银币被称为戳记银元，流通地越广泛，戳记也就越多，有时几乎被戳记打裂为银片。时日一长，看银师店铺的地板间就会积下很多小银片，看银师有时甚至会将清扫地板的权利卖给有心之人，后者可保留找到的所有碎银，积累下来，也为数可观。

商船在黄埔停泊后，行商就会邀请上司，即海部[①]参观船只。盛装的海部大人在扈从陪同下，搭乘饰有丝绸飘带的船只登上商船。上船之后，首先是双方分别发表冗长的致辞，接着海部评估港口费用，即“规礼和船钞”。规礼又称“金沙”，是外国人为获得“入港特权”提供的礼物，一般以白银支付。船钞相当于吨位税，由海部的助手使用带尺丈量船只的长宽并计费。洋商也需要支付引航等其他费用，还得给出更多的规礼，因为向外国人提供任何协助的人都会索取小费，也通常会得到礼物作为回报。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在丈量结束后，海部向随船

①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译者注

大班提出观赏“发条钟”等机械以及其他船上珍奇物品。宝物摆出之后，海部就会挑走最好的几个，并让行商代表他买下。行商则以实际价值的零头将这些物品卖给海部，作为对他巡视的感谢。而海部再将这些物品的一部分呈送给自己的长官，答谢被任命为海关官员。

上述程序结束之后，就到了整个程序的最后阶段。船只和船上官员、水手在黄埔待命，而随船大班则带上外国人希望交易的货物，继续前往广州。到达广州牡驴尖后，大班会被护送到商馆，在 10 月到次年 3 月的交易季中，这里兼具交易与住所之用。商馆由行商租借给外国人，一面临珠江，三面围墙，面积仅 12 英亩，实为独立的城中城。交易季临近结束时，采购到的货物装上快船发回黄埔，并转送到商船上。在离开广州前，外国人向他们所属的行商致谢，支出更多规礼，并得到盖有海部大印的关文作为离港许可。[19]

为确保洋人了解在中国的得体行为，并依照行事，道光帝颁布了《八条章程》。其中明定：所有兵船不得驶入虎门。为商船转运货物之兵船必须停泊外洋，直至商船准备起航，然后一同驶离。商船不得在口外游荡。夷人不得随意在海湾游玩，不得将交税货物卖于民人，以免走私货物。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游乐。每月只 3 天方可外出兜风，到花园和佛寺游玩，但每次不得超过 10 人，游毕必须返回商馆，不得在外过夜，或聚众滥饮。八条之外，其他的清朝律例也限制了外国人在广州逗留的时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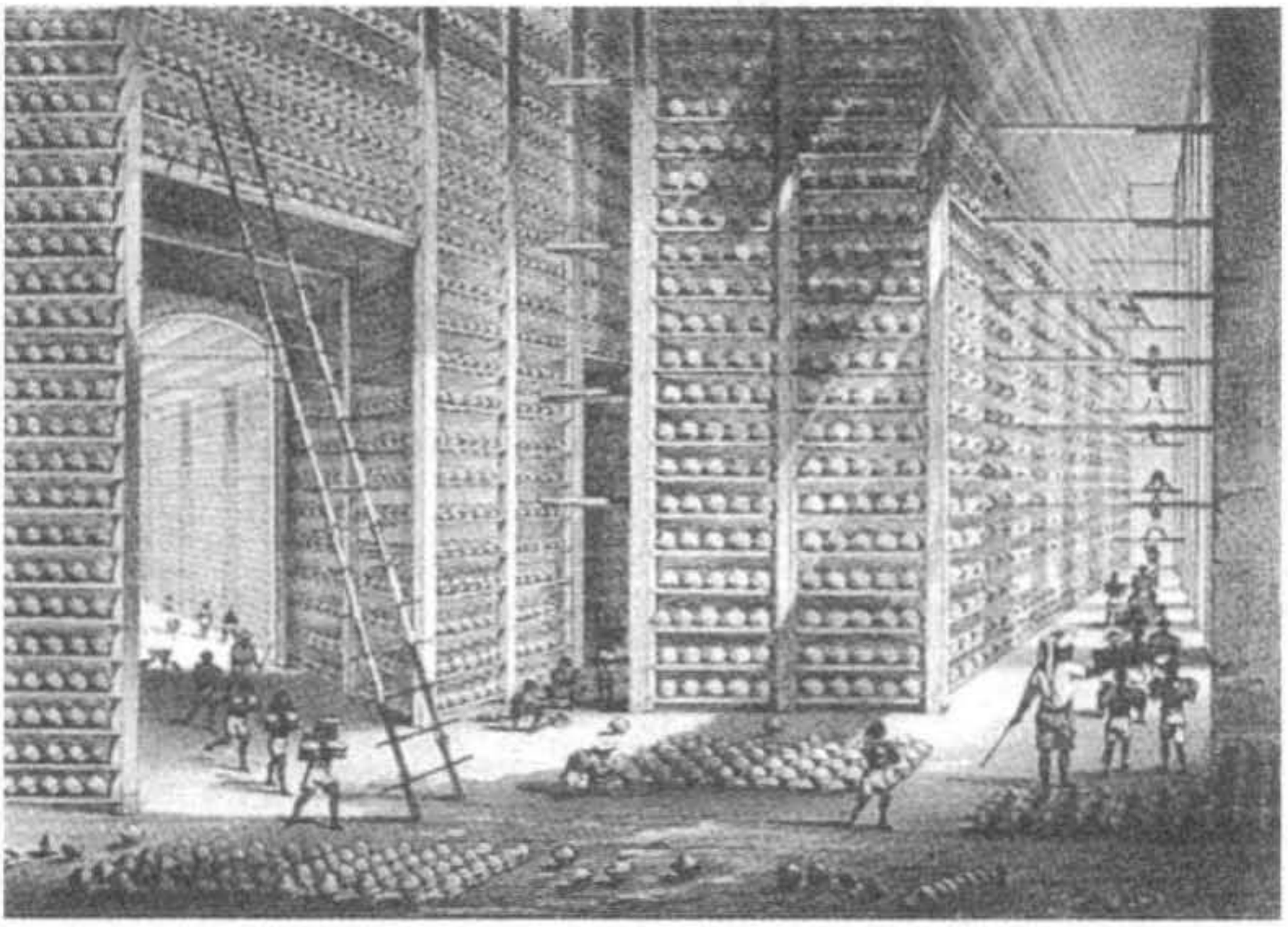
交易季间，外国人可以住在商馆内，一旦交易季结束，他们就得立即离开，或打道回府，或驻留澳门，直至下次交易季开始。个中原因很简单，在朝廷看来，只要能限制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也就能降低当地人受到外来影响蛊惑的可能。[20]

广州体制建立时，中国与欧洲的直接及间接贸易已经进行了近2000年。在此期间，货物的数量和性质时有起伏变化，反映出供需的变迁。有时，也会有新的货物加入交易，其中影响最著者又以鸦片和茶叶为最。这两项都是晚近才出现的贸易品，但后来却动摇了美国、英国、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势。

英文“鸦片”（opium）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pion，意为“罂粟汁”。在罂粟子荚成熟前切开，就会分泌出浓稠的乳液，即生鸦片。不同于无害的罂粟籽，鸦片含有吗啡等生物碱，使之成为强力毒品，而吗啡则可以合成为更危险的海洛因。在一到两周内，罂粟子荚会被切开多次，得到的鸦片经采集、干燥后压制成砖形或球形，以便运输和销售。鸦片制造需要大量人力，据估计，大约18000个子荚，即1英亩的罂粟花才能制成20磅的鸦片。[21]

第一株罂粟在何时何处出现已不可考，但瑞士曾发现过这种植物最古老的腐化遗迹，时间早至公元前4000年。罂粟有可能原产于此地，但是也有人主张原产地更接近东方，历史更久。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1000年，罂粟已经出现在欧洲、北非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人们将鸦片直接食用或溶于酒精，治疗多种疾病，如头痛、哮喘、忧郁。在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

中，诗人称鸦片“平息所有的痛苦和争吵”，而同时代的希腊人也将鸦片用作镇静剂，以及取得更高精神状态的手段。滥觞于此的植物和药物鸦片开始向东传播。[22]



印度鸦片球在装箱前堆放并使其干燥，送往加尔各答，而后运往中国，约 1850 年

鸦片首次传入中国的时间并没有准确记载。有些文献指向了公元 3 世纪，但直至公元 7 世纪到 8 世纪才出现较为确切的证据。那时，阿拉伯人已经开始和中国人开展交易鸦片，而中国人也开始种植并采集罂粟花。之后的好几个世纪，鸦片的使用范围很有限，只限于上层精英用作药材，而人们又认为鸦片能“壮阳强精，重振雄风”，有助“炼丹和房中术”，因此也常

被用于催情。这段时期，鸦片都是溶解后食用或饮用，直至欧洲人到来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吸食鸦片。[23]

16 世纪早期，欧洲人才发现吸食烟草能产生令人上瘾的快 43
感，在 16 世纪下半叶就将烟草引入中国。17 世纪，荷兰人将少量鸦片添加到烟草中，增其劲道，中国人很快开始效仿。到 17 世纪晚期，则将烟草完全抛弃，而直接吸食鸦片本身。鸦片球或烟砖需要先经过浸水、切碎、煮沸、搅拌，将溶液滤出后再次煮沸和搅拌，去掉大部分水分，再冷却得到浓厚的混合浆，并放置几个月硬化后方能吸食。全套程序下来，“三磅生鸦片可以产出两磅鸦片烟”。[24]

抽鸦片的过程和抽烟草完全不同。鸦片枪通常以竹或木制 44
成，长近 2 英寸，宽 1 ~ 1.5 英寸。门把手形状的瓷烟枪头通过中空的金属件连接到烟枪的一个洞上，烟枪头上方有另一个略大于针孔的开口。吸食者将一小撮烟土放入烟斗末端烧热，之后放入烟枪头顶端的洞中。吸烟片者或坐或卧，口含烟枪嘴，手托着烟枪头。随着鸦片开始“噼啪”生烟，吸食者大约 30 秒吸入并呼出一次，直至烟土烧尽。

由于烟气会浸入肺部，鸦片进入身体系统，造成全身被浸润的感觉。英国医生 D. 麦佛逊（Duncan McPherson）曾在 19 世纪中期吸食鸦片，记述了这种奇特的体验：

> 脉搏加快，更强劲有力……皮肤温度提高，肤色泛红……温暖的灼热感和极度舒畅愉悦的感觉传遍身体……

感知更加鲜明、充满丰富想象……任何工作似乎都变得轻松、容易。精神焕发，忧愁消散。[25]

鸦片并不会对所有吸食者产生同样的效果，有些人可能会有其他感受，包括深度的安宁、嗜睡、晕眩、恶心以及强烈的饥饿感。

如果是口服，鸦片并不会很容易上瘾，然而，吸食则会使鸦片成为不折不扣的麻醉品，足以令人沉迷。对许多人来说，偶尔或者有规律的刺激就能满足，但还有一些人吸食成瘾，酿
45 成苦果。19 世纪初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鸦片吸食者“起初纯粹是跟风，但鸦片产生效果，习惯固定下来，昏睡的吸食者像尸体一样，消瘦憔悴如鬼魅”。[26]对此，麦佛逊补充道，“忧郁的个人成为这种毒品的奴隶，回避社会，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27]

一直到 18 世纪早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都不超过 200 箱（每箱约有 130～160 磅）。虽然中国本土也出产鸦片，但由于产量有限，加上吸食者对印度产烟土的偏好，这些年间的鸦片主要是由葡萄牙和荷兰商人从印度进口。即便在进口量较低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注意到鸦片的副作用。18 世纪 20 年代，雍正注意到，“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百病丛生，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
46 为盗”。雍正深以为患，1729 年，发布谕旨，禁止销售鸦片和经营烟寮或烟馆，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若私开烟馆，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T. 阿洛姆绘，1843 年

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但鸦片的药用和进口并未禁止，结果到了 1767 年，输入鸦片的数量已经达到 1000 箱。[28]

尽管鸦片对中国贸易的影响直至 18 世纪中期才逐渐显现，另一项产品——茶叶则早已成为贸易大宗。茶叶的起源和鸦片一样都已无从考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茶树首先出现在喜马拉雅山东部或更远一点的东南部，但确切的地点尚不清楚。首先发现茶叶可以冲泡的人也同样是个谜。传说中，公元前 2700 年，神农氏在华南考察草药时发现了茶叶。当时，他的随从停下休息，煮水饮用，一阵风忽然将附近茶树上的叶子吹进了水壶。神农尝了尝有点苦涩的茶汤，觉得味道不错，还惊讶地发现，茶汤既让人平静，也有助于恢复精力，于是收集了一些茶

叶，告诉同胞这个激动的发现。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谁泡出第一杯茶，但毫无疑问，是中国人首先栽种了茶树，使饮茶成为一种艺术，并传播到世界各地。[29]

中国文献中关于茶叶最早的可靠记载出现在公元3世纪或
47 4世纪，当时全国逐渐开始种植茶树（而不是从野茶树采茶）。接下来的几百年中，饮茶的目的从医疗（被奉为治凝闷、头疼之良方）逐渐转变成健康和愉悦。公元8世纪晚期，陆羽撰写出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在书中，陆羽详细描述了茶叶的种植、冲泡和奉茶，他说，茶之精华，“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恭敬的饮茶之人应当有二十四件茶器，才能烹制并呈现一杯完美、和谐的茶。这包括铜或铁铸的风炉和茶碾，形制、色泽、大小合适的瓷碗。书中告诉读者，要选择最佳的水源，
48 以“山水”为上，并告诫“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以其久食令人有颈疾。陆羽忠告说“茶性俭，不宜广”。[30]

陆羽赞美茶叶的神秘的同时，中国诗人将这种美妙的饮料称为“玉液琼汁”，在卢仝最著名的诗作中写道：

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

六碗通仙灵。

茶树

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31]

同时代还有另一份较平实的评价，角度更为实用，“茶比酒好，不会让人喝醉了说胡话，事后又懊悔不已。茶比水好，不会传染疾病，或如井水般污脏”。如果还需要证实茶在中国的重要性，只要知道，陆羽和卢仝为茶叶书写赞歌之时，帝国的政府也在忙于提高茶叶的销售税。茶叶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如此显著，以致在宋朝就和柴米油盐酱醋一起，并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32]

尽管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茶叶作物，但公元 9 世纪，佛教徒成功地将茶籽从中国带到朝鲜和日本，随后茶叶的种植在两国开始生根。但对中世纪的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茶叶的传播仍是依赖贸易而非种植。茶叶经常被制成紧实的茶砖并作为货币使用，成为中国与北方、南方、西方商人交流的贸易品，从西伯利亚到西藏，沿丝绸之路直至中东，这种温和的饮料在公元 9 世纪中期就出现在各地的文献中。

葡萄牙人肯定在 16 世纪初就已经知道茶叶，并曾在他们到访过的远东港口尝过这种饮料的味道，但直至 1559 年，梵蒂冈人赖麦锡（Giambattista Ramusio）才从波斯旅行者那里听说了这种令人陶醉的饮料，因此写下了欧洲第一份有关茶叶的书面记载。51 年后的 1610 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进口到欧洲，从那时起，饮茶之风吹遍整个西方社会，而又以英格兰受影响最深。[33]

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商人已经在伦敦贩卖茶叶，1660年，伦敦著名咖啡馆店主T. 加拉韦（Thomas Garraway）用巨大的墙面向主顾宣传这种异国风情的饮料，“茶叶优点众多，在以古老、知识和智慧闻名的国度，茶叶的价格常常两倍于白银”。他还列举了如下好处，保证能激发渴望，就算最冷静的顾客，也会产生好奇：

> 让身体充满活力
> 消除呼吸困难，清视明目
> 驱走疲劳，净化胸腹
> 赶走多余睡眠，预防瞌睡
> 治疗感冒、水肿、坏血病[34]

1662年，查理二世的婚礼上，爱喝茶的葡萄牙新娘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公主在嫁妆中带上了一小份茶叶，从此，茶叶在整个英国社会，特别是妇女中风行起来。不久之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茶叶，到了18世纪初，整个英国上流社会都陶醉于饮茶，也唯有他们能负担得起这种价格不菲的东方奢侈品。人们饮茶的地点并不局限于家中，在伦敦的咖啡馆里，绅士们一边享用进口的咖啡和巧克力等美食佐茶，一边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35]

为饮茶之风推波助澜的还有内科医生，他们推荐利用这种饮料来增进健康。1679年，荷兰的C. 德克尔（Cornelis

Decker）医生建议大众每天至少喝 8 到 10 杯茶，“只要胃能承受，再多喝几杯也无妨”。为表诚意，外号“好茶医生”的德克尔带头示范，根据记录，他每天喝茶达 200 杯。虽然有谣言说是荷兰茶商买通了医生，因此质疑他的建议不无道理，但德克尔绝非唯一鼓吹茶叶的医生。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倾心于所谓的茶“德”，有些人激烈地批评这种调和饮料的有害影响。在德克尔医生抛出言论前多年，就有一位德国医生 S. 包利（Simon Pauli）说，“至于他们归于茶的美德，或许可以承认在东方确实如此，然而在我们的环境中，这些美德已经荡然无存。相反，茶变得非常危险，会加速死亡，特别是对年逾四十的人士”。[36]

51 最终，反对者还是落得下风，17 世纪晚期，喝茶迅速风行，获得了大批追随者。到了 18 世纪早期，英格兰的饮茶之风已经从家庭和咖啡馆，传到了环境优美的“茶庭园”（Tea Gardens）以及新出现的茶馆。其中，第一个茶馆由 T. 川宁（Thomas Twining）创办。1717 年，他将自己在伦敦的“汤姆咖啡馆”改造成“金里昂”茶馆。咖啡馆是男人的领地，而茶庭园和茶馆则男女咸宜，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茶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茶叶引入 100 多年后，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从每年数百磅上升到 1770 年的约 900 万磅。而这还只是官方数据。除此之外，为了避开政府对英属东印度公司合法进口的茶叶征收的重税，以荷兰为主的商人每年还将数百万磅茶叶走私到英国。[37]

茶叶大量涌入英国使价格变得平易近人，从此，无论贫富，人们都可享用这种饮料。1757 年，英国作家和评论家 T. 约翰逊（Samuel Johnson）描述了一幅自画像，这对他的数百万同胞们也一样适用。他称自己是，“典型顽固不化的茶鬼，20 年来唯以茶伴饭，茶壶鲜有冷却时，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38]而英国，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饮茶大国。

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分布在中部到南部，长江流域的南北两端各省则出产最好的茶叶。中国的茶叶生产不是依靠种植园，而是由无数个小型家庭茶园组成。茶树经反复修剪，在成熟时，高度刚好及腰，以利采摘。茶园通常分布在面东的山坡上，以便接受旭日照射。茶树间隔成行，远看就像是一条条绿带。从早春到暮夏，茶叶每年采摘三次。天气晴好时，茶农全家一起出动摘茶叶，每天大约可采 15 磅。

采摘之后的加工过程包括杀青、揉捻、干燥等步骤，有时需要重复这几步，务求去除多余的水分，同时保留某些成分，形成茶叶独有的风味。加工完成的茶叶被送到当地镇上，出售给行商的代理交易商。商人将茶叶装进板条箱压紧，通过水路运到行商在广州内外的仓库。茶叶在这里按种类和品质分类后，再次压紧后放入茶箱，卖给外国人。

中国的茶主要有两种，绿茶和红茶，差别在于加工方法的不同。这两个大类以下，又按多种因素分为小类，例如茶叶采摘时的新老与叶片大小、土壤条件以及最终产品中不同茶叶的

拼配。最早运往英格兰的主要是绿茶。但却有个缺点。绿茶之名得自于茶叶中保留了叶绿素，未经发酵，没有完全干燥，因此容易变质，对于经过半个地球运输的商品来说，这并不是上选。相反，红茶经过完全发酵，非常干燥，久储不坏。时日一长，由于担心变质和口感的变化，英国人喝的绿茶渐少，红茶徐增，红茶也因此成为进口茶叶之大宗。红茶中，以白毫为上品，其次为小种、功夫。最低等级为武夷红茶，其中除茶叶外，还混入了茶叶根和加工时的杂屑。绿茶的类似分等从最受推崇的饼茶到熙春茶再到松萝茶。

困扰喝茶人的一个问题是掺杂物，红茶和绿茶都是如此。中国和英国都有无良商人向茶叶中添加各种异物，泡出来的茶当然口味糟糕。例如，加入其他植物的叶子和泡过的茶叶增加体积，用普鲁士蓝、姜黄和各种植物染料让茶色看上去更诱人，加入石膏和铁粉增重，从而提高利润。还有一种方法是将灰叶晾干、烘烤、踩碎、收集、筛选，在羊粪和硫酸亚铁的溶液中浸泡，最后再经干燥后混入真茶叶中。[39]

随着时间变化的不只是茶叶的进口量和类型，还有喝茶和奉茶的方式。中国人并不向茶汤中添加他物，取茶叶的原本味道。他们用盈盈在握的瓷杯或瓷碗饮茶，免去烫伤之虞。相反，欧洲人则喜欢以糖奶入茶，增甜去苦，形成顺滑的口感。这一点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糖在热水中溶解最快，欧洲人遂以热茶奉之，这顺带造成了对带手柄杯子的需求，也就是后来的茶杯。为将糖送入茶杯，还诞生了茶匙。茶杯之下出现

的瓷碟则是为了放置用过的茶匙，同时也保护“茶桌”光亮的木桌面不被茶杯刮伤，或被溅出的茶水弄脏。茶碟还有另一个用处，即让不太讲究的人将热茶倒入茶碟中冷却，再直接从碟中一饮而尽，这也产生了一个词组“合意之人/事”[1]。最后一个改变是茶壶。茶壶并非欧洲人的首创，中国人早在至少一千年前发明了茶壶，欧洲人则喜欢体积更大、造型更圆润的银质或瓷质茶壶。

随着饮茶之风在欧洲兴起，也带动了对瓷器、银和糖的需求。每年有数百万件中国瓷器运往欧洲，银匠们夜以继日地打制茶匙和茶壶，满足沉迷于饮茶的民众，加勒比海和其他地区的蔗糖种植园规模迅速扩张，为茶杯中送去一丝清甜。但是这种甜蜜代价不菲。蔗糖的种植需要大量劳力，而 17 和 18 世纪，劳动力大多数来自非洲黑奴。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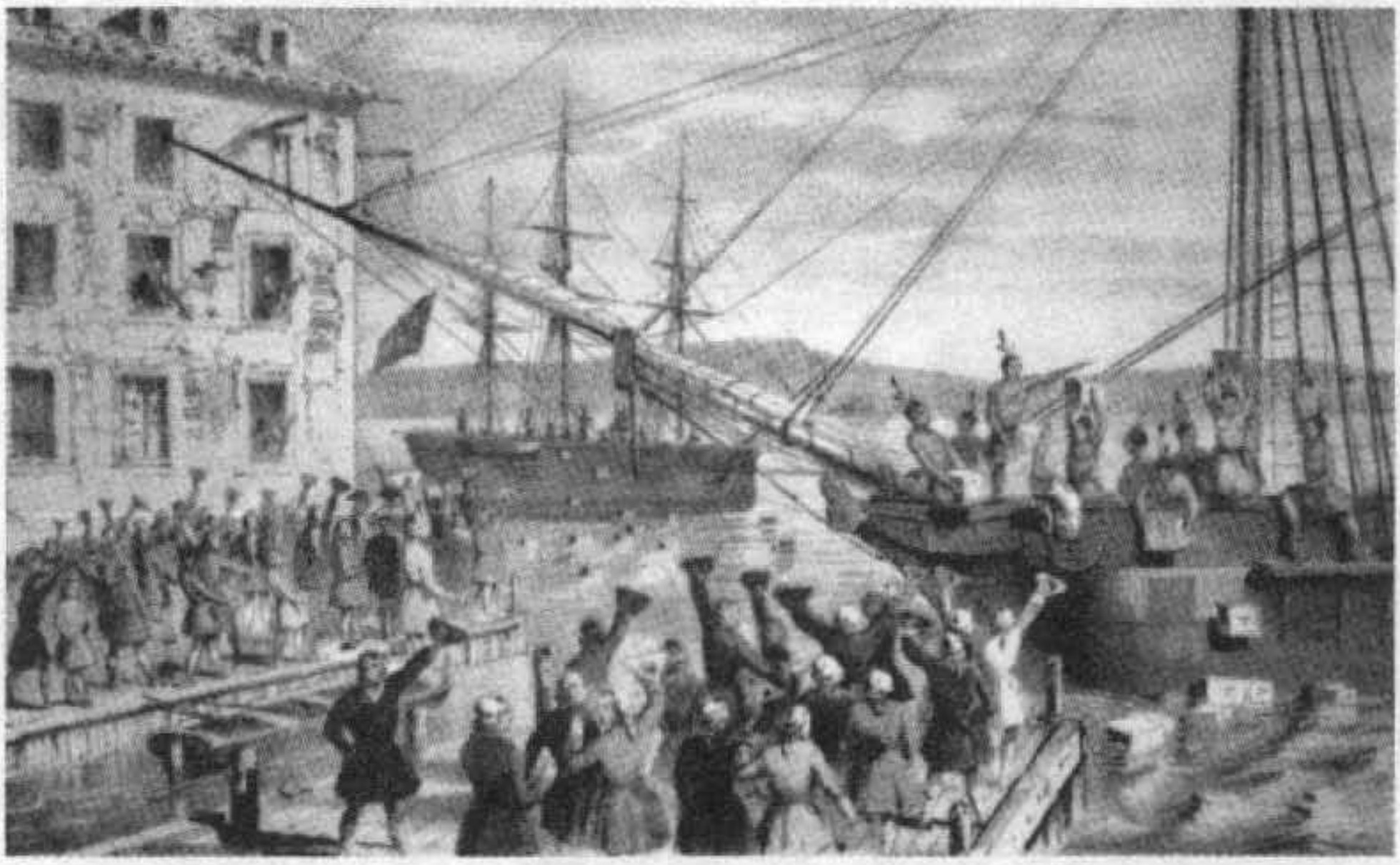
欧洲高涨的茶叶消费也使中国出口商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丝绸和瓷器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品。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竞争。自从景教教徒在 6 世纪将家蚕偷运出中国，西方的丝绸生产日益扩大，质量也逐渐改善。此外随着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例如 18 世纪早期德国梅森工厂开始烧制瓷器，中国瓷器已经不再是喝茶人或艺术鉴赏家的唯一选择。但是，中国丝绸和瓷器失色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茶叶成为中国商品的明星，欧

① 字面意思为“一碟茶”。——译者注

洲人对茶叶的需求超过其他任何产品。因此，从广州离开的欧洲商船装上了越来越多的茶叶，而“瓷器一度被埋在茶叶中防止破裂，现在只是作为压舱货而顺带捎上，使帆船的重量不致因携带干燥的茶叶而过轻”。[40]

大多数欧洲国家匆匆前往远东，想要在中国的贸易中分一杯羹，此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还在远处观望。尽管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贸易，也没有船只前往广州，他们却对中国极有兴趣。作为国际贸易网络的一分子，特别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北美殖民地也受到中国商品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些已经融入美国的文化景观。与中国的联系不仅提高了殖民地生活的水准，但更重要的是，为美国革命和前往中央王国的首次商业冒险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中国梦



1773 年 12 月 16 日，波士顿茶党。和画面相反，事件实际发生在夜间，人群安静。N. 科利尔绘，1846 年

56 看过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的读者都会记得，主人公克莱恩拜访荷兰富农范·塔塞尔的宅第，以求其女的芳心。当时是1790年，宅子坐落于纽约塔里敦，哈德逊河东岸一个叫做沉睡谷的偏僻峡谷。步入宅子的客厅，克莱恩看到“一桌地道的荷兰乡下茶点，在
57 一年中最丰裕的秋季……一碟碟堆得老高的蛋糕，各种各样，几乎无法形容”，还有美味的糕饼、熏牛肉、腌渍梅子、炙鲱鱼，“再加上一碗碗的牛奶与奶油，全都乱七八糟搁在一起……而又有那母性的茶壶在一切之间冒出一阵阵的热——天哪，我说的实在太不成话！”

即便在17世纪中叶，类似但略简朴的场景也不为过，当时纽约还是荷兰的殖民地新尼德兰。这是因为沉睡谷像文化的琥珀一样保存下来，居民的风俗与荷兰祖先相比少有变化。事实上，正是新尼德兰的殖民者在美国最先开始饮茶。由于他们喝的中国茶叶由荷兰供应，这片荷兰殖民地也就成为美国追慕中国风的发源地。[1]

1664年，英国占领新尼德兰并易名为纽约后，也顺带继承了一大批饮茶者。从那时开始，喝茶的风尚传遍整个北美殖民地。许多城市出现了仿照英国的咖啡馆和茶庭园。数千份报纸广告上推销起当地商店的上等进口茶。和在英格兰的传播方式类似，起先只是上层富人嗜好，随着茶叶进口量的提高，价格降低，风气也逐渐普及社会中下层。1759年，特拉华的一名教士写道：“茶、咖啡和巧克力，即便在最偏远的

人家也很常见，人们加上黑砂糖或粗糖，在日常饮用，或招待来客。”[2]

外人常常对殖民地居民如此沉迷于茶叶感到惊奇。1740年，到访波士顿的英国人 J. 班尼特（Joseph Bennett）观察到，“女士们热衷饮茶，沉迷于个中雅趣，仿效伦敦淑女的优雅，家务置之不理”。[3]在纽约市，人们逐渐不满足于口感普通的茶，当地官员于是设计了特制的“茶水泵”，从地下汲取甘甜的泉水。于是，挑剔的纽约人开始使用这种水代替其他城市劣质的井水，以求泡出一杯好茶。到了 18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大多数殖民地民众也成为忠实的茶叶爱好者。据估计，殖民地这段时期的年茶叶消耗量在 570 万 ~650 万磅。假设 1 磅茶叶冲泡 200 杯茶，这意味着美国人每年饮用 11 亿 ~13 亿杯茶，相当于每人每天饮用 1.4 ~1.6 杯茶。[4]

58

输往殖民地的中国货物并不只有茶叶。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中国丝绸、漆器、茶几，数量最多的则是陶瓷。历史学家 C. 弗兰克（Caroline Frank）指出，殖民地的中国工艺品几乎无所不在。比如，马萨诸塞州小渔镇马布尔黑德的 A. 克雷提（Andrew Cratey）船长 1695 年去世，留下了十几把漆椅和多件瓷器。35 年后，镇上另一个居民 N. 诺尔登（Nathaniel Norden）则给继承人留下了 23 件中国小瓷像。这些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在大陆东岸不断重复的情景。[5]

59

随着殖民地经济在 18 世纪中期的发展，富人购买中国货的节奏越来越快。即便是无力负担的中下人家也义无反顾地追随

瓷瓶与塑像的手工成型，约 1825 年

这股风潮，一位忧心忡忡的纽约人注意到这一问题，在 1734 年写道，“我得到可靠消息，茶叶和瓷器令本州每年耗费近 1 万镑，哪怕最拮据的人也定要买回茶叶，即便家人要的是面包。别人告诉我，他们经常当掉戒指和餐具，以满足这昂贵的嗜好。”17 世纪中叶，中国货物还只如溪水般少量进入殖民地，到了独立战争前夕，已经变成了滚滚洪流。即便买不到真正的中国货，也还有各类仿制品供选择。从 17 世纪开始，欧洲的工匠们以中式图案为蓝本，创造出多种多样装饰性和实用性兼具的中国风物品，从饭碗到花瓶，从挂毯到墙纸，不一而足。[6]

许多殖民地人，特别是富人，常常内心觉得自己在文化上

低人一等，因此对伦敦的潮流领导者亦步亦趋，仿效宗主国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例如，乔治·华盛顿在 1755 年就订购了他的第一套中国瓷器，他告诉伦敦的代理人，“选择合于时髦品味的器件，发来上等货色”，他后来又补充道，“请择时兴物件采买，否则勿送”。[7] 接下来的几年里，华盛顿和妻子玛莎在弗农山（Mount Veron）宅第中收集了大量中国瓷器。但是这股影响不止于工艺的模仿，美国人对中国器物的热爱仅仅反映了部分英国人的趣味。许多英格兰以外的国家都前往中国寻求财富，美国殖民地虽然还属于大英帝国，也受到全球的影响。殖民地人民对于中国货物的渴望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美国人新萌发的身份意识和审美品位，以及异国情调的吸引力逐渐升温。

理论上说，进入殖民地的所有中国货物都必须经手英国，更准确一点，是要通过独揽英帝国远东贸易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如果这还不足以限制中国货的流入，英国的航海条例则从根本上规定，美国只能直接和英国展开贸易。然而，英国为殖民地精心编织的商业网却漏洞重重。

17 世纪晚期，就有几十艘船只从美国沿岸出发，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红海，并带回远东的财富，其中也包括许多中国货品。这些船只全副武装，人们视之为海盗，或当做私掠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于劫掠其他国家的船只，而非和平的商业贸易。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殖民地总督的鼓励和皇室的委任，至少也得到了他们的默许。而作为回

报，总督往往能得到来自远东的战利品。

无论劫掠者的行为是否遭到英国皇室殖民地代表的惩罚，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或是航海条例都已颜面无存，对此，英国当局自然不能置之不理。皇室开始反击，利用海军、法院的力量，颁布打击海盗的新法律，并公开处死了若干违禁者，试图遏制侵犯英国公海利益的行为。到 18 世纪初，这个目标已经实现。[8]

61 对英国远东贸易控制权损害更为严重的是走私。美国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对走私者实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们将茶叶偷运进殖民地，而不支付任何关税。走私茶叶大多数来自荷兰，这一点让英国尤其难堪，因为英国航海条例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将荷兰和其他欧洲商人拒之于殖民地外。英国对荷兰的高度防范不无原因。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荷兰在军事和商业上都剑拔弩张，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从两国第一次到远东的航行之后，就为争夺独占该地区的贸易展开殊死竞争。因此，英国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让对手进入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

美国最主要的两名走私者不是别人，正是莫里斯和同伴维林。他们行船到荷属西印度群岛，购买茶叶之后调头返回。非法的茶叶贸易数量绝非很小。1757 年，一名费城商人估计，前两年中，费城消耗的茶叶中仅有十分之一是从英国合法进口，高达九成都是经由走私贩入。尽管准确数据已经无从考证，但据估计，到 18 世纪 70 年代初，流入殖民地的走私茶叶已经占到总消费量的 75% ~95% 。[9]

虽然中国商品的贸易有如此规模，合法与否暂且不论，但殖民地一般民众对于中国本身几乎一无所知，似乎只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异国色彩的神秘帝国。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或许耳闻稍多，但也不过是泛泛之论，而非深入了解。毕竟，只有极少数，可能仅五六个殖民地人曾经踏足中国，并且是作为英国船只的海员，因此无法对中国社会作出确切评价。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一人曾经将其想法付诸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但是，对于想要了解中国的北美殖民地人，还是有很多欧洲书籍可供阅读，这些书籍通常都展现了中央王国非常正面的形象。

这些书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本经典对中国的描述令所有读者都惊叹不已。另一本则是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General History of China*）。杜赫德本人未曾到过中国，而是根据曾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录编纂出这套四卷的巨著。该书“介绍了中国的政府、法律和哲学基础，可作为效仿的范本”，出版后极受欢迎，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拥有一套。杜赫德称，中国是“已知最不凡的国家”，全世界“最大最美的王国”。如果这些书还不足以让读者相信中国的不可思议，或许伏尔泰的意见能打动他们。尽管这位法国哲学家认为，欧洲在科学方面遥遥领先于中国，他却是个不可救药的中国迷，对中国的道德、农业、政治经济和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伏尔泰宣称：“4000年来，当我们尚在蒙昧之际，中国人

就已经知道万物皆有其用，而我们到今天还以了解这一点为荣。”[10]

然而，这些美好的形象却也被一些略显暗淡的方面所抵消。欧洲人用了几百年才打破中国的坚垒，在广州建立起稳定的交易据点。在长期的尝试中，欧洲人遭遇无数挫折、回绝和（至少他们自认为的）无礼对待（这点姑且不论，事实是，许多情况下，都是欧洲人对中国人态度不善，而非相反）。这种经历，加上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的观念，激怒了许多欧洲人。他们原本认为自己至少和中国不相上下，而且对于被称为“番鬼”或“蛮夷”也难以认同。

英国海军准将 G. 安森（George Anson）的记录则让外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尤为恶劣。在公海打击西班牙舰队四年之后，安森和他的海军中队起程回国。当时，他们残破疲惫的舰队拖着一艘装满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抵达广州，急切地寻求补给，但受到的待遇却让安森恼羞成怒。准将断然拒绝中国人要求支付的关税，指出他们的船队是兵船，而非商船。地方长官没有立即与他会面，而是借故一再推迟。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岸上遭到殴打和绑架，更让他感到惊骇。他认为中国人总是找机会欺骗，其中一例就是给死鸭子填塞沙砾，借此提高称重的价格。这些遭遇使得安森在他广为阅读的航海记录中总结道，“在诡计、谎言以及一切有关牟利的手段方面，多数中国人罕有对手”。此外，安森还称，中国的“官员腐化堕落，人民偷窃乘风，法庭唯利是图”。[11]

法国18世纪著名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与安森如出一辙。虽然和杜赫德及伏尔泰使用了同样的耶稣会的记录，但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他认为政府的惩戒手段过分且残忍，中华帝国“是一个暴政的国家，统治的原则就是震慑”。[12]

尽管有着如是种种意见不一的看法，许多美国人还是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方面感到着迷。其中又以美国学者学会的饱学之士最为突出。1771年，该学会出版了首份会报，学会秘书之一C. 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和同事致力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因此，他们提出“原则上，将研究限定于对国家有益，能促进国家利益和繁荣的学科”。基于这个理由，汤姆森认为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 从中国移植到这里的植物与我们的水土气候相宜，这些稻米、松叶蕨和紫云英长势良好，可满足我们最热切的期望。我们还可以尝试移种其他植物……引入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物产，这个国家（美国）可能会有超越预期的光明未来。假使我们够幸运，能够成功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农业进步和本土植物，假以时日，美国或许能和中国一样，养育比任何国家更多的人口。[13]

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快速逼近3亿，而北美殖民地才刚刚超过200万。但是，这种中国梦完美地体现了美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坚定的信念，即（美国）社会

的进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虽然美国学者学会致力于获取实用知识，其他美国人则更看重中国的商业机会。1777 年，时为华盛顿将军副官的 A.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开始着手考察中国出口货物的诱人利润。汉密尔顿指出，这些货物包括“所有欧洲已有的，更有比欧洲供应更充足或欧洲完全未出产的物品”。他开出的清单上既有丝绸和茶叶等传统商品，也有“钻石、珍珠、金、银、铜、铁、硫黄……陶土（制瓷的原料）……肉桂、胡椒、靛蓝……朱砂……血竭（一种深红色树脂）……龙涎香和其他许多贵重药品和树胶”。[14]

1770 年，伦敦的一份报纸上登出了一封信，署名是“殖民地人民权益之倡导者”，这可能是富兰克林或同情美国的英国辉格党人 J. 博格（James Burgh）使用的化名。文件谴责了 1767 年 6 月通过的《唐申德法案》（Townshend Acts）（该法案规定对进口到北美殖民地的茶叶、玻璃、纸张、铅、涂料课税），并提出美国人打破贸易约束的可能性：

> 不知他们（支持《唐申德法案》的英国人）发现此等情景会作何感想：挂着普鲁士或其他旗帜的船只，装满各种货物，从殖民地整装（我想他们不能阻止装备船只）前往世界各地，例如经过合恩角前往中国，并带回茶叶和东印度群岛的货物……英格兰的整支海军，即便如此警觉地驻扎在此，也无法阻止 1500 英里海岸线上的走私。如果我

们顽固地坚持不公平的压制，美国人很快就会效法这些走私者。[15]

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警告。美国在经过了一场革命（独立战争）之后，才真正打开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通道。有趣的是，对华贸易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要了解来龙去脉，必须先对成为革命导火索的茶叶作一番考察。

在美国，几乎每个学童都对波士顿茶叶事件耳熟能详：1773 年 12 月 16 日的晚上，殖民地人是怎样伪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将 342 箱东印度公司约 9 万磅的茶叶捣毁并倒入波士顿港。对于这一事件，许多学者的问题是为什么茶叶会成为美国人愤怒的焦点，而对于茶叶的争议何以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简单来说，这一切都植根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以及茶叶在美国社会的普及。[16]

1767 年 6 月通过的《唐申德法案》导致北美殖民地的强烈不满。征收新税的海关官员经常遭到攻击，英国人派出军队强制执行法案，并维护治安，结果更激起殖民地人的愤怒。由于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殖民地人对于法案单方面的征税极为不满，因此开始抵制英国商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茶叶。他们发誓除非法案废除，否则绝不饮用茶叶。报纸登出文章，呼吁民众保持节制，用本土的茶叶代替，比如覆盆子叶制成的锡伯龙茶，或在北部沼泽和湖泊边的杜鹃花科常绿植物长出的拉布拉

多茶叶。尽管抵制并不普遍，也没有充分执行，但连同其他的殖民地抗议活动一起，已经足以迫使英国国会重新考虑，如何对待这些桀骜不驯的美国人，最终在 1770 年 3 月废除了《唐申德法案》。但事情并未结束。国会仍对茶叶征收每磅 3 便士的关税，以此向殖民地显示，只要国会认为合适，就有权管束他们。尽管国会能够接受法案的挫败，但并不愿意将征税权拱手送出。

接下来的几年，殖民地相对风平浪静。抵制潮退去，人们重新开始喝茶，那些相形之下难以入口的替代品被果断抛弃。
67 大部分茶叶仍然是走私而来，当然也就没有缴税。同时，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依然有大约 30 万磅（含《唐申德法案》的税款）茶叶进口，因此，还是有少数人抱怨这种额外的收费。直至 1773 年 5 月，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Tea Act），北美殖民地的怒火再次被点燃。[17]

本质上，《茶叶法案》就是政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保驾护航。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不仅独揽中国贸易，也控制着与印度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公司几乎自成一国，被授予“占地、铸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宣战、议和以及实施民事和刑事管辖”的权力。[18]著名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E. 伯克（Edmund Burke）指出，“东印度公司似乎并不是一个纯粹为增进英国商业利益而成立的公司，而是将［联合王国］的一应权力和统治都延伸到东方”。[19]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公
68 司支付的税款构成了英国国家预算的重要部分。尽管如此，到了 18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东印度公司在经济上却一落千丈，原

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得自印度的收益下降，未经许可提高红利的金额，公司股票价值的缩水，英国金融市场的不景气。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茶叶。东印度公司的九成利润来自销售茶叶所得，由于利润连续多年暴跌，造成公司账目入不敷出，更有2000万磅的茶叶滞存仓库，无人问津。公司面临的茶叶危机部分原因是《唐申德法案》的废除，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走私者已成为人们首先选择的茶叶供应商，他们也因此拿走了本可以进入东印度公司金库的利润。

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让东印度公司不堪承受，遂向英国国会寻求支持，得到的答案就是《茶叶法案》。该法案的目的就是允许东印度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在殖民地倾销过剩的茶叶，从而挽救濒于破产的公司财务。为此，国会同意免除英国出口的茶叶税，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向殖民地销售茶叶，从而排斥了长期从事这项业务的美国商人。就国会来看，这似乎是个一举多得的政策。英属东印度公司找到处理库存茶叶的渠道，而殖民地居民可以按英国消费者一半的价格购买茶叶。由于茶价大幅下降，走私者更难与东印度公司竞争，反过来也强化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当然，3便士的唐申德茶叶税依然适用，即便如此，茶叶价格也相当之低。

然而，国会却打错了算盘。殖民地强烈反对该法案，波士顿茶党则是最激烈的反抗代表。尽管少数美国人曾对废除《唐申德法案》后却依然保留茶叶税颇有微词，《茶叶法案》却再次引发了对国会无代表却被征税的激辩，越来越多的殖民地民

众担心，如果茶叶税继续存在，其他商品也很快会被征税。合法进口英国茶叶的美国商人和走私贩也同样不安，因为《茶叶法案》将他们排挤出茶叶生意，至少也会大幅蚕食利润。[20]

《茶叶法案》激起的愤怒远不止于担心税收和损失利润。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法案的用意极为险恶。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长期策略的序曲，英属东印度公司要垄断的不止是茶叶贸易，还将扩大到其他外国货物，事实上将殖民地变成东印度公司商业帝国中的一枚棋子。有些人甚至不无猜疑地认为，既然东印度公司能够不择手段取得对印度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北美殖民地落入其手也只是时间问题。1773 年 12 月 4 日，“一个机修工”在船舷一侧写下如下文字，向同胞警示继续购买和饮用英国茶叶的极度危险：

> 东印度公司只要踏足这片（曾经）美好的国家，就会不遗余力地变成你们的主人。他们养尊处优，并不在乎金钱和声望。他们有狡猾、卑鄙、专横的大臣相助。他们自己则精于残暴的掠夺、镇压和杀戮。在压迫与奴役、饥饿与刀剑压力之下辛苦劳动的地方十分了解他们。这也是他们的自肥之道，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贸易公司。[21]

另一名殖民地人称，“进口和饮用”英国茶叶会致使“政治堕落、贸易衰败，最宝贵的自由被剥夺”，因此，必须当成“黑死病”来对待。[22]历史学家 J. R. 费希特（James R. Fichter）

写道，“爱国者们认为，茶叶代表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这个公司独揽了英国对亚洲的贸易。对他们来说，垄断……就是危险国家手中的工具”。[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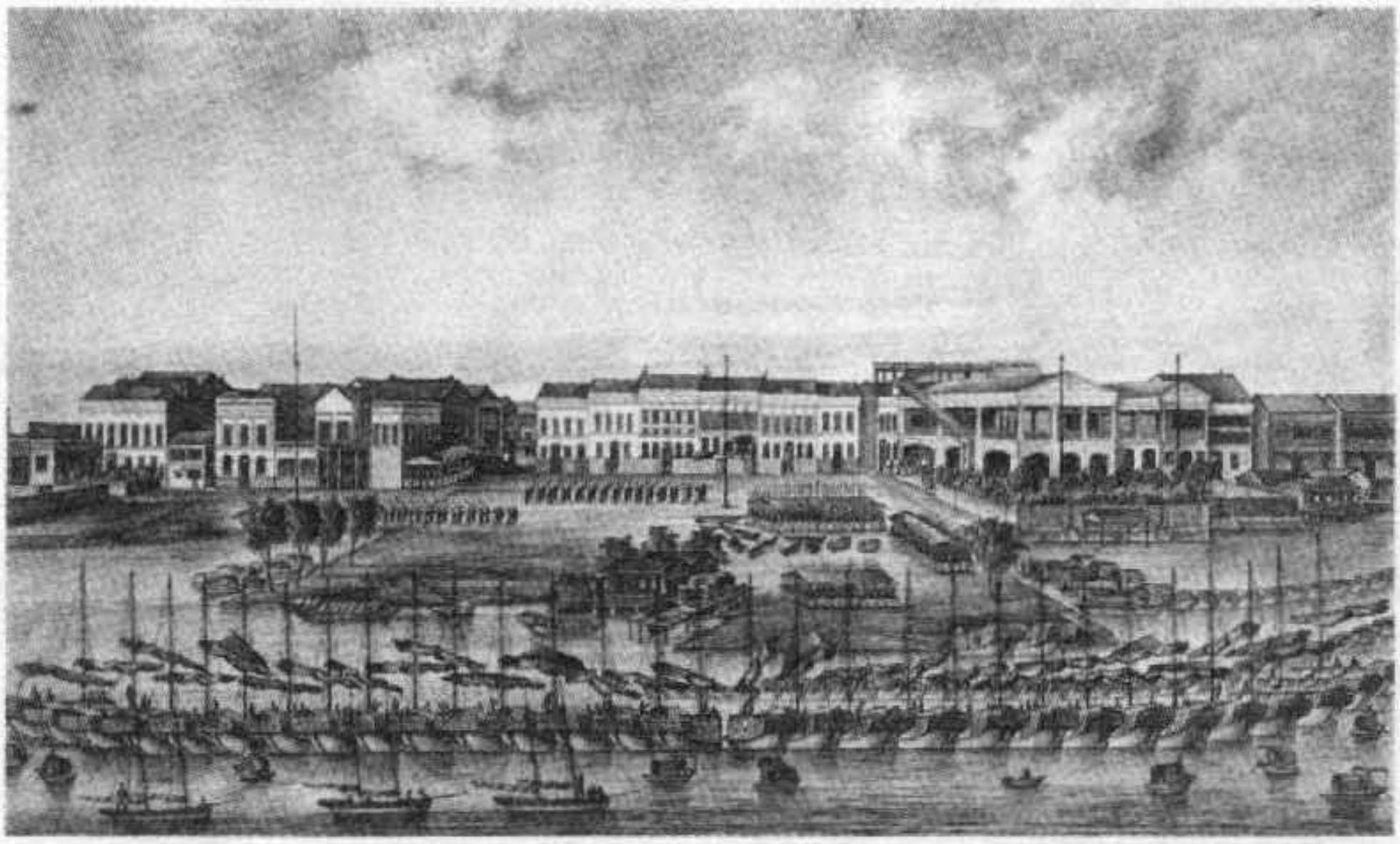
英国讽刺漫画：北卡罗来纳州登顿的美国妇女誓言抵制英国茶叶，P. 达维绘，1775 年

71 面对《茶叶法案》的实施，历史学家 T. H. 布瑞恩（T. H. Breen）描述说，美国人“发誓要让［英国政府］知道，他们热爱自由甚于茶叶”。有识之士呼吁尽量少喝茶，以示爱国，并得到民众积极响应。有些人彻底戒茶，有些人转向其他替代品，也有人公开焚烧茶叶，表示对英国人行为的不齿。而没有坚决放弃茶叶的人则往往遭到同伴的鄙夷，后者将喝茶视同叛国，希望以羞辱来刺激同胞戒茶。

《茶叶法案》引起如此波澜，主要原因在于英国人试图操纵的这种产品性质特殊。由于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经饮用茶叶多年，茶叶就成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容易辨识的商品。布瑞恩写道，茶叶“已成为新消费经济的主要象征”，在独立战争前的数十年中，殖民地的饮茶风气迅猛发展。鉴于茶叶是这样一种代表性的符号，对英国茶叶和东印度公司的反抗也就成为一种共同体验，乃至美国人可赖之团结的爱国事业。[24]

此外，围绕茶叶的抗争造成的影响也不止于战争。茶叶引发的种种事端令美国人难以释怀，他们永久地放弃了茶叶，转而饮用咖啡，咖啡的消费量因此急剧增长。但无论如何，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中，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喝茶人。也正是由于他们，“中国皇后”号才会在 1784 年晚夏叩响天朝的大门。

第四章　“生番”



鸦片战争前夕封锁夷馆，中国画家（佚名）绘，约 1839 年

72 1784 年 8 月 23 日，细雨清风，浪波翻滚，“中国皇后”号和法国“海王星”号一起驶入珠江入海口，进入中国领域。从纽约出发 6 个月后，经过 18000 英里海路，美国人终于顺利抵
73 达中国。船只首先在澳门水路停泊，格林船长下令鸣礼炮 7 响。3 英里外的澳门港也鸣炮回礼。随船大班山茂召和事务长斯威夫特升起星条旗。美国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地球这一角，船上所有人无不激动欢欣。格林船长已经成功地将“中国皇后”号驶抵目的地。接下来的主角要轮到山茂召。[1]

次日，山茂召和船上随员登上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拜会当地长官，前往海关加盖官印，并与法国和瑞典领事共进晚餐。尽管澳门已今不如昔，安森 40 年前就说这里“从旧时的辉煌衰落”，但仍不失为一处繁荣的所在。澳门长约 3 英里，宽半英里到 1 英里，人口约 2 万，其中 4000 人为葡萄牙人和非洲奴隶，其余多数为华人和少数欧洲人。澳门一侧是海港，另一侧是称
74 为“大码头”（Praya Grande）的新月形沙滩，是东方的小欧洲。狭窄蜿蜒的街道中各种优雅的砖石建筑错落而列，包括天主教堂和外国商人离开广州时居住的商馆。[2]

8 月 26 日，“中国皇后”号在一名引水员的带领下出发，两天后抵达黄埔。在这片略显拥挤的河道上，已经停泊了当年将在广州交易的 35 艘外国船只中的大半。格林向他们鸣礼炮 13 响，各国商船也纷纷鸣炮回礼。法国人、丹麦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纷纷举办欢迎仪式，翌日，山茂召、格林和兰道尔也分别回礼拜访。山茂召说：“各国船只的绅士非常礼貌，令人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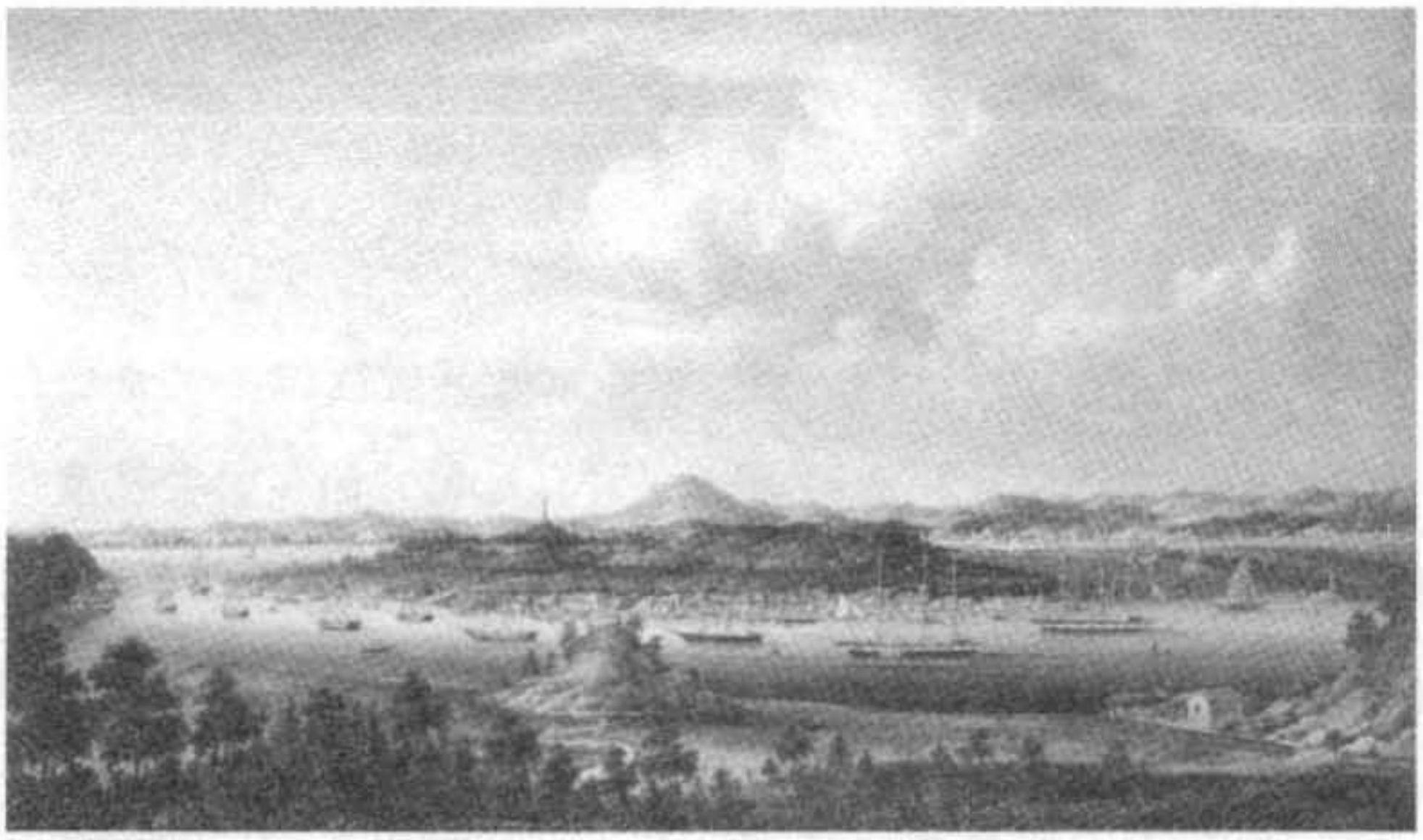
快。见到英国人不免谈及两国最近的战争。他们承认，这是英国的巨大错误，很高兴战事已经结束，并能在这里见到我们，希望捐弃前嫌，并补充说，如果英美携手，必能在全球无往不利。”[3]

澳门南湾，T. 阿洛姆绘，约 1843 年

8 月 30 日，山茂召和兰道尔离开黄埔前往广州。奇怪的 75
是，作为“中国皇后”号船上唯一写有日记的船员，在从澳门到广州一路上，山茂召却没有留下任何对于沿途见闻的记录。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山茂召无疑会对眼前景观留下深刻印象，但或许他过于冷静，对于所见未置一词。幸好有人不像他一样沉默。20 年前，一个经过同样路线的法国人在接近珠江口的时候，记录下他的见闻。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地平线上

桅杆如林，没多久，就看到无数船只布满海面。数千渔民捕捞为业。河岸边停满了船只，数量惊人的小艇纷至沓来，又迅速没入无数河道，穿过河水灌溉的广袤平原”。农人在广袤的田野中劳作，闪耀着丰收的光彩，远处隐约可见端正的村庄。山林披绿，开垦为梯田，像是这宏伟风貌的背景。进入广州城中，更有目不暇接之感：水道、陆地处处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城中人口或有百万之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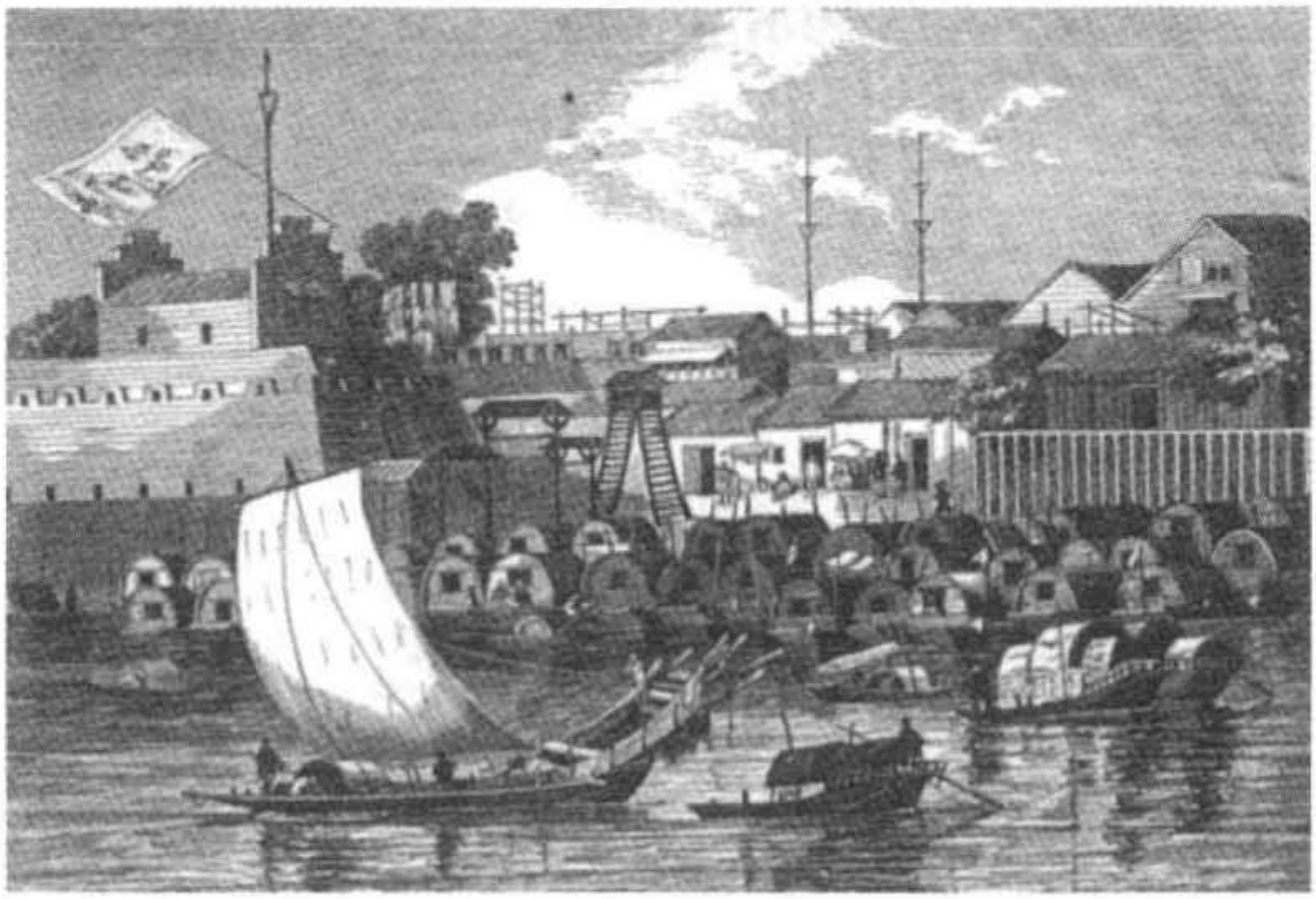
广州附近江面上的中国船只约有数万条，从船头绘有怒目的500吨平底帆船，到捕鱼或运货的小舢板。娼家女在花船上向贵客卖弄风情，不远处就是合家人蜗居的船屋。广州似乎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地上，一个在水上，两个都充满活力，永不停歇。



黄埔港，关联昌绘，约1845年

来自“新国家”的美国人在广州还没有自己的商馆。法国友人再次伸出援手，为美国人提供了落脚之处。直至9月6日，在一个空房子上建起的美国商馆方才落成。这座欧式建筑以砖石筑成，距珠江300英尺，旁边是一个石铺的“广场”，外有旗杆表明居住者的国籍。商馆面积宽大，高约二三层，上有卧室、客厅、办公室、餐厅、阳台，下为厨房、仆役间、库房。商馆后方是一条宽阔的“十三行街”，这条街和广场之间通过三条狭巷相连。这些拥挤嘈杂的大路上，商店或推车的小贩叫卖各色奇珍货物，从丝绸和成套瓷器到象牙雕和木漆器。沿路 77
招牌颜色醒目，翻译成奇异的英文，吸引行人注意。商号名字有“集义”、“和平”、“全合”，还有招揽客户进门的标语，如“富客常临”、“上等货物，实价不二”。普通的水桶标上“水桶常平”，盒子上贴着“箱盒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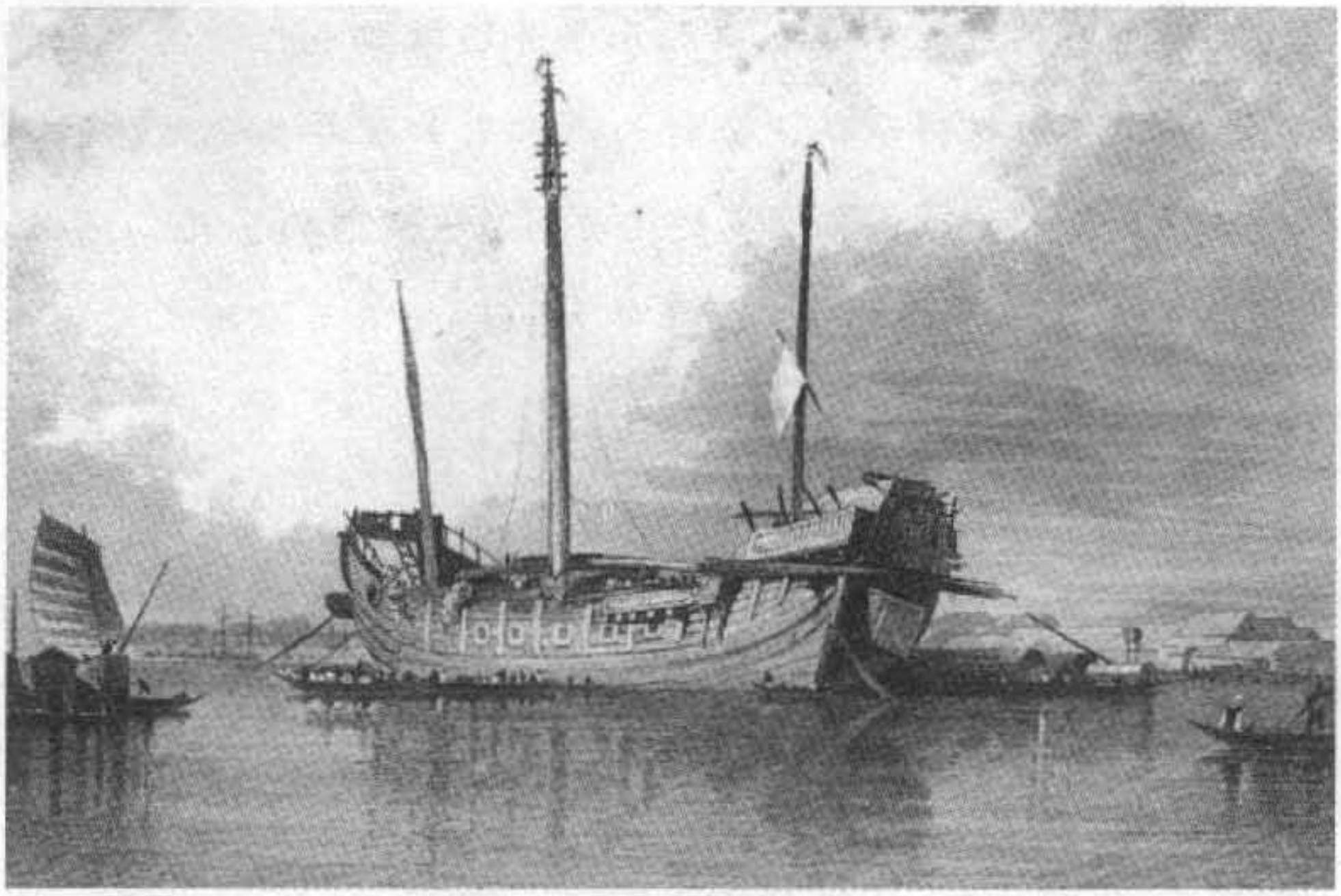
船员等外国人时常在广州和黄埔港之间来回，常在这些街道散步消磨时间，买些礼物带回国内。他们也领略了中国饮食的多样。活鸡、异国水果和蔬菜旁边就是待价而沽的老鼠、猫和狗，外国人常常会想有什么是中国人不能吃的。水手也一定会专程前往新豆栏街（或者按他们的说法“猪巷”），这里可以买到各类本地烈酒，街道上时有吵架，酒力发作昏睡街头的酒鬼也不罕见，或许是喝了太多三白（一种用酒曲制成的常见中 78
国白酒）。山茂召后来曾说，新豆栏街发生的事“比虚构的更离奇：这是各国扒手和流氓的贼窝和天堂，猪狗喧嚣声不绝于耳”。[5]



广州珠江风景，约 1837 年

山茂召和兰道尔曾多次受邀去其他行馆进餐，也会做东酬谢。他们在荷兰行参加过音乐会，和其他欧洲人一起过江到行商的深宅大院中享受美餐。然而，山茂召还是认为广州的社交生活乏善可陈，“各国商行的绅士们自成一统，除了少数场合，往往节制而冷淡……考虑到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必须遵守种种限制，亲友都在万里之外，缺乏社交，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必须承认，他们赚钱并不容易”。

此时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美国，当然也就不熟悉美国人有何特点，由于长相和语言接近，开始时还将他们错认为英国人。弄清楚分别后，中国人将美国人称为“生番”（后来，则改称“花旗鬼”）。对美国人了解得越深，中国人就越好奇。山茂召



珠江上的中国帆船，1833 年

说，他曾向中国人展示一幅地图，“说明我们国家的面积，目前正在增长的人口，但对于中国产品可能有的广阔市场前景，他们没有表示出丝毫兴奋”。

* * *

从 9 月到 12 月中旬，秋去冬来，广州渐渐变得温暖而潮湿，山茂召和兰道尔在行商的协助下采购中国货物。对于交易流程，山茂召印象深刻，但又不胜其烦。他认为广州体制“或许和世界上任何［商业］系统一样简单”。但实际上，这取决于交易的对象。山茂召说：

> 中国人（特别是贸易商人）的无赖几乎众所周知，但

> 凡事都有例外，尽管小商人几乎普遍欺骗成性，需要严密留意，同时也得承认，公行的商人则和世界其他地方商人一样值得尊重。我们交易的主要对象也是行商。他们守时、注重仪表、自视甚高，在账务方面一丝不苟。所有欧洲人的证言都可说明此言不虚。[6]

但是，他的评论也需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商人的“无赖”或不道德行为并不为中国独有，在记录的另一处，他也承认世界其他地方亦不乏无赖行径。如果某些中国商人真的比外国同行更狡诈，也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山茂召和兰道尔开始交易后不久，就在供需问题上吃了苦头。货物的价格并不稳定。供应量提高后，价格必然下降，而西洋参不幸就面临这一窘境。“中国皇后”号向广州运来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洋参。但同时，欧洲人也带来了大量西洋参，导致事务长斯威夫特抱怨，“今年的到港［西洋参］数量十倍于往年”。结果，山茂召和兰道尔出售他们带来的西洋参时，由于许多欧洲人已率先出货，价格已经一落千丈。[7]

尽管西洋参的销售令人失望，山茂召对“小贩”感到厌恶，并认为“行馆里的所有仆役……都是间谍”，贸易还算顺利，只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个麻烦是在海部为评估港口税测量完“中国皇后”号后，依照惯例，向外国人提出要求看看“自鸣钟”或礼物。由于美国人的船上并没有准备这些，山茂

召道歉说，美国人“来自一个新国家，第一次到贵地，不知要携带此等物品之风俗”。海部大人接受了这个解释，警告他们日后不可再犯。尽管洋人失礼在先，海部大人却遵从了另一个传统，向外国船只赠送皇帝的礼物，让他们知道天子的宽厚仁慈。因此，海部离开“中国皇后”号几小时之后，格林船长就收到了“2 头牛、8 袋面粉、7 坛酒”。[8]

第二个麻烦则比没带自鸣钟严重得多。11 月 24 日，停泊在黄埔港的英国船“休斯女士”号上的晚宴临近尾声。为欢送宾客，船上鸣放了火炮。其中一发意外击中了紧邻“休斯女士”号的一只小船，三名中国人受伤，一人次日身亡。中国官员要求交出开火的炮手，但是英方称此人已“潜逃”，下落不明。英国商馆的负责人也向中国人表示，“休斯女士”号是往来印度与广州的私人英商拥有的“港脚船”（country ship），虽持英属东印度公司执照，但该公司并无管辖权。如果中国人想捉拿凶手，他们应该找的是史密斯（George Smith），“休斯女士”号的随船大班。

事发三天后，史密斯接到口信，称行商有公事面谈。走出商馆后，他才发现这只是个幌子，差役立刻将他逮捕。很快，所有贸易中止，商馆周边道路被封锁，并布满兵丁守卫，中国商人、通译和买办将这片地区疏散。尽管海部已下令禁止广州和黄埔港的通信，史密斯还是设法托人带信给在黄埔港的船只，让他们派遣兵船到广州，保护商馆。四五百名外国人闻讯后随即动身。

“广州之战”（按山茂召的说法）一触即发。中国守军发现外国船只逼近，开火迎击，打伤两人，但所有船只仍成功靠岸。同时，地方官员通知外国人，无论死亡是“意外还是故意”，必须交出炮手，并依清律审判，只要交出凶手，史密斯就会被释放。他还说，外国人必须听命，否则会用武力赶走外国人。“（尔等）当自度实力所能”，这位大人说，“若胆敢在我天朝作奸犯科，切勿追悔莫及”。

英国、丹麦、法国、荷兰、美国大班对扣留史密斯提出正式抗议，声称事发时在广州的史密斯纯属无辜。对于派遣兵船，他们也辩称是为了保护人身和财产之必要。28 日晚间，地方长官答复，要求除英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大班参加会谈，他表示，纷争只限于英国，和他国无碍，并且重申希望交出炮手，同时也保证，只要史密斯无罪，必会释放。虽然外国人将武装船只开进广州已违反中国法律，只要兵船离开，他也将既往不咎。之后，所有船只按时离开，仅美国人决定留守支持英国人。中国和英国之外所有欧洲国家的贸易也随即恢复正常。

随着欧洲兵船离去，史密斯向“休斯女士”号船长威廉姆斯致函，请他将炮手送到广州。11 月 30 日，凶手被交出，史密斯获释。12 月 6 日，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禁令解除。次日，“休斯女士”号离粤赴印度。一个多月后，炮手被判有罪并问绞。[9]

对英国人来说，这一事件无疑是对司法公正的扭曲。他们认为炮手无意杀人，死亡纯属意外，因此要求“以血还血”有失偏颇，该案的审判也不该敷衍了事，而应宽大处理。此外，

让英国人全体为炮手的行为负责，并扣押史密斯作为人质也同样被认为有失公平。英国人认为，更糟糕的是此事并非个例。四年前，停泊在黄埔港的一只英国船上，一名法国水手和一个葡萄牙水手生事打架，后者不幸丧生。尽管英国人称法国水手属自卫还击，中国人还是要求交出水手并在中国公堂接受审判。一天后，法国人被判杀人罪，并在商馆附近的一处地点遭绞刑处死。英国人认为，设若未来再有意外死亡，他们只能面临两难选择：或者交出无辜的人送死，令英国蒙羞，或者全盘退出广州的贸易。[10]

山茂召的看法和英国人一致。在炮手被交出，尚未问绞之前，山茂召写道，这个“麻烦事出混乱，事态发展毫无章法可循，不光彩地结束。如果欧洲人能团结一致，要求人道权利，私人利益暂时让位于共同的福祉，必定能得到更体面的结果，甚至获得额外的特权［在处理此类案件方面］”。[11]

相反，中国人对此的看法则大相径庭。研究了英国和中国文献的历史学家陈利（Li Chen）表示，“从传统观念来看，‘休斯女士’号事件很难证明中国法律和正义的腐败、专横和/或不人道”。陈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尽管可能是“意外致死”，但这仍然是属于犯罪行为的过失造成的结果，因此需要追究责任。被炮击的中国船只明显靠近“休斯女士”号，在炮手的视野范围内。由于中国法律禁止在领域内拥有或使用火器，炮手也不应当发实弹。此外，迟迟未能交出炮手也被视为妨碍中国司法，鉴于以往英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的不

端行为，皇帝需要果断处分，以免被看成不能保护子民及执行法律的无能之君。[12]

在这桩案件中，讨论孰是孰非，或行事妥当与否，已非本书所能深究。关键问题在于，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84 关于这一点，英国人的观点成为西方的标准看法。特别是在英国，“休斯女士”号事件成为不断恶化的伤口，不仅使中英关系江河日下，也对中美关系造成深远影响。

所有货物交易完毕后，“中国皇后”号于12月28日起程返美。船上满载山茂召和兰道尔在广州的收获：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棉，当然也少不了大量瓷器。回程风平浪静，唯一的意外是，穿过赤道不久，随船木匠摩根因病而故。1785年5月11日，出发15个月后，航行了32458英里的“中国皇后”号抵达纽约东河，再次鸣炮13响，向纽约致意。[13]

回国后不久，带着对“中国皇后”号成就无可争议的自豪，山茂召向外交部长杰伊递交了一份报告，“供建国之父参考”。他叙述了广州体制的严格交易规定，称中国和欧洲人给予他本人和船员热情接待，并预言未来充满希望。“对深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以及更关注商业的人们，你们可以放心地看到，我们已经友好地与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帝国打开了交流的通道。”杰伊告诉山茂召，“美国公民首次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大获成功，主事者和参与者都与有荣焉，国会议员对此十分满

85 意”。[14]一名议员W. 格雷森（William Grayson）在1785年5月下旬写给弗吉尼亚同乡J. 迪逊（James Madison）（当时是弗吉

INDIA GOODS,
Imported in the ſhip EMPRESS of CHINA, from
CANTON,
FOR SALE,
By Conſtable, Rucker, & Co.
In GREAT DOCK-STREET,
CONSISTING OF
TEAS of all kinds,
CHINA WARE,
SILKS,
MUSLINS, and
NANKEENS,
Which will be diſpoſed of on the loweſt terms, for
CASH ONLY.
New-York, May 24, 1785. 1m.

登出“中国皇后”号商品出售广告的报纸

尼亚州众议院成员）的信中说：

我想你已经听说，一艘美国船历时四个月从广州满载中国商品返回我国。看来，我们的国民已经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受到同样的对待，即所有外国人都被中国人视为蛮夷，

> 他们有着太多亚洲人的傲慢，不在任何歧视［格雷森这里说的“傲慢”意思更接近于“高傲”，而非“轻慢无礼”］面前屈尊。多数美国商人认为，美中交易能够持续，美国甚至拥有比欧洲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求，还可以运输相当数量的货物到西印度群岛。我衷心希望看到我国的商人投入这项事业。[15]

美国驻法国使节托马斯·杰斐逊利用“中国皇后”号回国的机会，向法国外交部长夏尔·格拉维耶（韦尔热纳伯爵）（Charles Gravier）寄送了一份“中国皇后”号首航的报告，同时也对法国人途中的帮忙表示感谢。杰斐逊说，“国会特此致函，盖因法皇陛下澳门领事及海上法船指挥官及其他官员友善相待。贵国对我国民之热诚在在可见，国会在此谨表至高敬意”。[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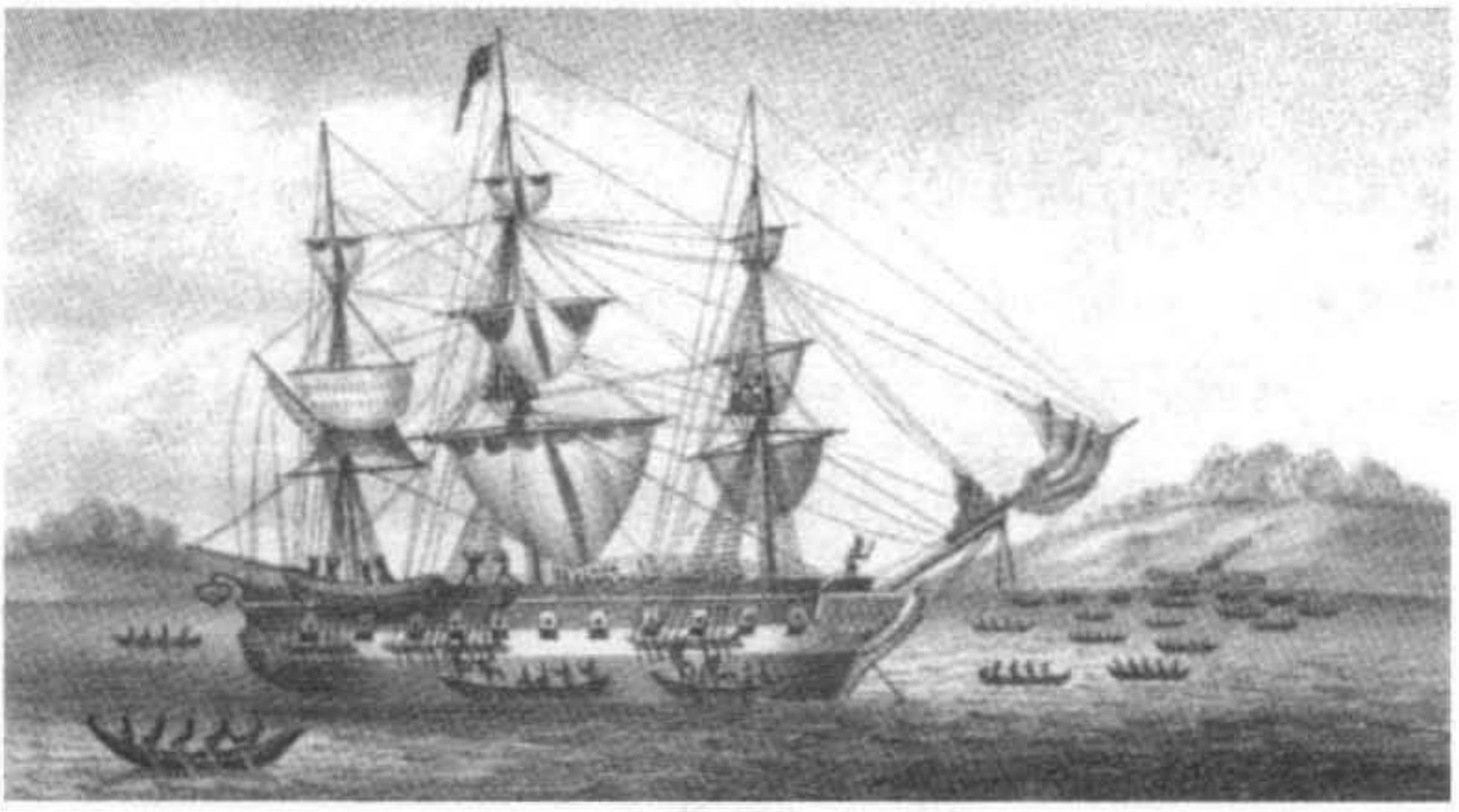
“中国皇后”号为资助者带来了30727美元的回报，略高于最初投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不如想象中丰厚，但仍足以说明此次航行大获成功。[17]船上的货物从纽约流往美国东岸南北的商铺中出售。报纸宣布了船只回国的消息，其中一份报道说，鉴于船上“带回了我们过去需要从欧洲进口的货物，一名记者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得以摆脱与欧洲贸易必经的繁重交通，我们崛起的帝国曾经因此束手束脚，前途暗淡，现在，属于我们的繁荣时代即将到来。无论船上的货物是否能促进船东的这些优势（这是他们对这趟冒险的支持应得的），记者认为，这将

促使美国全体的利益，激发国民与商业对手一较高下”。就在这份报道上方，一本在伦敦刚刚出版的新书《一个美国军官眼中的英美重聚展望》（*The Prospect of a Reun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18]似乎恰好强调了“中国皇后”号意义不凡的破冰之旅。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已经站稳脚跟，正要向利润丰厚的新目标前进，“中国皇后”号的航行可堪为证。

“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后不到一个月，一名卜居纽约的英国绅士给家中的友人写信，提到这次航行：“每天从各种财富源头流入的新奇玩意，没有一样比得上‘中国皇后’号抵达……带着金羊毛（中国货物）成功返航……这趟航行，意义极深，为美国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财源。”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皇后”号的成功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一事件让我震惊，我的祖国应当睁开眼看看这个崛起帝国的真实情况……作为欧洲的强劲对手……现在，美国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黎明已经投射出第一缕阳光，预示着他们商业之路的无穷潜力”。[19]

这位绅士的远见准确地捕捉了“中国皇后”号凯旋带来的希望。从中看出新商业前景的并不止他一人，美国将和英国及整个欧洲为东方的财富展开竞争。随着“中国皇后”号的成功广为流传，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跃跃欲试，力图在与中国的贸易盛宴中分一杯羹。

第五章　中国热



1811 年夏，“东加”号船员在温哥华岛的攻击和屠杀

如今，美国已经为抓住对华贸易的机会做好了充分准备。 88
从松散的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国家若要生存和发展，海洋和陆地的开拓缺一不可。美国的船厂已经造出了数千艘最精良的船只。乡镇和城市成长出一批谙熟海洋的好手，渴望去新的舞台一试身手。J. F. 库珀 89
（James Fenimore Cooper）说，美国人“比任何同时代人或前人都更了解海洋，追求海上冒险”。托克维尔指出，“《独立宣言》打破了将他们［美国人］和英格兰相捆绑的商业限制，让他们的海洋天赋有了施展的机会”。[1]

一名热忱的爱国者深信，中国注定会对美国的未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1785 年夏，他宣称：

> 我们只得到一条商业通路，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感激欧洲列强。感谢上帝，基督教法庭的诡计没有影响东方世界的明智法令。我们都同样自命不凡，他们没有能力妨碍我们涉足利润最丰的贸易，只要我们拥有能力和勇气，建造并装备远航的商船……相信我，同胞们，你们需要的只是船只，如果由见多识广的老练船长带领，很快将给你们带来回报，为这个国家增添荣耀。

几个月后，约翰·亚当斯加入舆论，呼吁美国人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给杰伊的信中，他写道，“对于美国的商人最好的建议就是，尽快将商业版图扩大到东印度，并且越远

越好”。[2] 事实上，商人们已经无需更多的激励。“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足以让他们跃跃欲试。

据说，“中国皇后”号成功后，一个南方人宣称，“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3] 当然，这种说法稍显夸张，毕竟，前往中国的航行少不了坚实的后勤和财务支持，只有少数商人和港口能够做到。无论如何，从“中国皇后”号 1784 年开辟航线到 1814 年战事结束，近 300 只美国船只向广州进行了 618 次航行，如果再加上官方没有记录的走私行为，这个数字则会更高。在广州的美国船只数量每年波动很大，1785 年的时候没有一只船，最多时则有 45 条。当然，大多数船只来自美国最发达的城市，诸如波士顿、纽约、费城，也有很多船来自东海岸的中小港口，比如楠塔基特、新贝德福德这样的捕鲸港，以及从马萨诸塞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兴商业中心。这些船只的名字各异，但都反映了这个新生国家的自豪，对建国之父的赞美，水手们对妻女的爱，以及贸易本身的性质。这个名单上，有“纯粹美国人”号、“亚当斯总统”号、“南希”号和“格蕾丝”号、“广州”号、“茶树”号。[4]

前往中国船只数量的激增也反映出大趋势的萌动，美国开始着力将自己塑造成海上强国。“1789 ~ 1807 年美国航运的增长在世界商业史上独一无二，”19 世纪晚期的经济学家 H. C. 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称。在这 18 年里，“从事外国贸易的美国船只吨位……提高了 6.8 倍”。[5] 从 1791 年 10 月底波士

顿港一天的活动，可以一窥美国海上扩张的活力。在这个月的第24天，超过70艘船只从波士顿出发“前往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由J. 麦基（James Magee）指挥的“玛格丽特”（Margaret）号，这艘船“积极投入北美大陆西北海岸的考察与交易（毛皮）之旅”。[6]

对华贸易反映出美国新兴的商业抱负和努力。早先曾有人说，美国要成功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唯一的办法是政府介入，并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是建立垄断。如果真是如此，则未免太过讽刺，因为促使美国人独立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对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愤懑。兰道尔在1791年写给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信中说：“我得承认这是我的主意，我曾认为只有借助一个严格管理的公司，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成功，而没有政府的保护，这一点将难以实现，因为对中国人而言，私人商人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不够，无法在和老牌公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7]

然而，兰道尔和抱持类似想法的人并没有说对。和殖民地时期积极投入捕鲸和毛皮贸易的美国人相比，开发美国到中国贸易的冒险家们并没什么不一样。他们依靠自己或投资者的支持，谋划航行，招募水手，承担风险，分享利得。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拒绝政府的援助。事实上，从18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他们急切寻求并接受来自政府的支持。当时，许多州和联邦政府对外国船只进口的中国货物加税，对美国进口商保持低税率，并允许美国的茶叶贸易商延迟支付税款，最多可达两年，有了这一系列举措，美国的商人在面对外国竞争者

时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当然，这种政府保护主义的做法远不构成垄断或造就政府资助的公司。成功与否靠的还是经营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而不是政府。这种观念完美地呼应了美国人逐渐发展的自我认知，充分反映出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自由市场理论。尽管斯密是当时英国最有名望的思想家之一，但将斯密的理论积极付诸实践的却是美国人，而对华贸易则提供了一个贴切的范
92 例。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势力，美国的商人却面向未来，应用斯密的理论，透过高度竞争的自由贸易获取了惊人的利润。[8]

率先开展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包括来自纽约的 J. J. 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费城的 S. 吉拉德（Stephen Girard）和塞勒姆的 E. H. 德比（Elias Hasket Derby）。阿斯特是德国瓦尔多夫一名屠夫的儿子，1784 年移民纽约，以销售在伦敦的兄长制作的乐器谋生。他在当地立足之后没多久，就被利润诱人的毛皮贸易吸引，抓住了 18 世纪 90 年代晚期的中国热，除了精美的
93 毛皮之外，也开始向客户兜售中国丝绸和茶叶。阿斯特从派船前往广州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货物。虽然进行得很顺利，但阿斯特从不满足于做中间商，而有更长远的打算。1800 年，他和商业伙伴合作，安排“塞文”号前往中国，直接和客户开展贸易。后来，阿斯特索性完全买下“塞文”号，并连同其他船只组建了他的对华贸易船队，包括“马达兰”号（以他的长女命名）、“西尔芙”号、“福克斯”号、“进取”号和“海狸”号，

最后这只船的名字尤其贴切，因为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于这种啮齿动物的光亮毛皮。阿斯特在远东贸易取得巨大成功，为他赢得了“对华贸易王子”（“Prince of the China Trade”）的称号。

J. J. 阿斯特

不过，阿斯特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他少数的几次失手中，有一次即和中国贸易息息相关。1807 年，他计划建立一连串毛皮贸易点，北起密苏里河，越过北美大陆分水岭，经哥伦比亚河直抵太平洋沿岸。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哥伦比亚河口，他计划将这里建成自己毛皮帝国的西部门户，在此将毛皮发往广州。为此，阿斯特出资，分别由海上和陆路派出大型探险队前往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这次艰苦的旅程产生了美国西部开发史上最动人的悲剧故事。遗憾的是，探险队最后一无所获。尽管阿斯特的手下曾于 1811 年春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了初步的贸易点，并命名为阿斯特里亚，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旋即在 1812 战争末期被英国西北毛皮贸易公司占领。无论如何，阿斯特在这项事业上投入的大量时间和财富足以证明，在美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对华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9]

吉拉德和阿斯特一样同为移民，于 1774 年从法国来到纽约，两年后迁居费城，自此终生都将费城当成自己的家。吉拉德一眼失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14 岁时就在法国商船上开始谋生。他到达费城的时间刚好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签署前一个月，但吉拉德的兴趣在商业而非革命，不久之后，兰道尔就雇佣他作为贸易船的船长前往西印度群岛。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吉拉德都在西印度群岛忙于贸易和私掠，直至 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他开始投资前往中国的船只。从 90 年代中期到末期，他逐渐从投资者转变成船东，总共修造了 6 艘船只，其中 4 艘以法国哲学家的名字命名："伏尔泰"

号、“卢梭”号、“孟德斯鸠”号和“爱尔维修”号。这些船只成功地进行了多次来往广州和美国的航行，此后，吉拉德又陆续将更多商船投入对华贸易。[10]

与阿斯特和吉拉德不同的是，德比则是地道的美国人，出生并成长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独立战争第一枪在列克星敦打响时，理查德·德比（Richard Derby）将一个小型商船队送给儿子。小德比用这些船作为核心，建立了一支劫掠船队，在战争期间，他自己拥有或投资了超过25只武装船，出没于海上伺机打劫英国船只。1780年，德比委托制造的一艘300吨私掠船下水，德比将它命名为“大突厥”（*Grand Turk*）号。这艘大船按照战船设计，火炮可打出28发炮弹，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俘获了16只英国船，包括价值和“大突厥”号相当的“庞培”号。

虽然战争还在继续，德比关注的还是生意，他将“大突厥”号上的多数炮眼封上，改装了甲板，使之更适于载货。在两次前往西印度群岛的短暂贸易之旅后，这艘船有了新的目的地。德比被“哈里特”号在好望角成功的茶叶贸易所吸引，决定让“大突厥”号也循路前往。1785年2月，当“大突厥”号抵达好望角的桌湾，船长J. 英格索尔（Jonathan Ingersoll）却发现自己陷入困境。英国船只被禁止在回国途中卸货，好在最后英格索尔设法挽救了这次航行，他找到一个英国船长，后者愿意将自己私货中的武夷茶出售，挣点外快。英格索尔将这批茶叶中的大部分在加勒比海卖掉，买回了大量朗姆酒和蔗糖，

E. H. 德比，J. 弗洛辛汉姆绘，19 世纪早期

一并运回塞勒姆。

1785 年 12 月，尝到东方贸易甜头的德比再次派出“大突厥”号，这次的目的地是印度洋上的法属毛里求斯，他希望船长 E. 韦斯特（Ebenezer West）能够在这里交易到中国货物。这次航行在塞勒姆的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但是因为韦斯特发

现毛里求斯的贸易乏善可陈，于是继续航向广州，并在1786年9月到达黄埔港。他惊讶地发现，除了第二次前往中国的“中国皇后”号和来自纽约的“希望”号，自己的船只竟然是历史上第三只到达广州的美国船。没过多久，纽约的单桅帆船“实验”号和费城的“广州”号也陆续抵达。从“中国皇后”号为美国打开中国贸易航线仅两年后，从黄埔的宝塔上能看到的美国船只已蔚然成行。

1787年5月22日，“大突厥”号返回塞勒姆，船上装了500余箱茶叶、75箱瓷器以及各类织工精美的手帕和棉布衣服。许多塞勒姆市民在港口欢迎“大突厥”号的凯旋，这是塞勒姆乃至新英格兰第一只从中国返航的船只。随即举行的公开拍卖吸引了周边数英里的民众前来投标，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刚刚当选的州长，《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字人J. 汉考克（John Hancock）及夫人多萝西，他们从波士顿搭乘马车前来。“大突厥”号出售的货物让德比的投资翻倍收回，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将更多的船只发往中国、印度和东印度其他地区，逐渐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并赢得了“国王德比”的绰号。德比和塞勒姆其他商人的海上开拓做得风生水起，这个昏沉的新英格兰小镇曾因1692年恐怖的女巫审判而臭名远扬，现在一跃成为美国在19世纪早期的主要港口之一，若按人均计算，更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对华贸易虽然只是刺激转变的原因之一，但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11]

阿斯特、吉拉德和德比的对华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使他们

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德比成为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阿斯特是第一个千万富翁，吉拉德的财富也几可与阿斯特匹敌。在2008年编写的一份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名单中，这三位财富巨人成绩不俗。阿斯特排名第18位，吉拉德第20位，德比第72位，换算成现在的美元，他们的财富分别达到1150亿美元、995亿美元和314亿美元。[12]意外的是，有一位参与早期对华贸易的成功商人莫里斯却未进入名单。尽管莫里斯在“中国皇后”号之后几年，曾资助“联盟”号开展了又一次前往中国的成功航行，但自此之后，他放弃了对华贸易，投身席卷全国的土地投机风潮，购买了数百万英亩边境土地。这些投资虽不乏成功之作，更多时则不尽如人意。莫里斯债台高筑，债主催款，他感到自己的辉煌已经逐渐远去。1798年2月16日，他在自己费城未完工的宅第中被捕，并被押送到两个街区以外的债务人监狱。被捕前夜，莫里斯在给商业伙伴的信中写道，“我的财富散尽，家具待价而沽，我即将入狱，家人衣食无着。晚安”。莫里斯在狱中待了三年半，1801年被释放后不久，破产委员会免除了他的剩余债务，如他所说，他成了“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身上却一无分文”。四年后，这个对美国功绩彪炳、开启了美中贸易的先驱者在71岁死去，美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之一结束了悲剧的一生。[13]

97

从中国贸易中受益最多的自然是商人，但以此致富的并不只有他们。独立战争期间，许多美国商船在海上和船坞中被英国海军摧毁。快速发展的对华贸易需要大量新船，造船厂因此

重焕生机，为各行业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这些船只还要装备和招募数以千计的人员，又形成了对高级船员和水手的广泛需求。每当有船只回国，船东就要向政府支付海关费用，而船上的货物在售出时，又能产生额外的收入来源。因此，对华贸易的影响透过种种方式遍及美国。资金注入造船、装备、人员配备、税收，并用来在全美各地大量买卖货物，使得经济竞争力大为提高。勃兴的对华贸易帮助美国站稳脚跟，保护了自己的海上权益，并培育出商人和海军都可仰赖的优秀海员，俾以发展和保卫国家。此外，商人创造的财富也对这个年轻国家的成长有着莫大的影响：他们将得自贸易的资金再投资于其他重要行业，并支持慈善和民生事业，其中贡献最突出的就有吉拉德和阿斯特，他们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并向美国政府出借了急需的数百万美元，用以支持 1812 年战争。[14]

所有投入对华贸易的美国船只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吨位普遍较小。欧洲人派往广州的船只称为“东印度”商船，体型庞大，英国船只的平均吨位达到 1200 吨，而美国船只由于刚刚起步，几乎都小于 500 吨，其中又以 200 吨以下者为多，在众多欧洲大船中，犹如巨人环伺下的矮子。有些前往中国的小船甚至被尴尬地认为是大型船只的补给船。1785 年 12 月从纽约出发的“实验”号长 59 英寸，仅有 85 吨。在 1787 年 4 月回到纽约后不久，《伍斯特杂志》（*Worcester Magazine*）就带着些许满足报道：

看到这么小的船只从遥远的中国远道回国，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本国人还是那些海外的欧洲人，都必定对美国公民的进取精神十足钦佩。[“实验”号]的成功和安全返航证明，光凭想象，往往会让事情比实际更可怕，只要积极进取、奋力作为，我们定能克服困难，即便这困难充满危险。[15]

这段时期，唯一接近欧洲船只规格的美国船只却由于筹划失误，结果屡遭厄运。1786 年重返中国后不久，山茂召和兰道尔就计划，要为对华贸易建造一艘巨轮，并向美国国内发出了造船的订单。这就是 820 吨的“马萨诸塞”号，当时美国所造的最大的商船。1789 年 9 月，船只下水并从布伦特里的船坞开往波士顿，船上的二副，F. D.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的远亲 A. 德拉诺（Amasa Delano）回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登上船只，一探究竟，赞叹不已”。

但是，船只的出发时间却一再推迟，原因是马萨诸塞州林恩的一个著名的占卜者皮彻预言，跟随“马萨诸塞”号出海的所有船员都将葬身大海。惊恐的船员们不断离开，直到第三次集结到完整的船员，他们才固定下来。德拉诺说，“这真是奇怪，时常面对暴风雨和各种危险的这样一群人，竟会被预兆、魔咒、预言和无形精神代言的古老传统影响如此之深”。

此时，山茂召已经回到波士顿，并于 1790 年 3 月 28 日驾驶新船再次出发，前往广州。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一睹大船

和船员的风采。官员和船员们也翘首以待，但扬帆起锚时，用来吊住船锚的吊钩却没能钩住，船锚立即沉入河底，船只停止不前，让船员们“深感尴尬”。船锚很快被打捞上来，“马萨诸塞”号向港口的人群鸣炮致礼，缓缓开出波士顿港。

山茂召原本的打算是，在荷兰人的贸易点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靠港，出售货物，换成银币后再到广州购买中国货物。但是，雅加达的荷兰总督禁止山茂召销售货物。失望之下，山茂召带着满船的货物开向广州，却没想到，厄运接踵而至。

根据德拉诺的记录，“马萨诸塞”号“装的主要是新砍伐的木材，从冬天的水中直接运上船，沾满了冰碴和泥土”。这些木材装满了底舱，下层甲板的仓库在波士顿就被密封，直到船只抵达广州才打开。结果酿成大错。当货舱在广州黄埔港打开时：

> 里面的空气非常腐败，点亮的蜡烛像投进水中一样立刻熄灭……我们在里面存放了四五百桶牛肉。新鲜空气进入之后，进入舱口下面的人发现，牛肉几乎腐烂，桶箍已经脱落，船只内部覆盖了半英寸以上的青霉。

整批货物几乎完全报废，余下的也没有广州买家愿意接手。幸运的是，一艘在台风中折断了桅杆的荷兰巨型东印度商船正在寻找新的船只，他们刚好看上了“马萨诸塞”号。因此，山茂召和兰道尔以 65000 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荷兰人。

“马萨诸塞”号的造价大约40000美元，再加上之前支付的5000美元港口费用，这笔买卖虽然有赚头，但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们期望的利润远不止于此。船上的海员也被解散，各寻出路，有些人和山茂召及德拉诺一样，留在了中国，有些人搭其他美国船回国，或是去荷兰或英国船上继续做海员。[16]

虽然“马萨诸塞”号出师不利，其他开往中国的商船却带着货物源源而来。美国人的餐厅、客厅、卧室里纷纷摆上来自东方王国的瓷器、家具、丝绸、绘画、墙纸和古董珍玩。曾有人估计，在19世纪早期的许多波士顿和塞勒姆家庭中，大约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器物用品都来自中国。这些物品构思精妙，巧夺天工。艺术史家H. A. C. 福布斯（Crosby Forbes）称，“广州的工匠群体里，有瓷器和珐琅画师、油彩和水彩画工、织工和刺绣工、银匠和其他金属工匠、雕刻匠、镀金匠、细木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作了许多质量稳定、品位出众、种类多样的商品。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工匠群体可以与之比拟”。茶叶进口量也大幅上升，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年均消耗250万磅茶叶，之后的10年里，这一数字飙升了近50%。[17]

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最有趣的是临摹品。只要出一小笔费用，广州的画师就可以将外国人提供的任何图案临摹出来，他们也可以创作中国风物的独有图案。许多著名的美国画作、雕刻和印刷品经过中国工匠的再现后重回美国，其中较受欢迎

的主题是自由女神、J. P. 琼斯（John Paul Jones[①]）、清教徒登上北美大陆、列克星敦战役。而最受青睐的则是华盛顿，有关他的形象，以 G. 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绘制的“图书馆中肖像”最受欢迎（这幅画有多个版本，也是一美元纸币上华盛顿像的雕刻范本）。然而，这幅肖像的中国摹本抵达美国后却激怒了斯图亚特。因为向他购买过原作的人曾签署协议，声明不会复制画作，而眼下的证据很明显违反了协议。其中一名客户，“费城”号的船长 J. E. 索兹（John E. Swords）的行为最为严重。据称，他向广州订购了 100 件将此肖像背画在玻璃上的复制品。斯图亚特起诉了索兹，法官判处船长停止侵权。至于最后流入美国的斯图亚特所画华盛顿肖像的复制品到底有多少，没人能知道，但是无论怎样，这些作品都和许许多多其他中国画作一样，装饰了美国最精美的宅第。[18]

另一方面，欧洲局势的杌陧不安也让美国的对华贸易受益。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随后拿破仑的崛起让整个欧洲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战争”，一系列战争从 1792 年开始绵延多年，仅短暂中断过一次，直至 1815 年才正式结束。[19]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火也延伸到海上，许多参战国几乎无法用自己的船只进口商品。美国因此能够乘虚而入。一名英属东印度公司代表说，“作为中立国的美国人从欧洲的战局获益

① 美国海军军官，美国第一位成名的海军英雄，被称为美国海军之父。——译者注

匪浅；他们得以进入英国撤出的国家，经手大量印度和中国的商品”。[20]1795 年 5 月，波士顿《哥伦比亚百年报》（*Columbia Centinel*）对于美国获得意外的机会坦陈，“欧洲的战争简直是天降横财，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盘子接住掉下的馅饼”。结果，在“法国战争”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很大一部分立即转口到欧洲的港口。[21]

要维系对华贸易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带来中国人渴求的商品。白银是广州贸易的硬通货，但由于美国早期银币铸造量有限，商人往往难以筹集到足够的银币。市场对西洋参的需求虽然可观，但也总有上限，而且来货一多，价格也会下降，无法成为稳定的贸易支柱产品。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商人就要面
104 对困扰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的问题，中国还需要什么？美国人的答案，多半就是带上更多的海豹皮、海獭皮和檀香。

美国突然进入海豹皮贸易始自一个有根据的推测。1785 年，著名楠塔基特捕鲸家族成员 W. 罗奇（William Rotch），在伦敦读到库克船长新近发表的文章。文中描述了在广州销售海獭皮的惊人利润，罗奇想起自己家族的船只早年去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的途中见到的海豹。他认为，或许海豹皮也能卖个好价钱。带着这个想法，罗奇的兄长弗朗西斯在 1786 年将“合众国”号派往马尔维纳斯群岛，船长 B. 赫西（Benjamin Hussey）在当地收集了 13000 张海豹皮和 90 吨鲸脂油。离开群岛前，赫西遇到了英国船长 N. 波特洛克（Nathaniel Portlock），后者正
105 在前往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收购海獭皮的途中。波特洛克曾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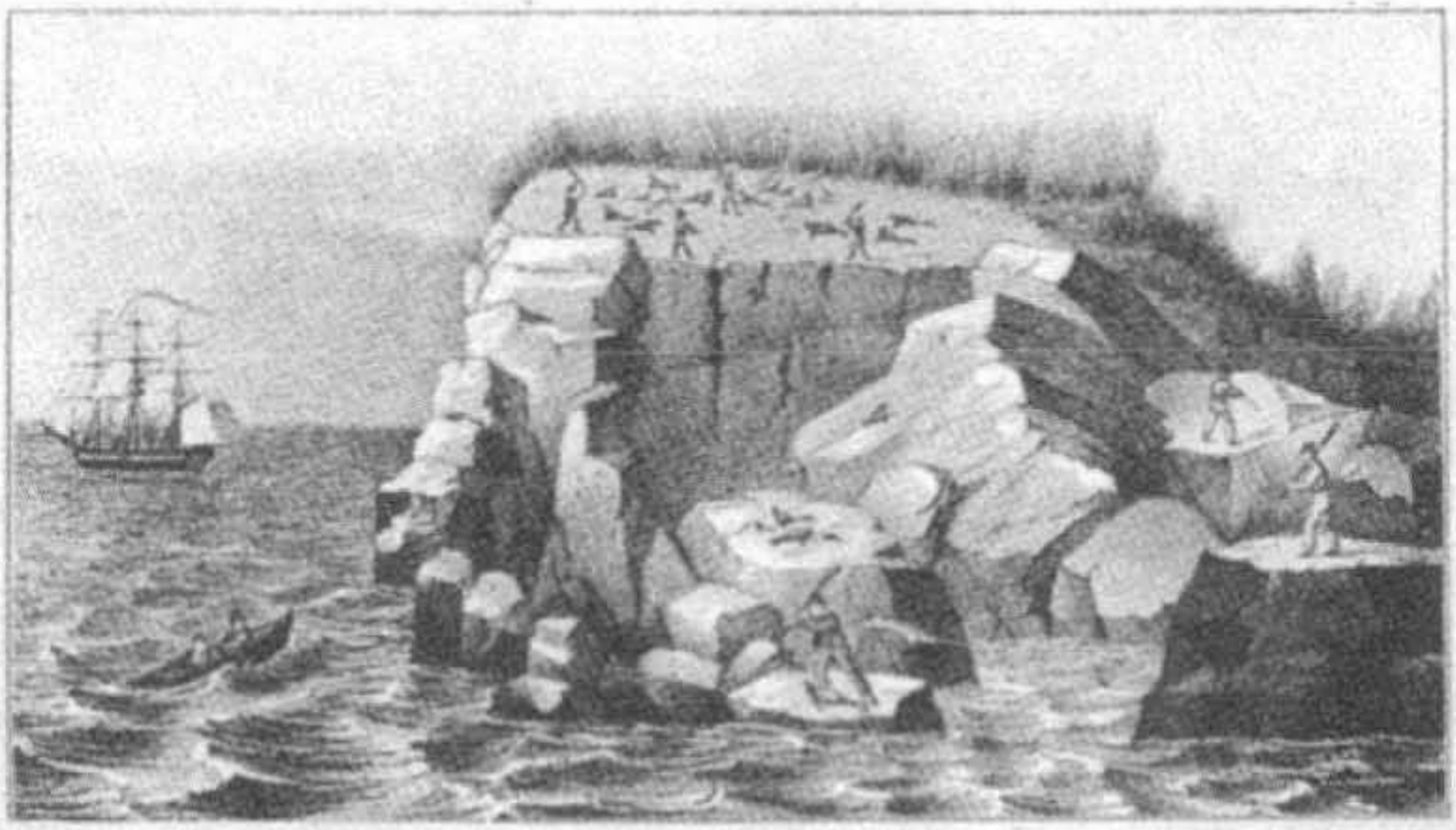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的海狗

库克的船队到过中国，因此十分清楚中国对毛皮的巨额需求。波特洛克认为，海豹皮“极有可能”在广州打开销路，向赫西提出购买这些毛皮，但赫西打算自己把这些海豹皮运往中国，因此拒绝了提议。不过，他们并没有走那么远，这批货物在纽约以 50 美分一件的价格卖出，并由 S. 麦特卡夫（Simon Metcalfe）任船长的纽约“埃莉诺拉”号运往广州，最后以 10 倍价格售出。[22]

事实上，美国人并不是第一个把海豹皮带到中国的商人。“埃莉诺拉”号到达珠江前几十年，俄国人就已经投入了这项贸易。但是美国人对捕鲸更在行，而且目的非常坚定。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主导了海豹皮交易，几十甚至上百艘船

只从美国东部的港口出发，前往全球各地寻找猎物。并非任何海豹都有价值，只有软毛海豹（海狗）才是他们的目标。包括海狮在内的粗毛海豹毛皮则不够软滑，因此需求量也较少。

这些船只开往软毛海豹聚集的群岛，随即开始杀戮。登陆之后，他们的做法取决于捕猎船是否来过此地。库珀在他的经典著作《海狮，还是迷失的捕猎者》中记录，如果是一个新发现的岛屿，海豹通常不会惧怕人类。猎杀者就可以走到海豹中间，不会引起任何警觉。要杀死海豹，只要靠近并用木棍猛击海豹的头。“就像在海滩上捡硬币一样，”库珀说。[23]



捕鲸者棒击海豹，马尔维纳斯群岛最南端博谢纳岛

如果是已经造访过的岛屿，捕猎者则会采用另一种策略。首先，他们走到海豹和海水中间。当人靠近时，感到威胁的海

豹就会挤在一起，激烈地大叫。一部分捕猎者手持木棍，冲进海豹群击打海豹的头部。其他人则在两边排开，迫使海豹进入这个血腥的屠场，如果发现有逃走的则立刻用棍棒击打。尽管海豹往往很容易被杀死，有时它们也会还击，撕咬捕猎者，或推挤到岩礁下摔死。

捕猎者们剥下海豹皮，用刀刮下脂肪和肉。虽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一个捕猎老手说，曾有人能在一小时内剥下六十张皮。剥下来的海豹皮在海水中冲洗过后，放到木架上晾干。干燥后的皮张堆起来放置几天，如果渗出水分，则会再取出吹干。经过处理的皮或存放在岛上，或装到船舱里，可以保存多年不坏。[24]

捕猎者蜂拥到岛上寻找动作迟缓、毫无防备的猎物，大船则在附近停泊，或先行开走寻求其他猎物，再返回接载这些船员和值钱的货物。留下来的船员住在洞穴中，或搭建小屋。没有捕猎的时候，他们饮酒、赌博、吹牛、种菜，有时也会读书。 107
等待可能要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如果大船失事无法返回，这些人就只能等待其他船只到来，祈求发善心的船长带他们离开岛屿。

一些捕猎者几乎成了这些岛上的常住人口。有些做了逃兵，还有一些被原先的捕猎船抛弃。留下来的人也渐渐习惯了岛屿生活。为了谋生，他们猎杀海豹，把海豹皮卖给到来的船只。W. 莫尔顿（William Moulton）曾是智利沿海马斯阿富艾拉岛（Más Afuera）的留守者，和新伦敦 的“欧尼克”号船长反目

后，来到这座岛屿，自己建了一个小屋，并形成一套与外界交往的独特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适时表现礼貌，回避任何过于亲密的行为，远离粗野的冲突和鲁莽的水手官”。岛上的另一位留守者“隐士比尔”选择居住在洞穴中，似乎靠着别人和他交换海豹皮的朗姆酒和面包过活。一名拜访过他的人说，隐士比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因为“那里不用左舷侧看，不用收顶帆，不必和任何人争吵，想睡就睡，想动就动”。[25]

在平均两到三年的航行中，捕猎船巡弋于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岛屿。虽然许多船的目标只是海豹，也有为数不少的船只也同时寻找鲸鱼。因为捕鲸人经常在大量海豹出没的地方寻找他们的猎物，这也就顺理成章，而很多时候，海豹皮的价值甚至决定了一趟航行的成败，特别是捕鲸收获不佳的时候。

这一时期，猎杀海豹的规模之大几乎超出想象。据估计，1792～1812 年间，美国商船运往广州的海豹皮数量达 250 万张，也有人称实际数字会更高。这些皮张往往能卖出 30 美分～5 美元一张。优质的皮张用来制作披肩、腰带、手套、帽子，品质较差的则经过修剪后鞣制成皮革，松散的毛皮则制成毛毡。其中利润相当惊人，以 90 吨的捕猎船“贝奇”号为例。1797 年，“贝奇”号从纽约开往南太平洋，23 个月后，带回了价值 120467 美元的中国货物。扣除航行的成本，船东净得 53118 美元。18 世纪晚期，一名法国观察家写道，美国人在捕海豹途中

发现的“毛皮仓库”给他们带来了回报，“或许正是对茶叶的嗜好让他们得到了自由和东方的珍宝”。[26]

在所有毛皮当中，最有价值的是海獭皮。海獭皮比当时交易的其他毛皮都更软、更厚，中国人最为喜爱。中国人愿意付大价钱满足对这种毛皮的渴望，促使美国水手不顾一切地投入海獭皮贸易。

在“中国皇后”号开赴广州后不久，雷雅德也离开美国，希望能在欧洲找人资助前往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航行。对于在祖国受到的冷遇，雷雅德仍愤愤不平，听到俄国人和英国人派船前往太平洋西北岸购买海獭皮的消息后，他在给一个亲戚的信中抱怨说，“看看，这项贸易值得注意，我曾经为此努力过，现在仍在争取，如果莫里斯没有在微不足道的障碍面前退缩，我现在一定好过得多，美国也会把国旗插在最遥远的商业重地。我已经厌倦了苦恼”。然而，他在异国运气依然欠佳，由法国出资组建探险队的尝试失败后，当时在巴黎的独立战争英雄琼斯支持的另一次探险也同样无果而终。遭到这最后一次挫败后，雷雅德写信给表弟伊萨克，“总之，我可以说，我和琼斯的事业到此为止，我将把这个嗜好埋葬在巴黎”。[27]

其实，雷雅德只是超前了时代一点。1787 年，一群熟稔雷雅德著作和库克船长日记的波士顿商人决定开展与中国的海獭皮贸易。他们合力装备了“哥伦比亚瑞迪维瓦”号（当时被简称为“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女士”号，派往太平洋西北

1799 年雕版画，中国广州的皮货商叫卖货物

岸寻找毛皮。最终，“哥伦比亚”号成功返航，虽然几乎没有获得利润，但却成为第一艘到达太平洋西北岸和夏威夷的美国船只，也是第一艘实现环球航行的美国船。1790 年返回波士顿的时候，作家 D. 拉凡德（David Lavender）说，这开启了“美国人著名的三角贸易：把马萨诸塞州的廉价小玩意儿运到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从那里将毛皮贩售到广州，再运送中国商品绕过半个地球回到波士顿”。[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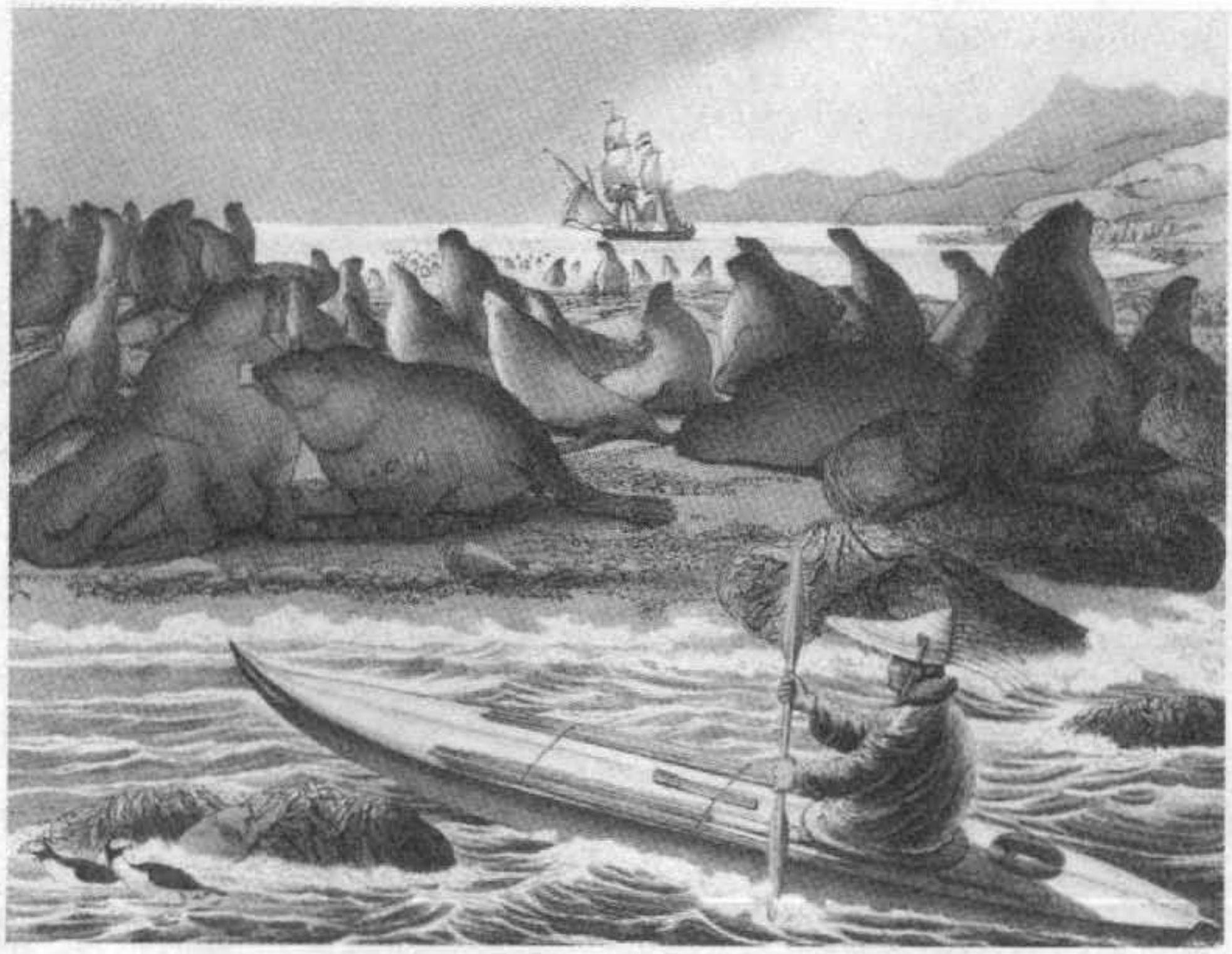
在美国人之前，俄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已经涉足海獭皮贸易。但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的还是随“哥伦比亚”号之后到来的许多美国船只，到 19 世纪早期，与土著印第安人的海獭皮贸易繁荣一时，历史学家 M. 马洛伊（Mary Malloy）称，这项贸易成为“美国人的专长，几乎被美国人垄断”。在所有参与这项贸易的美国港口中，又以波士顿港发出的船只最多，美国最主要的海獭皮商人之一 W. 斯特吉斯（William Sturgis）曾说，“［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印象中，波士顿就是美国。假如别人跟他们说起美国船或美国人，他们不会明白。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来自波士顿的船只，是波士顿人”。[29]

西北的海岸并不是美国人获取海獭皮的唯一来源。“哥伦比亚”号前往该地区大约 10 年后，美国人的船只逐渐抵达上加利福尼亚，时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尽管西班牙人警告不得在海岸沿线进行交易，美国人还是从土著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毛皮，也成为第一批踏上这片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人。

1803 年，美国人联合俄国毛皮商一起开发新的商业机会，给这项贸易又平添几分波澜。阿拉斯加的俄国人长期以来残酷地驱使阿留申群岛、科迪亚克群岛以及库克湾的土著居民，逼迫他们猎取海獭。现在，俄国人将数以百计的土著人送上美国船只，前往下加利福尼亚，他们收集到的毛皮则在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瓜分，并销往中国。合作持续了大约 10 年，为两国毛皮商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在加利福尼亚沿岸，阿拉斯加的土著人一人或两三人结队，乘坐覆皮的小舟“拜达卡”捕猎海獭。这种小船长 12 ~ 21 英尺，宽不到 2 英尺，操作灵活，吃水很浅。土著人可以在巨藻之间，悄悄接近熟睡中的海獭，用石头或贝壳包头的长矛投向
111 海獭的侧腹，甚至直接将它们打死。如果海獭是醒来的，猎杀者就会在最后见到海獭的区域围成一圈，等到海獭一出现，其中一只拜达卡就会冲上去，其他人则呼喊尖叫，不给海獭喘气的机会，迫使海獭跳入水中。这个过程不断重复，圈子也越来越小，直至猎杀者逼近精疲力竭的海獭，将其杀死。土著人有时也会撒网或枪击来捕猎海獭。[30]

这一期间，数以万计的海獭皮从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和加州流向广州。但是暴利并没有持久，随着越来越多的毛皮进入市场，价格也随之下跌。不过，一张海獭皮依然可以卖出 20 ~ 30 美元，利润往往能达到航行成本的 300% 以上，并且一度飙
112 升至 2200%。19 世纪的一位作家写道，“美国西北部到广州之间毛皮交易的利润之高，可以和沙里淘金相比，只要河中沙金



拜达卡中的阿留申土人，阿拉斯加普里比洛夫群岛圣保罗附近

不绝，投入极少的劳力或技术就能取得闪亮的真金”。[31]

在横穿太平洋的时候，美国海獭皮商人很喜欢停靠夏威夷，在这里稍作休整，采买日用品，雇佣当地人上船工作，享受美妙的岛屿生活，更不用说奔放的土著女性带来的诱惑。在这一连串如同宝石散落在太平洋上的天堂岛屿上，美国人发现了另一种可与中国人交易的产品——檀香。[32]

檀香树有很多种类，从南太平洋到印度的许多岛屿上都能找到。初看之下，很难了解这些树木的商业价值何在。檀香树并不高，通常只有约30英尺，小小的果实也食之无味。但是有些种类的檀香内部则别有秘密：树心和根部含有香气馥郁的油

脂，使得这种纹路纤细的土黄色木头在中国价值极高，曾经并仍用于雕刻成散发香气的精美家具，也制成气味香甜的香料，在祭拜时焚用。

在美国人到达广州前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使用的是产自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檀香。夏威夷的檀香被当地人用来制作一种弦乐器，也磨成粉香洒在衣服上，质量虽然略次，香味也足以悦服中国人。第一个把夏威夷檀香带到中国的美国人已经不可考，这项贸易从18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到了1812年战争前
113 夕，每年已经有十几个海獭皮商人会经过夏威夷群岛，将刚刚砍下的檀香树填满货舱。夏威夷的檀香贸易开辟之后十多年，美国人又将斐济群岛的檀香纳入了他们的供应链中。

第一个将斐济檀木林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O. 斯莱特（Oliver Slater）。1800年前后，他还是美国帆船“阿尔戈”（Argo）号上的水手，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英国流放地的途中，船只在斐济拉克巴岛11英里外触礁沉没。斯莱特幸存下来，在斐济度过两年后，一艘路过的澳大利亚船只才将他带走。孰料一上船，船上就爆发哗变，船只转向中国。在斐济时，斯莱特就注意到当地的檀香树，到广州以及回到澳大利亚后，他开始告
114 诉别人自己的发现。很快，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船只纷纷开往斐济，在这片被称为“檀香群岛”的乐土，竞相取用芳香的宝藏。

无论是在夏威夷、斐济，还是其他檀香贸易波及之处，包括汤加、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萨摩亚，美国人的

三种檀香木的花朵（其中一个是花瓣）

成功都离不开土著人。这些岛屿的国王或酋长控制着檀香林，美国人首先需要获得他们的首肯才能采伐树木，而交易的头等大事也就成了和统治者建立关系。美国人和他们交换礼物，签订协议，规定砍伐檀香木的条件和数量。抹香鲸的牙齿是当地人最青睐的物品，美国捕鲸船纵横太平洋捕捞这种深海的庞然大物，再交换给需要的商人。巨大的牙齿重可达 2 磅以上，被认为具有神圣的力量，用作嫁妆或巩固部族

之间的联盟，在战争中，佩戴鲸牙的人相信自己能够所向披靡。和真正的鲸牙一样受欢迎的还有象牙做的仿制品。此外，织布、镜子、斧头、玻璃瓶、钉子之类的小玩意儿也颇受欢迎。

这其中，有些关系的形成极富个人色彩。有一位布朗先生曾在纽约出发的“希望”号上担任大副，1870 年，他在瓦努阿莱武岛住过一段时间，并学会了当地方言，可以不借助翻译直接交流。当地首领很喜欢这个求知欲强烈的和善客人，因此收为义子，这层关系帮助“希望”号船长达成了一笔檀香的交易。在离开该岛时，布朗保证会再随其他船回来，1808 年 12 月，他果然随“东加”（Tonquin）号重返此地。据船长 E. 范宁（Edmund Fanning）的记录，与布朗久别重逢的国王登上“东加”号，“立刻像孩子一样抱住布朗，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再一分钟，国王陛下似乎感情过于投入，忘记松开手，大呼‘孩子！孩子!’，热泪流过脸颊，国王显然欣喜若狂，为
115 见到义子而激动难抑。这个场面不仅让在场的船员瞠目结舌，也让甲板上的土著人目瞪口呆”。

礼物交换、协议签订后，美国人就要靠当地人开伐树木。国王选出大队劳力登上山坡，船上则派员监督。他们选取最粗大的檀香树，不用斧头，而是用横锯锯开，以免产生不值一文的木屑。美国的一名檀香商人说，“土著人很喜欢锯树干，由于锯子的声音在他们听来优美而愉悦，他们经常抢着干这个”。大树倒下后，人们砍下树冠，修剪掉多余的树枝，掘除树根，

去掉外皮，只留下浸透了油脂的树心。

这项苦工要持续多日才能采集到足够的树木运下山，送往岸边等待的船只。回报往往极为惊人。比如，1812 年，波士顿出发的“猎人”号船长以 8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几百吨斐济檀香，在广州以 80000 美元卖出，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一家报纸惊呼，“这简直是一本万利！”但是，除非砍对了树，否则所有的工作都会付诸东流。最早的时候，曾有一艘从夏威夷运来檀香的美国货船，由于弄错了树种，砍伐的树木里几乎不含中国人需要的那种宝贵油脂，因此，在广州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33]

在 20 世纪生态学家 G. 哈丁（Garrett Hardin）看来，海豹、海獭和檀香的贸易却导致了“自然界的悲剧”。强烈的需求、有限的供给、贪婪和缺乏约束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休止的破坏，人类为了一己私利毁灭掠夺自然资源，丝毫不考虑长期的恶果。年复一年，成群的海豹被杀戮，几十艘船只满载着上万件毛皮离开。在 19 世纪初期，海豹捕猎者们自己也承认猎物越来越少见，有些地方已经完全绝迹。海獭的命运也如出一辙。至于檀香，夏威夷和斐济的绿色山脉很快就变成了了无生机的荒原，大部分的林木被砍伐殆尽，只留下触目的残枝和树桩。海豹、海獭和檀香的贸易本可以持续地更久，贸易商人也想从自然界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只是短浅的目光让衰退过早地来临了。[34]

为填充货仓，美国的对华贸易商还依赖着另一种自然资源。

土耳其人种植罂粟花，从罂粟子荚中提取出鸦片，美国人将鸦片成品运往广州。同样，美国人也并不是第一个进入这项贸易的，他们只是在追随英国人积极开辟的道路。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满足英国人对茶叶日益高涨的需求。还是对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货物相对较低的需求，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办法并不多。中国人需要的主要英国进口货是毛制品、棉织品、锡、铅。但这些货物并不足以支付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采买茶叶之费。因此，英国就要用大量白银填补差额。白银的外流令英国财政左支右绌，造成英国政府担心的贸易赤字，特别是由于国际供应的紧张，找到足够的白银也时有困难。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让中国人对英国商品更感兴趣，避免直接支付白银。这一点加上其他因素，促使英国政府于 1792 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带领贸易使团觐见乾隆皇帝。[35]①

然而，使团却未能如愿，乾隆帝向英王乔治三世传达的信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我们对英国货没有任何兴趣。乾隆在信函中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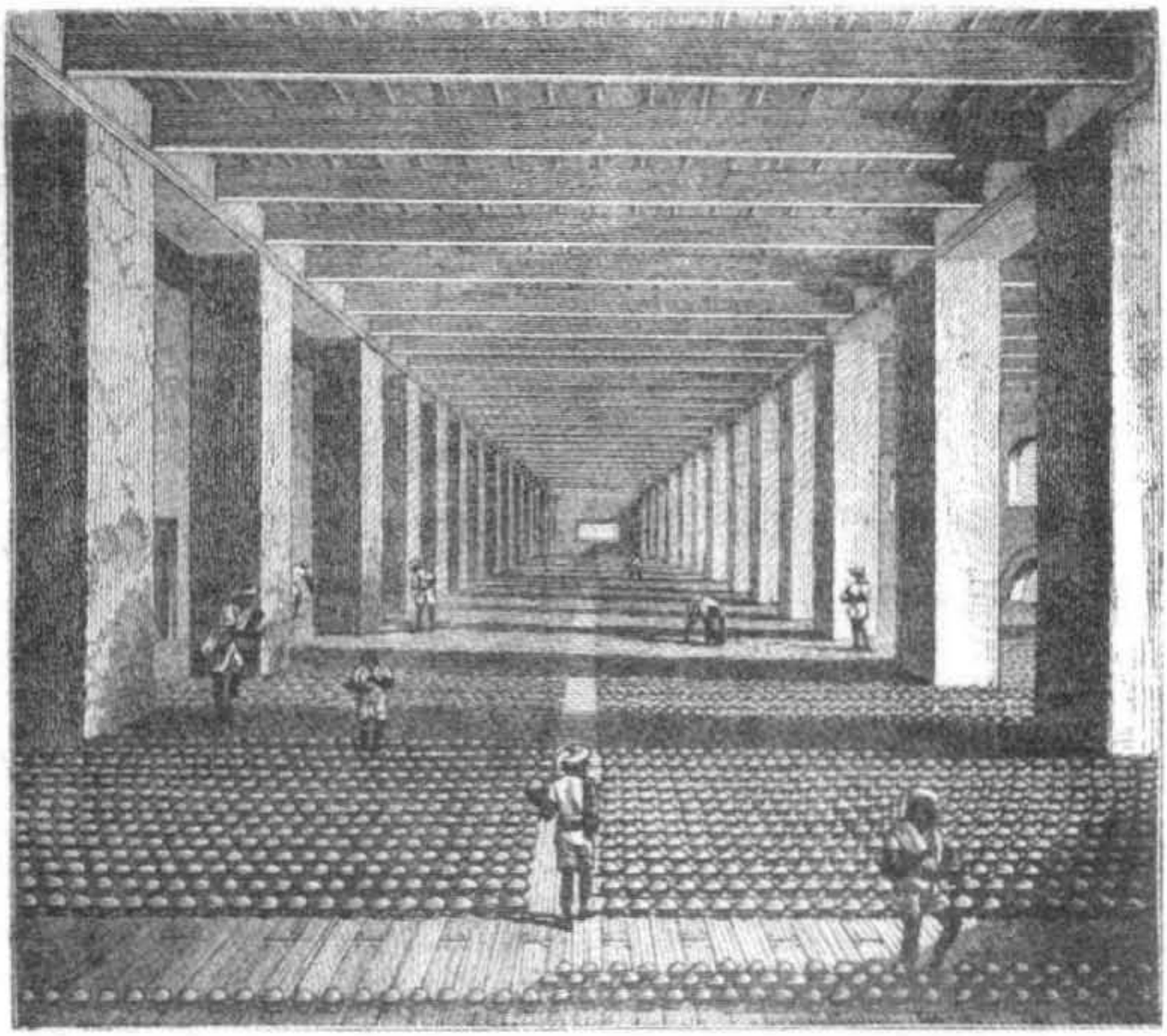
> 然从不贵奇巧，更无需尔国制办物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

① 提高中国人对英国商品的兴趣只是使团的目的之一，使团的目的还包括在北京驻使、向英国商人开放更多中国口岸。

体恤，在广州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36]

中国社会高度发展，经济多样，基本上能够自给，但乾隆对中国自足能力的说法言过其实。事实上，中国当时从东南亚进口大量基本产品，例如大米、胡椒、木料、铜，也从全球很多地方进口其他商品。[37]英国人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确需求很少，难有代替白银的商品。但是除此之外，中国人也确实另有所好，那就是鸦片，这后来成为英属东印度公司最理想的商品。人类学家 M.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写道，“在近三个世纪里，中国就是欧洲白银的坟墓，所有的白银有去无回”。[38]但是，鸦片让东印度公司找到了打开坟墓的钥匙，并终于逆转了白银的流向。由于中国人用白银购买鸦片，东印度公司卖出的鸦片越多，就能从中国攫取越多的白银。如果销售鸦片的所得高于购买中国货物之需，英国船只就能将多余的白银运回国内。换言之，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的财政可凭借向中国贩卖大量鸦片扭亏为盈。

自从 18 世纪晚期开始，东印度公司独揽了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地区）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这也是南亚次大陆产量最高的地方之一，因此，货源并不是问题。然而，鸦片贸易并非坦途。尽管清政府 1729 年的公告并未禁止鸦片进口，英国人已将其当成实质上的禁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官员以及行商们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在当时的私下交流中，公司官员明确认为，如果英国船只被抓到携带鸦片，皇帝就会下令将船货



印度鸦片厂干燥间的鸦片球，约 1850 年

一并没收。因此，在公司看来，参与鸦片贸易就等于交易违禁品，因此有所忌惮，唯恐惹怒皇帝，进而威胁到更重要的茶叶贸易。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就此放弃这项令人垂涎的贸易。因此，如历史学家 M. 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所说，东印度公司“改进了在印度种植鸦片的技术，并在中国与鸦片划清界限”，做出金盆洗手的姿态，事实上却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39]他们不再用公司船只将鸦片送往中国，而是在加尔各答将鸦片以拍卖形式出售给所谓的港脚商人，亦即东印度公司颁

119

发执照的英国私商，从印度将鸦片小批量地输送到广州。公司官员就可以声称，印度鸦片流向中国要归咎于私人港脚商而不是东印度公司。这样，一方面，公司发放执照，从鸦片拍卖获利；另一方面，纯粹为交易而进行的拍卖也就和走私不相干了。

港脚商人进入中国水域后，当然不能直接带着这些非法鸦片到广州销售，而必须偷运进来。他们把船开到澳门和黄埔港停泊，接头的走私贩用现金支付鸦片，再将鸦片运到内地分销。 120
走私情况极为普遍，原因之一是许多清朝官员受走私者贿赂，沆瀣一气，有的自己也吸食成瘾。行贿的也不只是走私者，港脚商人本身也大行此道，将贿赂称为“茶钱”。

不过，这套系统并没有解决东印度公司的现金流问题，因为在广州销售鸦片所得的大部分白银流向了港脚商，只有一部分在港脚商竞拍鸦片后流回公司。因此，公司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以便从港脚商手里套出更多白银。公司在广州的出纳部门向港脚商发放可在加尔各答或伦敦兑现的汇票。由此，港脚商人得到货款，公司得到支付中国货物急需的白银。效果相当不错：1800 年，英国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已经超过 3000 箱。[①] 由于鸦片价值很高，当年的卖价几乎达到 600 西班牙银元一箱，形成了大量的白银收入，然而还是不够公司支付在广州采购货

① 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并没有“准确”数字，特别是在对华贸易的早期。每箱鸦片的价格也同样模糊。一部分原因是贸易的走私性质，没有可靠的记录。另外，获得的数字也往往得自不同渠道，统计的口径也不尽相同。

物所需。[40]

鸦片进口越来越多，吸食鸦片导致更多人上瘾，令百姓体格虚弱，道德退步，乾隆帝和后来几个皇帝为此困扰不已。嘉庆帝曾诏令禁止进口鸦片，以遏制吸食鸦片之风。1799 年的一份诏令称[①]，“昔时烟害尚限于几地，今日已遍及南北各省”。结果，上瘾的人数增加，皇帝很担心，因为成瘾的人彻夜不眠，“唯求纵欲，玩忽职守”。

此外，鸦片使人非常饥饿，在食物上花费更多，但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填饱肚子，他们会在“数年之内，败坏颓废……体弱者亡于饥困，体壮者行窃盗抢，最后必定一切尽毁”。因此，皇帝总结道，“洋人以此邪物荼毒我人获利，而普罗之众竞相追逐，死而后已，实乃可憎可叹之至”。为切断鸦片的流入，这份诏令禁止外国人将鸦片带入中国，警告走私者将被发现并惩罚，如果官员收受贿赂让鸦片流入中国，也会被追究责任。[41]

然而，禁令并未产生效果，走私依然像以往一样继续。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大为改变。由于对鸦片的需求上升，但供应仍相对稳定，鸦片价格也就扶摇直上。从 1805 ~ 1809 年，进口的鸦片数量维持在 4000 箱左右，大多数时候，每箱单价已经超过 1000 西班牙银元。在这一时期，准确地说是在 1806 年，鸦片贸易和公司其他货物交易所得的白银第一次超过了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英国人终于不用再将白银送入中国，白银头一次

① 此处引文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回流到英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在后来的多年里只增不减。白银的坟墓终于打开。[42] 122

东印度公司野心勃勃，他们并不关心中国的禁令或是鸦片会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利润：只要白银持续流出中国，英国就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输送鸦片。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称，英国人认为这笔生意的逻辑在于，“中国人得对自己负责，如果他们坚持购买和走私鸦片，那就只能是他们的问题，而与外国人无关”，没多久，美国人也接受了这个看似方便而道德上站不住脚的立场。[43]

随同“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时，山茂召就曾经留意到鸦片贸易，并告诉一些美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很好卖，可以放心走私，利润可观，而且绝无安全之虞。[44]不过短期内，并没有多少美国人进入此道。尽管有资料表明，最早在 1788 年，就有美国船只携带鸦片进入中国，但美国直至 1804 年才开始稳定地参与进来，这一年，费城商人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不过，他们运往广州的鸦片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在爱琴海沿岸的土耳其士麦那（今伊兹密尔）购得。在中国，土耳其的鸦片并不像印度货一样受欢迎，但销路尚可，有时也和印度鸦片混配，以求扩大销量。不久之后，巴尔的摩、波士顿、塞勒姆等其他城市的商人也纷纷做起鸦片生意。对于买卖鸦片，美国人并没有良心上的不安，而是看成和其他生意一样。1805 年初，吉拉德写道，“我非常赞成大力投资鸦片。只要［法国战争］的战火持续，鸦片就能在中国卖出好价钱”。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

和走私商合作，用收取的白银购买货物。但相比起来，美国人
123 在鸦片贸易中的份额相对较少。英国人每年输入数千箱鸦片，获利数百万美元，美国人最多时也只有几百箱，年销售所得约为 10 万到 20 万美元。[45]

美国人在海豹皮、海獭皮、檀香和鸦片上虽然有所获利，但仍不足以支付用于购买中国货物的支出。即便加上美国销往中国其他商品，包括西洋参、棉、鱼翅、燕窝，资金仍有缺口。为弥补差额，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使用了银币。在美国对华贸易的头30 年里，美国人从广州进口的货物中，有65% ~70%以银币支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严重的贸易赤字。换言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远远高于出口到中国的货物。[46]

美国船只前往中国的航线也各有差异。许多船只带着白银或货物直接奔赴中国，更多的船只则选取迂回路线，先开往中途点，像美国小贩的传统做法一样，将货物多次转手倒卖，以期增加货物品类，吸引行商的兴趣。有些船只开往太平洋西北沿岸，或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岛屿，收集毛皮和檀香，也有的则去往南美和欧洲的港口，出售货物，换取白银，还有的则深入加勒比海、中东、非洲和亚洲港口开展易货交易。J. 布朗（John Brown）拥有的“华盛顿将军”号可以印证这种富有漫游色彩的贸易路线。1787 年，“华盛顿将军”号从普罗维登斯起航，船上的货物琳琅满目，从船锚、炮弹、铁条，到西洋参、焦油、鲸
124 蜡，还有牙买加烈酒、帆布和新英格兰朗姆酒，总值为 57000 美

元。在前往中国的途中，船只首先在马德拉群岛停靠，卖出大部分的酒类，然后西行到印度的本地治理，将剩余的酒类卖掉，购买棉花，运往广州后换来了价值 10 万美元的商品。“华盛顿将军”号的最后利润为 2 万美元，回报率达到 30%。[47]

无论美国船只运到广州的是什么货物，或者走的是哪条航线，不变的是总有危险相伴。第一个障碍就是安全抵达广州。许多船只遭遇了暴风雨或其他灾难，消失于海上，自此音信全无。有些船只则撞上暗礁或沙堤沉没，由于他们行经的许多地方并没有海图作参考，因此这一问题就特别严重。此外，船只还不时会遭遇暴力冲突或凶徒，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斯特名下的“东加”号事件。1811 年夏季，这艘船在温哥华岛沿岸的格里夸湾与印第安人交易的时候就遇上了麻烦。

事情的起因是，在和当地人购买毛皮时，“东加”号傲慢的船长 J. 索恩（Jonathan Thorn）对当地首领开出的价码不满，但他没有还价或直接拒绝，而是用一张卷起来的海獭皮扇了这位首领一个耳光。这一行为挑起了印第安人的愤怒，他们杀光了船上的所有船员，只剩下 6 个人。其中一名翻译躲在当地印第安人家里逃过一劫，有 4 个人搭上“东加”号的救生艇试图逃走，但很快被追上并杀死。最后一名船员在印第安人的攻击中身受重伤，爬到船舱里，点燃了 9 吨火药，将船只和登船寻找战利品的 200 名印第安人全数炸死。[48]

在“东加”号事件爆发前 20 多年，夏威夷也曾出现过一系列离奇的悲剧事件。1788 年，将 F. 罗奇（Francis Rotch）的

125 海豹皮运往广州后，船长麦特卡夫率“埃莉诺拉”号开往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收购更多的毛皮，回广州的途中途径夏威夷毛伊岛，于1790年2月下旬的一天停靠在檀香山（Honuaula）。一晚，附近奥罗瓦鲁村的两名村民偷走了“埃莉诺拉”号上的一只小艇。艇上的一名船员还没叫出声就被杀死。到了岸边，村民将小艇拆开，取走了所有的铁钉，然后扬长而去。

次日早晨，麦特卡夫和一些手下气势汹汹地上岸，杀死了一名土著，并抓住两人，其中一名指出了真正的小偷。麦特卡夫驱船前往奥罗瓦鲁，悬出重赏，收集关于船员和船只的信息。土著们交出了船员的尸体，麦特卡夫佯装宽恕，告诉土著们会得到赏金，并邀请他们上船交易。土著人划着大量独木舟靠近“埃莉诺拉”号，麦特卡夫让他们聚集到船右舷一侧后，遂命令船员向人群开炮，立刻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麦特卡夫满意地离开，前往夏威夷大岛，在库克船长遇害的凯阿拉凯库亚湾（Kealakekua Bay）停泊。麦特卡夫的手下采集檀香木的时候，他18岁的儿子托马斯则开着26吨的小船“美丽的阿美利亚”（Fair American）号前往东北方向45英里的卡威哈湾。由于在1788年秋离开广州后遭遇暴风雨，麦特卡夫父子在海上分离，彼此并不知道对方就在附近。

就在几周前，老麦特卡夫刚刚因为一些小过失，鞭打了当地酋长卡米亚末库。悲剧的是，托马斯恰恰选择了这里停留。酋长和随从登上“美丽的阿美利亚”号，送上礼物，出其不意地袭击了6个美国人。卡米亚末库逮住托马斯并推入海中，手

下用船桨将托马斯击打致死。4 名船员被杀害，一人被俘，船 126
只搁浅，并被洗劫一空。

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凯阿拉凯库亚湾，大酋长卡美哈梅哈担心老麦特卡夫起事复仇，禁止任何人离岛。“埃莉诺拉”号水手长扬（Young）当时正在岸上，没能回到船上。麦特卡夫在船上断断续续地鸣枪召水手长回船，但两天后依然毫无音讯，不得不放弃。麦特卡夫调头前往广州，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在附近被害，更不会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也是悲剧酿成的原因之一。[49]

除了这两起殊为耸动的事件，在 18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早期涉及中国贸易的航路上，还有数十到百余起其他暴力事件，其中许多发生在斐济。人们在这里争夺对日益稀缺的檀香木的控制权，流血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土著人和贸易商之间发生冲突，土著人自己也往往大打出手。

而在所有和对华贸易有关的地方中，最血腥的或许是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那里的印第安人时常从到来的船只上偷东西。历史学家 J. R. 吉布森（James R. Gibson）写道，印第安人把“他们水域上的船只”当成“可以抢夺的漂浮物，将欧洲人和美国人砍树取水看成偷窃和对领土的侵犯”。[50]对于印第安人的偷窃行为，美国人有时并不追究，也常常毫不手软地果断还击，如 1794 年的“杰斐逊”号。为了报复偷独木舟和绳索的印第安人，船员们突袭温哥华岛西岸格里夸湾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找回了失窃物，杀伤数名村民，捣毁房屋，还顺手牵走了几条

独木舟。

此类事件往往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索。如果美国人认为印第安人要价过高，有些贸易商甚至会扣押印第安人作为人质，自己开价，要挟对方以毛皮支付赎金。有时候，交易看上去相安无事，事后印第安人才发现美国人欺骗他们（比如，在火药桶底部放绳索充数，在朗姆酒或糖浆中掺水），又会再起纷争。印第安人自己也不老实，譬如拉长河獭皮的尾巴或染色，冒充海獭皮。

不轨之事如此普遍，这片海岸的关系自然很紧张，也经常出现争执。一艘波士顿出发的毛皮交易船的英国船员 J. 杰维特（John Jewitt）就指出，暴力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更多的暴力。他所在的船只被印第安人攻击后，大部分水手被杀死，他自己则做了两年俘虏（1803～1805 年）。杰维特说：

> 我坚信，［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岸］许多悲惨的灾难肇因于部分船长和船员的不智之举，他们往往为了琐事，侮辱、抢夺甚至杀害土著人，激怒了他们。对野蛮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复仇的信念更神圣，也没有人比受到侮辱的人更狂躁，他们将怒火发泄到送上门的船员身上，使得无辜者常常为有罪之人的暴行承担恶果。[51]

虽然美国人和土著人的做法都不光彩，有时甚至极为可怕，美国人的行为却更加恶劣。斯特吉斯或许是社会和文化意识最

敏感的美国对华贸易商，他认为，印第安人常常“是不公、残忍、压迫的受害者，强权政策的牺牲者”。他也认为，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更多的是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作恶”。[52]对于卷入对华贸易圈的夏威夷人和斐济人，这个论断也同样适用。

即便美国商人顺利到达中国，危险也没有结束。在中国南 128
海和珠江口出没的海盗大约有 7 万人，拥有 800 艘船只，对往来商船构成持续威胁，“阿塔瓦尔帕”号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该船从波士顿出发，载有 30 万银元，1809 年 8 月下旬停靠在澳门水路，其中一名乘客提醒斯特吉斯船长，有 16 只中国舢板快速逼近。斯特吉斯认为这些人可能是渔民，向舢板的船首开炮，试探他们是否会改变航线。这些人依然径直而来，斯特吉斯开始准备战斗。

他的幸运之处在于还可以选择战斗。“阿塔瓦尔帕”号的船东对中国海域的风险一无所知，禁止斯特吉斯在船上配备武器。好在惯熟于中国贸易的斯特吉斯悄悄地在船上存放了四门大炮。开火前，斯特吉斯让人把一箱火药桶搬上来放在他身边，跟着点燃一支雪茄，告诉水手，炸沉舢板，不要让海盗接近。交火随即开始。

随着船只逃亡澳门，海盗们向“阿塔瓦尔帕”号投掷火球弹，斯特吉斯的船员们开火反击，海上顿时血色成片，呼号四起。海盗损失惨重，但仍不断逼近。直到“阿塔瓦尔帕”号靠近澳门，炮台将火炮对准海盗，他们方行撤退。海盗首领阿保仔（Apootsae）被清朝当局抓获，凌迟处死。[53]

美国对土著人的伤害还不止于直接的暴力行为。交易者们带来了性病、麻疹、肺结核，当地人对于这些无形的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备受折磨。酒精损害了土著人的健康，并产生和酗酒有关的其他问题。[54]交易商在很多情况下开枪射击土著人，但土著人得到的枪支常常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斐济即属一例。

一些美国船长，如范宁拒绝向“天真的”斐济人提供武器，担心会“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杀戮”。只是，并不是所有贸易者都和范宁一样从人道主义考虑，许多人受到当地首领的压力，默许提供枪支，后果可想而知。[55]首领们自相残杀，争夺对檀香林的控制权。这些枪支大部分是贸易得来，但斐济人的第一批枪是来自一艘失事的船只。1808 年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出发的“伊莉莎”号也是循檀香而来，在斐济那莱岛附近的海域触礁沉没。船长 H. 科里（Hill Corey）和其他船员游到海滩，其中大部分人最终搭乘其他贸易船只离开了斐济。但 C. 萨维奇（Charles Savage）留了下来。

萨维奇是个脾气火爆的瑞典人，并非“伊莉莎”号船员，而是在汤加上船，他此前经历了另一次船只失事。“伊莉莎”号沉没后，萨维奇想到一个计划，他说服姆巴乌岛的首领打捞这艘船上的枪支弹药。接下来，萨维奇从斐济的海滩流浪者（这个词包括遇难船只的海员、逃兵、澳大利亚流放地的逃亡者和其他岛民）中选取人手，组织了一支小型战斗队。一些海滩流浪者是和平的流浪汉，得到斐济人的善待。但其他一些则是积习已深的麻烦制造者，萨维奇所招募的正是这样一群人。

凭借“伊莉莎”号上打捞起来的火药和手下的杂牌军，萨维奇成了一个军火商。姆巴乌岛首领利用萨维奇提供的枪支和人手，大肆杀戮，成为斐济的最高统治者。萨维奇的血腥生意维持了五年之久，最后死于自己狂热的暴力倾向。他在一桩檀香的争斗中帮助一方，结果被对手抓到，解除了身上的武装，投入水中淹死。[56]

土著人涉入对华贸易遭遇的悲剧应当结合积极的一面来看。作为当地物产的交换，土著人得到了他们视为宝贝的东西，如珠子、布、鲸牙、金属工具甚至中国瓷器。然而，他们失去的东西更多。暴力、枪支、疾病和酒精的传播，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毁坏荒废都是难以计算的代价。

除了留下破坏殆尽的文化和资源，美国的早期对华贸易者还解开了一个谜团。楠塔基特的 M. 福戈尔（Mayhew Folger）船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也是 19 世纪著名废奴主义者、贵格教会信徒 L. 莫特（Lucretia Mott）的叔叔。1807 年 4 月，福戈尔船长驾驶“托帕兹”号从波士顿出发。由于许多捕海豹的传统地区已经枯竭，福戈尔此行希望发现新的岛屿。福戈尔的船只先是南下到南大西洋，继而西行至南太平洋，总共收集到 600 张毛皮。1808 年初，福戈尔决定去塔希提东南 1300 英里的皮特凯恩岛补充淡水并寻找海豹。

1767 年 7 月，英国船长 P. 卡特里特（Philip Carteret）成为第一个发现皮特凯恩岛的欧洲人，但自此之后，再无人见过这座岛。1808 年 2 月 6 日，福戈尔靠近皮岛，看见岛上升起一缕

青烟，这让船长大为吃惊，因为卡特里特曾说皮特凯恩岛并无人居。福戈尔乘捕鲸艇靠近海岸，远远看到三个人划着独木舟。三人还没靠近，就有一个人用英语高声问福戈尔是谁，来自哪里。福戈尔回答后，对方答道："你是美国人，你从美国来；那么美国在哪里？在爱尔兰么？"接下来就发生航海史上最有趣也最意外的一段对话，据德拉诺从福戈尔本人那里得到的信息记载如下。

福戈尔船长认为要弄清楚状况，就得知道对方来自哪里，既然他们说的是英语，于是便问："你们是谁？"

"我们是英国人。"

"你们出生在哪儿？"

"你看到的这个岛。"

"如果你们出生在这座英国从未拥有的岛屿，怎么能说是英国人？"

"因为我们的父亲是英国人。"

"你们的父亲是谁？"

他们的回答很有趣，只有一个单词，"埃里克"。

"谁是埃里克？"

"你不知道埃里克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

"那么，你们知道'邦提'号船长布莱么？"

尽管福戈尔不认识布莱，但他确实听说过这个人，因为大多数西方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1789 年 4 月，F. 克里斯蒂安（Fletcher Christian）成功地在英国海军船“邦提”号领导了一场兵变，将船长 W. 布莱（William Bligh）和 18 名船员赶上一只23 英尺的小船，布莱熟练地驾着这只小船漂流了 3600 英里，安全抵达荷属东印度的帝汶，并和其他幸存者从那里坐船回到英格兰。近 19 年来，人们都对叛变者的下落不明所以。福戈尔找到了答案——他们已定居在皮特凯恩岛。所谓的“埃里克”其实是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别名约翰·亚当斯），幸存的最后一个叛变者。福戈尔上岛后得知，岛上有 35 人，大部分是“埃里克”的妻子和孩子。离开皮特凯恩岛后，福戈尔报告了他的发现，也为“邦提”号的兵变画上了句号。[57]

英国人对美国人日益增长的对华贸易十分关注，警惕可能的竞争。一开始，他们对初出茅庐的美国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在大英帝国把持的贸易领域难有作为。随着美国船只前往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英国人的轻蔑变成紧张，有时希望美国人栽跟头，有时又对他们的成功眼红不已。P. 邦德（Phineas Bond）为这种情绪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出生在美国，但选择加入英国国籍，在独立战争后，成为英国驻费城领事。1787 年 5 月，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卡玛森（Carmarthen）爵士的信中写道，“美国人在对华贸易中备受鼓舞，激励他们在这项事业中大展拳脚”。虽然邦德认同这种趋势，他后来也指出，“在美国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有进取心的人自然会投身（对华贸易）事

业”——他担心的是趋势发展的方向。邦德颇有先见之明，他认为，美国对华贸易“使用的船只数量”将“超过美国市场所需”，这将促使他们将中国货物运往欧洲，从而“严重侵蚀大不列颠的财政收入和商业”，成为英国人的噩梦。

和许多同僚一样，邦德对美国兴起的中国热感到惊讶。1787 年 7 月，他给卡玛森的信中写道：“阁下，初看之下，航行的延迟，装备商船的必要开支，以及适当汇款取得投资的困难，很快会令他们的事业遭受挫折，但如果从现在的热潮判断，我们应当看到，新的利润之源已经浮现，投资的手段也得到改进，足以确保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向卡玛森保证，英国还是有机会逆转趋势。邦德声称，美国商人的财力“极为有限，如果及早检查或设置限制，无论是破坏他们的信用或扣留适合的商品，我相信，他们都绝无机会恢复力量”。不过，英国并没有进行任何检查或限制，美国人的财力和能力也比邦德设想的更强大。邦德这封信中对美国人的唱衰之论后来多数落空，美国人已牢牢占据对华贸易的地位，而英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58]

如果对伯克的话多听一点，面对美国在航海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中的崛起，英国也就完全不会感到意外。在独立战争前夕，伯克敦促他的国人调和与殖民地间的巨大矛盾，选择和平，避免战争。在国会三小时的演讲中，他提出，“殖民地的商业绝不会局限于人口数量的比例”。他特别注意到美国的捕鲸业，说道：

看看新英格兰人最近在捕鲸业的作为。当我们在崎岖的冰山包围中跟随他们，看到他们深入哈德逊湾和戴维斯海峡最深处的冰谷，当我们还在北极圈以下寻找他们，我们听闻，他们已经深入地球另一端，踏上冰封的南极大陆。海洋上没有能什么能阻挡他们。任何气候都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59]

伯克深心钦服的精神、动力和决心不唯捕鲸业独有，而已成为美国人天性的一部分。当独立战争为美国铺平了自主之路，这些特点就帮助美国人在对华贸易上高奏凯歌。

美国人的成功让英国人明显改变了在广州的态度。1784 年山茂召首次抵达中国时，尽管独立战争刚刚平息，英国人还相当友好，乐于帮忙。但数年之后，情况已经大为转变。在 1787 年 12 月写给杰伊的信中，他说，“我只看到，前宗主国对我们的贸易十分妒忌”，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无法和对方以礼相待”。这种转变的原因很明显。“我想，找到矛盾并不难”，1786 年给诺克斯的信中，山茂召写道，“［1784 年］，我们只有一只船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对于我们，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但却通情达理，欢迎我们。现在，［1786 年］我们已经有五只船，这种竞争让他们警觉，我认为他们举国上下都希望我们栽跟头”。[60]

对美国人态度急转直下的还不只是英国人。1799 年，“海王星”号捕鲸船随船大班 E. 汤森德（Ebenezer Townsend）在

澳门时写道："这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猜忌，英国人太傲慢，而独立的美国人则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的一艘船行过一个英国人的时候，他用美国佬的方式喊道'你们要去哪儿?'得到的回答也很美国，'带一箱茶叶去波士顿，你不想来看看邦克山么?'①"[61]

虽然英国人的感觉五味杂陈，美国人却沉浸于远东商业的厚利中。R. H. 李（Richard Henry Lee）是《独立宣言》签字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在"中国皇后"号回国后一周多写信给 S. 亚当斯（Samuel Adams），断言（"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航行……证明了美国人的进取精神，也可能会抑制甚至损害我们的老对手英国的利益"。1787 年 8 月，《普罗维登斯公报和国家杂志》（*Providence Gazette and Country Journal*）重印了一份来自都柏林的急件，想必让读者得意地微笑。

> 尽管英国报纸还在不遗余力地报道美国不利的贸易局面，资金短缺，信用不足，但我们在印度最新的消息表明，已有五只美国船只聚集在中国，并且很可能带来巨大的回报。

9 年后，塞勒姆牧师 W. 本特利（William Bently）在日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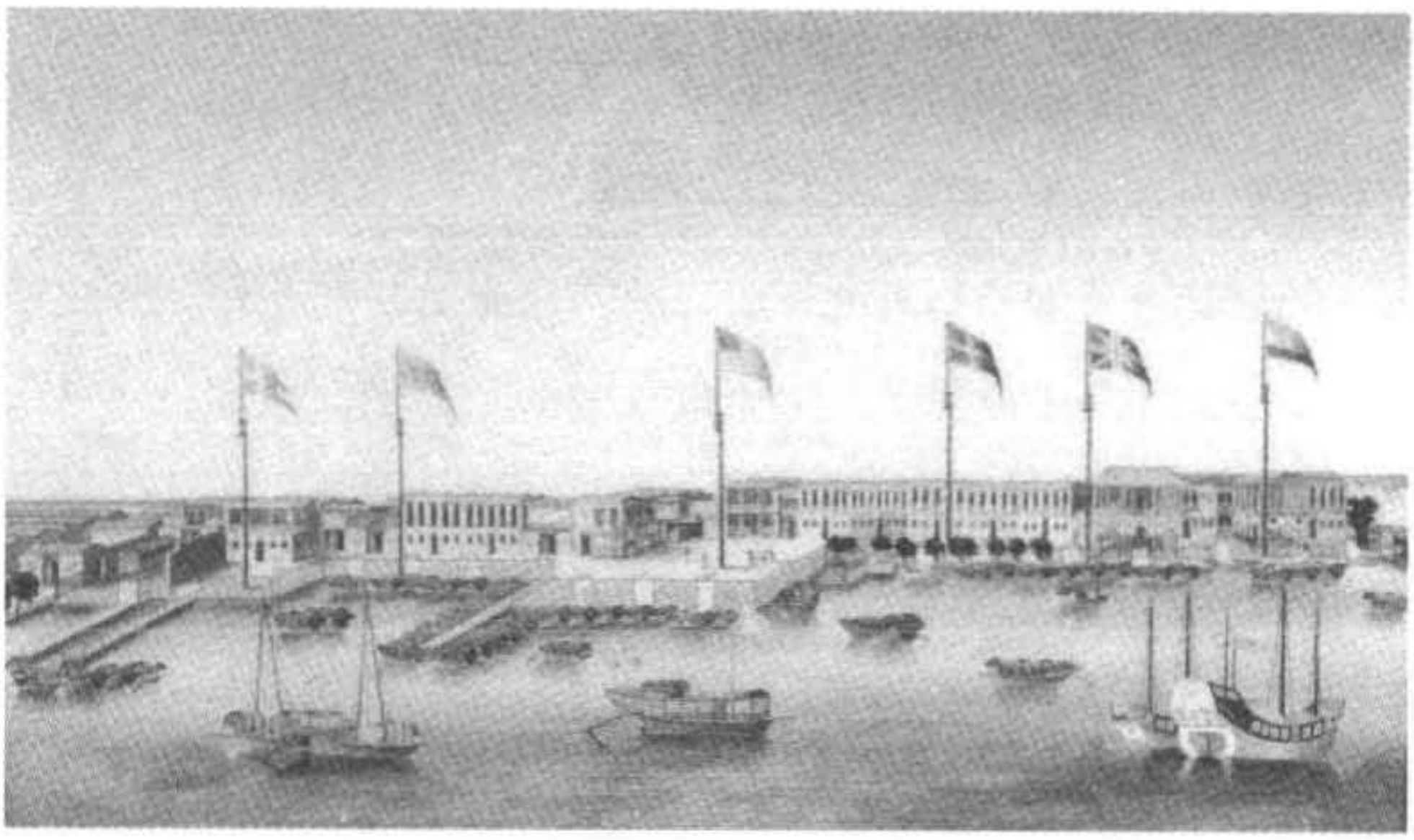
① 1775 年发生的邦克山战役是英军与北美殖民地民兵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冲突。——译者注

写道，“对东印度的贸易现在已经扩大到美国各州的所有重要乡镇”。1807 年，一个美国人从伦敦写信回家说，“在商业方面，这个国家（英国）已经不再对美国无动于衷，而视之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几乎已经瓦解了英国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62]

很明显，最后一句话有点偏离事实了。尽管美国几乎肯定是英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但远谈不上瓦解英国对于中国贸易的掌控。虽然在 18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对华贸易的船只数量上，美国仅次于英国，后来 20 年中，美国发往广州的船只甚至一度超过英属东印度公司，但仅靠数字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规模比美国大得多，而英国贸易的总量更是远超美国。如果加上英国的私人港脚船，两国商业活动的差距就会更明显。以中国商品中最重要、价值最高的茶叶为例，英国每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数量远高于美国，有时达到 10∶1，最高时可达 20∶1。迅速崛起的美国人确实从英国的对华贸易中抢得不少份额，但不列颠雄狮依然强大，远没有衰落到被摧毁的地步。[63]

虽然英国人遥遥领先，美国的对华贸易商在 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早期的成绩也值得称道。数百艘船只来往于美国和中国的航线上，大多数获利不菲，有些甚至取得令人咂舌的财富。1805～1812 年，对华贸易（进出口）的总值大约为每年 500 万美元，占美国外贸总额的 3%，某些年份，进口货物的关税就已超过 100 万美元。活跃的商贸活动和带动的相关行业有力地支持了新兴的美国经济。历史学家西德尼和 M. 格林比（Marjorie Greenbie）写道，中国贸易“不仅使大西洋沿岸各州

在独立战争后站稳脚跟，还为他们最初的工业进步提供了资金。这些资金或许不算很多，但要知道，启动冷却的发动机也无须大费周章”。而在广州，美国的影响也在逐渐上升。早期曾参与对华贸易的许多国家，如丹麦、西班牙、瑞典、普鲁士、法国，到19世纪早期已经几无活动，往往一年中最多只有十多艘船只，某些年份则完全没有。这些国家在广州的商业逐渐停顿，美国的贸易却愈加兴旺。[64]



广州的夷馆，中国画家（佚名）绘，约1805年

137 欧洲的法国战争让美国船只成为中立的运输选择，从而对美国的崛起推波助澜，美国的对华贸易商也从其他独特优势中得益。由于没有垄断的限制，他们的运作更加灵活，可以迅速抓住商业机会。美国人的航海技能和船只质量很适于快速和高效的航行。他们也很擅长随机应变，因此在交易中左右逢源。

实现俄国首次环球航行（1803～1806年）的海军上将A. J. 冯·克鲁辛斯特恩（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说：

> 或许没有人能比美国人更具商业精神。他们是熟练的海员，船上人员精干，这一点别国难以匹敌。此外，他们的船只质量极为优秀，比许多战船速度更快。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些美国船长能在十个月内往返中国和美国……美国人能够迅速把握贸易中涌现的任何优势。[65]

但无论多自由、技术多熟练或高效，对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人也毫无办法。多年来，他们的船只在海上屡屡遭遇麻烦，1808年，这些问题更是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对华贸易。

从18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就在海上玩起了猫鼠游戏。英国战船声称许多美国水手是英国海军的逃兵，因此拦截美国船只，强行带走所谓的逃兵，称为“强行征兵”。有些时候，英国人确实行有所据，但许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对英国公民强行征兵，而是绑架美国人。这种做法激怒了美国本土的民众，1807年发生的一次事件导致愤怒升级。

当年6月22日，美国“切萨皮克”号正驶离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英国皇家海军“利奥波德”号少校J. 米德（John Meade）登上“切萨皮克”号，要求船长S. 巴隆（Samuel Barron）将船员召集到主甲板，找出英国逃兵。巴隆拒绝了要求，米德返回“利奥波德”号，船员近距离向“切萨皮克”号

开火，迫使巴隆屈服。米德从“切萨皮克”号带走了4名船员，但只有一人确为英国逃兵。对于希望向英国宣战的美国人，“切萨皮克”号事件恰好成了集结号。但是，杰弗逊总统并未宣战，而是决定惩罚英国和也曾骚扰过美国船只的法国，他宣布实施封港令，禁止美国船只驶往外国港口，而外国船只也不得从美国港口购买货物。他的想法是切断贸易，打击英国和法国的经济，从而迫使对方尊重美国的独立性。[66]

包括对华贸易商在内的美国海商都反对封港。他们认为，宁可接受外国势力的掠夺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也好过完全停止贸易活动，损失一切收入。但政府对商人们的担心并未理会，封港令于1807年12月22日生效。尽管有一些商人绕过禁令，悄悄将船只开往中国，大多数商人还是停止了海上活动，不希望以身试法。但是，一个叫“文钟”（Punqua Wingchong）的中国商人却帮助阿斯特逃过了封港令。[67]

1808年7月12日，纽约参议员，阿斯特的好友S. L. 米切尔（Mitchell）致信杰弗逊总统，介绍说中国商人文钟九个月前来到纽约，现正急盼回国料理家中事务，筹备奄奄一息的九旬祖父的葬礼。文钟希望包一只船回国，因此需要总统的帮助，因为只有杰斐逊才能对封港令破例。

文钟和翻译来到华盛顿面见杰斐逊，但到达时杰斐逊已经出发去蒙蒂塞洛。据一家报纸称，文钟不止是个商人，还是一名清朝大官。此时，他直接致信总统，重申了雇船将在美期间积累的财富运回国的要求。杰斐逊的国务卿，阿斯特的另一名好友J. 麦

迪逊（James Madison）也写信，劝说总统应允文钟的请求。[68]

杰斐逊终于被说服，7 月25 日，他写信给财务部长 A. 加勒廷（Albert Gallatin）：

> 这个人妥善离开，或许能促进中国对我国的了解，舍此之外，传递信息并非易事。对于在华的我国商人，也是明显的优势。因此，我认为，取得长期的国家利益高于在大范围封港令下破例的影响。

杰斐逊命令加勒廷为“满清大官文钟”从纽约离港作出必要的准备，并在信中附上了一本“空白的船只通行证”，以利通行。[69]

但7 月底，有消息传出，说文钟计划携带价值 4 万 ~5 万美元的商品和银币，人们开始逐渐怀疑他身份的真实性，到了 140
8 月上旬，公众得知他雇用的船只是阿斯特的“海狸”号，怀疑之论更是甚嚣尘上。其他对华贸易商留意到这一情况，自己做了调查。8 月10 日，多名费城商人写信给加勒廷，宣称文钟是个骗子，他只是阿斯特逃脱封港令计划的一枚棋子。有些商人声称，文钟不过是“广州城中的小店主”，还有些商人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人，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信誉扫地，因为如果他真是所谓的重要“满清官员”，商人们在中国就一定会认识他。纽约商人也加入攻击，说文钟就是个“在公园找的中国佬”，或“穿上绸衣、摇着孔雀羽毛扇的印第安人”。[70]

纽约的媒体更是煽风点火。8 月13 日，《纽约商业广告人》

(*New-York Gazette & Advertiser*) 题为《“海狸”号和满清大官》(“The Ship Beaver and the Mandarin”) 的文章中，一个匿名投稿者写道，“一个离奇的事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点出这次航行伪装的目的和总统的破例后，编辑写道：

> 众所周知的是，得到许可的人并非满清大官，甚至不是领有执照或合法的商人……据信，这艘船的船东不会接受在我国的所有中国人的全部财产作为补偿，大家都知道，他与人订约，将美国商品送上船。因此，无论总统授予许可的动机何在，可以确定的是，船东的目的就是在其他商人被封港令限制的时候前往中国。[71]

同一天，《纽约公报和广告人》(*New-York Gazette & Advertiser*) 刊出了一则讽刺性的“给满清大官的通知”(“Notice to Mandarins”)，悬赏2万~5万美元，寻找“在当前封港令下，能获得美利坚总统许可，开船从纽约出发到广州并返回纽约的满清大官”。这份文告称，申请人是“亚洲人还是美国人都无关紧要，但必须是真正的满清官家”。这位大官还应该有一位“年长的父亲，如果多于一位前来申请（这很有可能），则父亲最年长的那位将获得优先考虑”。如果能够得到总统的许可，将银币运往广州，未来的雇主更会另眼相看。[72]

面对指责，阿斯特选择直面对手。在给《纽约商业广告人》编辑的信中（8月15日登出），他要求13日文章的作者表

明姓名，阿斯特将发给“他关于此事的事实记录”，澄清其中并无不妥之事。“他将确信，政府对于授予许可的误传并不惊讶，而当事方的声誉也不会受到一点损害。”[73]阿斯特的信并没有得到回应，指责他的人选择置之不理，因此，阿斯特所说的“事实记录”里究竟包含了什么，也就无从知晓。

尽管众多对华贸易商和记者呼吁进一步调查此事后才能放行“海狸”号，杰斐逊政府却并未行动。旁人并不清楚当时还在蒙蒂塞洛的总统是否知道发酵中的争议。迟至8月15日给加勒廷的信中，他仍然相信，文钟的回国航行可能“为我国的商人和商业在中国带来长久优势”。相反，加勒廷显然对这次航行的真实性质深表怀疑，推测说“其中有一些投机成分”，但不知是和阿斯特的关系还是其他考虑占了上风，加勒廷并没有深究下去。[74]

8月17日，“海狸”号离开纽约。两天后，《波特兰公报和缅因州广告人》（*Portland Gazette and Maine Advertiser*）对于船只的离港挖苦道，“唯一让杰斐逊先生相信这人不是骗子的证据就是，他酷肖中国茶壶上的人物！——我们的好总统被骗了吗？还是“海狸”号属于一些优秀的民主党人？无论如何，自从“海狸”号开走，据说总统的府第已经被满清大官们完全包围”。[75]

无论受骗与否，杰斐逊都有理由怀疑他的决定。8月23日，他收到过一封匿名信，指出文钟 和阿斯特的行为不端。杰斐逊说自己“无意评价”来信者声言的正确与否，因为他早前收到的信息都已显示，文钟的身份和目标已是“既成事实”。但如果船只还在港口，杰斐逊就会要求扣留船只，查清事实。

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已，船只已经开走。“海狸”号1809年6月1日从广州返回，带来了种类繁多的茶叶、丝绸和南京棉，利润超过20万美元，让阿斯特有理由为之自得。

文钟的真实身份和他的故事究竟有几分真实，至今仍是个谜团。他来自中国，这点毫无疑问。“幸运儿”号船长曾从广州带来一些资料，显示他和仆人曾在1807年到访过楠塔基特岛。岛上接待他的一位主人描述说，他像个“商人……肤色和我们本地白人一样”。[76]1812年战争后，文钟还曾两次回到此岛。而对于故事的其他部分，疑点则较多。其一，作为有能力在逗留美国时收购价值5万银币和商品的清朝官员，又是来自中国的稀客，况且身家富裕，在此期间应该会有更多人知晓；其二，他是如何得知祖父将不久于世，若果真如此，为什么他一开始要离开中国。此外，“海狸”号最后给阿斯特以及和他定有协
143 议的商人带来了诱人的利润，不能不让人怀疑，阿斯特可能是把文钟当成伪装，为的就是瞒天过海。[77]

无论如何，封港令最后被证明彻底失败，不仅没能削弱英国和法国，反倒让美国自己元气大伤。这项法案通过后一年内，美国的出口从1.08亿美元下降到2200万美元，对华贸易也随之衰落。[78]在此之前的1807年曾是美国对华贸易商的黄金时代，当年有44艘美国船只抵达中国，带回来大约650万磅茶叶。次年，随着封港令全面生效，到达中国的船只数目骤减至15艘，仅运回100万磅茶叶（这些船只大部分是在封港令生效前就离开美国，因此并未违法）。

1809 年 3 月 1 日，就在离任前几天，杰弗逊总统废除了封港令。对华贸易迅速恢复，当年到往广州的船只回升至 44 艘，进口到美国的茶叶接近 1000 万磅。[79]然而好景不长，1811 年，美国再度陷入和英国的另一场鏖战，在 1812 年 6 月 1 日正式宣战后，对华贸易再次陷入危境。

虽然商人们可以自由派船前往广州，但路上却面临着重重风险。英国海军有着当时最精良的装备，不时出现在海上，并把美国商船当成可以合法打击的对象。无论如何，在英美这次两年半的敌对期间，还是有几十艘船只在利润的巨大诱惑之下，顶住被俘虏的恐惧，离开美国港口前往广州。

这些无畏甚至凶悍的美国人中，有些陷入英国人的包围被捕，由于中国海域也成为战场，他们遂成为战利品。但这里的美国私掠船不甘示弱，开展反击，也俘获了英国人。同时，中国人则提心吊胆地旁观这场家门口的争斗，而参战两国将他们 144
的战利品送往黄埔港，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则让他们十分气愤。中国人威胁说要停止贸易，后来又请求英国人和美国人将战火转移到别处。一位中国官员说，“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什么纠葛，让他们到自己的国家解决”。[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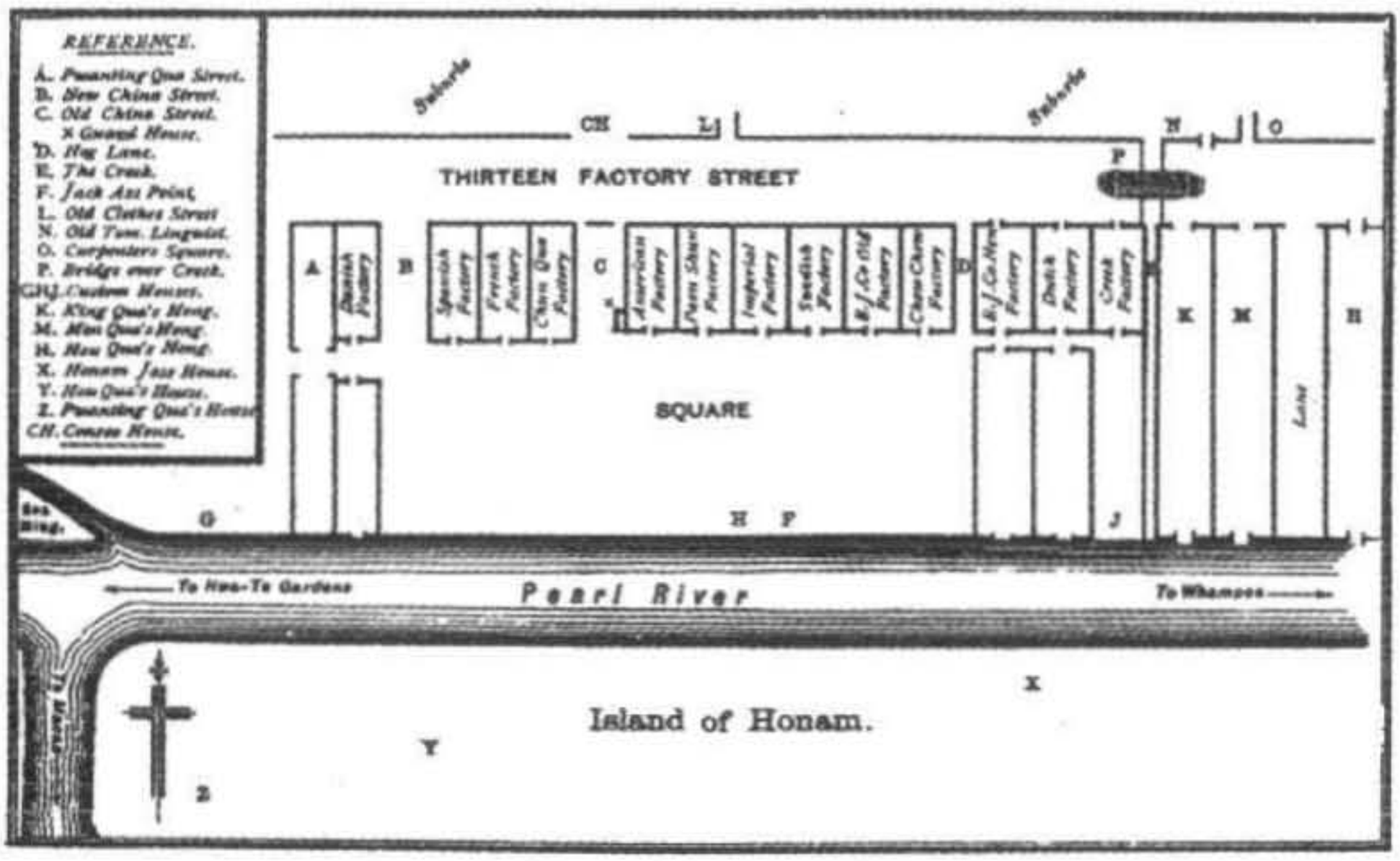
在英美两国宣战后出港的美国船只宣称自愿承担风险，但是也有部分船只已经先行离开，结果往往碰到不期而遇的麻烦。其中最有趣的要数吉拉德名下的“孟德斯鸠”号的遭遇。1812 年 2 月，船只抵达广州，并在年底出发返回费城，而船长 R. 威尔森（Robert Wilson）此时并不知道战事已经开始。1813 年 3 月下旬， 145

在特拉华湾口的亨洛彭角，威尔森看到一只和他船队中的小船大小相仿的纵帆船正在靠近。很快，威尔森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有三十名“悲惨饥饿的男人和男孩”，装备了十门小臼炮和枪支，这其实是英国海军的“帕兹”号，他们靠近的目的是截获“孟德斯鸠”号。威尔森没有反抗，他和船员们被送上岸，并进行了谈判。这时，英国皇家海军“普提尔”号指挥官J. 贝雷斯福德爵士（Sir John Beresford）已经到达，他为“孟德斯鸠”号开出了18万西班牙银元的赎金。虽然“孟德斯鸠”号的货物只值16.5万，但吉拉德却同意支付了赎金，并笑到了最后。原因在于战争造成了货物短缺，商品价格高涨，吉拉德将船上的货物脱手后，卖出了近50万元。[81]

S. 吉拉德的“孟德斯鸠”号，澳门附近，中国画家（佚名）绘，1812年

在1812年战争期间，许多船只在美中航线历经艰辛，总算取得成功，不过总体而言，贸易受到重创，进口急剧下降，输入美国的茶叶总量更骤减至每年150万磅。1814年12月24日，《根特条约》（the Treaty of Ghet）签订，战争正式结束，美国的对华贸易也进入新的篇章。

第六章　金街



广州的夷馆地图

随着和平恢复，美国商人也重新将注意力投入到生意上来，
商业活动逐渐呈现井喷之势。从 1816～1839 年，美国对华贸易
额平均每年约 700 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的 4%。这段时间
内出现多次起伏，商业贸易随着美国国势一起经历过恐慌，也
有过繁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然保持赤字。但总体而言，对
华贸易不仅是商人的主要财富来源，也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渠
道。原始数据虽然反映了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以来可观的对华
贸易量，但参与者的经历却隐而不现。事实上，这个过程既充
满变化，又绵延连续。[1]

1812 年战争后的 25 年，对华贸易出现了一波大规模的整
合。船只众多、资金充裕的大公司取代了许多小规模的独立贸
易商，后者曾是战前的贸易主力军。对华贸易的两位重量级人
物阿斯特和吉拉德仍然活跃，直至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随着
与中国在鸦片贸易的摩擦升级，加上美国本土商机的诱惑，他
们最终都放弃了对华贸易。

广州的船只数量从最低时的 18 艘上升到 59 艘，其中大部
分来自纽约、波士顿、普罗维登斯、费城和塞勒姆。但回国后，
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停泊纽约，使之超过费城，一举成为美国
最大的城市，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茶叶销售和分销的主要中心。
尽管为了装载更多货物，船只体积越来越大，随着航行效率提
高，水手的数量则慢慢减少。[2]货物的组成也有所改变，因为一
些传统的出口商品日渐稀少，特别是海豹皮、檀香木和海獭皮。

19 世纪 20 年代末，商业猎杀使许多地方的软毛海豹已经

灭绝，捕猎者不得不寻找新的目标。这一次，康涅狄格州斯通宁顿的商人抢得头筹，很快发现在世界最南端附近有一片无人染指的宝藏。多年以来，南美洲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大陆尖角以南的岛屿上，“从未被人类打扰的海豹像小猫一样温顺，数量比任何地方都多”。[3] 强悍的斯通宁顿商人和船长是捕猎海豹的能手，这个故事一直诱惑着他们，终于，在 1819 年，一支斯通宁顿人组成的队伍登上 J. P. 谢菲尔德（James P. Sheffield）任船长的“艾西莉亚”号，踏上寻找海豹皮宝库的旅途。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谢菲尔德从一个曾见过那些神秘岛屿的英国人获得信息，将“艾西莉亚”号开往合恩角（Cape Horn）400 英里以外的南设得兰群岛（South Shetland Islands）。传说果然不虚，谢菲尔德收获了近 1 万张海豹皮。回到斯通宁顿后，当地的同行欣喜若狂，不久，9 艘当地船只也先后追随而来。为了独享这份财富，斯通宁顿的商人对外宣称，这些船只纯粹是出海捕鲸。不过，纸包不住火，1820～1821 年，南设德兰群岛迎来了捕猎的高峰，云集了 30 艘美国船只，不光来自斯通宁顿，还包括楠塔基特、纽约、新贝德福德、塞勒姆、纽黑文、费尔黑文。甚至连英国和俄罗斯的船只也闻风而至。[4]

在这段繁忙的时期，20 岁的 N. B. 帕尔默（Nathaniel B. Palmer）率领“英雄”号单桅帆船从斯通宁顿出发，试图寻找其他海豹活动的岛屿。“英雄”号体型小巧，仅 47 英尺长，44 吨，在向南行驶了几百英里之后，一片覆盖着冰雪的山地映入帕尔默和船员的视野。他不知道的是，这片荒原就是南极大

陆。不断袭来的浓雾迫使帕尔默返航，随后的遭遇却让他吃惊不已。1821 年 2 月 6 日清晨，“英雄”号被浓雾笼罩，船员们只能让船慢慢漂流，祈求不要撞上什么东西。帕尔默敲响船钟，却听到仿佛远处传来一阵钟声。帕尔默以为自己听错了，重新调整了手表，但半小时后，他两次敲响船钟后，回应的钟声再度想起。帕尔默后来回忆道：“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像在做梦一样，（因为）除了企鹅、信天翁、鸽子和海燕的叫声，我很确定，在船的四周，并没有其他生命。”

浓雾散去后，帕尔默和船员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船开入了两只俄国战船中间。这是俄国沙皇派往全球进行科学考察的船只。俄国探险队的指挥官，海军上将 F. G. B. 冯·贝林豪森（Fabian Gottlieb Benjamin von Bellingshausen）比帕尔默更吃惊。他无法相信这么小的船只能够从美国一路驶来，并冒险进入这片危险的水域。在遇到“英雄”号之前，贝林豪森曾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抵达这片区域的探险家，但根据和帕尔默谈话的记载，他说：“我们必须将这次探险的荣誉让给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屈居你们之后。”贝林豪森还承诺，将在俄国人的海图上，将这片新大陆命名为帕尔默大陆，纪念这位斯通宁顿的船长。尽管贝林豪森气量大度，但对于帕尔默究竟是不是看到这片地方的第一人，以至享有发现南极洲的殊荣，还存在争议。[5] 无论如何，“英雄”号勇敢的冒险再次证明了美国人的航海能力，在纵横七海“追逐财富的冒险”中，将他们推到商人国家的领先地位。

尽管帕尔默没能找到其他布满海豹的群岛，1820～1821 年的捕猎依然取得巨大成功。南设得兰群岛的海豹皮填满了船舱，第二年，许多船只纷纷回来猎取更多货物。在这两年中，32 万只海豹被杀死并被剥下毛皮。只是，这样的好景已经没有第三年可言。南设德兰群岛也进入了被人类毁灭之地的长长名单。捕猎者们从不放过任何猎杀的机会，事实上，他们所想的，就是尽快杀死更多海豹。几年后，英国海豹捕猎者 J. 威德尔（James Weddell）反思了这段时期，显现了当时罕见的洞察力：

> 软毛海豹价值很高，如果捕杀的速度能稍加控制，多年之内，每年都可繁殖 10 万只海豹。如果等到小海豹能喝水再杀死母海豹，他们的繁衍也可以持续，哪怕是只杀戮成年海豹和一部分公海豹，即便总数会下降，至少速度不会太快……然而，在南设德兰群岛发生的，实为有系统的灭绝，只要有海豹爬到岸边，无论大小，就会被立即杀死，剥下外皮。海豹因此几近绝种。[6]

美国对中国的海豹皮贸易持续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但南设德兰群岛这样的来源已经绝迹。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美国船只运往广州的海豹皮数量几乎骤减为零。[7] 剩下的海豹数量之少，已经使这项交易无利可图。

同样的轨迹也出现在檀香木贸易，斐济则是第一个牺牲品。在 1812 年战争之前，斐济的这种芳香树木就已所剩无几，但檀

香木的贸易还是勉强维持到 1816 年，直至所有的檀香树都被砍伐殆尽。与此同时，从南太平洋中心向东北数千英里的地方，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檀香木来源，这就是远古火山喷发遗迹形成的马克萨斯群岛。在 1812 年战争中，船长 D. 波特（David Porter）率领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和俘获的一些英国捕鲸船开到马克萨斯群岛避风。波特的俘虏们注意到，岛上陡峭的山坡密布着檀香树。其中一艘捕鲸船逃往悉尼后，消息传播开来，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冒险家纷纷赶往马克萨斯群岛，希望利用马克萨斯人对抹香鲸牙齿的追捧，在又一波檀香热中分一块蛋糕。波特后来说：“无论在欧洲或美国多珍贵的珠宝，都不及这里的抹香鲸牙齿，我曾见到得到鲸牙的人喜极而泣，从这个岛上拉走三百吨檀香木，代价可能只是十颗鲸鱼的大牙。”[8] 在南太平洋逡巡的捕鲸者人数众多，檀香木商人不费什么工夫就能满足马克萨斯人对鲸牙的渴求，仅仅三年后，这片群岛上的檀香木就已被砍光。

檀香贸易最繁盛的要数夏威夷群岛。[9] 在战争之后，统一了夏威夷王国诸岛的卡米哈米哈一世国王（King Kamehameha I）将这里大片的檀香林当做自己的私人银行，随时卖出檀香木，购买船只，创立自己的海军。美国人乐得顺水推舟，用年久失修的旧船只交换了数千吨檀香木，并运往广州，中国人也因此将夏威夷称为“檀香山”。除了用船交换檀香木，美国人还从卡米哈米哈手中采购檀香木，或受托将檀香木运往广州，再将一定比例的利润返还给国王。

夏威夷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

卡米哈米哈的臣民被迫砍伐檀香树，工作极苦，以至健康恶化，自己的农田和家人也顾不上。夏威夷历史学家 S. M. 卡玛考（Samuel M. Kamakau）说："奴役代替了自由，土著人被当做牲口对待。他们将檀香树捆在肩上，徒步来往于艰险的山径。沉重的木料让男人和女人身体变形。被迫在檀香林劳动的苦工无暇农事，粮食逐渐缺乏，饥荒随即到来。"[10]卡米哈米哈注意到这种趋势，也看到岛上檀香木迅速减少，于是限制岛民
153 砍树的时间，并保护树苗，避免树木被砍绝。但卡米哈米哈的儿子利霍利霍（Liholiho，即卡米哈米哈二世）1819 年继位后，情形每况愈下。利霍利霍不像父亲那么谨慎，更喜欢恣意挥霍，

允许个别首领进行檀香木交易，很快，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砍伐，购买朗姆酒、枪支、香槟、丝绸、家具和更多的船只。同时，夏威夷的臣民却还在继续承受着痛苦。

利霍利霍最不寻常的举动是购买了83英尺长的“埃及艳后”号，美国制造的第一艘航海游艇。这艘船原来的主人是著名塞勒姆商业家族成员小G. 克洛文希尔德（George Crowninshield, Jr.），1816年10月从塞勒姆下水。“埃及艳后”号以欧洲皇室游艇为蓝本，装饰如同宫殿，有天鹅绒沙发、精描细画的椅子、枝形吊灯、全套精制玻璃和瓷器的餐柜。在地中海巡游和克洛文希尔德逝世后，“埃及艳后”号被拆除大多数装饰，当做商船使用了很多年，之后卖给了布莱恩特和斯特吉斯公司。这个公司随即将船只开往夏威夷，希望国王用檀香木来买下这只船。

1820年11月初，“埃及艳后”到达拉海纳后不久，利霍利霍就和宠臣们登船巡视。国王着了迷，一周之内，用500吨檀香木买下船，并重新命名为“夏威夷之傲”号。接下来的多年里，利霍利霍常常满载好酒，乘着这艘船多次巡游他的岛国，所到之处，无不任意驱使数量稀少的国民。他是如此沉醉于这只船，以至于布莱恩特和斯特吉斯公司的一名代理人布拉德说，“如果你想知道夏威夷群岛的宗教情况，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教派都得到容许，但国王崇拜的是‘埃及艳后’号”。[11]

1824年4月5日的一次出游中，这艘船撞向考伊岛崎岖的

海岸，沉入海底。据说，当时除了船长，船上的所有人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利霍利霍没有见到自己的爱船沉没。当时，他正在英格兰面见乔治四世。对于招待夏威夷的统治者，英国国王十分担心，他说利霍利霍及其妻是“一对可恶的食人魔”。乔治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伦敦污浊的空气让利霍利霍和妻子感染了麻疹，到达英国两个月后就病死了。[12]

利霍利霍和手下的首领们挥霍无度，购买了许多无力支付的东西，债台高筑，积欠多年，直至夏威夷政府最后才清还了账目。而比债务伤害更严重的则是贪婪。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夏威夷的檀香林已经被悉数砍光。仅存的树木连一船也装不满，美国贸易商也不再开赴夏威夷购买檀香。尽管后来几年，还有少量夏威夷檀香运往广州，但由于尺寸过小，质量不高，因此销量很低。

与海豹和檀香木命运相仿的还有海獭。到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美国的海獭皮贸易已经难以为继。美国人一度每年向广州输入 18000 张海獭皮，现在的数字仅有五分之一。10 年后，更跌落至仅仅 300 张。1832 年，一个美国著名海獭商人写信告诉他的船长，“今年的贸易季，我不会装备任何船只，这项生意已经无利可图”。被疯狂猎杀的海獭几乎绝迹，不仅在西北部的太平洋地区如此，从加利福尼亚州到阿拉斯加的海岸沿线都如出一辙。虽然海獭最初的利润并不高，却依然没能逃过人类贪婪的荼毒。[13]

不过，鸦片贸易反倒蒸蒸日上，从早年间一直上升，或许

说明，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会减退。美国贸易商输入中国的鸦片量从早期的一两百箱，发展到500箱以上，甚至一度超过1500箱，其中大部分来自土耳其，也有一些来自印度。尽管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份额中，美国人很少超过一成，但却足以创造充足的收入来源，每年的销售额达到100万美元，美国人因此也可以减少带到广州用以支付中国商品的钱款。不过，由于缺乏美国商人从印度进口鸦片数量的可靠信息，美国人贩卖鸦片的范围可能更广，利润可能更高。大多数美国对华贸易公司都参与鸦片走私，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他们出于宗教和道德原因反对这项贸易。对于该公司坚持操守的立场，其他美国商人把同孚洋行在广州商行中的办公室戏称为“圣邬山的角落”①。[14]

19世纪20年代早期，由于清政府逐渐加紧对贩卖鸦片的控制，走私体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两宗和美国人有关的事件成为清政府取缔鸦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1817年5月，中国海盗袭击了来自巴尔的摩的“沃巴什”号，杀死船上多名船员，偷走1万银元和大约35箱鸦片。由于涉及人命，清廷很快逮捕了海盗，其中5人被处死，一人凌迟，4人问绞。银元被送还美国人，但在货物中发现的鸦片引起一场风暴，并造成官方对美国走私鸦片的第一次谴责。行商在广东巡抚的授意下，要求美

① 圣邬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圣地。——译者注

国领事立即写信给美国总统，告知根据天子谕令，禁止向广州输入鸦片，如果美国船只被发现夹带鸦片，负责的行商将受到调查，船只会被扣押，不准离港。[15]

担保“沃巴什”号的行商因此非常难堪，还被罚款30万元，并受到上层官员的排挤。接下来，对贩卖鸦片同样负有责任的所有行商约定，除非外国船只的船长具结文书，承诺永不夹带，否则将不再为这些船只提供担保。虽然文书已签，也阻止了一些鸦片走私，但鸦片仍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历史学家J. M. 唐斯（Jacques M. Downs）认为，原因在于“倒霉的行商实力不济，无力对抗西方的贸易伙伴”，正是后者维持着鸦片交易的开展。[16]

第二次涉及美国人的鸦片事件激起的反应更为猛烈。[17]1821年5月，巴尔的摩的“艾米丽”号停靠黄埔港，继续销售鸦片，其时并无当地官员干涉。到了9月，大部分鸦片已经售完，然而，一天下午发生的事强烈震惊了整个广州贸易圈。当时，“艾米丽”号的船员F. 特拉诺瓦（Fancis Terranova）正和船边开来的一个舢板上的妇女买水果。接下来的故事则取决于信息的来源。有些记录称，特拉诺瓦被妇女的要价激怒，扔了一个“橄榄罐”或是陶片，刚好击中妇人的头部，致其落水溺死。还有记录说，罐子是偶然掉落，甚至对这一节完全不提，称妇人用木浆操纵舢板时失去平衡，落水而亡。无论经过如何，妇人的丈夫指控特拉诺瓦谋杀，后来事态演变之烈，表明中国人的愤怒压抑了太久：他们指向的是一个违法犯罪的时代，而不

只是一名妇人的溺亡。

当时的美国领事威尔考克斯（Benjamin Chew Wilcocks）很快收到消息。他的想法是赶在政府官员涉入前，给妇人家里一笔钱，尽快私下解决问题，这是很多外国人为避免麻烦的普遍做法。威尔考克斯有两重考虑。第一，道光帝（1821～1850年在位）力图禁止鸦片贸易，因此，如果特拉诺瓦事件公开，皇帝可能大做文章，以儆效尤。第二，威尔考克斯本人也在鸦片贸易中占有不少份额，因此，考虑到既得利益，也希望将事件低调处理。

在行商的支持下，威尔考克斯敦促“艾米丽”号船长W. S. 考普兰（William S. Cowpland）向死者丈夫付款，甚至以个人名义开出15000元的款项供船长使用。然而，船长却认为死亡乃意外事故，特拉诺瓦纯属无辜。卡普兰希望进行审判，而不是掏钱封口了事。

不久之后，当地官员收到消息，要求立即交出特拉诺瓦。美国人组织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代表海员进行协商。一开始，委员会寸步不让，担心特拉诺瓦得不到公平的审判。但是，鉴于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听任中国人停止美国所有的对华贸易，权衡之下，委员会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

随后在“艾米丽”号上进行的审判依据的并非既成事实，至少在旁听的外国人眼中是如此。中国证人明显遭到恐吓，指控特拉诺瓦有罪，美国人想提供证据，试图证明政府主要证人扭曲事实，不可能从他们的有利位置看到当时状况，地方官却

已怒不可遏。他已经判定，特拉诺瓦罪不可恕，不想听到与他认定的事实矛盾的任何证据。更糟糕的是，（番禺县衙）任命
158 的翻译英语十分蹩脚，这意味着，美国人的意见无法得到准确翻译，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所说。根据一份同时代的记载，愤怒的地方官最后说，“本官已看过郭梁氏的尸体和那个瓦坛，意大利人有罪，如果本官判错了，此乃天意！”并怒而起身结案。美国人对此强烈抗议，要求他们的证人发言，汪再次坐下。而一名美国水手上前陈述证言时，汪拂袖而去。“终于停止了这场对正义的嘲弄”。[18]

俟后，美国人依然拒绝交出特拉诺瓦，但也表明，如果中国官员带走他，美国人并不会阻挠。在给行商首领的一份声明中，美国人说，尽管他们认为此案“有失偏颇”，特拉诺瓦未经审讯即已定罪，在中国水域，虽则大清律例多有不公，他们还是愿意遵守。[19]然而，广州巡抚并未带走特拉诺瓦，而是中止了与美国人的一切贸易。

僵局持续了三周。中国人忌惮美国人的暴力反应，因此不想处理特拉诺瓦，尽管美国人一再重申不会干预。直至公行承诺，中国将公平审判特拉诺瓦，且美国人可出席旁听，僵持方才化解。10 月 23 日，差役逮捕特拉诺瓦。承诺的审判几天后进行，但并没有任何美国人在场。地方官宣布特兰诺瓦自愿服罪，于 27 日绞死。次日，广州当局将特拉诺瓦的尸体交还给美国人，运往黄埔的外国人公墓下葬。29 日，禁运解除，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重开。

不久之后，督抚向行商发送了一份文告[①]，宣称正义得到伸张："上天已公平论处，负罪之人特拉诺瓦绞刑伏法……天朝允售茶叶、大黄，但为该等国家民众生计之需［中国人长期认为，如果没有大黄作泻药，西方人的内脏就会堵住，导致身亡。茶叶也被视为西方人生存的必需品］。赖此之民不下亿万。此等恩惠何其宽厚！而洋人毫无感恩之心，无意酬谢，反倒走私严禁之烟土，毒害斯地。"[20] 159

对于美国人的妥协，英国人十分愤慨。英属东印度公司官员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人就这样卑鄙地将船员扔给清帝国残酷的法律处置，不曾努力争取过共同的正义，每一个正直、高尚、有同情心的人都应该永远唾弃这种行为。"[21] 尽管言之凿凿，但在"休斯夫人"号事件的处理上，英国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当时，他们曾将一名他们认为无辜的水手交给清朝当局，这名水手后来也被绞死。之后，和特拉诺瓦事件一样，维持贸易凌驾于其他任何事。

然而，至少过去的鸦片交易方式已经不会再继续。"沃巴什"号和"艾米丽"号事件，加上一名中国走私贩（他指认了参与贩运鸦片最严重的若干人）被逮捕，使得清廷再度对黄埔港的鸦片贸易施加了更有效的打击。外国商人并没有放弃交易，而是临时将交易转移到澳门东北方 20 英里处的伶仃（内伶仃）岛。 160

① 此处引文未见原文，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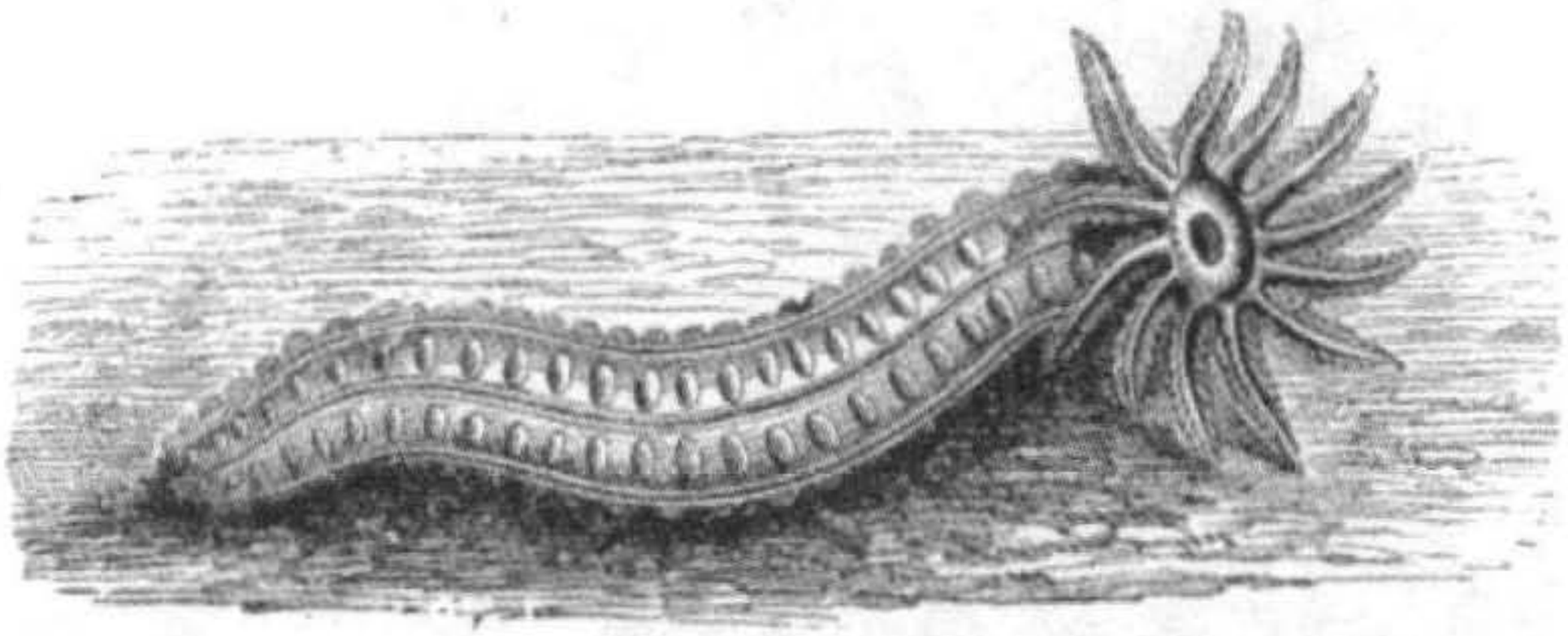
伶仃岛的最高峰海拔 2000 英尺，远处即可望见。1822 年，英国人首次开发了这片荒岛，次年，美国人也加入进来。鸦片商开往伶仃岛，将鸦片卸到长期停靠的碇泊船，再根据需要，将鸦片转移到中国走私贩驾驶的快船。这些船只被称为“快蟹”、“扒龙”，全副武装，全天候运货，配有多达 50 名划手，以最高 14 英里的时速开往广州或其他岸上交易点，卸下并分装鸦片。在旧的体系中，走私贩当场支付货款，现在的钱款则在商行中转手。洋商贩运鸦片的另一个伎俩是，把船开到沿海，沿城镇停靠，将鸦片卖给当地商人，从而将走私中间商排除在外，提高利润。尽管中国官员对这些新手段心知肚明，但由于很多官员自己也贪污贿赂，因此很少干预。即便地方当局偶尔会佯装打击走私，派出武装巡查力量执法，也难以抵挡灵活、狡猾且攻击性很强的对手。相对孱弱的中国水师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22]

除了鸦片和日渐稀少的海豹皮、海獭皮、檀香木，美国商人还经常向中国输入许多其他商品，包括西洋参、铅、水银、棉布、牛肉、朗姆酒和铁。同时，也有不少充满异国特色的商品，大部分得自南太平洋，包括燕窝、龟壳、贝母。而最不寻常也最有名的，要数海参。[23]

* * *

161 海参又名海瓜，和海星、海胆、海钱同属棘皮类动物，但更柔软，富含胶质，像是水下的鼻涕虫，达尔文曾经因此形容海参“黏滑、恶心”，对于这种奇妙的生物，这种评价未免过

于苛刻。海参的大部分种类是圆柱形，长度从一英寸到一英尺不等。海参是优秀的清道夫，可以吃掉面前的任何有机物质。在南太平洋群岛周围的浅水区，海参尤其丰富。这也是海参能进入美国对华贸易货物之列的原因。[24]



海参之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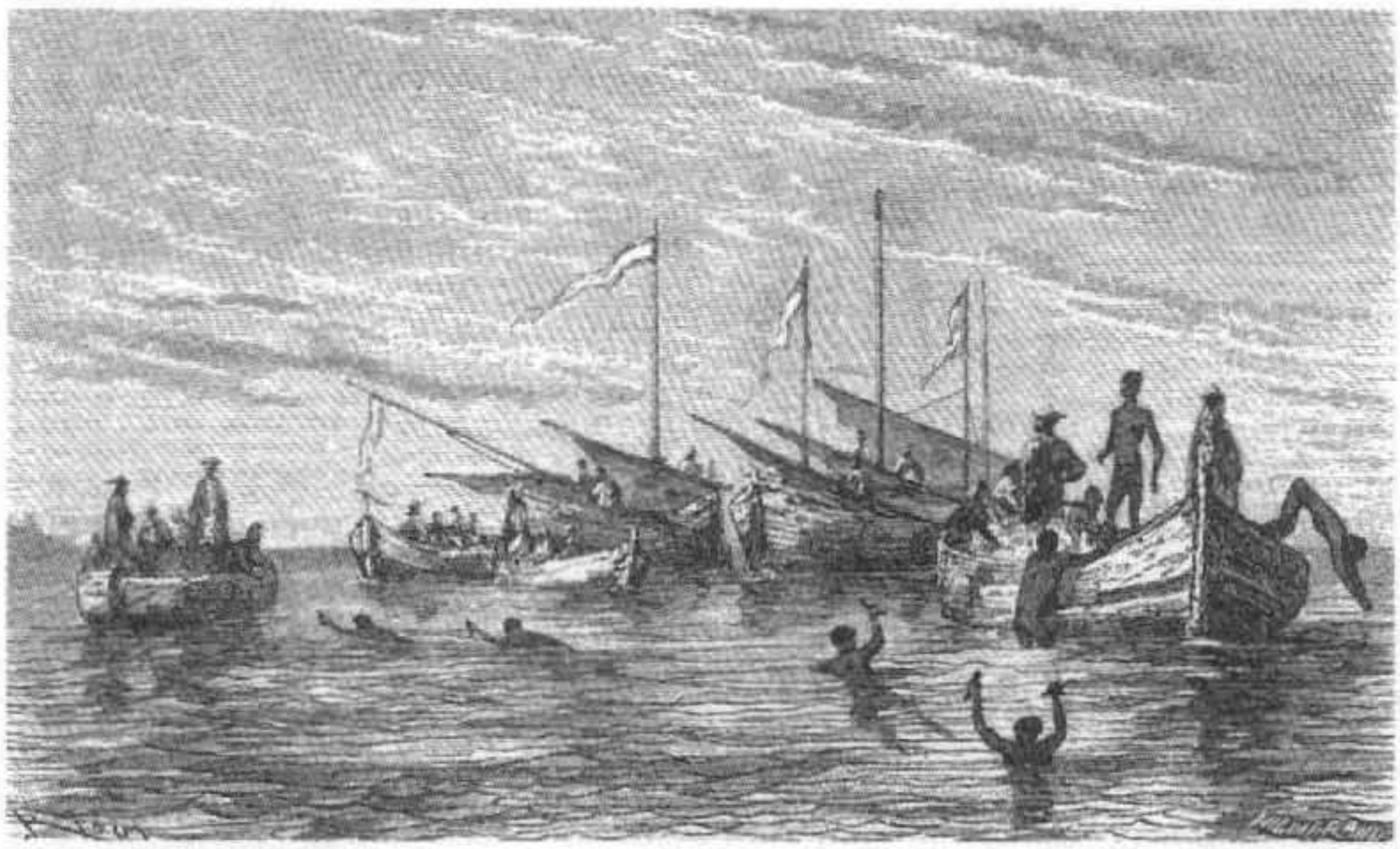
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海参熬汤，特别喜欢它赋予其他食材的胶质及调和风味的特点。此外，这种动物据说能够永葆青春、滋补壮阳，因此备受青睐，中国人也因此将其比喻成“海中人参”。[25]美国海参贸易和檀香木贸易同时兴起，但在1812年战争前规模有限。随着檀香木日渐稀少，美国人也就更加重视海参，准确地说，更愿意采集海参的是斐济、夏威夷、马克萨斯等岛屿的土著人。

船长和当地人达成交易之后，搜寻随即开始。土著人驾着 162
独木舟划到暗礁上方，潜入水下2~5米处，这里就是价值最高的海参生长的地方。他们也会在夜晚海参最活跃的时候，借助

干海参

火把或月光照亮缓缓蠕动的目标。此外，涉水走过滩涂，也可以在泥沙中找到价值稍低的海参。由于枪支是当地人最渴求的商品之一，他们愿意用大量海参换取一支步枪，因此，寻找海参的过程也被称为“渔枪”。在19世纪20年代末，一支步枪的行价是16大桶，即大约1000磅海参。即便是一个铁凿子，也足以换取土著人一整天的劳动所得。[26]

相比后续工作，从水中打捞海参只是比较简单的一步。如果海参放在烈日下，很快就会晒干，成为不值钱的线团，因此，就必须趁新鲜盖上海参并拖到独木舟上。采集到足够的数量后，163
才拉到岸上做下一步处理。首先，将海参放在用椰子木在沙地



土著人潜水搜寻海参

上围成的架子上，排出多余水分。其次，切开海参，取出内脏，将外皮放入铁罐煮三刻钟，再送到干燥房，悬挂在支架上，用慢火烘烤三到四天。成品是收干的黑色或棕色团状物，重量大约为新鲜海参的六分之一。制成之后，成品海参被打包送往广州。

采集和加工海参都需要大量人力。往往需要动用上百甚至上千名土著人，同时，烘干过程还需要大量木柴，本已由于檀香木的砍伐而所剩无几的森林遭到进一步破坏。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以塞勒姆为主的商人将海参贸易推到顶峰，收获了可观的利润。一名塞勒姆船长 J. H. 伊戈斯顿（John H. Eagleston）曾以相当于 3500 美元的价格购入 80 吨海参，运到广州后以 27000 美元卖出。

* * *

164 不过，海参贸易并非一帆风顺，贸易商和土著人之间曾发生多次暴力冲突，最为人所知的是“格莱德”号事件。[27]19 世纪 20 年代末，塞勒姆大商人 J. 皮博迪（Joseph Peabody）已是对华贸易的老手，他任命 H. 阿彻（Henry Archer）为船长，将“格莱德”号派往斐济。船员 J. 奥利弗（James Oliver）后来写道，他和其他海员“多数是年轻人，有些是初次体验水手生活，放弃了家中的舒适和朋友的欢聚，忍受水手舱粗糙的床铺和食物，服从高级船员的权威”。1829 年下半年，“格莱德”号抵达斐济后不久，开进一片未知水域，猛然间重重撞到一大块珊瑚礁。海水涌进裂开的船体，船员们纷纷向外舀水，才勉强保住船身不沉。几天后，“格莱德”号到达斐济第二大岛瓦努阿岛，在这里遇到另一艘已在加工海参的塞勒姆船“奎尔”号。两只船的水手一起动手修理“格莱德”号，12 天后，修复完毕。

接下来的几周中，数千名土著人为两艘船采集海参，随后，“格莱德”号先开往马尼拉将货物出售给中国商人，再借道夏威夷返回斐济。途经库克群岛时，阿彻发现一大帮土著人划船向“格莱德”号靠近。阿彻急于为在夏威夷买下的山羊弄到草料，耐心等待土著人的到来。然而，当他发现对方的规模，联想到南太平洋素来的彪悍风气，命令手下持枪待命，并向炮膛装上散弹炮。50～60 名土著很快到达船边，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粗鲁地打着手势。奥利弗后来回忆，“他们相貌十分可怖”。阿 165

彻让他们爬上船舷，站在船舷上缘，但不让他们靠近主甲板。

阿彻弯下腰，翻检交易的物品，此时，一名土著向他扔出一杆长矛，事发突然，以致船员来不及提醒船长。如果阿彻当时没有转过头，长矛无疑将会穿颈而过，好在阿彻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趁土著人还没开始攻击，阿彻下令开火。枪声响彻天空，六七名土著人“应声落水而亡”，其他土著人则被船上的锐刺和短剑所伤。阿彻命令船只起航，船员仍继续攻击驱散土著人。奥利弗认为，“如果船长的命令再迟一点，这帮野蛮人就会占据上风，或许‘格莱德’号和船员们的命运就沉于海底，永无人知”。

回到斐济的欧瓦罗岛，阿彻继续交易海参、龟壳以及少量檀香木。一天，数名土著人带着水果来访“格莱德”号，看上去是想交换什么东西。忽然间，船员发现，土著人开始指点船上水手的数量，互相耳语，因此疑心骤起。阿彻得知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举动，还没赶到甲板之前，二副就看到，土著人把武器递给船舷上缘的同伴。上层的船员也看到同样的情景，迅速跑下，向土著人开枪射击，后者立刻跌入水中，船上还留下许多长矛和棍棒。

几天后，“格莱德”号的旅程再次被阴影笼罩，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来袭，两条锚链因此断裂，只剩下一只锚可用。暴风逐渐平息后，又遇到一阵强流，剩下的那只锚沿海底拖行，几个小时后，触礁断裂。第二天，阿彻来到另一个塞勒姆对华贸

166 易船“小鹿”号刚刚失事的地方，修好了船锚和锚链。回到欧瓦罗岛，8 名荷枪实弹的船员上岸，砍伐新锚杆要用的树木。其中 7 人步行进入森林，一个年轻男孩留守船上。

突然间，20 名土著出现在沙滩上，有些人带着武器，一些人拿着水果。由于林中的水手忙于砍树，没空交易，土著们便走到水边，开始嘲笑那个男孩，并从船上取走东西。男孩的惊叫提醒了其他海员，他们迅速跑下沙滩，正好撞到疯狂冲向他们的土著人。船员们举起步枪，向船的方向撤退，挡开空中飞来的棍棒和长矛。5 个人成功回到船上，还有两个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其中，一个不走运的船员开枪射击，“立即遭到围攻”。他顾不上头部大量流血，踉踉跄跄跑到水中，无力地游向混乱中已被推向海中的小船，结果还是被土著人拉回海滩，结果了他。另一个船员最后一个冲出森林，用枪托反击土著人，最后被乱棍打死。最后回到“格莱德”号的仅剩下 6 人，船上的其他船员听闻消息，“所有人都不禁失声痛哭”。被害的两名水手是来自塞勒姆的同乡 J. 德比（Joshua Derby）和 E. 奈特（Enoch Knight）（对于奈特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几个月之后，苏门答腊的土著人就杀害了奈特的哥哥查尔斯，在当地交易胡椒的塞勒姆商船“友谊”号的大副）。

“格莱德”号船员决意反击复仇，派了两艘船划向海滩。短暂交火之后，一名当地首领身亡，多人受伤，其他土著人逃散，船员们摧毁了好几只独木舟后回到船上。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好几起小规模冲突，许多土著人被害。到了1831年3月20日，“格莱德”号的麻烦似乎终于到了尽头。他们带着价值不菲的海参，即将离开斐济。当晚，船员们聚集在前甲板，兴致勃勃地唱着歌，其中一支歌是《家，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船员们带着满满的期望登上“格莱德”号，离开塞勒姆22个月后，终于可以再见到家人和朋友，没想到，他们第二天晚上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飓风。取自“小鹿”号的船锚太小，随着暴风雨的升级，“格莱德”号拖着船锚飘行了10英里后，船锚撞入一块暗礁。

“塞勒姆历史上最大的船只之一”的“格莱德”号的航行终于结束。大多数水手生还，被其他美国船只救起。“格莱德”号上的许多水手在数年之后方得以重返故园。奥利弗直到1833年夏季才回到家：他先后搭乘多艘船只，途经夏威夷、巴西，搭上波士顿的“路西安”号，7月4日从科德角（Cape Cod）看到美国海岸线。第二天，船开进波士顿，下船后不到一小时，奥利弗就登上一辆开往塞勒姆的长途汽车，终于和又惊又喜的母亲重聚。

尽管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取得获利，支付中国商品的资金来源仍然是个挑战。到1825年，在广州采购的商品中，超过75%以银元支付，这令商人十分头疼，因为白银较为稀缺，让宝贵的资金愈见紧张。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随着英镑汇票的使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美国商人从英国的银行获得贷款

或预付款，然后将汇票带到广州，汇票能在广州流通。美国商人将汇票卖给英国鸦片商换取银元，用来购买商品，也可以直接用汇票向行商购买货物。然后，美国人在美国或其他港口出售货物，并使用销售所得支付预付款以及利息。鸦片商可在伦敦兑现汇票，行商可使用汇票购买英国货物。此外，美国商人还可以在伦敦销售美国商品，以汇票的形式持有收益，并用以在广州购买中国货物。由于消除了收购和长途运输银元的麻烦，因此汇票非常方便。而且和白银不同，汇票不会被海盗看上，因此成为在公海运输更安全的货币形式。尽管如此，使用汇票还是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兑换率可能会波动，影响到汇票的成本，而获取或支付汇票的条件也存在偶然性，取决于商人以合适的价格销售大量货物的能力，而这一点并无定数。[28]

如果不想将源源不断的银元或汇票送入中国，方法之一就是输入更多美国货物。虽然美国商人望穿秋水，但中国人对美国商品并不买账，正如他们对大多数英国货物一样不为所动。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有所收获，随着美国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的扩大，从中国进口的南京棉已经下降，美国人逐渐把更多的棉织品运往广州。但总体而言，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中，美国人的份额还是很有限，美国对华贸易商人、农民和制造业者都感到焦虑不安，这一问题的余响到21世纪似乎也依然回荡在耳。毕竟，如果能让中国3亿多的人口更喜欢美国商品，商人们就可以获得难以估量的财富，而美国农民和制造商也能赖

此谋生。哪怕是一点点消费习惯的转变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像一名英国棉花制造商认为的，“如果我们能让每个中国人的衣服哪怕长 1 英寸，就足以让曼彻斯特的工厂生产世代无忧”。美国人也做着同样的梦。[29]

美国人将银元、英镑汇票和货物运往广州，也获得了名色多样的商品。茶叶和丝绸依然是美国进口货物的大宗。肉桂、糖、咖啡、藤和灯芯草垫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些数量较少的货物，包括家具、玻璃器、糖果、鞋子、外来植物。而在欧洲瓷器制造商精湛技艺的竞争下，中国瓷器则退至较次要的地位。[30]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出口商品——仿制品。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纽约的卡恩斯兄弟弗朗西斯（Francis）和纳撒尼尔（Nathaniel）靠进口法国商品发家，例如香水、瓷器、扇子和丝绸。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有了一个新想法：为什么不让中国工匠复制法国货来节省成本呢？毕竟，中国人已经显示出模仿西方绘画和艺术风格的惊人技能，他们没理由不能在其他商品上重现。此外，何不也用更低的价格生产风行的欧洲食品和药品？抱着这样的想法，卡恩斯兄弟向广州运来了欧洲样品，结果非常成功。美中贸易的又一个新时期随之到来。

美国人，尤其是逐渐兴起的中产阶层，手中开始有了余钱，渴望获得外国物品，已经做好了购买的准备。仿制的法国丝巾、羽毛扇，以及可口的调味酱、糖果、糖浆、玫瑰油等各类以假乱真的仿品大量涌入纽约，以真品的价格出售。由于和正品相

比极其低廉的成本，卡恩斯兄弟得以坐收暴利。中国人甚至还找到了一种粗劣的木材，经过加工包装后，就能冒充大黄高价出售。尽管据称有些儿童由于进食过多而暴毙，这种产品的销路依然不错。最后，卡恩斯兄弟也终于自食恶果。由于进口的假货太多，市场饱和，价格暴跌，两兄弟不得不停止了广州的业务。[31]

随着美国船只来往于广州，在华美国人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变化。广州贸易体制的所有特点依然如故，但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1812 年战争结束后，居于支配地位的多家美国贸易行大都取消了随船大班，而起用常驻中国的公司代理人。由于对外国人在每个交易季结束后退到澳门的规定已经不再执行，他们

171 中许多人长期留驻广州。因此，代理人能够更好地与行商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跟踪市场动态，从而在条件最有利时达成交易。代理是个肥差，有幸获得这个职位的美国人都有一个目标，赚取足够的财富，有朝一日衣锦归国，自由地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代理人都能得偿所愿，但还是有少数人做到，J. P. 库欣（John Perkins Cushing）就是其中之一，1828 年离开广州时，他所积累的财富据估计近 75 万美元。[32]费正清注意到广州十三行一带聚集大量财富的潜力，将其称为“金街”。[33]

也有些代理人在广州默默无闻，倒是在伶仃岛的鸦片贸易做得风生水起。这条线路的开发者是 R. B. 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简称“本”），他曾认为自己“对海洋并无偏

好”，但实际的经历则恰恰相反。[34]1804 年，本出生在波士顿郊外的贾美卡平原，6 岁时就随母亲和兄长第一次横穿大西洋。几年后，在 1812 年战争期间，他随家人登上从波尔多开往波士顿的纵帆船“内阁政令”号。途中，他们遭到英国巡洋舰攻击，在惨烈的交战后设法击退了英舰，旋即又被一艘英国护卫舰俘获，并被带往西班牙科伦那。福布斯一家在当地偷偷登上将开往波士顿的美国“凯罗琳”号，出港没多久，又被英国护卫舰“波蒙那”号截获，并送回西班牙。不久之后，似乎时运不济的一家人再度逃到一艘开往里斯本的渔船，并在那里登上巴尔的摩“勒达”号，并终于在 1813 年 8 月下旬抵达新港。对于一个未满 10 岁的孩子来说，这也算是一趟难得的海上冒险。

尽管福布斯的父亲在生意上并无成就，他的叔叔詹姆斯·H. 帕金斯（James Handasyd Perkins）和托马斯·H. 帕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却是商业大亨，在他们的支持下，13 岁的福布斯 1817 年作为“广州包”号的船上侍者投身对华贸易。他后来回忆道，“我带着圣经、‘鲍迪奇’[①]、四分仪、一箱海员服和母亲的祝福，怀着满满的希望和决心，离开家庭的

① “鲍迪奇”是对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 N. 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所著《新美国实用航海学》（*The New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的简称。这本书在 1802 年首次出版，设定了准确的海上导航信息，从而革新了海上航行的面貌，海员们从此可以安全地航行于世界的各个大洋。这本书后来多次更新，售出了 100 多万本。现在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出版，目前依然广为海员所用。

R. B. 福布斯船长，关乔昌绘，约 1845 年

庇佑”。福布斯在船上很快得到重用，20 岁时已成为船长。1827 年，他在一份记录中说，“航海生活的 10 年来，我在岸上的时间不超过 6 个月，其中大部分还是在广州，只有很少时间在家里”。

1829 年 8 月 9 日，悲剧降临。福布斯的哥哥托马斯当时掌管着帕金斯洋行（Perkins & Co.）在广州的生意，他的树皮在

澳门附近被暴风雨淋湿，托马斯本人也被淹死。很多人劝福布斯去广州，像兄长一样做代理人生意，但他显然另有打算。“我曾希望统领伶仃岛的碇泊船，这是唯一适合我的健康、兴趣和喜好的事业，我可以随时返回，也可以和最亲近的人轻松往来。”[35]

1830 年 5 月，福布斯购买了“伶仃”号并开往伶仃岛。“伶仃”号不仅成为帕金斯洋行的鸦片仓库和供给船，也同样为怡和洋行（Russell & Co.）和斯特吉斯洋行（J. P. Sturgis）服务。尽管福布斯发现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乏味，他的所得倒并不平淡，据称一年获利达 30 万元以上。1832 年春，福布斯卖掉了“伶仃”号，回到波士顿的家中，和家人分享多年来积累的财富。1834 年，福布斯后来回忆道：“我头发变得灰白，想象自己迈入老年。我所追求的都已实现：坐拥巨产，退出了航海事业，成为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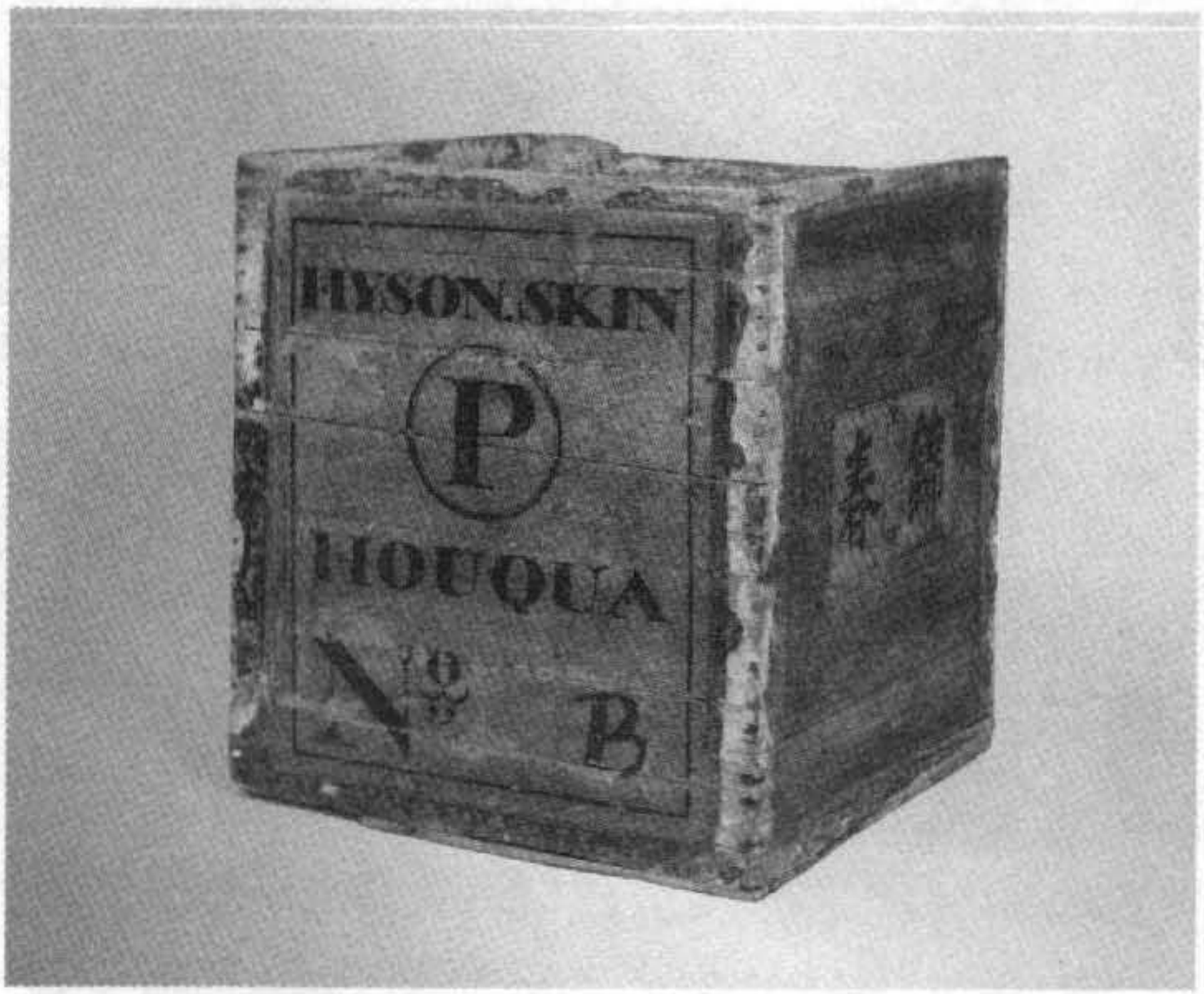
代理人最看重的资产就是和行商的关系。在美国人交往的所有行商中，最受敬重的是伍秉鉴（Wu Bingjian），外国人口中的“浩官”。伍秉鉴身形瘦高，面容和善，处事温和，被很多人认为可靠、精明，值得信赖。这种信任非同一般，因为行商和代理人之间并无书面合约。在广州，商人之间以口头约定，而浩官的话就是信心保证。

浩官的慷慨堪称传奇，其中一个故事特别突出。费城的 174
B. C. 威尔考克斯（Benjamin Chew Wilcocks）人高马大，被中国人称为“高鬼”（“high devil”），在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进口土耳

伍秉鉴，关乔昌绘，19 世纪早期

其鸦片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他花起钱来也大手大脚，结果千金散尽。至于究竟花在了哪里，并没有准确说法，但人所周知的是，他特别偏好美食、美酒、异国女性和昂贵的艺术品。他发誓要重建财富，而好友浩官则慷慨地提供了贷款。几年后，威尔考克斯已经没有破产之虞，除了还欠浩官 72000 美元。浩官仁慈地接受了威尔考克斯对欠款开出的期票，并塞到了自己的保险柜里。好

几年中，浩官都非常耐心，从未提起过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问起威尔考克斯为什么没有回美国。威称自己思归情切，但首先要还清债务。浩官问道，债务是否是威尔考克斯滞留广州的唯一原因，如果债务一笔勾销，他的经济状况是否足以回国。对两个问题，威尔考克斯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浩官让手下取出了期票。据称，浩官当时说，“你和我都是一流人物，你是个正直的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完，浩官将期票撕碎扔进了废纸篓。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威尔考克斯，现在债务已了，你随时可以回去了。惊讶的威尔考克斯也很快起程。[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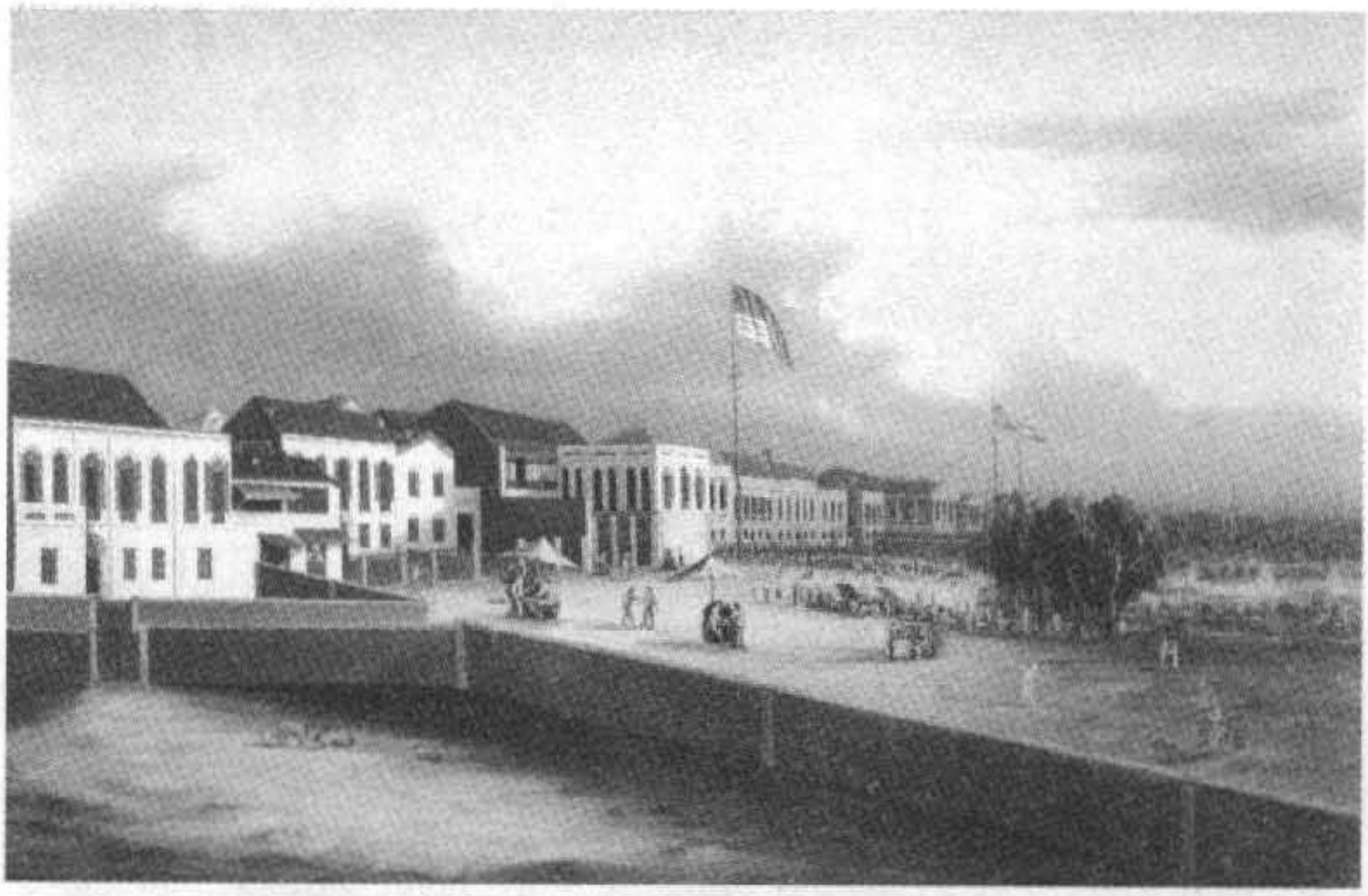
浩官的茶箱，内装熙春茶

浩官对交往的美国人非常慷慨，也从广州的贸易中斩获颇多。据估计，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财富达到2600万元，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也绝对位列前茅。他也没有让自己的财富闲置。早在1828年，他就依靠信任的几个美国联系人担任代理，选择最有潜力的机会，在美国投资。[37]

在广州的美国人圈子规模不大，1812年战争后大约仅有十几人，20年后也只有三四十人。在商馆的高墙之内，每天有世界各国的商人进出，美国人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数量最多的当然是中国人。有一个美国人报告说，商馆前的空地是“大量当地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每天凑在一起做生意、打望洋人或是消磨时间”。[38]在这里的外国人以英国人最多，还有法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此外，来自印度、亚美尼亚、菲律宾、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商人和贸易人员也为数不少，每个人都穿着本国的传统服装，让这片地区充满异国气息。[39]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外国人的共同点是长相都很奇特。

许多美国人都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在商馆的时光。“在商馆中做成的生意难以估量”，W. C. 亨德（William C. Hunter）曾在广州担任代理人近20年，他尤其欣赏美国人和行商之间的“融洽和好客”。其他美国人倒没有如此倾心广州的环境，而觉得在这儿的时间无聊又苦闷。很多人都抱怨广州夏季潮湿闷热，贸易季节工作时间超长，还有自己的思乡之情。而最共同的怨言或许是对妇女的种种禁令。[40]

清朝当局不遗余力地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广州。排斥的道理



广州夷馆风景，美国馆居中，关乔昌绘，约 1835 年

很简单。1827 年，一名到访广州的巴尔的摩人被告知：“如果 177
让贵国的妇女进入我国生活，你们很快就会在我们之中建立家庭。随着家庭的繁衍生息，加上充裕的条件，假以时日，你们就能建立长期的殖民地。但如果我们禁止你们的妻子、姐妹、女儿居住或逗留，我们就有把握，在贸易上取得成功后，你们将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为其他种族的单身汉留下余地！”[41]

虽然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永久居住在中国值得怀疑，但是中国人并不这么想。因此，在广州期间的美国男性仍只能是孑然一身，有人称之为“半野人”。如果美国代理人需要女性陪伴，往往会去澳门见妻子或情妇，甚或是召妓。如一名中国商人所说，“澳门多有私生子出没”。[42]但在这样的严防之中，却曾经有 178

过美国女性大胆进入广州，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哈里特·罗伊（Harriet Low）。

1829 年 5 月 29 日，哈里特作为多病的婶婶阿比盖尔的女伴，陪同叔叔 W. H. 罗伊（William Henry Low），怡和洋行的合伙人，前往中国。哈里特年方 20，面容姣好，性格活泼。在中国的 4 年期间，她写下了大量日记和书信，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记录。[43]

她常常用“浪漫”一词描绘周边的环境，笔下是典型的前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文字。从海上看到澳门时，她写道，“（澳门）看上去很漂亮，有一些很浪漫的地方”。她发现，在西方人的小圈子中，她是仅有的两名单身女性之一。在定期举办的舞会、晚宴、茶会和戏剧中，哈里特迎来很多社交机会：“比起人数微不足道的女性，这里的男性人数达二十倍以上。除了我，这里只有一位未婚的老姑娘。”许多追求者紧追不舍，让她不胜其烦，以致在日记里写道：“天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①]！真是不可理喻。”

看到港口所有的船只“都在船首两侧画上一个大眼睛”，哈里特被逗得直乐，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回答“嗨，没有眼睛怎么看呢?”哈里特还看到女子裹足。这种可怕的做法沿袭了近一千年，就是要使脚的长度不超过 3 ~ 4 英寸，成为男性所欣赏的“金莲”。[44]

---

① 她这里的意思是“物种”，而不是评价他们对女性的态度。

哈里特·罗伊，G. 钱纳利绘，1833 年

裹足早在女孩五岁时即开始，最初仅流行于上层社会，后来逐渐普及中下阶层。缠足时，四个小趾下屈，向脚底扳拢，用束带固定，只有大脚趾可自由活动。整只脚再用裹脚布缚紧，务求让脚趾尽可能靠近脚后跟。完成之后，塞入尖头布鞋。每

隔几天，拆下裹脚布并洗脚，再缠上裹脚布，只要有可能，就换上更紧的鞋子。经过如次步骤，足弓折断，脚趾畸形，看上去更像是小动物的蹄子。裹足的过程极为痛苦。女子往往会出血，化脓，隐痛不止，感染、坏疽、脱皮、溃烂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会导致并发症以至丧生。

179 现在并不清楚裹脚是如何产生，有人认为起源于宋朝，当时的女性舞者用紧紧包裹的尖足跳舞，表现莲花盛开的样子，使之成为男性欲念想象的对象，统治者遂强迫妇女扭曲身体，模仿莲花的形状。在男性主导的中国社会，裹足也是使妇女成为社会附庸的方式，她们的活动范围因此大受局限，没法远离家庭。[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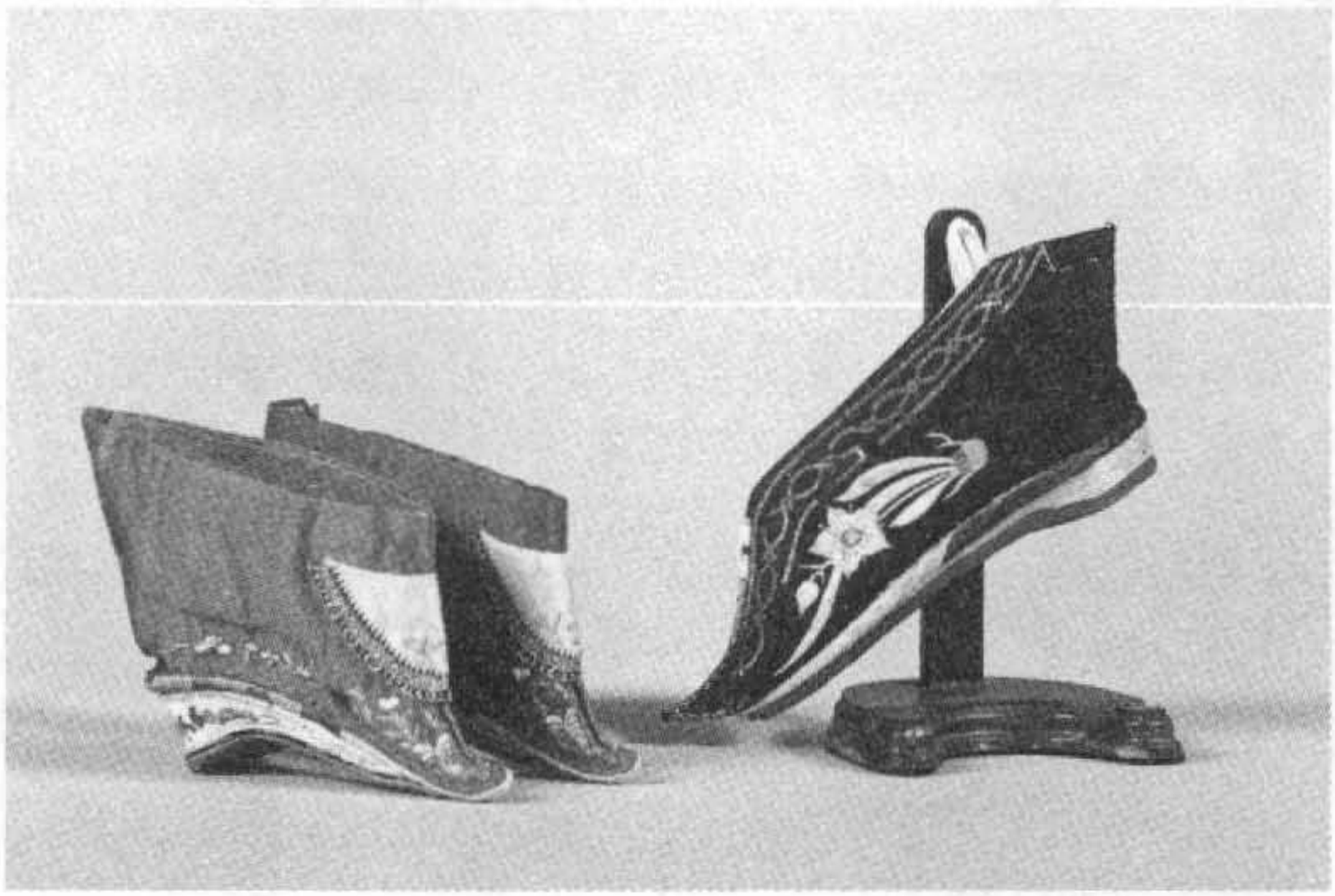
哈里特在去往南湾的路上第一次见到裹脚的实例。

我们在路上看到两名裹了脚的中国妇人。我当场呆住，虽然听说了那么多次，我从未相信真有其事，一直以为是

181 别人骗我。这些妇人的脚和我们的小查理（一个3岁男孩）一样大。想想丰满的身体之下却是这样的小脚……她们两人都带着小手杖。

哈里特喜欢四处漫游，一次，听到叔叔的熟人说起去过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禁抱怨社会对女性行动自由的限制，“我忍不住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拿起我的行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男性的陪伴，她不仅不能够远游四方，哪怕独自

走在澳门的街上也不行。至于去广州的愿望，则无论有没有男性陪伴，都是不可能的。她曾经问过一个行商，为什么女性不能进入商馆，对方答道，广州太小，男人们都会注视着她。哈里特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她知道英属东印度公司男职员的女眷曾在广州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是为了照顾生病的丈夫，虽然哈里特认为这不过是个拙劣的谎言。既然英国女人能去，为什么美国女人就不行？



为裹脚妇女设计的丝绸鞋，形成所谓的“金莲”

1830 年 11 月初，在叔叔勉强默许下，哈里特和婶婶女扮男装，登上一艘美国商船从澳门去广州。在伶仃岛短暂停留时，哈里特看到了 15 只鸦片船，她称之为“法外之徒”。接近午夜时，船只进入广州，她看到，“明月高悬，宝塔历历可见……

各式船只不计其数……一切如此安宁静谧、无数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安睡……茶船体积庞大，在岸边依次列开，俨然成街”。她们身着宽大的披风，紧紧按住帽子，迅速溜进美国商馆的大门，保住了秘密。

不到 10 天之后，中国官员终于察觉到她们的伪装（由于哈里特日记的重要部分遗失，他们是如何获悉的也就不得而知），命令罗伊一家立即撤回澳门，否则旗昌洋行的所有贸易将被停止。威胁起到了效果，但哈里特和她的婶婶几周之后才最终离开。离开广州的前一天晚上，哈里特和婶婶决定夜游广州。她们“走到商馆前，并没有引起旁人注意”，但到了街巷中，“被发现是‘番鬼’……中国人于是提着灯笼打量我们，一群乌合之众也围过来，我们只好回到商馆前，不过他们都很文明，没有喧哗，只是有点好奇”。

回到澳门后，哈里特写信给妹妹：“我很想知道你对我们的广州之行怎么看。我猜，你会认为我们不该铤而走险，违反中国法律。但是，我向你保证，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毫无可比性。他们不允许对‘旧制’有任何突破，并反复在你耳边重复那些话，好像他们并不愿违反，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么回事。”

1833 年 11 月中旬，哈里特离开澳门，短暂逗留开普敦和伦敦后，于 1834 年晚夏回到塞勒姆。

在澳门度过的四年时光平息了我对她的喜爱，我也不

留遗憾地放弃了曾经的愉快和舒适。我应该会常常回忆；而时间终会像坟墓一样埋葬我在那里的无数烦恼，我相信，这段时光并未虚度。

尽管美国人在广州的生活有所不便，但总体而言并没有那么糟糕。商馆的建筑非常宽敞，设施齐全，仆役众多，可以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使得日常生活大为轻松。虽然食物并非典型的美式口味，至少也供应充足，味道可口。排遣乏味生活的方式也很多。他们偶尔会到广州城中游览，行商也会在江边宴请。广州的外国人已蔚然成群，美国人也就有了不少社交机会。在晚宴甚至舞会上，男人们自愿结伴，虽然有时不免尴尬。有 183
些商馆则开放存有数百卷藏书的图书馆，还有人组织了读书会。此外，广州还出版多份英语报纸，包括《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广州周报》（*Canton Press*）、《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这些出版物不仅帮助外国人了解时事，也提供了共同的谈资。

除了交情深厚的代理人和行商，美国人也时常和为数不多的西方传教士往来。传教士们热切地希望在天朝建立基督教的阵地，却鲜有成功。他们之中最有名的要数伯驾（Peter Parker）。他和许多传教士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修习神学和医学专业，1834 年 10 月作为新教医学传教士抵达广州。在接受任命的仪式上，伯驾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中国“拥有智慧、财 184
富、文明，拥有上亿不朽的灵魂！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我们对

上帝的信念和努力必须相称”。此后多年，伯驾无疑“拯救”了一些灵魂，但真正持久的成就是他 1835 年 11 月在广州开办的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伯驾治疗了数千名中国病人，很多人的生活由于他的医术和照顾而改善。伯驾的无私、奉献和善举让他成为当时在中国最受尊重的外国人。一名美国代理人说，伯驾“几乎被中国人奉若神明”。[46]

行商在广州附近的宅邸，T. 阿洛姆绘，约 1843 年

商馆周围的环境也充满了种种奇异的娱乐方式，譬如算命、杂技、吞刀、耍蛇。除此之外，就算是在附近逛街买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消遣。一名在广州的美国人写道，“在这样活色生香的街上闲逛，乐趣丝毫不下于进博物馆”。[47]

而在广州最令人愉快的活动之一要数划船比赛。虽然《八

条章程》禁止外国人在珠江划船，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并不在乎中国人的反对。比赛事关国家和个人荣誉，因此非常正式。代表不同商馆的队伍各自统一着装，获胜者可获得现金和奖杯，每周还有颁奖宴会。1837 年，广州船赛俱乐部成立，此时参赛者不仅划船，还使用手工制造的帆船比赛。[48]

有时，意外事件也会打乱广州外国人的生活，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 1822 年广州大火。[49] 11 月 1 日周五傍晚，距商馆约 1 英里的一个商店突然失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毗邻的房屋。警铃响起后，英国商馆和行商的救火车赶到现场。此时这里已是一片狼藉，人们带着细软，惊叫着从失火的房中逃散。由于没有协调指挥，救火车供水不足，火势迅速扩大，吞没了城中更多地区。外国商人请求地方官拆掉着火房屋周边的建筑，阻止火势蔓延，但官方却无动于衷。9 点钟，人们聚集在英国商馆的阳台，观察大火是否会烧到自家门口。为防万一，他们还向黄埔港的贸易船发出通知，即刻赶往广州，以便在需要时协助疏散。

午夜之后，商馆的住户开始收集重要的文件和贵重物品，包括保存在当地仓库的交易商品，并搬运到珠江边待命的船上。周六早上 8 点，商馆也开始着火。风助火势，愈演愈烈，外国人在许多中国人的帮助下，全天都在拼命灭火，但傍晚时分，终告失败。次日天明时，此处已然废墟一片。“金街”和广州城的一大部分变成烧焦的荒地。有人将之和 1666 年伦敦大火相比，那是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全城损失惨重。

1822 年大火中的广州夷馆，中国画家（佚名）绘，约 1822 年

而在广州，数千栋房屋被烧毁，大约 5 万人无家可归，多达百人丧生。一份记录中写道，“有个小偷割开一个人身后的包裹，大量银元散落地上，人群哄抢银币，混乱中 27 人被踩踏致死”。[50]尽管外国人和行商抢出了一些财货，他们的损失也很可观。商馆和仓库已经荡然无存，存放的数万箱茶叶和数不清的丝绸也尽数烧毁。英国人估计，火灾损失达 400 万元，美国人也损失了 10 万元。一名朝廷高官发布的火灾公告中[①]宣称，“广州之繁华荣光一夕成灰，如花俏小虫葬身火海”。[51]

① 以下引文未见原文，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虽然损失惨重，对外贸易由于牵涉价值重大，不能耽搁过久。商馆很快从废墟中重建，但这次撤掉了四周的围墙，让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交流更加频繁，但在有些交易商看来，这一点有害无益。一个美国人写道，“[与广场的]围墙虽然麻烦，却也有用，旁边的本地市场环境糟糕，广场还聚集了各色闲杂人等和街坊的小孩，变戏法的、江湖郎中、剃头师傅、小偷、流浪汉都在这里出入”。更远一点则堆满了烧焦的碎石和火灾后清理的垃圾，在广场的一边堆积如山，实际上成了街坊的垃圾场。[52]虽然还有这些杂音，广州生活的节奏很快恢复，“金街”重焕光彩。

1833 年，广州的商业生活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这一年，英国议会投票决定，终结英属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而美国人在这个姗姗来迟的决定中扮演了难以忽视的角色。从美国建国开始，就不断蚕食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主要原因在于相比笨拙、臃肿的英国官僚垄断体系，美国人效率更高、胆子更大，也更善于变通。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前，英国商人就向议会诉苦，呼吁废除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在中国实现自由公平的竞争。有怨言的还不只是商人，许多英国人长期以来都对东印度公司借垄断维持的高价愤愤不平。

1807 年，国库大臣 G. N. T. 格伦维尔（George Nugent Temple Grenville）发出了许多英国同胞的失望之情：“对华贸易一直以来都是欧洲所有商业力量角逐的对象，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在竞争中保持我们的利益。”格伦维尔嘲讽

了所谓维护“我们［东印度公司］庞大的贵族式商业模式”的好处，指出美国人无须“垄断”的优势，对华贸易也做得十分出色。他认为，打破垄断并让其他英国商人自由地贸易与竞争，将使英国民众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商品，而不是任凭垄断者支配，因为他们往往将公司奢靡浪费和管理不善的成本转嫁给民众”。当时另外一个人也简洁地表达了同样尖锐的看法：“我们看到太多垄断彻底失败的例子。而自由贸易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美洲［东］印度群岛的贸易。”[53]

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垄断都饱受抨击。1813 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到了重新授予的时候，议会决定采取行动。但人们的诉求只成功了一半。议会投票决定，终止公司在印度的垄断权，而在中国的则依然保留。不过，许多英国人还是对此十分高兴。一份伦敦报纸的评论家欢呼，“商人在美国积聚大量财富，在印度广泛贸易。现在轮到我们跃跃欲试的商人了”。[54]

接下来的 20 年中，要求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呼声愈演愈烈，其中有多个原因，而美国竞争的因素难以忽视。英国的对华贸易，包括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以及私人贸易商利润惊人的鸦片走私在内，总额比美国高出许多，一度达到 6∶1，可如果单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则是另一番情景。1818 年的贸易季，美国的贸易总额第一次超过东印度公司，整个英国大为震动，英国人对美国的崛起不免产生了一丝警惕的心态。此后多年中，美国的贸易额虽然落后于东印度公司，但差距并不

大。更令英国恼火的是，美国的部分利润来自本是东印度公司把持的领域。美国人常常在伦敦购买英国货，运往广州后以低于东印度公司的价格出售。这个事实常被英国商人拿来证明东印度公司竞争力之低下。1833 年，改革的呼声终于得到响应，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垄断权终结，次年生效，一个贸易时代也终于结束。[55]

到目前为止，对华贸易尚未对美国本土政治构成太多影响。唯一的例外是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俄勒冈地区的最终处置。这一大片土地南起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即北纬 42 度，直至阿拉斯加州南角的北纬 54.4 度，从沿海延伸至落基山脉。从 1818 年开始的近 30 年中，美国和英国展开了长期的外交战，争夺对这片宝贵土地的控制权。直到 1846 年，美国和英国才结束了外交拉锯战，签订《俄勒冈协定》（Oregon Treaty），确定了两国在北纬 49 度线的边界，并将温哥华岛给予英国。美国在这项交易中得到的土地后来构成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全部、爱达荷州的大部分，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这个新兴国家地理上的意外收获。

在解决领土划分方式的外交程序上，对华贸易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点是对哪个国家拥有这片土地的争议。为强调美国通过发现和占领对俄勒冈地区南部（即北纬 49 度线以南）的所有权，美国搬出了 R. 格雷（Robert Gray）、M. 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W. 克拉克（William Clark）以及阿斯特的远征探险为证，而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足对华贸易。1792 年 5 月，格雷担任商船“哥伦比亚”号船长，第二次出海

寻找用于中国贸易的海獭皮，途中意外“发现”了神秘的“西部大河”，即现在的哥伦比亚河，他随即宣布，这条河及其流经的土地都归美国所有。十多年后，杰弗逊总统派出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远征队，考察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他们从密苏里出发，翻越美国大陆分水岭，直抵哥伦比亚河口后再返回。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详细考察西部地区，寻找机会扩大毛皮贸易，而获取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毛皮贸易的丰沛利润更是此行焦点之一。刘易斯回到圣路易斯之后，告诉杰斐逊，“横穿大陆的走廊可以为毛皮贸易提供巨大优势”，并指出，他和克拉克此行所经地区可以采集到大量毛皮，在哥伦比亚河口就能发往中国，这条路线比英国人要快得多。刘易斯所说的毛皮主要是海狸皮，它和海獭、海豹及其他动物毛皮都在广州的市场上销路极好。刘易斯和克拉克回去几年之后，阿斯特也派出一支探险队，并且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了阿斯特里亚，他本想以此作为毛皮贸易的集散地，从这里将货物发往广州，只可惜最终未能如愿。[56]

对华贸易对俄勒冈地区最终划分的第二点影响在于，鉴于该地区在扩大对华贸易中的潜力，政治家鼓励美国政府争取在这片地区应有的份额。其中，弗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 J. 弗洛伊德（John Floyd）主张最力。在 1822 年一次关于美国是否应当占领哥伦比亚河口周边土地的辩论中，弗洛伊德认为对华贸易是有力的支持因素。他说，占领哥伦比亚河，“将这条河及沿海的贸易与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打通，就能开辟财富金矿，

扩大海上利益，连接其他西方国家，个中利害攸关，甚至超过攫取财富本身”。他认为，美国输出的毛皮足以用来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且利润很高，“不需要从美国带出一个美元”。[57]

接下来的几年，同样的论调不断出现，国会外的其他声音的更壮大了这一派的声势。例如，新英格兰人 H. J. 凯利（Hall Jackson Kelley）毕生致力于公开推动占领俄勒冈地区。1829 年，他写道，占领俄勒冈将“激发美国人的进取精神”，打开“新的渠道”，将美国和东方世界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为这个国家的财政源源不断地增添价值”。[58]

当然，除了对华贸易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促成了《俄勒冈协定》的签署，首要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即有数千名美国人定居在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这一既成事实促使英国人决心解决边界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对这片地区毛皮贸易利益的看重以及提高对华贸易前景的考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9]

* * *

从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中国皇后”号的起航，对华贸易为美国带来了无以计数的中国商品，并进入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贸易带来的并不只是商品，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另一个国家的认识。在与中国贸易的 50 多年里，美国人逐渐了解了“中央王国”生活的风貌。虽然他们得到的信息只是现实的只鳞片爪，但在满足对那个遥远、神秘国度的好奇心而言，这已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全部。

第七章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中国女士”梅阿芳

1783年5月8日，身兼耶鲁大学校长及传教士的E. 斯泰 193
尔斯（Ezra Stiles）为向新近选出的州政府官员致意，在康涅狄
格州哈特福德发表了一席演讲。此时，独立战争已经结束，最
后的和平曙光在望，斯泰尔斯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了新美国的未
来之路："美国从世界国家之林崛起，伟大的独立战争会得到 194
所有国家的瞩目。星条旗将随着海船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飘
扬在孟加拉与广州、印度河与恒河、黄河与长江的上空，商业
会给我们带来东方的智慧和文学。环球航行会出现，知识也将
积累和增长。"[1] 对于广州以及中国的看法，斯泰尔斯虽然正确，
却也过于乐观了。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星条旗确实在全球
飘起，也定期出现在广州，但发展最迅猛的还是商业。而美国
对于中国的知识则依然匮乏，鲜有增进。

在对华贸易的早期，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渠道，一部分来自进口的货物，例如中国瓷器、绘画、丝绸、扇子、装饰家具，这些无不反映了中国理想化的一面，包括瀑布、密林、青山，壮观的建筑，日常生活的人物（贫困的农民被刻意排除）组成的一幅幅充满异国情调的风情画，这也构成了中国想象的基础。历史学家J. R. 哈达德（John Rogers Haddad）称，正是通过与中国物品的"交流"，"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形成了一种虚幻的印象，认为那里是田园牧歌式的东方乐土，如梦如幻的天朝王国"。[2] 但这些物品并非唯一的信息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访中国，他们也形成了自己对于这片土地的详细观察，并以书籍、文章、演讲、闲谈等形式流回美国。

然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却面临着一道难题。自从乾隆皇帝在 18 世纪中期建立广州贸易体制后，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就限于夷馆所在的一片狭长地带，以及每月在广州可短暂游览的若干地点。要认识中国这个辽阔而多样的国家，这样的条件自然难以满足。尽管视角有限，美国人还是记录下了为数不多的见闻，并在国内找到了非常称职的受众。从一名商人 1830 年的记述中，不难窥见美国人对中国好奇的程度，“但凡是从‘天朝’游历回到美国的人，总是被熟人纠缠，几乎没法摆脱他们无穷无尽的问题（虽然有些问题荒谬之至）”。[3]

许多对于中国的描述都相当肯定，特别是风物之美、农业生产、伟大发明、儒家智慧、工匠技艺。而在当时的记述中，最热情赞美的要属德拉诺在 1817 年的文字：“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美丽的国度之一。四时蔬果丰富，制造业发达，足可满足大多数生活之需，水路交通极为便利，是我们所知最伟大、最富足、最宏伟的国家。”许多观察者都认为，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行商是诚实、守信、专业的杰出商人，竭尽所能帮助洋商顺利打通中国贸易的通道，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其中，伍秉鉴更是声名远播。他的正直、友善甚至传到了波士顿、纽约和许多对华贸易活动兴盛的港口，从而成为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4]

尽管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但也有一些人的看法与此相去甚远。一名美国商人写道：“（我们）一开始总是认为中国人堪为楷模。可以想象，我深受传教士旅行笔记的影响。然而，

到达中国之后，我失望地发现，这里并没有达到我曾有的期望，这里的人，无论在道德还是体格上，都远远低于我的想象。”[5] 196

历史学家陈国伟（John Kuo Wei Tchen）指出：“美国人越了解真实的中国人，就越会打消他们想象的‘东方’情调，对中国文明的尊慕和效仿也就逐渐消解。”[6]

由于贸易是主要的交流媒介，因此，对华贸易本身也一度遭到轻视。陈国伟认为，“美国人相信，生活、自由、幸福的信条使得对‘自由’贸易的需求合乎情理，在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后，他们认为中国对贸易和港口的管制实属专制”。[7] 一些美国人认为清政府腐败堕落，山茂召就注意到，“尽管常常有人称赞清政府恪尽职守，但或许在地球上任何文明国家中都很难找到如此压迫民众的例子”。[8]

而对中国司法体制的负面看法也常常加深了（美国人）对清政府的恶感。在水手特拉诺瓦被定罪问绞的“艾米丽”号事件中，美国人的正义感受到严重打击。在美国人看来，妇人落水而亡纯属意外，审判过程更是徒有虚名。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司法之不公，美国人还提到了英国人在“休斯夫人”号事件中的经历。违反大清律例的惩罚，包括绞刑、斩首、滚油等，都受到诟病。一名美国贸易商写道：“中国长期对违反刑律之人施以酷刑，对于拥有如此高度文明的民族，刑法种类之多样、手段之严密，实在难以想象，其中更有许多连最野蛮的国家也望尘莫及的苛刑。”[9]

中国的军事能力也成为批评的对象。西方人普遍认为，如

若开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绝无胜算。一名曾旅居
197 广州的费城人说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就是一群绵羊，他们的百万军队可以被轻松消灭”。[10]

有些人对中国人的描述充满蔑视与不屑。1832 年到访广州的一名美国人写道：“在人生舞台上的卑微生命中，中国人无疑是最奇特的物种，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群，全世界最笨拙的两足动物。”[11]其他人还用“报复心重、好色、捣乱”、“邪恶”、“卑鄙”、“懦弱”等词语形容中国人。而小贩受的批评最为严厉，他们被看成无赖，随时准备算计外国人。[12]一名美国商人曾忠告说：“对于别人的行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假设每个中国人都是恶棍，直到你确信他品行正直。”[13]中国菜也没有逃过谴责，特别是食用鼠、狗、猫以及其他绝不会出现在美国人菜单上的东西。杀女婴、裹足也饱受攻击，外国人以此指责中国对女性的压迫（当时的美国人也明显没有能力理解个中原因）。[14]

在华的外国人还时常提及另一种现象——贫困（当然这并非中国独有）。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伯驾就发现，“乞丐众多，无所不在”。[15]让伯驾等传教士吃惊的并不只是普遍的穷困，还有说服民众皈依基督教的难度。他们将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无神论态度。传教士面临的阻力越大，他们也就越沮丧，经常抱怨中国人拜神、嫖赌、抽大烟，政府专制，认为这是妨碍中国人改变信仰的原因。[16]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来自有限的观
198 察视角。关于广州的美国人社区，历史学家唐斯说道：“美国

人的日常生活和中国下层社会互相隔离，夷馆内的豪华生活和周围的贫困与司法落后（如当众斩首）形成强烈的文化对比，因此使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产生了严重偏颇的看法。”[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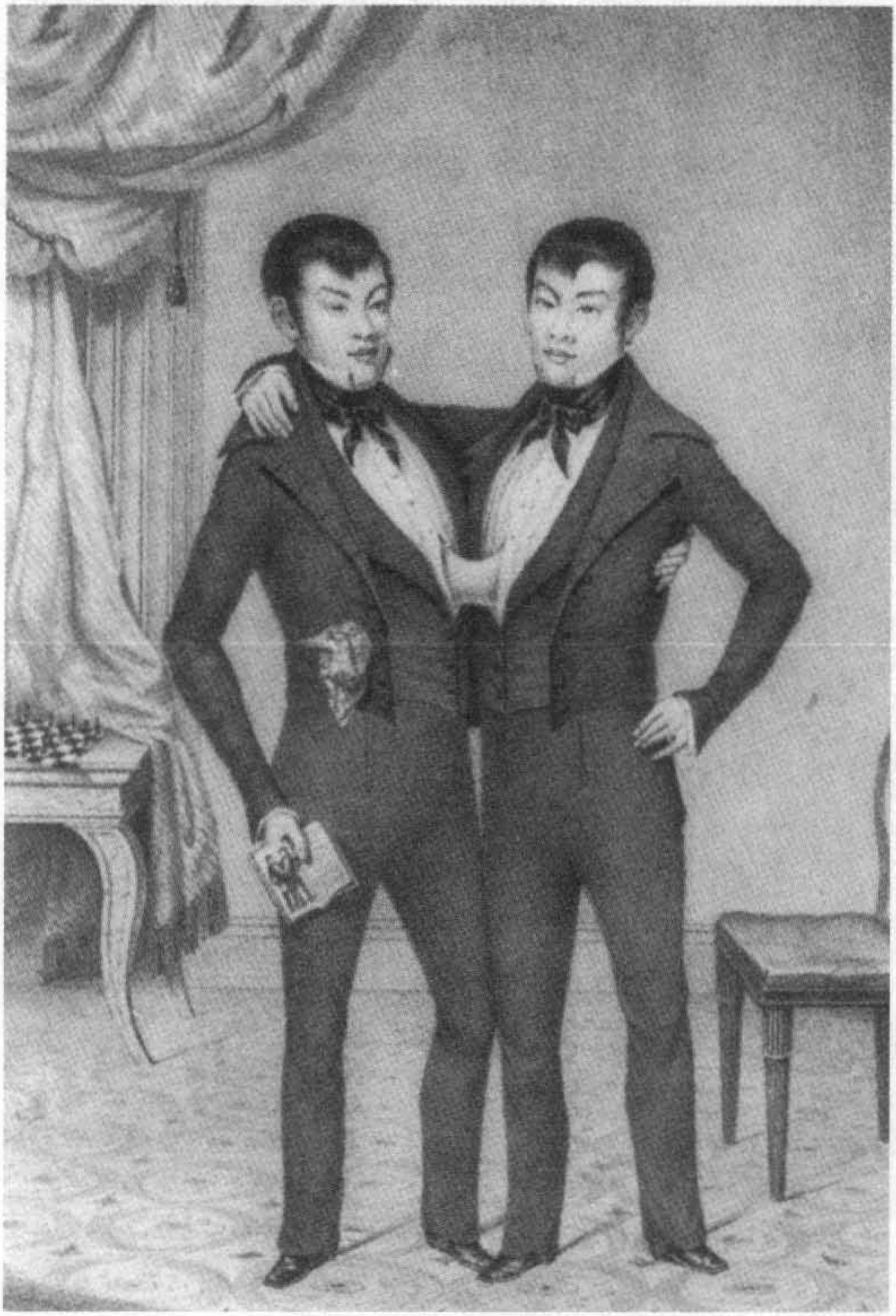
在美国本土，美国人几乎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中国人，因此往往衍生出自己的想象。虽然有一些中国人曾随美国商船到达新大陆，但除了文钟，没有人能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文钟也很难说对中国人的形象有何助益。1818～1825 年，曾有五名中国男童远赴重洋，来到美国，进入康涅狄格州康沃尔的外国教会学校。不过，他们此行并非为了了解美国，而是如报纸指出的，是为了接受“基督教教育，寄望他们回国后，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帮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18]除此之外，来到美国的唯一中国人并非传播文化的使节，而是娱乐的对象，或者说“满足好奇心”。他（们）更多地被美国人看成怪人，而不是来自另一个社会的值得尊重的成员。[19]

其中，一个例子的主角成了美国人在 19 世纪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酋长”号船长 A. 科菲（Abel Coffin）从远东回国时，给妻子苏珊带来一个惊喜。1829 年，他给妻子写信说：“我找到两个 17 岁的中国连体男孩，他们非常健康，我希望这能帮我们赚到钱，也能满足好奇。”[20]这两个男孩叫做昌和恩，腹部接近脐带的地方连在一起。他们共用一个肝脏和供血系统，其他器官则各用各的。两人在暹罗曼谷附近出生长大，渔民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据说有四分之三的中国血统，当时的暹罗人称他

们为“中国双胞胎”。科菲和合伙人英国商人 R. 亨特（Robert Hunter）说服了双胞胎的母亲，以 500 美元的代价，带双胞胎离开两年半。

1829 年 8 月 16 日，双胞胎甫抵波士顿，即成为新闻头条。《波士顿爱国者报》（*Boston Patriot*）报道：“我们亲眼看到这一自然界的畸形人，确信无疑。这是我们所见最惊人的活生生的奇观。”[21] 当地人找来医生仔细检查后确认，双胞胎的连体属实，先前关于骗局的谣传也不攻自破。很快，科菲期望的财源就滚滚而来。两周不到，他就租下了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帐篷，展开大量宣传，海报贴满全城，吸引人们来看“暹罗双生儿”。人们蜂拥而至，每人要支付 50 美分的入场费。[22]《波士顿银河报》（*Boston Galaxy*）报道：“所有的乡镇都有人为暹罗双胞胎而来，好奇心十足地想看看这对自然的奇异造物，迷惑了我们普通人的心智。”[23]

在科菲的操作下，著名的“暹罗双胞胎”在美国、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进行了近 3 年的表演。在许多演出中，他们穿上中式服装，表演简单的杂技，出售签名的印刷画片作为纪念品。1832 年 6 月，兄弟两人在年满 21 岁之际，认为已经履行了对科菲的所有义务，与科菲分道扬镳。他们告诉科菲，要“为自己而活”。接下来的七年中，他们自谋生计，足迹遍及美国大部分地方，还前往法国、比利时、荷兰、古巴演出。当时的一名年鉴作者称他们是“世界第八大奇迹”。[24]



暹罗双胞胎昌和恩，J. M. 埃利奥特绘，1839 年

1839 年，两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定居，归化为美国公民，买了奴隶管理房产，并和一对姐妹结婚，生了 21 个孩子，改名为“邦克”。尽管他们希望退出舞台，但迫于生计，他们还是在 1849 年重登舞台，并在之后多年四处表演谋生，一度在马戏团老板 P. T. 巴纳姆（P. T. Barnum）的演出中登台。1874 年 1 月 17 日，两人在几小时内相继去世，享年 63 岁。恩的遗言是“愿上帝宽恕我的灵魂”。[25]

昌和恩到美国 5 年后，一位中国女性随“华盛顿”号在 1834 年 10 月 17 日进入纽约市，这也是目前所知第一位到达美国的华人女性。“华盛顿”号的船东是靠着贩卖中国仿制的法国产品暴富的卡恩斯兄弟，他们现在请来这位中国女性，希望为自己的业务增添几分东方风情。许多报纸称她为“Julia Foochee ching-chang king”或“Ching-Chang-foo 小姐”（也因此开了乱用中国名字的头），其父据说是广州的要人，但对于这名女性的真实身份，并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卡恩斯兄弟不久就让她改名为梅阿芳（Afong Moy），而她的经历也像“中国女士”这个称号一样富于色彩。[26]

卡恩斯在八号公园展览厅设展，如果希望一睹梅小姐芳容，就需要支付 50 美分的门票。许多人络绎而至，进门之后是一个客厅，摆满了漆制家具、丝绸、纸灯笼、中国画、瓷瓶，梅小姐身着中式服装，或小口品茶，或迈“金莲”款款而行，或在仆人和翻译阿东的帮助下回答拜访者的提问。《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报道称，梅小姐“芳龄十九，面容可人，身

高4英尺10英寸，穿上鞋子脚长也仅4英寸，根据该国风俗，生下来的头十年都要穿铁鞋”。[27]她的小脚尤其引起报章的关注，很多人对此十分愤慨。一名记者谴责孕育这种风俗的畸形文化，称“她的遭遇十分悲惨”，表明中国女性生活在“男权的阴影下”。[28]

除了在纽约外，梅小姐也前往美国各地展演，所到之处总是能像恩和昌一样吸引大批观众。历史学家K. R. 穆恩（Krystyn R. Moon）指出，“在许多方面，梅阿芳加深了美国人对于自己和中国人差异的看法，特别是后者的低人一等”。据 202
说梅小姐1837年离美返华，但十年后又出现在纽约和波士顿，唱着中国歌曲，用新学的英语向观众介绍中国风俗。不久后，“中国女士”再度消失，据称是接受邀请去了欧洲。[29]

昌和恩加上梅阿芳，为美国人带来的不过是对中国漫画式的肤浅印象，与事实出入甚多。除此之外，流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手工艺品也是信息渠道之一。有一名先驱者是荷兰裔美国人A. E. 冯·B. 胡克吉斯特（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18世纪90年代，他在广州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胡克吉斯特身材高大，随荷兰大使的使团前往北京为乾隆登基六十年庆贺。在漫长的旅途中，胡克吉斯特对周围的环境备感惊奇，用速写记录下一路上许多奇妙的场景。

1795年1月，使团到达北京，在此逗留了四十天。胡克吉 203
斯特不仅成为第一个到访北京的美国人，也是第一个在宫廷面见皇帝的美国人。胡克吉斯特向乾隆叩头行礼，留下了不错的

印象。在短暂轻松的交流中，胡克吉斯特认为自己和年迈的皇帝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他写道："我行礼已毕，起身退下，皇帝依然看着我，露出十分慈祥的表情。我确实得到了极高的善待，据说甚至没有任何公使得到过这样的待遇。"[30]

1795 年 5 月，使团回到广州，胡克吉斯特雇佣了两名中国画家，以他的速写为蓝本，绘出彩色的图纸和油画。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雇佣这些画家。在动身去北京之前，胡克吉斯特就找到这些画家，自费安排他们"到中国各地游访，凡遇上新奇的风景，皆绘画留存"。画家们不辱使命，成绩斐然，总共绘制了大约 1800 幅反映天朝风物的画作。胡克吉斯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囊括中国风貌精华的收藏。为此，他将这些作品分为 38 卷，内容涵盖历史、神话、艺术和贸易、风俗习惯，其中有整整两卷专门记录广州的风景古迹。此外，胡克吉斯特还补充了许多地图、图表、平面图，以及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其中最惊人的是一个由"水晶制成、树干为底座并饰以花环的"花瓶。

1796 年 4 月，胡克吉斯特到达费城，买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布里斯托附近一个 430 英亩的农场，盖起了一栋宏伟的屋子。与此同时，他在费城租下一个场地，展出部分收藏品，同在现场的还有他从广州带回的五个仆人。参观者并不多，大部分是费城社会精英，一名参观者表示，"周围是真正的中国人，以及代表他们风俗、习惯、古迹、艺术的绘画，你很难不想象自己身在中国"。[31]

北京西门，T. 阿洛姆绘，约 1843 年

15 个房间的宅第完工后，胡克吉斯特将其命名为“中国寓所”，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因为所耗之资正来自对华贸易。房子的顶上有一个挂满银铃的小塔，而在室内，他用自己的藏品将房子变成一个中国博物馆，但只有少数受邀的客人，如乔治·华盛顿和从法国来访的拉斐特公爵，才见到过这批藏品的真容。然而一年之后，铺张的生活让胡克吉斯特陷入困境。由于债台高筑，他被迫在债务人监狱短暂服刑，之后前往伦敦，而宝贵的藏品则由佳士得拍卖行在 1799 年出售。两年后，胡克吉斯特在阿姆斯特丹过世，几乎已被世人遗忘。[32]

就在佳士得拍卖胡克吉斯特遗产的同时，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另一批中国艺术和古董收藏才刚刚开始建立。塞勒姆的东印度海洋协会由当地少数航海人在 1799 年 8 月建立，他们的共

同点是都曾驾船驶过好望角或合恩角。协会章程的一项条款称要建立“自然和人类艺术的展室”，存放成员们带回的异国珍品。这个展室后来发展成塞勒姆现在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这是美国持续经营时间最久的博物馆，收藏了无数来自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太平洋各个群岛、远东的物品，而中国的展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女孩曾在19世纪30年代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后来回忆起这次展出对自己好奇心的奇妙影响：

> 一个充满幻想的小孩从新英格兰乏味的街上走进来，这里充满来自东方的香气……从踏足美丽的古老门墙开始，一群庄重的东方人（包括穿着官服的“满大人”）向我问好……直到闭馆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像着了迷一样，在这个平凡忙碌的世界，这片地方于我近乎梦境。[33]

不过，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方面，最出色的却是失败的费城商人N. 邓恩（Nathan Dunn）。他想让美国人以敬畏的眼光看待中国，纠正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遍的负面印象。1818年，邓恩目睹靠对华贸易致富的其他商人，为了逃债，同时也找机会翻身，他登上了前往广州的旅途。他果然大获成功，1832年回费城时，已经颇有积蓄。邓恩摆下盛宴，邀请所有的债主赴席，在每个人的盘子下放上一张支票，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34]当

然，他带回的并不只是钱。在广州期间，他也搜罗了异常精美的中国物品并带回美国。

邓恩的收集策略既传统又有新意。他不仅利用充沛的财力在广州收购，也凭借与中国人的良好私交取得他本人无法获得的东西。邓恩强烈反对鸦片贸易，因而声名鹊起，成为深受尊敬的外国人，也进一步打开了收集中国物品的渠道。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邓恩“经常从当地人手中收到各种古董珍玩，作为对他不事鸦片交易的感谢”。[35]邓恩在上下官员乃至皇帝那里都颇受好评，因此，能够雇佣中国代理人，帮他做“番鬼”无法做到的事——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珍玩，扩大藏品规模。[36]

1838 年 12 月下旬，邓恩在新落成的费城博物馆一楼展出自己的中国藏品，展览的名字就叫“一万件中国物品”，费用主要来自邓恩本人的一大笔捐款。展厅占地长逾 160 英尺，宽 70 英尺，22 根立柱支撑起高高的天花板。展览随附的手册称，“参观者将被带入一个新世界，这里是微缩版的中国。景象令人过目不忘”。[37]一名参观者说，邓恩“完整再现了东方生活和艺术的全景，将整个中国展现在我国好奇的居民面前”。[38]

虽然这描述或许有些夸张，但展览确实包罗万象，甚至过于庞杂了。在 53 个展箱和无数独立展台中，邓恩的“中国博物馆”用了 50 个真人大小的泥人和大约 1200 件器物讲述中国，事实上，即便用上规模大上 10 倍的展览，这也绝非易举。其中有大理石和铜佛像、宝塔、桥梁、房屋和中国河道上出现的各

式船只的精细模型。盈盈在握的鼻烟壶上刻画了身着轻装的“文士”，旁边是精心雕刻的木书匣，无声地证明邓恩的论断：“中国人是热爱阅读的民族”，在“整个欧洲几乎还处于无知、蛮荒的”18 世纪就已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技艺精湛的绘画生动地向参观者展示了优雅的建筑、青山绿水以及广州和北京等通都大邑。此外，还有各类人物的画像，包括全副武装的战士、严肃的官员、游玩的仕女乃至皇帝和浩官。自然史的部分展出了孔雀、中国狐狸、白鹇，其他部分还有乐器、厨具、农具和放在檀香木盒中的筷子。而在大厅边缘的柱子上则贴满了各种中国智慧格言。一张条幅上写着“自重者，人恒重之，自轻者，人恒轻之”。另一张则写着“善必寿考，恶必早亡”。[39]

展出大获成功，在三年时间里，总共吸引了 10 万名参观者，售出 5 万份博物馆目录，也确实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名费城牧师 E. 韦恩斯（Enoch Wines）说：“邓恩在向公众展出的藏品中，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力地纠正了普遍存在的错误，带来关于中国的正确信息，无论是爱好求知的哲学家，研究国家繁荣稳定原理的经济学家，还是希望传播福音的基督徒，都应当认真研究。”[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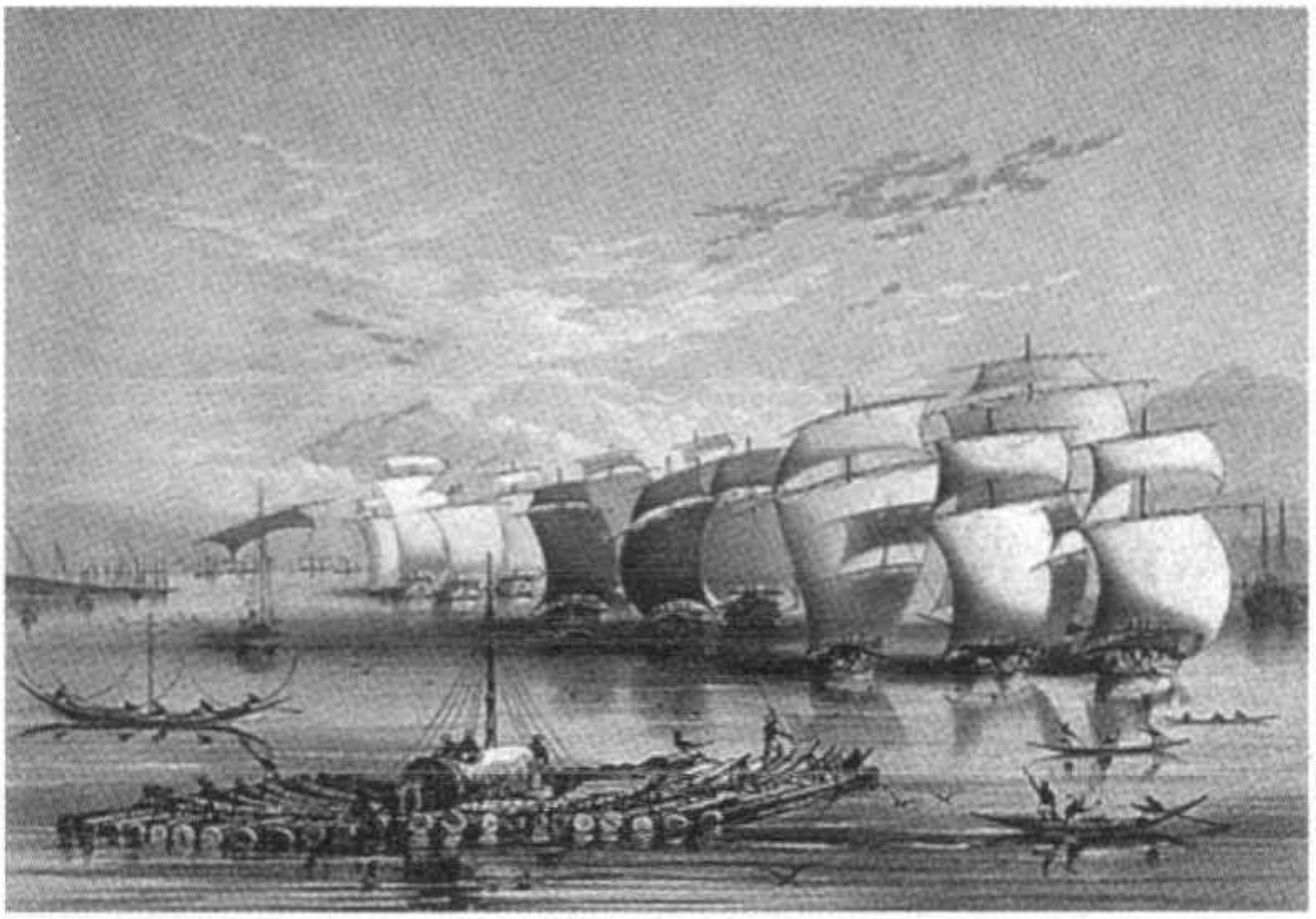
尽管在邓恩的展出中，中国是值得尊重和景仰的一流国家，却也引发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名《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报的编辑称：“中国人驻足不前，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邓恩的藏品透露出一成不变的价值观，这里展出的不仅是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还有他们的未来。”这名编辑

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和欧洲普遍存在的看法，即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停留在过去：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在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方面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中国却依然停滞不动，全无进展。[41]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尽管在19世纪早期，满清王朝已显示出严重的衰颓之势，但中国仍然是富于创新的辉煌文明。改变的其实是西方的地位和视角。在我们衡量人类进步的诸多方面，西方都迎来了飞速发展，使之最终接近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中国，科学和技术领域尤其如此。因此，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发展停顿的例子。

邓恩的展览中只有少数几只鸦片烟枪，对中国抽鸦片的情况也就一带而过，但展览目录中则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120页的目录中，邓恩用了9页篇幅抨击在中国日益猖獗的鸦片贸易："鸦片是毒药，吸食成瘾的烟民身体孱弱，道德败坏。因此任何情况下的鸦片交易，无异于贩卖人的身体和灵魂。"[42]尽管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最大的鸦片供应商英国，但对于向中国人贩卖鸦片的美国商人，邓恩也深为不齿。在参观者走进邓恩的中国博物馆，读到他对鸦片贸易的谴责之时，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围绕鸦片的事件逐渐发酵，长期以来是非不断的鸦片贸易最终演变成残酷的战争。

第八章　鸦片战争



印度当地船只沿恒河将鸦片运往加尔各答，约 1850 年

1839 年3 月10 日清晨，旗昌洋行代理人亨德和几个美国人 209
一起，登上了夷馆前停泊的一艘小帆船，等待林则徐的到来。
两个多月之前，经过 19 次漫长的商谈，道光帝最终任命林则徐
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林则徐已年过五旬，自嘉
庆十八年出任庶吉士，一路升迁，官至江苏巡抚、湖广总督， 210
品行廉洁，被称颂为“林青天”。林则徐为人素有刚正勤勉之
名，兼之力陈鸦片贸易之弊，道光帝相信，他是主持禁烟的不
二人选。1838 年 12 月31 日，林启程赴粤，随扈 30 人，行李
5000 余磅，水陆兼行，一路南下。

迎接林则徐到来的不只是亨德和他的同伴。珠江两侧，居
民和身装新装的兵士也翘首以望。岸边人满为患，民众挤满所
有房屋的门窗，希望一睹钦差尊容。江面摈退一切船只，清出 211
航道。8 时 30 分，林则徐的船进入视线，他端坐船头，其他清
廷大员立定其后。亨德后来回忆道：“他气度庄重，表情相当
严厉，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髭，下巴留着长髯。”载有
其他官员的船只紧随其后，从肃静的人群面前掠过。没有人知
道，林大人将会怎样着手禁烟，不过答案很快就会揭晓。[1]

林则徐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清政府虽多次下令禁烟，却
始终收效甚微。从 1799 年以来的多份禁烟文告如泥牛入海，渺
无成果。“洋土”仍源源流入中国，情势益形恶化。1823 年，
输入中国的鸦片约为 8000 箱，1833 年为 24000 箱，1835 年为 3
万箱，到了 1838 年，已经升至 4 万箱。[2] 几乎所有这些鸦片都产
自印度。其中不到一半来自英属东印度公司控制的罂粟田。其

林钦差，中国画家（佚名）绘，约 1843 年

余则来自印度西北部的麻洼（Malwa）地区，这里的鸦片生产和销售由印度本国人控制（麻洼进入中国鸦片交易从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虽然英国并不直接从麻洼鸦片的销售中取得收益，但由于麻洼商人需要向英国缴税，才能通过英国控制的孟买运输鸦片，因此英国也间接获利。此外，英国人还用自己的船将大部分麻洼鸦片运往广州，抽取销售提成。[3]

不断扩大的鸦片贸易对英国极为重要。1839年，一名英国作家写道："多年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获得巨额岁入，英国政府也从此项贸易取得难以估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鸦 212
片销售的利润为英国提供了管理庞大的印属地的费用，鸦片款所购中国货物的税收以及销售和运输鸦片的税收，每年为英国国库带来大约600万英镑的收入。美国人也继续将鸦片从土耳其和印度运往中国获利，但份额相对较低。事实上，鸦片是当时全世界价值最高的商品。[4]

鸦片贸易愈演愈烈，造成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一方面摧残民众身心健康，另一方面白银外流，财政枯竭。随着鸦片流入数量增多，价格下降，反过来促使印度生产者扩大产量以维持利润。如是循环，愈演愈烈，不仅迅速放大了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还意味着鸦片价格越来越低，扩大了潜在的吸食者人数。结果，本来局限于上层社会的风气逐渐渗透到社会中下层。 213
我们已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吸食鸦片，又有多少吸食者上瘾，但现代学术研究表明，只有很小比例的使用者吸食上瘾。伯驾认为，广州一地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有大约数万上

瘾者，其他估计则认为全国的上瘾人数总体在 200 万到 1000 万之间。而成瘾比例最高的恰恰是身负禁烟查弊之责的政府官员。此外，军中上瘾者亦极为广泛。[5]

手执烟枪的中国官员（“满大人”），约 1836 年

为了满足日益加深的鸦片瘾，中国流出白银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些年中，中国白银支出量远超收入。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指出，“白银不足意味着银兑铜的价格上扬；由于农民平常以铜钱交易，而以白银缴税，因此，银价上扬意味着农民事实上要缴纳更高的税”，遂引起广泛的动乱。[6]1838 年，皇帝警告道：“若不立即采取措施［阻止白银外流］，竭力自救，则中国有用的财富，都将倾泻到海外的无底洞，对国家物力与人民福祉造成深重恶果。”[7]

清政府虽意识到情势发展愈加危急，却仍只采用旧办法应对，颁布了更多禁止鸦片进口的法令，并马不停蹄地执行，最激烈的手段是两次烧毁走私船。饶是如此，清廷肃清障碍的能力毕竟有限，鸦片贸易依然猖獗。[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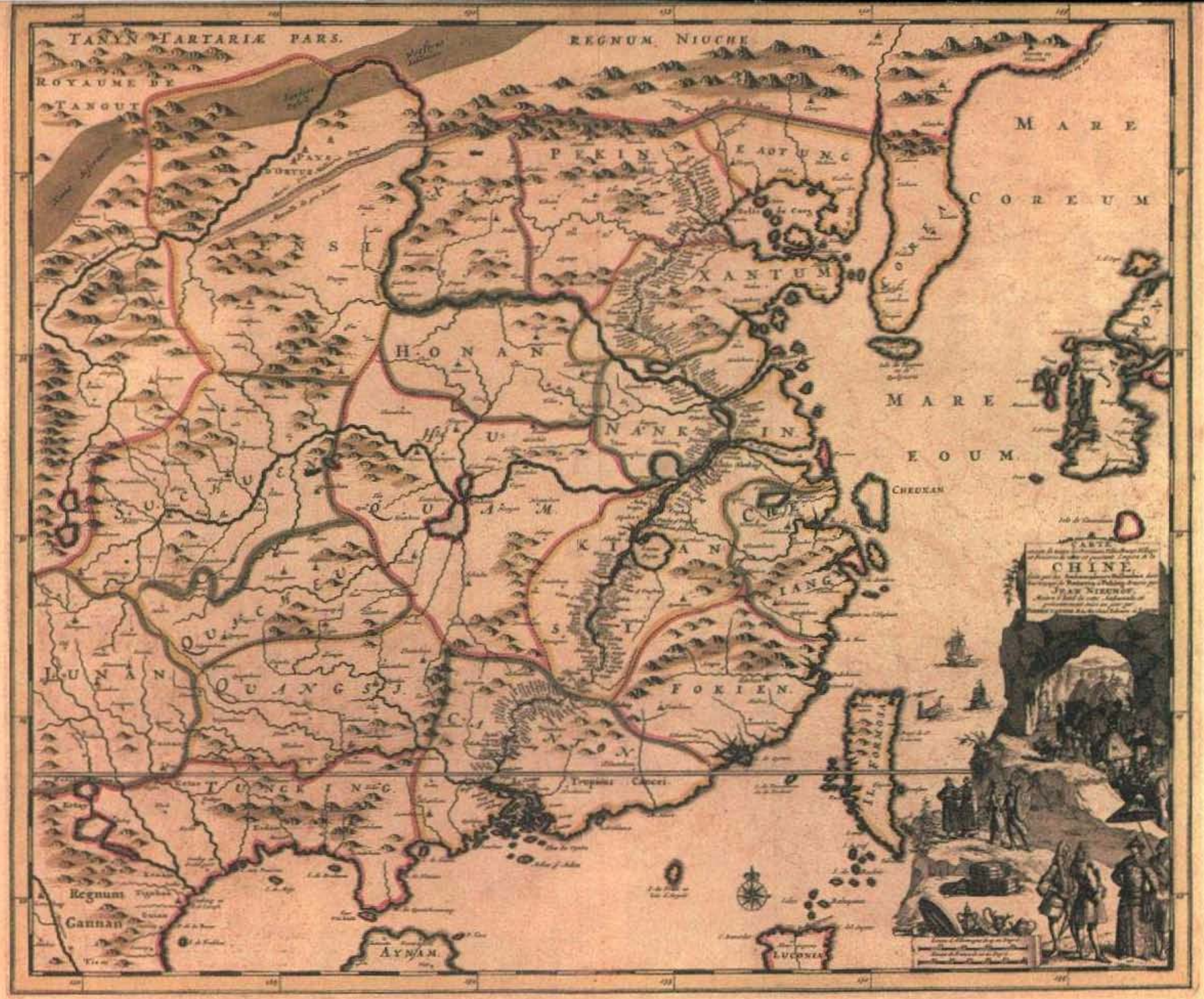
道光帝知道，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于是，他向信任的大臣征询对策。1836～1838 年，各种各样的建议涌入北京。归结起来，大臣们认为，处理鸦片问题，要在四途：①守卫海港，断绝运输。②停止一切对外贸易。③逮捕并严惩鸦片商。④鸦片合法化，开征鸦片税。[9]

广州的洋商对于京城的动向十分了然。他们翻译了呈送皇帝的纪要，讨论新政策可能的后果。一些贸易商作壁上观，希望事情到谈话为止，风头过后一切如故。亨德说："到目前为止，对于在广州的外国人，鸦片确实是一桩轻松的买卖。销路顺畅，汇兑及时。交易性质接近于药品，销售抽成百分之三，收益百分之一，而且全无坏账，十分稳妥。"[10]其他贸易商则更倾向于鸦片合法化。他们认为，鸦片和其他商品没什么两样，既然中国官员完全无法遏制鸦片流布，倒不如合法化。但无论贸易商对皇帝的意见有何看法，除了根本反对鸦片的少数人，没有人真的对自己在这项毒品交易中的角色感到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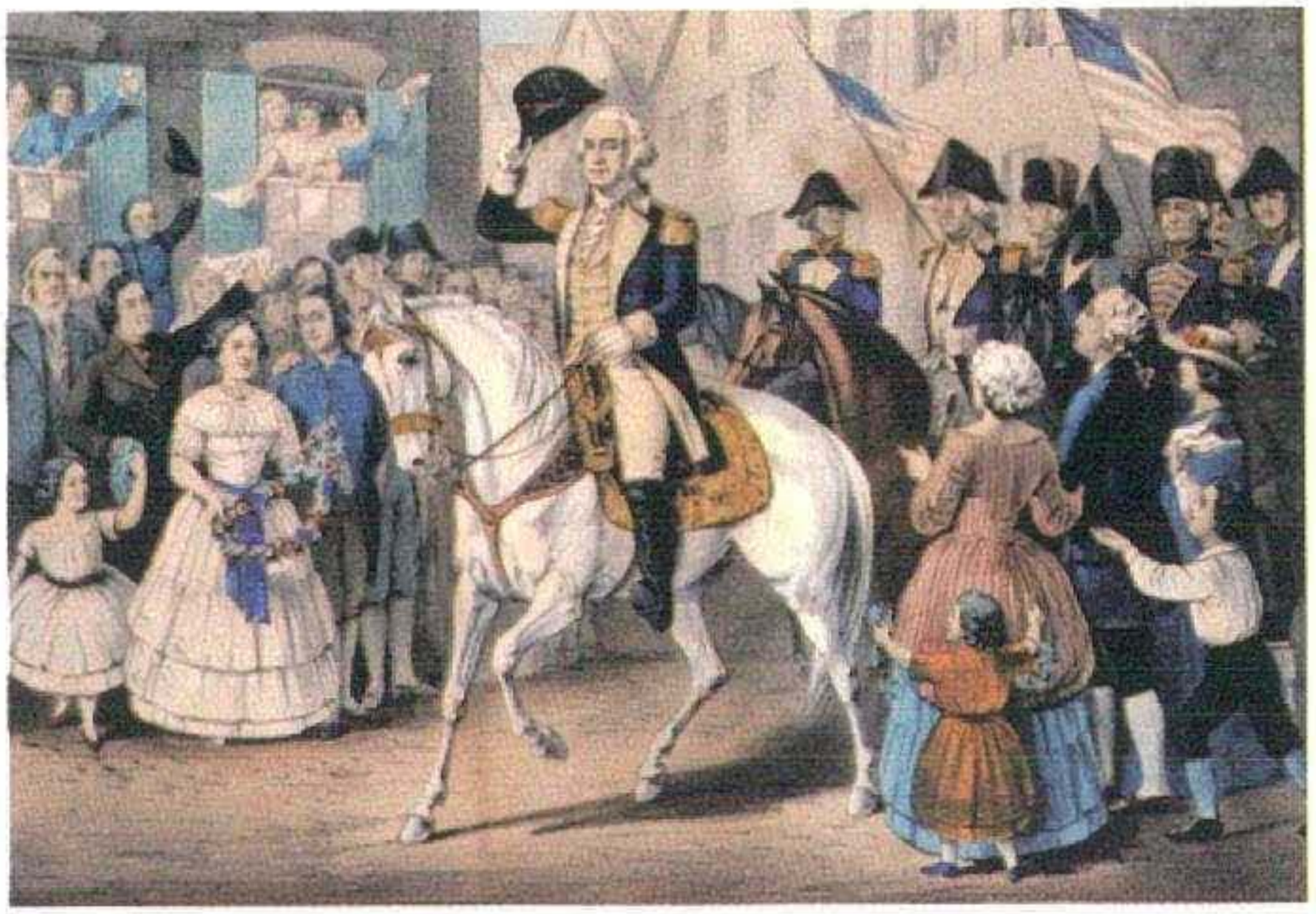
在对法律、道德、精神的影响方面，虽然鸦片走私事实上已违反中国法律，伤害许多民众，鸦片商却往往对鸦片的危害避而不谈，反说成是值得赞赏的事业，对自我怀疑打上了预防针。持有这种想法的代表人物就是 R. B. 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1837 年的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他的广州业务中断。1838 年，福布斯回到广州，重新打理生意。作为最大的美资鸦片商旗昌洋行的总代理，福布斯对鸦片贸易有着独特的评判视角。“关于鸦片对人的影响，毫无疑问，那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堕落，但或许并不会甚于酗酒。”他说，只要鸦片在沿海水域销售，保持在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之外，那就不算走私，而是“正当生意”。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说自己不过是效法英属东印度公司和他“一直尊敬的行业榜样——帕金斯洋行、皮博迪洋行、旗昌洋行、罗氏洋行”。[11]在给妻子罗丝的一封信中，为了安抚她的担心，福布斯说：“从事这桩生意并不会有义愤之感，如果有什么值得让你知道，我会说，与此同时，我也赚到了第一笔财富。”[12]继福布斯之后主理旗昌洋行的沃伦·德拉诺二世(Warren Delano II)，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和他的前任一样不遗余力地为鸦片贸易辩护。坚持说这是“一项公平、光荣、合法的生意”，并不比向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烈酒更卑劣。[13]

英美商人对鸦片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其实很容易理解，只要想想，在美国和英国，进口和使用鸦片都完全合法，两国都有不少人为治病和消遣服用各种形式的鸦片，常见的品种包括鸦片酒。在最有名的服用者中有不少作家，他们广泛使用鸦片，或为了镇痛，或为了寻找神秘的灵感火花。这个名单上的名人包括柯勒律治、勃朗宁和 1821 年出版的畅销书《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的作者 T. D. 昆西(Thomas De Quincey)。因此，将鸦片和烈酒——另一种合法但



荷兰语中国地图 J. 纽霍夫绘 约 17 世纪晚期



1783年11月25日
英军撤出纽约
乔治·华盛顿入城
科利尔和埃文斯绘　18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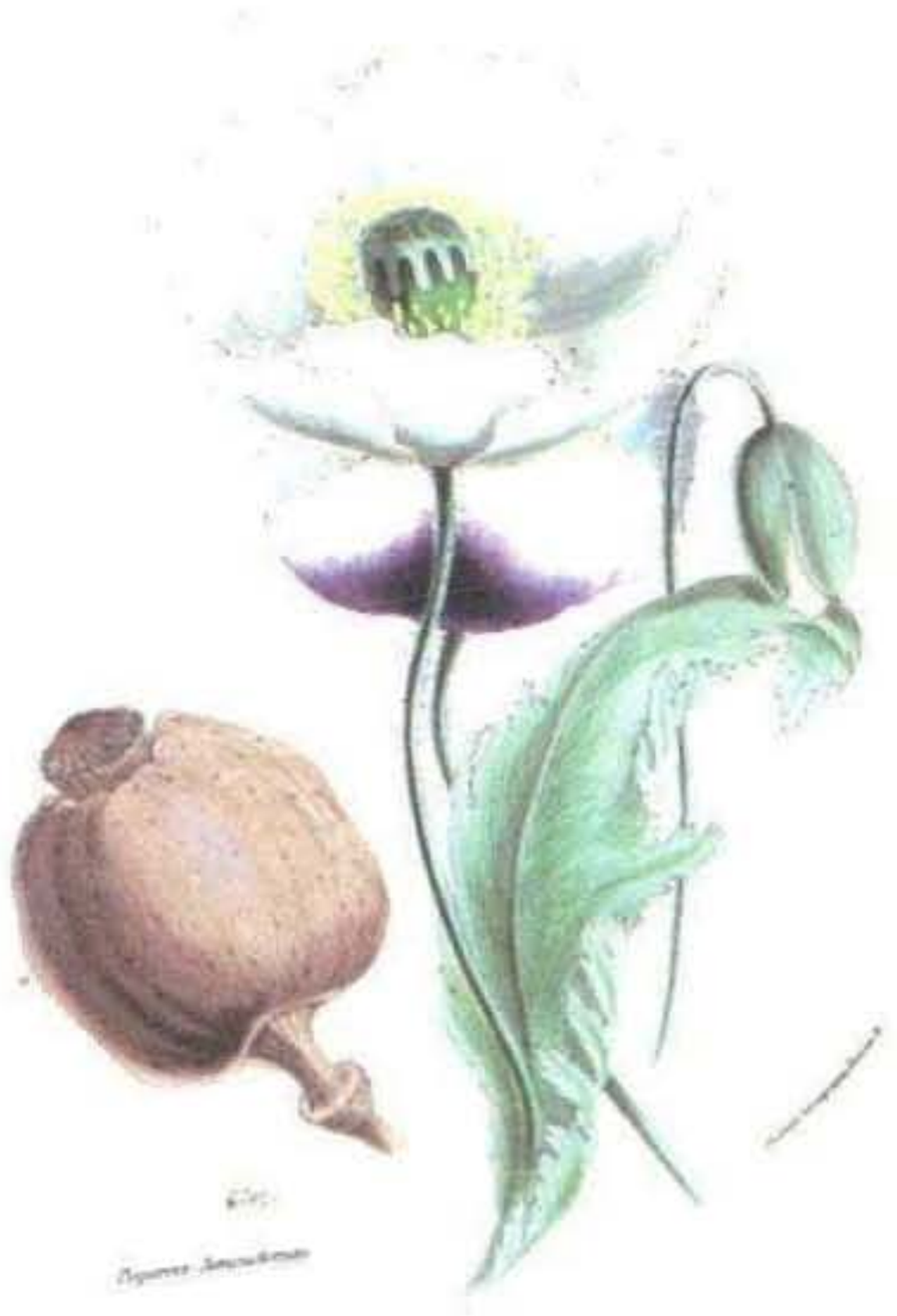
茶树的枝、叶、花
日本画家（佚名）绘　约1878年

浩官的茶箱内装熙春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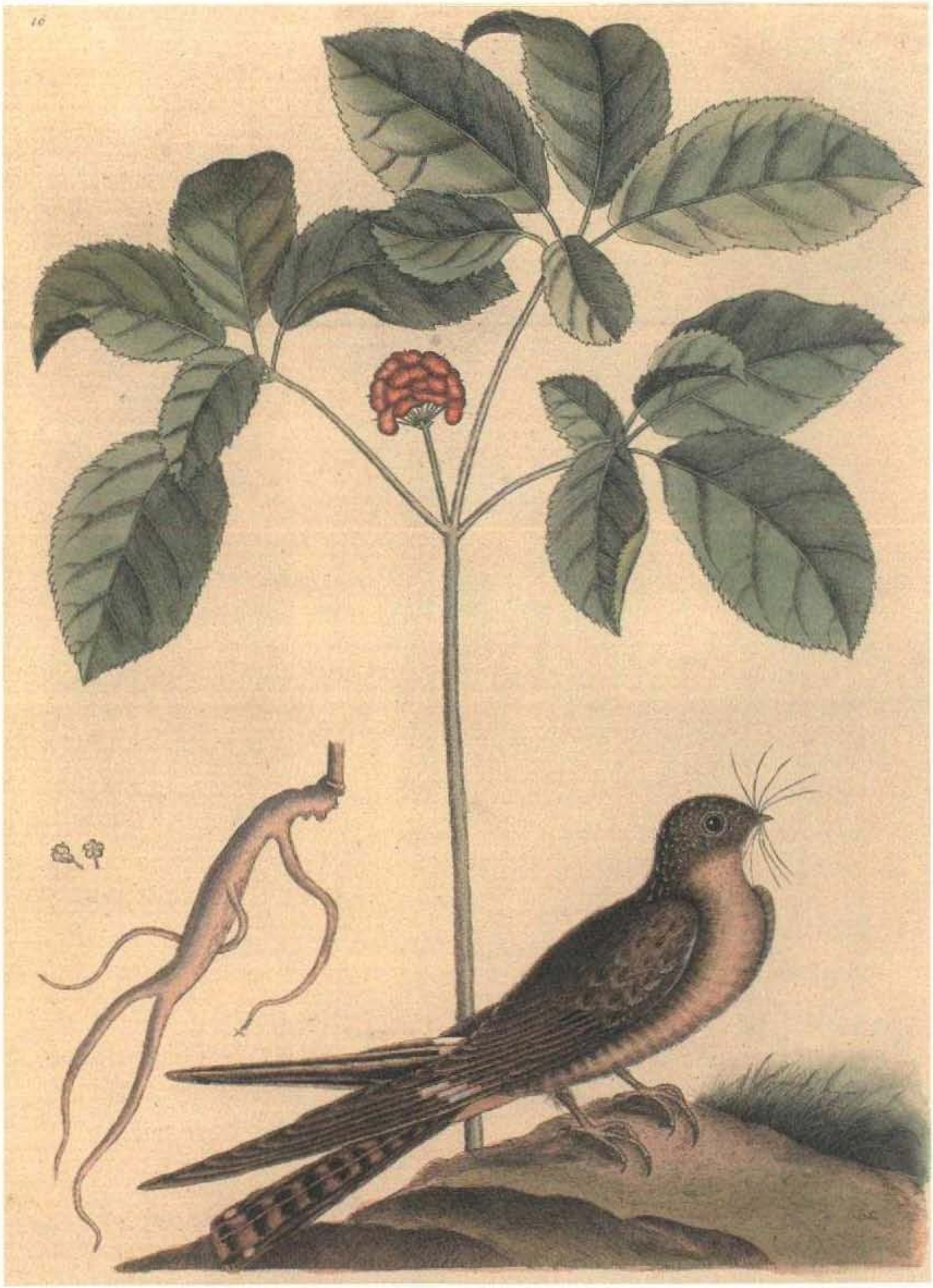
绘有广州风光的盖碗和碟 约 1780 年

乔治·华盛顿 1757 年从伦敦购买的中国瓷茶壶【约 1755 年制作】属于一套完整瓷器

三种檀香木的
花朵
「其中一个是花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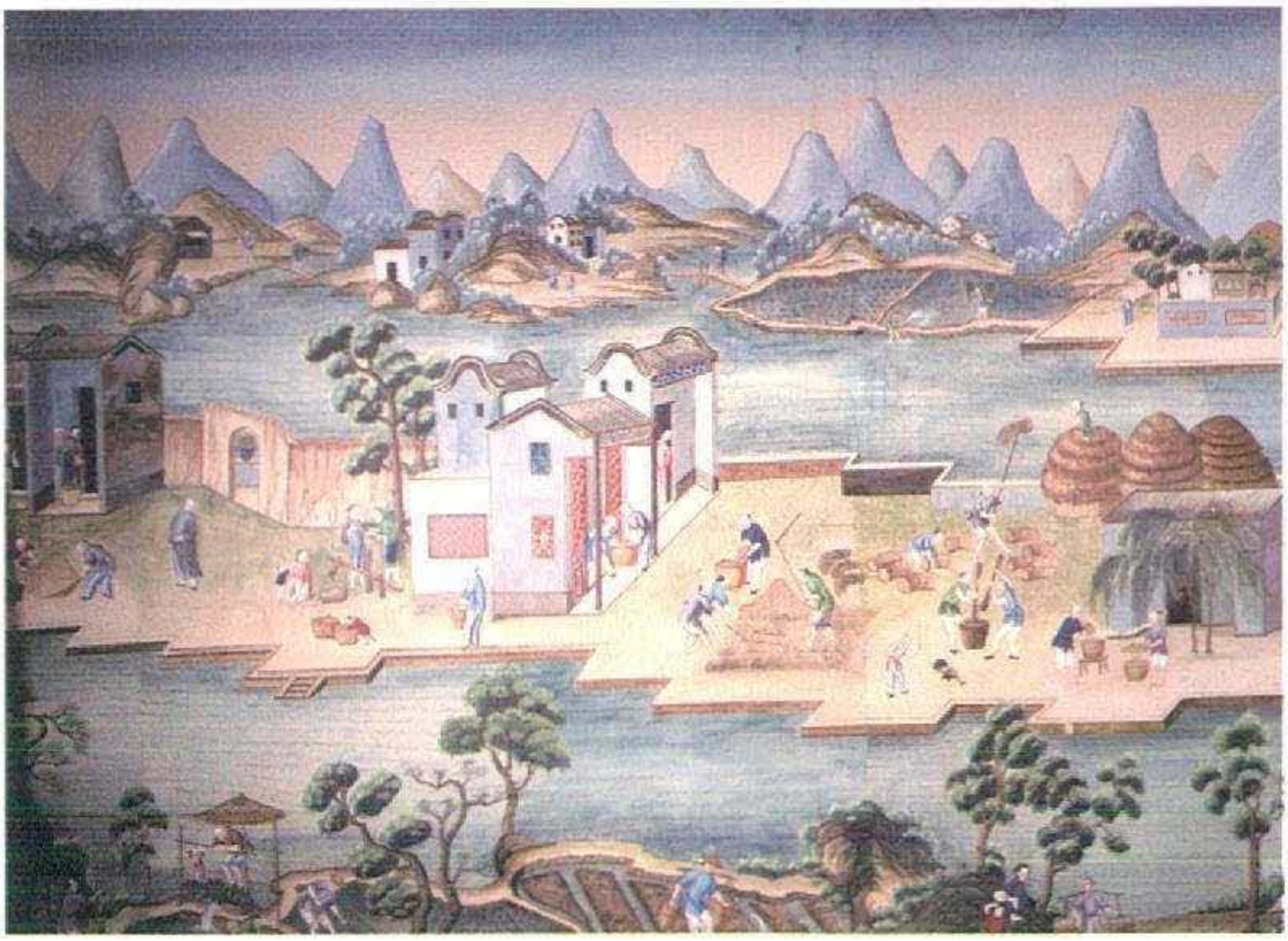


VI. A. 本内特绘
18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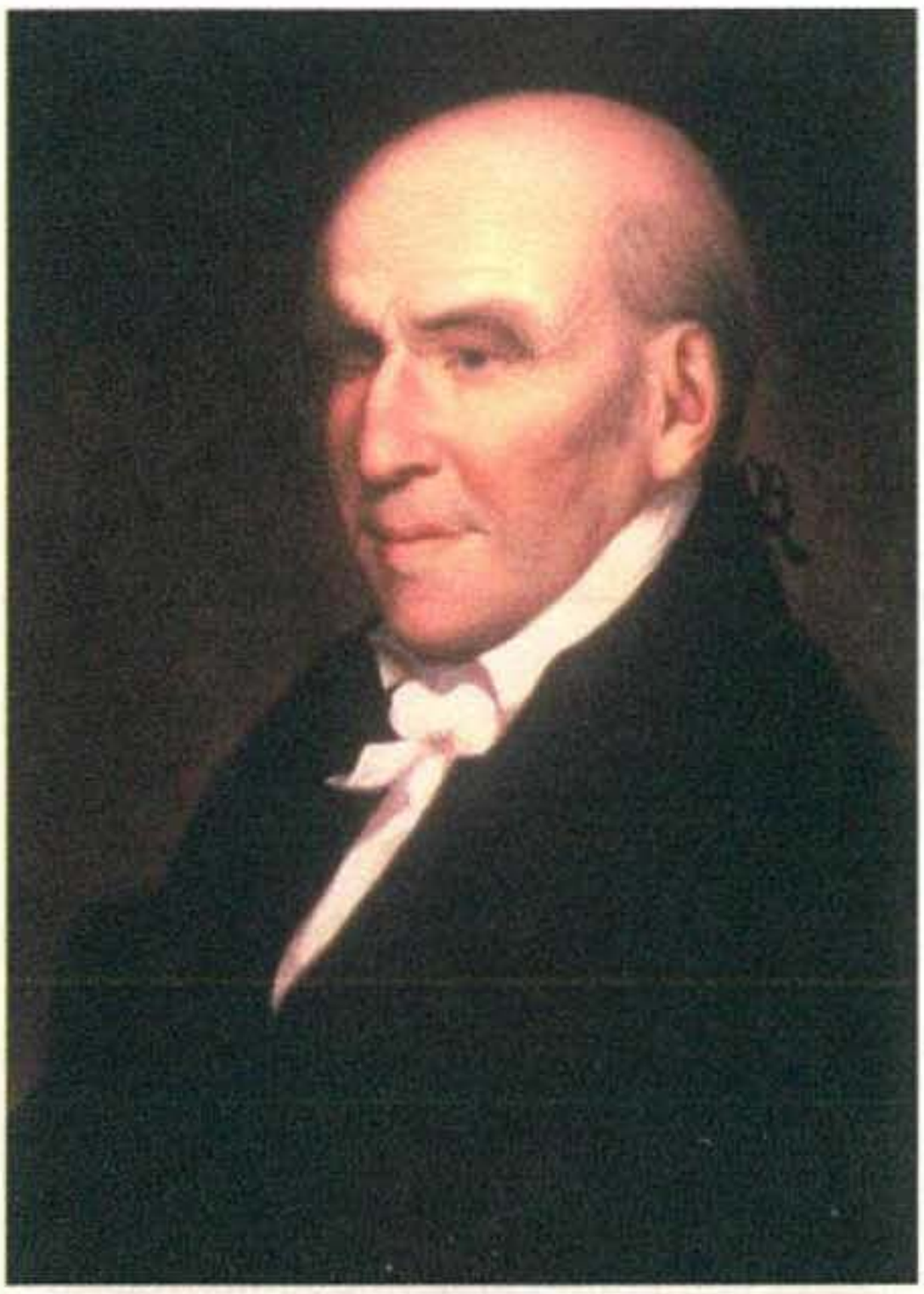


花旗参和夜鹰　M. 凯茨比绘　174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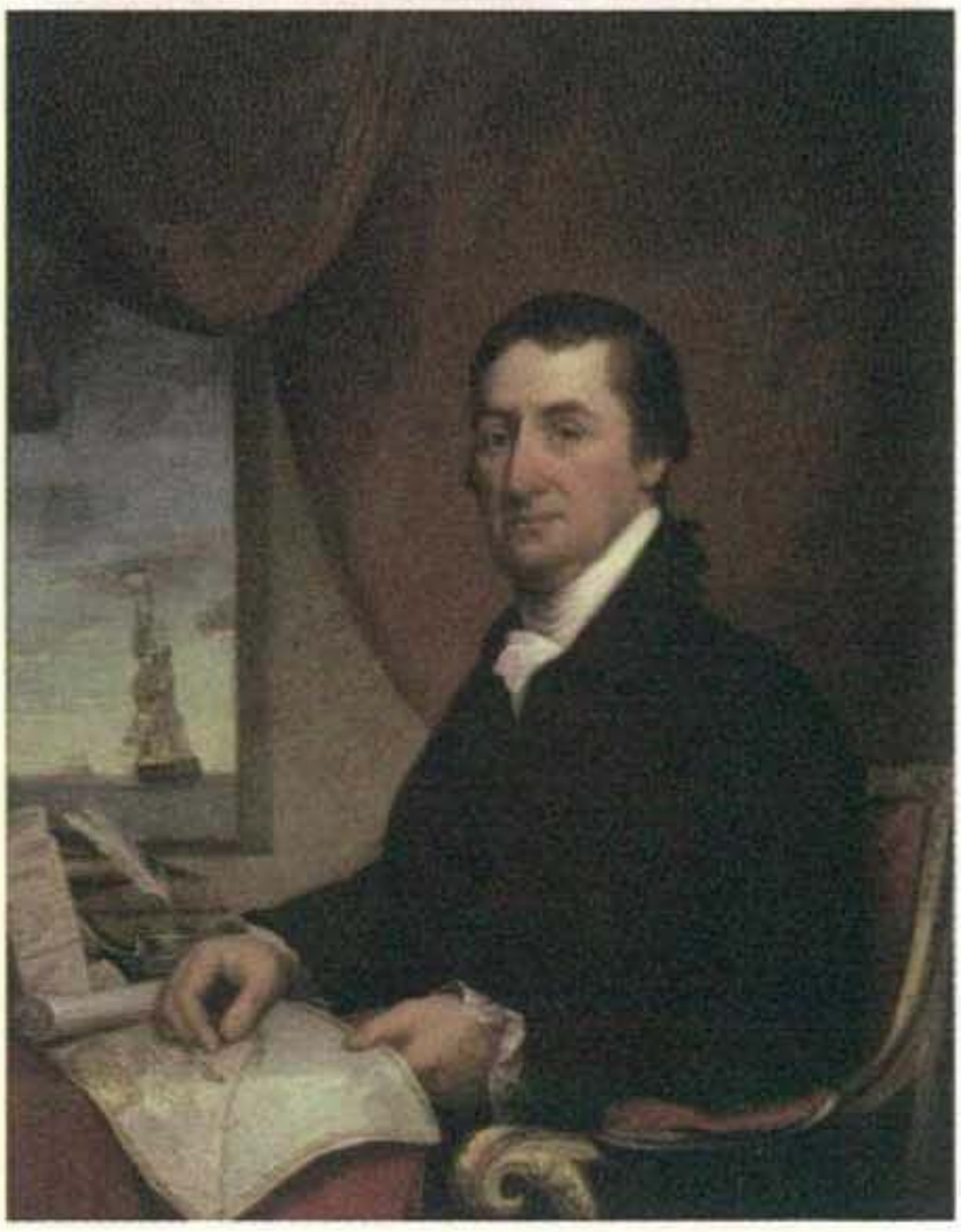
R. 莫里斯
C.W. 皮尔写生　1782 年



关于稻米种植的
手绘墙纸　中国制
约 1784 年
由『中国皇后』号带给 R. 莫里斯



S. 吉拉德
B. 奥提斯绘　183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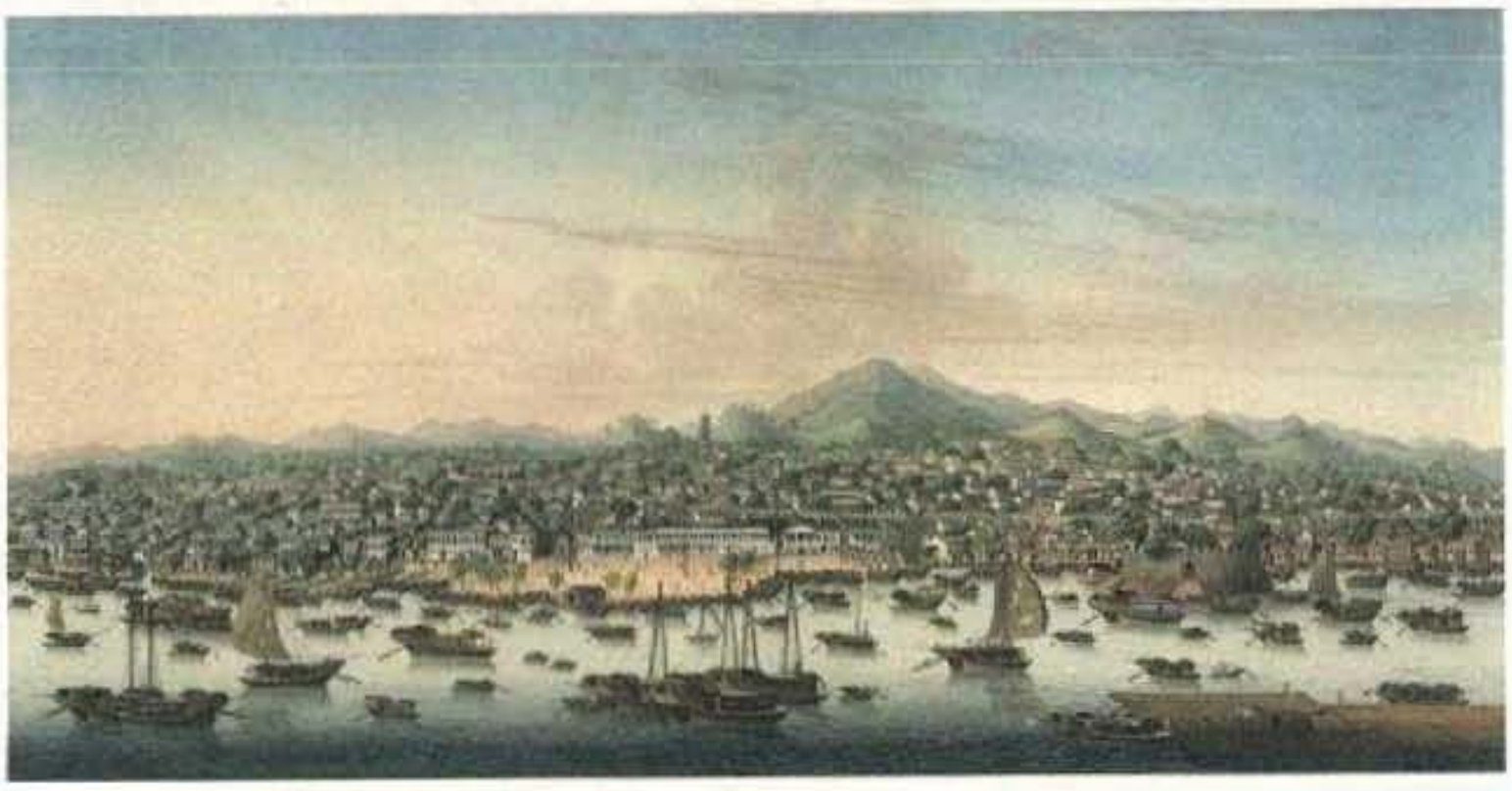


E.T. 德比
T. 弗洛辛汉姆绘　二〇世纪早期

『埃及艳后』号
G. 罗普斯绘　18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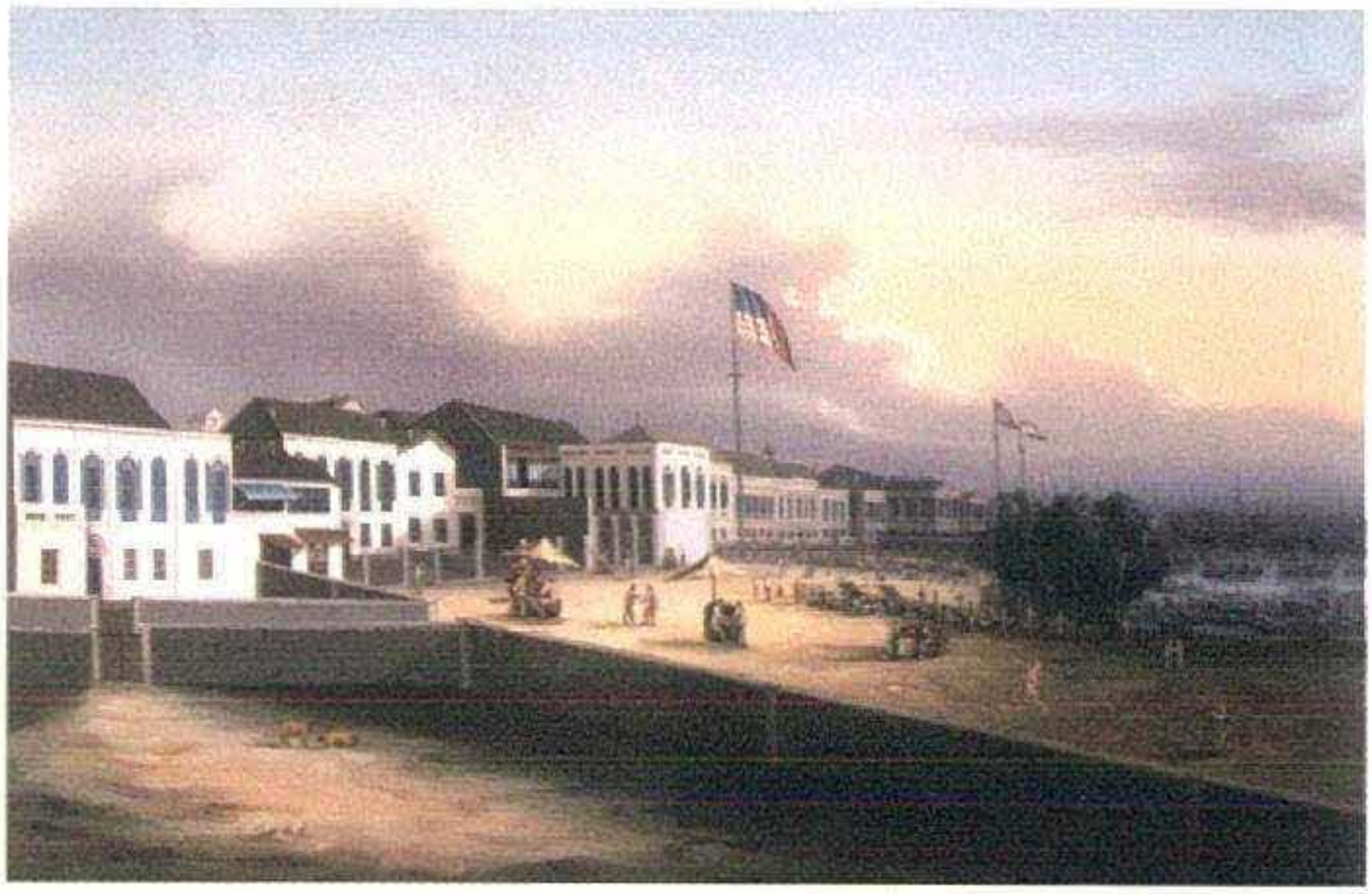
澳门南湾风光
中国画家（佚名）绘　约 1830 年

黄埔港
关联昌绘　约1845年



广州　前景为夷馆
中国画家（佚名）绘　约18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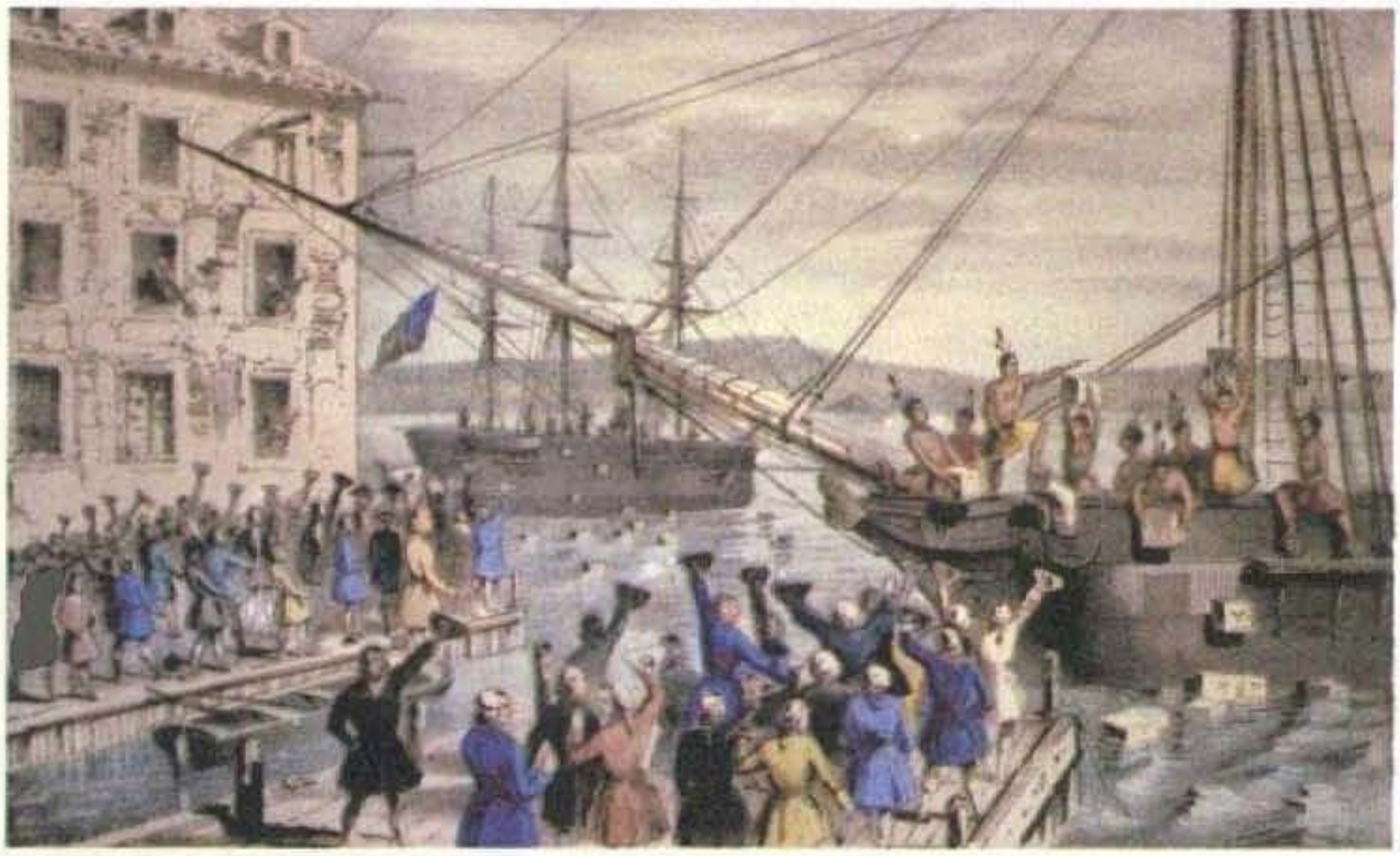
广州的夷馆
中国画家（佚名）绘　约1805年



广州夷馆风景
美国馆居中
关乔昌绘　约1835年

R.B. 福布斯船长
关乔昌绘　约18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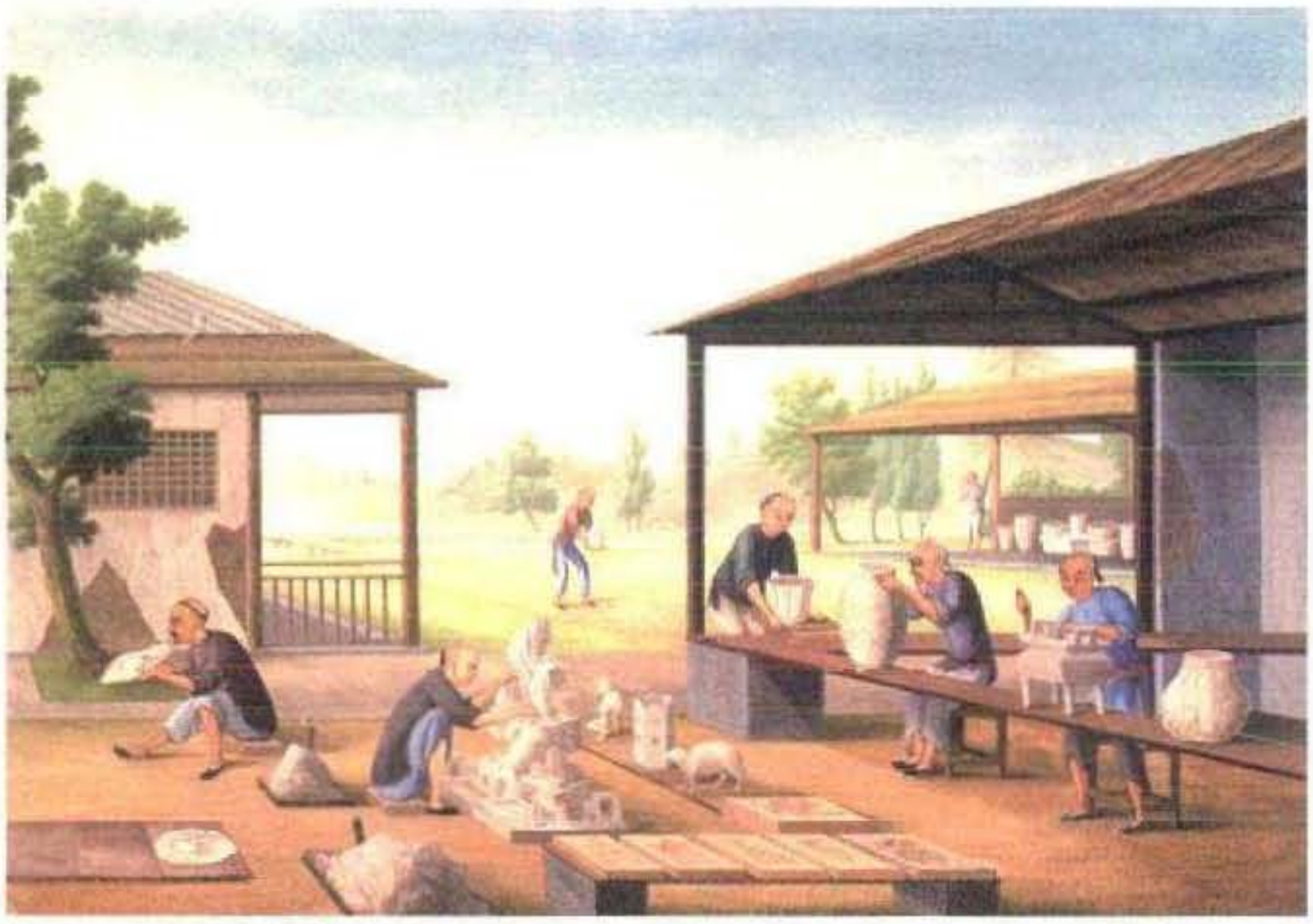
伍秉鉴
关乔昌绘
19世纪早期



1773年12月16日
波士顿茶党
和画面相反
事件实际发生在夜间
人群安静
Z·科利尔绘　1846年

广州
工人将茶叶箱搬上舢板
关联昌绘　1855年
背景中的『闪耀』号
由R.B.福布斯开往广州
是第一只进入中国沿海的
明轮蒸汽船

广州的茶仓
中国画家（佚名）绘　1820~18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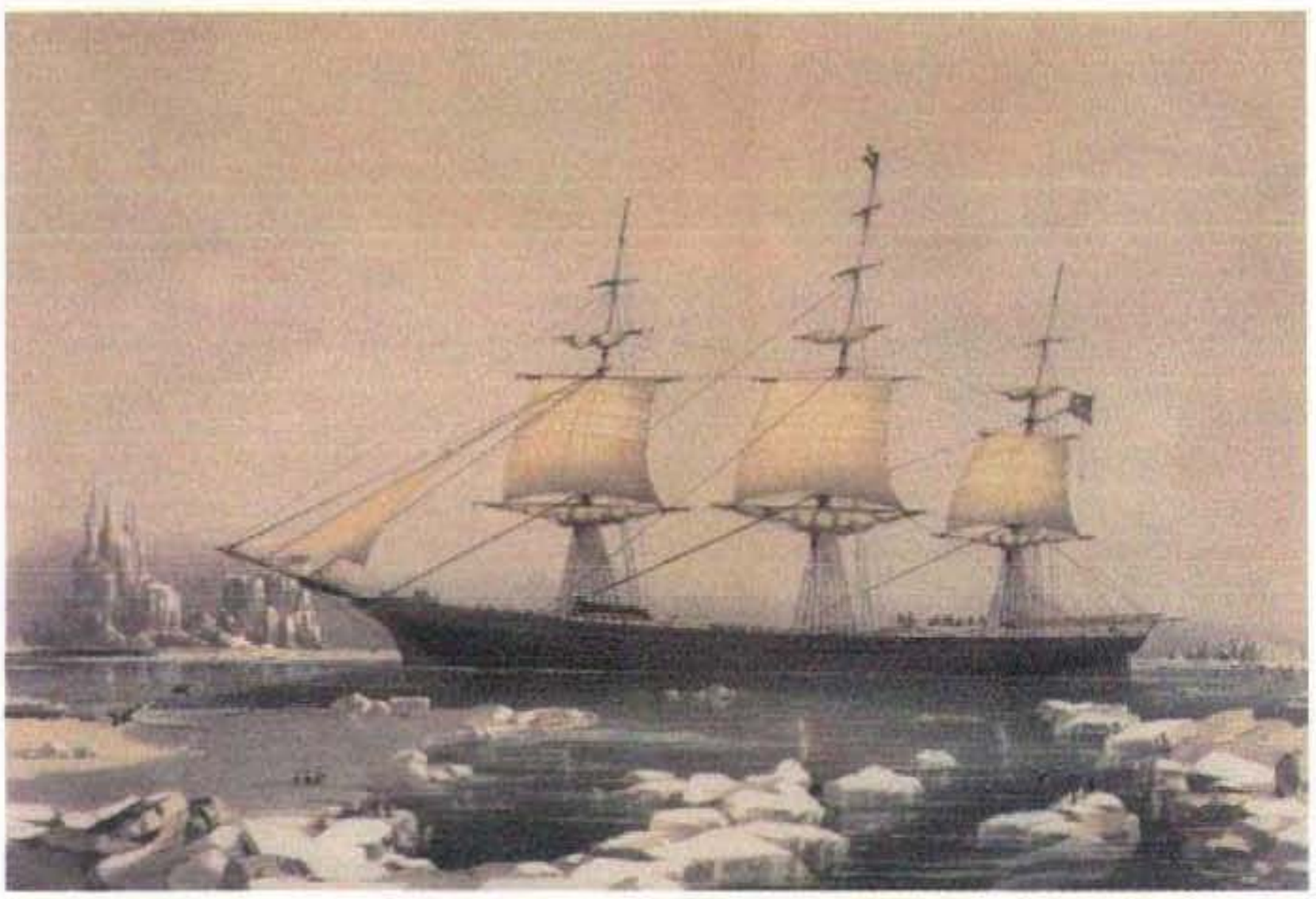
瓷瓶与塑像的手工成型　约 1825 年

1822 年大火中的广州夷馆
中国画家（佚名）绘　约 1822 年

约翰里特·罗伊
C. 钱纳利绘 18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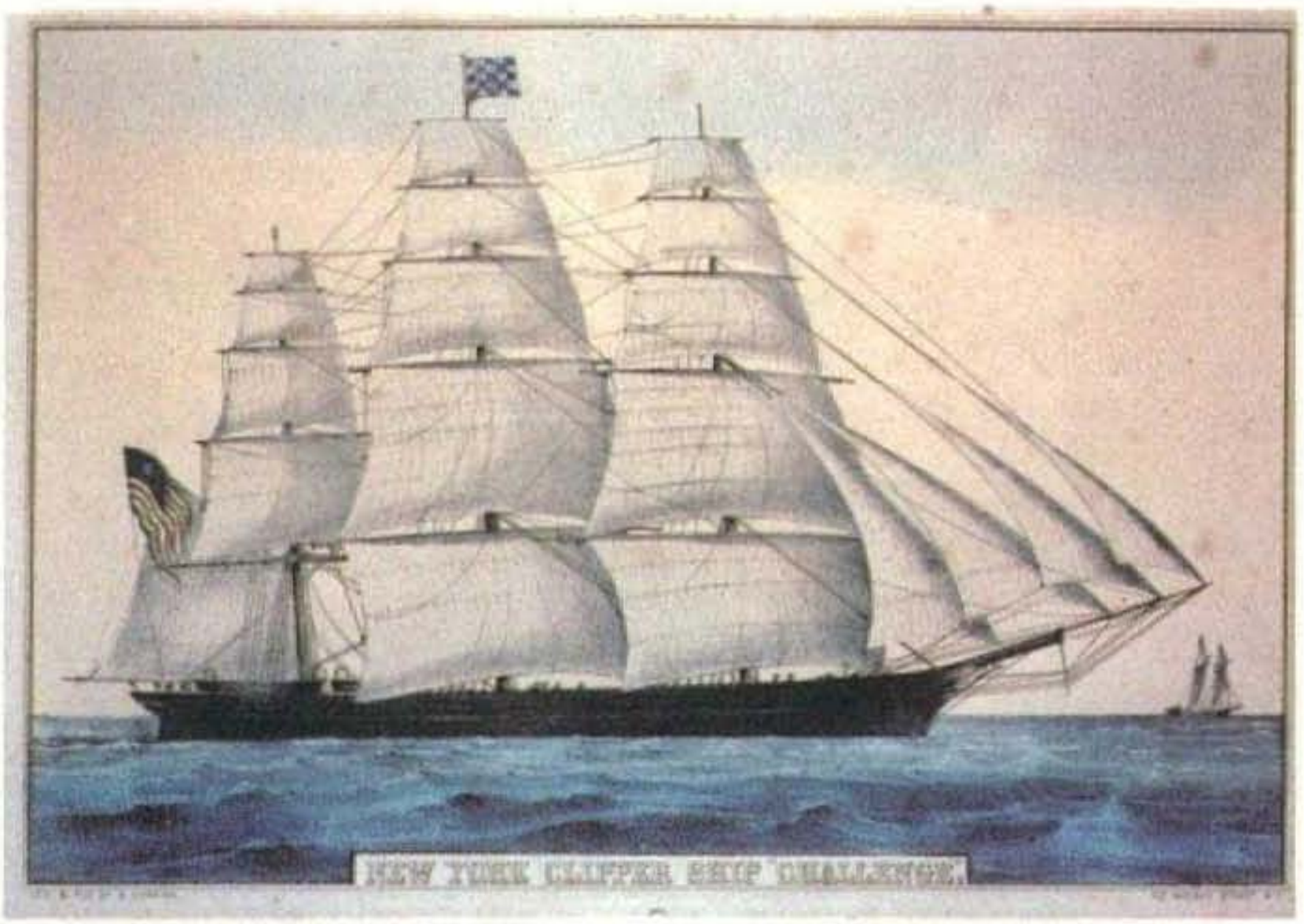
道光皇帝

为裹脚妇女设计的丝绸鞋形成所谓的『金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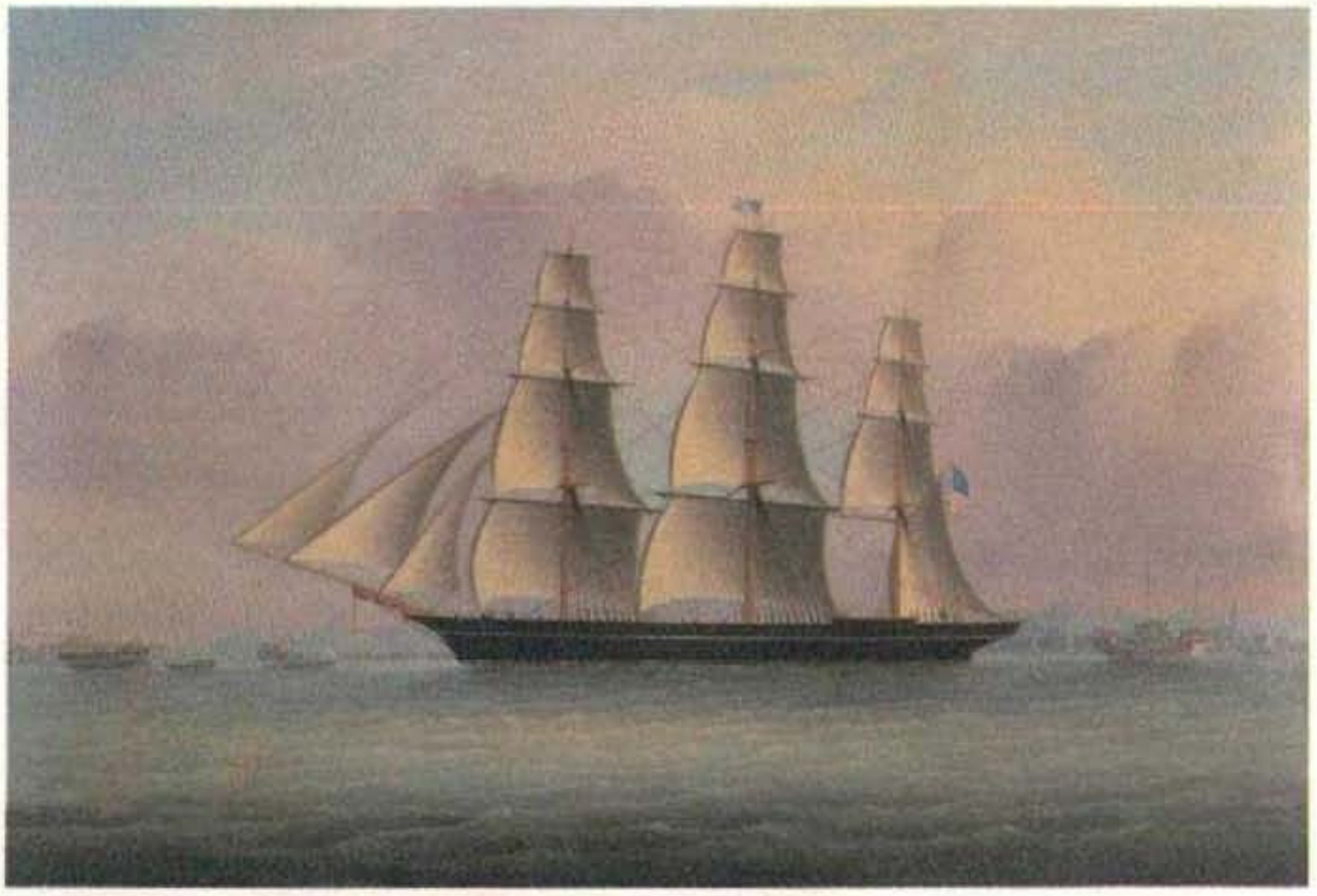


飞剪船『红杰克』号在霍恩角附近的冰块中　约1855年

上海中国画家（佚名）绘　约18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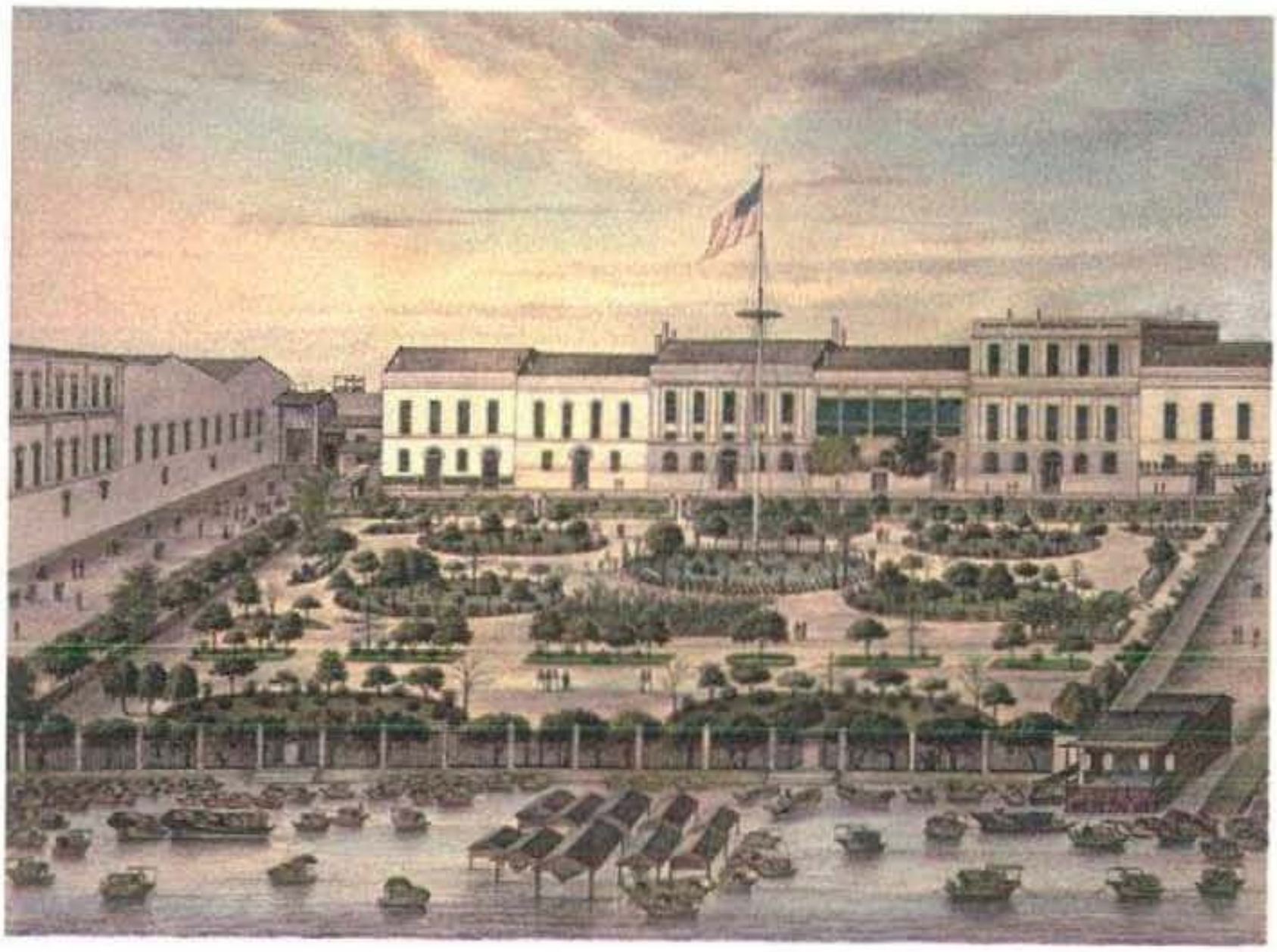


纽约飞剪船
『挑战』号
Z. 科利尔绘　1850 年



停泊在黄埔的飞剪船
『海巫』号
中国画家（佚名）绘

茶叶罐
中国工匠（佚名）制　约 1850 年



广州商馆美国花园一景

中国画家（佚名）绘　1844~1845 年

马萨诸塞州

米尔顿福布斯之家博物馆

这座希腊复古式宅邸是 1833 年

由 R.B. 福布斯和 J.M. 福布斯

为其母

M.P. 福布斯所建

极有害的产品相比——就毫不奇怪了。加上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极少对进口鸦片感到不安，他们也很诧异何以中国人如此固执地反对鸦片贸易。其实，英美商人明知违反中国法律、戕害中国人的身心，却仍毫无忌惮地长期从事鸦片贸易，原因很简单。正如费正清指出的，“几十年来，这项生意的经济价值让人罔顾道德”。[14] 216

对美国人而言，经济刺激至为重要。毕竟他们远赴中国就是为了取得资力，拿到回到美国的金门票。虽然在生活中，许多商人都格外虔诚、正直，活跃于慈善事业，被当时人认为是高尚之士，不过，一到了中国，他们就会根据另一套规则办事。唐斯认为：“对华贸易商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精明企业家。他们来到广州是为了寻求财富，在中国不择手段，回到美国后再拾起道德。”[15]

如果英美商人还需要自由展开鸦片贸易的其他理由，他们会指出，两国政府都不曾对他们设置任何障碍。英国政府虽曾多次制裁，但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收入，而不是讲原则。[16]至于美国政府，虽然对美国公民参与贩卖鸦片心知肚明，但对于他们是否应该这么做却不置一词。因此，清政府是外国商人面临的唯一政府障碍，但是它禁绝鸦片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事实上，商人们对清政府的这些努力不无轻视，亨德对于当时情况的分析中就很明显：

> 我们一再遭到恐吓，“如果继续贩卖‘洋土’，就一定

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实在无法容忍”。但我们还是继续像往常一样贩卖烟土。我们在伶仃岛的趸船不能再在碇泊所逗留，必须“立即驶入港口，或各自开回本国”。“奄有四海”的统治者虽然慈悲为怀。“但现在不允许再有延迟，巡船将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虽然如此，趸船却从没动过……我们完全和命令反其道而行之，却一切顺利。[17]

就在道光皇帝审度时局之际，外国商人也渐渐明白，既然中国政府对鸦片的打击力度逐年升级，鸦片已绝无可能合法化。大批鸦片走私者和商人被捕，其中一名商人在澳门被施以绞刑，并悬挂两日以儆效尤。清政府还捣毁了黄埔港的一个流动医院，认为这不过是伪装的鸦片仓库。包括一名美国人在内的九名外国烟贩被命令离开中国，虽然并未执行，但传达出的信息很清楚，当局将重典治烟。

虽然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鸦片交易却依然活跃。1838 年 11 月初，一名英国传教士观察到，“即便是深入参与鸦片贸易的商人也惊讶地发现，鸦片需求飙升，当地鸦片贩甘愿铤而走险，试图逃避法律惩罚，用贪污受贿蒙蔽司法”。[18]一个月之后，广州发生了一件事，将围绕鸦片的紧张态势蔓延到夷馆门口。[19]

12 月 12 日午后，一名官员坐在轿中，随同的两名狱卒和少数兵丁带着一个上了枷的犯人来到夷馆前的空地。仆役搭起帐篷，狱卒在地上立起木绞架，一些外国人意识到有事将至。和澳门的那名烟贩一样，公开行刑就是为了向其他商人敲警钟，

只不过这次广州的官员希望更强烈地传达信息，选择这个地点，就是为了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绞刑在即的消息很快在各个夷馆传开，70～80 名外国人组织起来。亨德作为发言人，“反对将这片空地作为行刑场”。官员回答，这片地方属于“天朝领土”，行刑将继续。亨德怒不可遏，指出这片地方已租给外国人，“不允许公开行刑，玷污此地”。一群从黄埔来到夷馆的英国水手义愤填膺，他们冲上前，拉出木绞架，捣毁在地，并用木片击打刽子手和附近的中国旁观者。水手们随后又撕下帐篷，踢打官员，几名外国商人很快介入，拉开了水手。在事态恶化之前，官员和随从迅速携人犯离开，在夷馆墙外处死了囚犯。

一大群中国人目睹了事件经过，官员离开后，外国人认为 219
一切将恢复正常，他们可以回去工作，人群也会散开。然而，人群越聚越多，开始呈包围之势。但并没有任何敌意的迹象，他们看起来只是非常好奇。外国人一再要求众人散去，但无人理睬，几个外国人走进人群，挥着棍子乱打，中国人则投之以石头泥块。

两方对峙的消息传开，有人估计，这时的人群已经聚集了 8000 人，纷纷向前冲，而洋商们则迅速撤退，躲入夷馆中，用煤桶和家具挡住门口。在场的一小队兵丁和巡捕试图稳住局势，但很快被人群淹没，留下外国人孤军奋战。中国人向夷馆投掷杂物，敲碎玻璃，从地上拔起栅栏撞击大门。惊恐万分的外国人手上拿着他们装备的少数枪支，打算一旦人群闯入就开枪

自卫。

美国人认为，要得到营救，就得向浩官通知他们的处境，以便官方介入。因此，傍晚时分，亨德和另一名美国人奈伊沿着夷馆屋顶和后巷进入伍秉鉴的官邸。一进门，他们发现浩官“惶惶不安”，他已经知道了行刑和人群聚集的事，但对于后来的骚乱并不知情。获悉之后，他立刻派了一名听差向广州知府寻求协助。6 时半，外国人终于听到好消息，官员率兵弁到达，已准备好鞭子。人群匆忙离开之后空地一片狼藉，一些人甚至跳进珠江。亨德回忆道，“夷馆门户大开，被困的居住者终于松了口气”。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少数中国人溺水，部分中国人和少数外国人受伤，并无其他人在事件中丧生。

骚乱之后几周，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命令林则徐从此禁绝鸦片贸易。据说道光任命林则徐之时，曾对泣而言：“唉！烟害不除，朕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20]

林则徐马不停蹄，1839 年3 月10 日抵达广州后几天内即发布数份告示，晓谕当地民众不得吸食鸦片，并举报吸食者。他告诫说，对走私者、贩卖者、吸食者都将严惩不贷。为免旁人认为此次行动又将敷衍了事，林则徐宣称“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21]

3 月16 日前后，林则徐草拟了一封信给二十一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敦请维多利亚全力帮助中国打击鸦片贸易。他说，中国皇帝已决定严厉镇压烟贩和吸食者，“为天下去害”。林小心地试探说，“此种毒物似在贵国所辖地方之奸人所制造”。林则

徐错误地认为，英国禁食鸦片，称这表明女王明知鸦片之害。他告诉女王，禁绝鸦片贸易的最佳办法就是停止种植鸦片，并恳求女王不仅停止英国辖地的鸦片制造，也销毁已经制成的鸦片，投入海中。“只要贵国不食用鸦片，而继续制造并诱使中国人购买，就表示贵国王在乎的只是贵国人民的性命，对别国人民全不顾及，只知贪婪获利，对伤害别人漠不关心；这种行为与人道相悖，也不符合天道。”

不知何故，林则徐的这封信并没有送给维多利亚，但当年末，林拟定了另一份类似的版本，并通过一艘英国商船发给维多利亚女王。尽管这艘船后来到达伦敦，这封信却并没有交给女王，或者送达但没有让女王看到。这封信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和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刊出，虽然对后来的事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却得以让人深入了解了林则徐当时的感想。[22]

接下来，林则徐把目光转向行商和外国人。在给行商的一份布告中，他严厉斥责行商未能尽责禁止鸦片贸易。数十年前，行商曾向皇帝保证，不为任何携带鸦片的外国船只作保，并将此等船只遣回所来之地。然而，尽管行商完全知道，大多数洋商都参与了鸦片走私，但没有一个行商真的放弃作保，也没有任何船只被遣回。林则徐痛斥，“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 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

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林则徐指斥行商谎称“以货易货”，但“今计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矣。……该商等藏污纳垢，实堪令人切齿!”林则徐要求行商知会各国夷人，将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林则徐称，“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否则“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

在给洋商的谕令中，林则徐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放缓。林则徐痛斥对方忘恩负义，大皇帝多年来允许他们贸易，购买茶叶和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林则徐要求，“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如果洋商尽数呈缴，出具合同甘结，则可“照常贸易……获利致富”，若执迷不悟，天朝将“一体从重惩创”。林则徐甚至威胁说，“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23]最后，林则徐禁止所有夷人离开广州。

面对突变的形势，洋商们起初不以为意。[24]他们先是决定敷衍以对，告诉林则徐，将在充分考虑要求之后作出回应（但一些洋商根本无意回应，认为林的要求不过是借机敛财）。浩官和茂官恳求洋商至少交出一部分象征性的鸦片示好，洋商们于是呈缴了 1000 余箱鸦片，价值约 50 万元。林则徐不受，称：“其余烟土，尚有数万箱，本官要求全数缴出，尔等视本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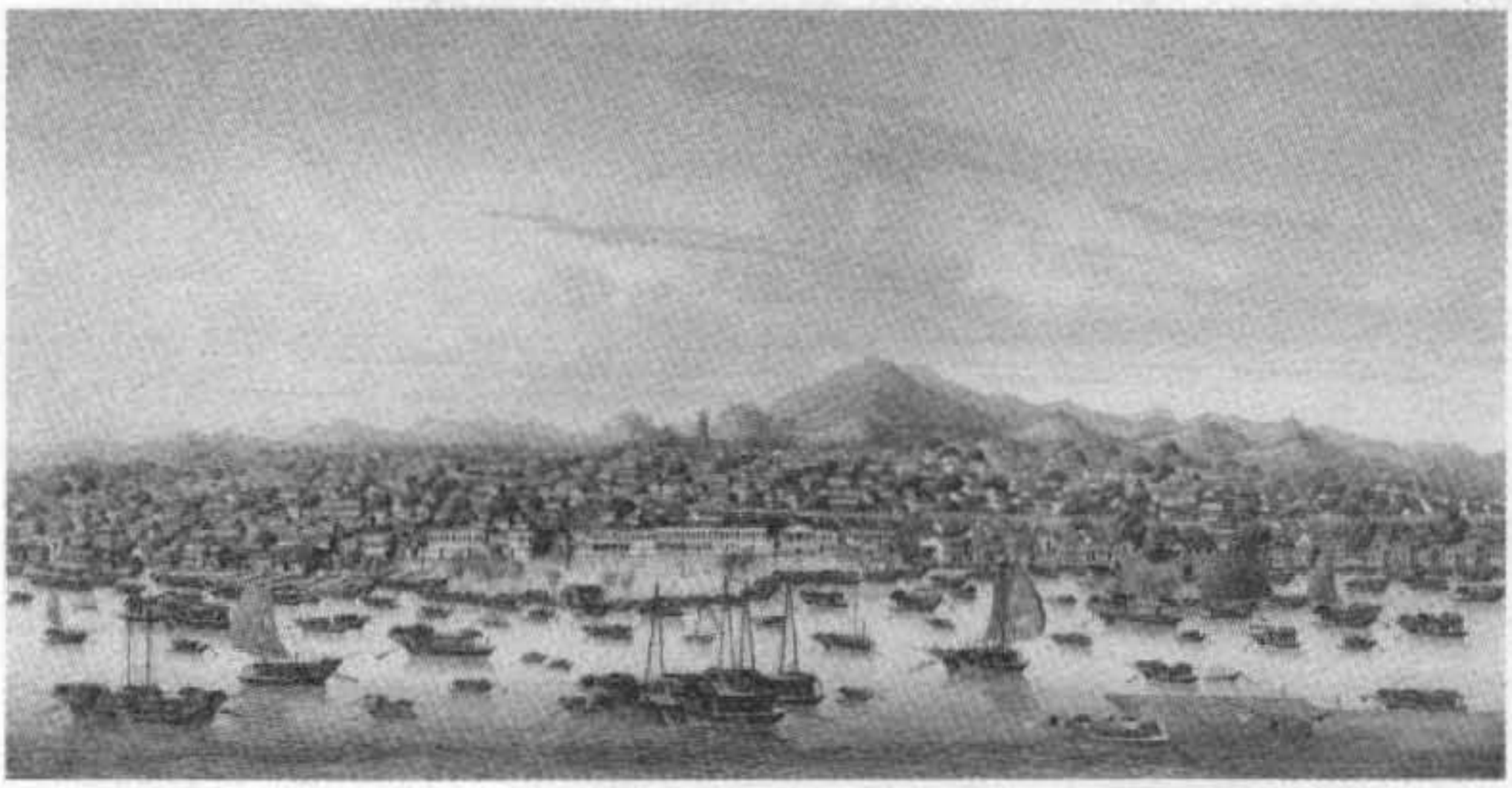
之话耳旁风?”

林则徐要求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前来对洋商的抗 223
命交代。颠地拒绝后，浩官和茂官脖子被套上锁链，狼狈回到夷馆。他们沮丧地告诉颠地，此事全因他而起。“昨晚我们向林大人报告你没有遵命前来，他将我们贬职，套上了锁链。还威胁我们，如果今早你再不去见他，他就会把我们中的两人处死。浩官的儿子已经被捕入狱，鳖官也是。”[25]而在此之前，随着义律（Charles Elliot）1839 年 3 月 24 日到达广州，谈判出现了新的转向。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 1833 年终结之后，议会任命了一名驻华商务总监负责广州的贸易。这个角色的职权范围并不明确，但总体而言，他需要统摄英人在华的活动，并作为商人和中国政府间的联系人。林则徐的命令下达时，义律身在澳门。一到广州，义律旋即成为洋商和林则徐之间的主要谈判人。甚至在抵达广州之前，他就已经断定，形势过于危险，决定让所有英国人立即离开夷馆，去往澳门。林则徐的严厉要求和对广州洋商的限制，加上中国军队和水师的集结，都促成了义律的决定。除此之外，大约一个月前发生的另一事件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2 月 26 日，下午 5 点 30 分，太阳刚要落下，许多外国人在江边散步，或在江上划船，突然间 100 多名兵丁和少数官员快速进入小广场。十分钟不到，他们就在美国夷馆前竖起了木绞架，绞死了一名中国烟贩，然后收起绞架离开现场。整 224
个事件如此之快，以致洋商根本无暇介入。当天晚上，愤怒的

外国人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示抗议。[26]

这些事件令义律抵达广州后很快便采取行动。他立即向广州地方官呈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信函，要求对方提供通行证，以便疏散英人，结果却是火上浇油。林则徐认为，如果一旦放任英商离开，便无法要求他们遵守谕令，于是决定围困洋商。林则徐下令，暗中撤走在商馆工作的800余名中国人，包括厨子、仆役、买办、通译。关闭夷馆周围的商铺，派兵封锁商馆出口，并迅速立起砖木路障。此外，商馆前的广场布满了持矛执盾的守卫，珠江边也用杂物堆起隔离带，封住逃离路线。广州的所有贸易陷入停顿。义律被林则徐的行动震惊，再次致函，放低姿态，但钦差不为所动。他坚称，只要洋商交出鸦片，就可以重启贸易或离开广州，否则绝不放松。



广州，前景为夷馆，中国画家（佚名）绘，约1800年

面对僵局，义律只得妥协。他未与英商商议，即同意交出20283箱英国人拥有的鸦片，总值大约1000万美元。这一数字是英国商人控制下的鸦片数量，构成当时这一地区所有外国鸦片的大宗（20283箱中，大约1500箱是在美国人的船上，但所有权并不在美国人，他们只是受雇帮英国和印度商人运输）。为获得英商的支持，义律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会赔偿损失，尽管他并无权做此承诺。

接下来的六周里，这批鸦片分次交给林则徐，而洋商依然被困于商馆。其中有些时间，他们得自己动手从事原先中国仆人承担的日常事务。有些人认为这是极大的羞辱。美国领事士那（Peter Snow）就说，“在我有生之年，不曾拥有一磅鸦片的公职人员竟被围困，被迫去做女仆分内的杂事，这真是够糟糕的”。[27]其他人则想办法苦中作乐，美国人甚至“烤阉鸡、煮鸡蛋或马铃薯，与其说是诉苦，不如说是好笑”，但烹调的结果却并不总是可口。一个美国人把“面包烤焦，又把鸡蛋煮成硬邦邦的葡萄弹”之后，放弃了这份工作，被安排了摆餐桌布的工作。[28]

由于对外国人的围困事出突然，未有警告，洋商们也就不及储备食物。虽然开始时口粮不多，但还不至挨饿，事实上还有许多东西可供食用。伍秉鉴的仆人还秘密提供粮食给美国人，英国人也有自己获取食物的渠道。如福布斯所说，外国人“在几个星期的围困之中，由于吃得过饱和缺乏活动受的罪，倒比由于短缺生活必需品所受的罪为多”。[29]

娱乐方面，男人们玩起了竞走和板球比赛，甚至围猎这片地区的狗和老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吃了这些猎物。每次送来一大批鸦片后，林则徐就会将管制放宽一些，少量派回一些中国仆役，也允许运进一些粮食。到5月5日，大多数鸦片已经交毕，林则徐解除封锁，所有外国人都获准离开，除了被认定为主要走私贩的16名洋商，他们得等到5月24日，即最后一批鸦片交出后才能离开。

林则徐初战告捷，接下来就是要处理这些棘手的鸦片。林则徐安排了500名劳力在珠江口以北6英里的地方挖了三个销烟池，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池底铺石，四周钉板，灌满淡水。6月3日开始，近300万磅鸦片陆续被投入池中。鸦片丸被压碎后倒入池里，与盐水和石灰混合，直至烟土溶解。待退潮时，再将池水送入大洋。所用人夫仅穿短裤，以便停工放出时一同搜检，确保无有夹带。曾有一人偷藏鸦片，被发现后现场斩首。

虽然林则徐对销烟一事颇为满意，但也担心将烟土倒入海中会激怒海神。因此，林则徐专门写文祭海，以表歉意，销烟开始几天后，林又宣称，“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整个销烟过程历时近三周，其间中国人纷纷前往虎门观看。林则徐上书皇帝写道，“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端节前后愈见其多，无不肃然懔畏。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30]

林则徐认为，鸦片交出后，事情即已解决，洋商会具文切结，保证再不夹带鸦片，也可重开广州贸易。美国人很快具结文书，特别是旗昌洋行。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旗昌由于担心林将厉行禁烟，认为他的措施将使鸦片生意危险重重，声名狼藉，因此已经全身而退。[31]现在，其他美国公司也紧随其后，纷纷签署保证书。不仅如此，一些洋行在对华贸易的立场也为之一变。在林则徐解除对夷馆的封锁后不久，许多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写信给美国国会，称“我们不希望看到鸦片贸易死灰复燃。对于中国人，鸦片带来深重恶果，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更令外国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降低三分……我们都迫切希望中国的鸦片进口和吸食彻底结束”。鉴于他们过去的言行，这种态度剧变背后的动机很值得怀疑，但姑且如此，这确实是当时多数美国公司采取的立场。[32]

关于林则徐的措施，自我感觉良好的英国人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于销烟前后的事态，他们不以为耻，而是愤愤不平，拒绝具结，义律要求所有英国商人退出广州城，船只也离开黄埔。英国人撤至澳门，义律恳请美国人也同行。据福布斯回忆，义律说，“如果你的洋行不在了，所有财富也就付之东流，我们应该立刻让这些无赖的中国人就范”。福布斯说，自己“来中国不是为了健康或享乐，只要还能卖出一码货物，买进一磅茶叶，我就会坚守职责，我们美国佬可以没有女王来赔偿损失”。义律十分惊讶，问福布斯是否愿意套着枷锁做生意，并告诫他，广州的局势很快会升温。福布斯针锋相对，回答道，“枷锁是

虚构的，对选民的义务和佣金账户却是实在的”。如果英国人在广州挑起事端，福布斯说，自己就会去黄埔，一步一步后退，但只要能找到生意对象，还是会继续买卖货物。[33]

事态果然迅速升级，但受影响的并非美国人。[34]义律认为，英国人可以在澳门卸货，就地交易，但被林则徐拒绝。义律命令英国船不得进入广州，激怒了林则徐。7 月 7 日，英国水手在香港九龙醉酒闹事，打死一中国村民①。林则徐要求交出“凶手”，但义律根据英国自“休斯夫人”号事件的教训，拒绝向中国人交出任何被指控杀人的英国公民。相反，义律在一艘英国船上进行审判，认定五名水手是闹事而非杀人，判处监禁和罚款。盛怒之下，林则徐切断对澳门英人的一切供给，要求所有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离开，并派出士兵驻扎在澳门附近的半岛，不时上街巡逻。到 8 月底，义律担心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在澳英国人的安全，将他们疏散到香港附近的船上。根据《中国丛报》的记载，离开澳门的“小船队包括小船、纵帆船、西式中国三桅帆船，挤满了乘客，缓缓从港口离开，场面令人动容”。[35]

作为回应，林则徐发布公告，号召沿海人民：

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将其

① 林维喜。——译者注

俘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准其饮用。[36]

9月4日晨，义律向九龙的中国官员提出抗议，“数千名英国人被剥夺了基本的食品供应，如果现状继续，必定纷争频起”。[37]当天下午，英国人获许在九龙购买食品，但当地人送货时，被中国水师船逼迫返回。义律警告当地官员，在半小时内送来补给，否则将命令刚到达的英国战舰击沉中国船。半小时后，命令发出，双方交火。中国水师不敌对手，一名英国水手记录，“（水师船）甲板上惨叫连连，令人心悸”。[38]随后几天，中方放行粮食运输。

接下来的数月中，情势依然紧张。林则徐仍坚持英方须交出士兵受审，但义律断然否定。林对义律软硬兼施，先是要求具文切结，后称英国如不签署，可在虎门口外穿鼻进行贸易。但这一新安排尚未谈妥，一艘来自加尔各答的英国商船就自行签署切结书并前往广州，令义律大为恼火，而穿鼻协议也不了了之。毕竟，在林则徐看来，如果一艘英船同意具结，所有英船也都应一体遵循。10月26日，林则徐通知义律，如果不交出肇事水手，将派出水师船和火船前往香港，摧毁英国舰队，武力抓捕水手。

义律的回应是，让“窝拉疑”号船长史密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防止任何英国船只进入广州。史密斯于是命令“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一起开往穿鼻，守候在珠江入口。11月

2日，史密斯和义律看到一艘巨大的中国水师船出现在附近海域。这是关天培率领的16艘战船和12艘火船。史密斯让一名水手呈递一份信函给关天培转交林则徐，要求撤回摧毁英国舰队的宣告，允许英国人在沿岸生活，不受骚扰，并能随时获得必需品。第二天，关天培交回了原封不动的信函。同时，另一艘英国商船“皇家撒克逊”号自澳门驶来。“皇家撒克逊”号也签署了切结书，正欲北上广州。史密斯向“皇家撒克逊”号发炮警告，阻止其离开。随后，史密斯再次致函关天培，要求中国水师退后，但关天培并未照做，而是调整舰队位置，结果英军认为中方意在威胁。中午时分，史密斯经义律同意，命令英船开火。

随后战事呈现强弱分明的态势。英国军舰驶入中国船队阵中，猛烈炮击，32英里外的广州都可听见。4艘中国船只沉没，其中一艘帆船的弹药库被射中并起火爆炸。其他船只也严重受
231 损，15人阵亡，多人受伤。由于中方火炮往往射程过远，英国舰队损失较小，只有主桅和帆破裂，一名水手受伤。三刻钟后，中国残余舰队撤退，史密斯也开始回航。义律称这次海战是“两国交往史上，英国海军和清军迄今最严重的冲突”。[39]

穿鼻之战后几周，义律告诉林则徐，他们将不允许其他英国船只进入珠江。林则徐则“永久”禁止英国人参与广州贸易。[40]但所谓禁止只是徒有虚名。英国人于当年初退出广州贸易后不久就遇到问题。他们有大量货物交易无门。如果不能卖出，就无法得到国内所需的茶叶和丝绸。这时，美国人乘虚而入。

具结承诺不带入鸦片后，美国人获得了继续交易的权利，因此有条件成为英国人的中间商。

只要给一笔不错的费用，美国人就愿意去停在香港的英国船上接货，运到广州，完成交易，并把购买的商品带回给英国人。他们也往来于英属印度与广州之间贩运货物。新的安排非常顺利。8 月份，福布斯写信给妻子说，“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收获甚丰，我希望英国的船只被禁得更久一点”。[41]运货的收入非常之高，以至于美国船只在英国人和广州之间运一趟货，甚至比往返于美国和中国更有赚头。义律曾经批评过美国人没有像英国人一样撤出广州，现在却称赞他们留下。在 1839 ~ 1840 年的交易季结束时，义律说，“尊敬的福布斯，女王陛下十分感谢您没有采纳我离开广州的建议。我们卖出了所有货物，也买到足够的茶叶和丝绸”。[42]不过，也不是所有英国商人都对美国人的意外之财处之泰然，有人就评价说，“我们在这儿吹响号角，他们却在那里挤牛奶”。[43]

英国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也不只是茶叶和丝绸，还有大量白银。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卓有成效，严厉打击了当地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到 1839 年夏天，他已逮捕了 1600 名烟贩或吸食者，查没了 5 万磅鸦片和 7 万杆烟枪。[44]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禁绝鸦片交易。英国人（有时打着美国国旗掩人耳目）在沿海的活动依然故我，他们和走私贩一起输入鸦片，将白银运回船上。虽然地方政府的控制坚决而有效，但鸦片还是继续流入中国，不过数量已有所下降。[45]

就在美国人为英国人充当中间商和英国人在沿海交易鸦片的同时，几千英里外的伦敦发生了几件大事，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贸易的轨迹也将因此发生巨变。

林则徐禁烟之时，义律曾多次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Lord Palmerston）致信，敦促巴麦尊采取行动。1839 年 4 月初，尚被围于广州时，义律写道，“阁下，在我看来，对这些不公平的暴力行为，应当迅速给予沉重回击”。[46]为促使政府行动，广州的英商筹集了 2 万元，在伦敦开展大量游说，包括在报纸上登出他们的说辞，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对于鸦片贸易败德的一面，自有传教士协会出面，政府无须多虑，而应当多注意保护在华的英国公民、英国的荣誉和英国贸易。[47]

从 1839 年夏末到 1840 年初，随着有关广州纠纷的报告流回伦敦，媒体的报道也越加密集。商人们要求政府赔偿损失，不光是由于义律曾经做此许诺，还因为政府长期准许鸦片贸易，因此要对商人的生意承担主要责任。一些人认为，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孟买的一名记者写信给《泰晤士报》称，“可以肯定，除非教他们学会尊重，否则我们在中国贸易的基础永远也不会稳固；而现在看来就是合适的机会”。也有一些报道关注鸦片贸易罪恶的一面，认为出于道德考虑，英国应当立即退出这项不光彩的交易，《泰晤士报》称“无论是在原则上、情理上还是私利上，从事鸦片买卖都是站不住脚的”。[48]

与此同时，英格兰也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形势的小册子，其中一本是 A. 提沃尔（Algernon Thelwall）牧师所写的《鸦片

贸易在中国之罪恶》（*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这本书主要是长篇节选已出版的材料，提沃尔抨击了鸦片对中国人的有害影响，哀叹“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系统、长期地参与这项害人的生意”。他说，结果使得“在东方国家眼中，英国国格贬降，声名狼藉，自取其辱”。提沃尔希望，政府、商人和所有良善的基督徒反对这一“邪恶的走私”。[49]另一份匿名的小册子（很可能是鸦片商出资编写的）则称，英国应当要求中国赔偿销毁的鸦片，为“扣押和围困英国人、侮辱国家荣誉”付出代价，占据伶仃岛，迫使中国签署商业协定，保护在华英国居民免受“侮辱和攻击”。为达到这些目的，小册子的作者建议英国派往中国的使节应当“配有一支能夷平虎门要塞、摧毁广州城的军队”，如果有必要的话。[50]

然而，对于政府将如何回应中国的局势，所有报道和小册子却都语焉不详。而在幕后，已经有人在精心筹划对策，其中，长期参与鸦片贸易的渣甸洋行创办人之一渣甸（William Jardine）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鸦片商最主要的游说者，曾在向中国官员抗议时，多次被围观者以石击头，却面不改色，因此被当地人称为“铁头老鼠”。渣甸曾与巴麦尊有过多次会面，向外相提供过有关广州事态、中国地理和政府的信息。他说，“如果女王的大臣们决定要求赔偿”，武力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他也就合适的赔偿提供了建议。与他配合的还有各个商行和商会发出的大量信函和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他们在广州的雇员，并维护对华贸易本身。如果这些还不足以

让政府行动，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义律曾告诉广州的英商，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作为王室的正式代表，巴麦尊无法轻易绕过义律的承诺，尤其是商人们本身也在敦促政府履行义律订下的协议。然而，英国政府财政并不充裕，仓促之间很难拿出数百万英镑补偿商人被销毁的鸦片。此外，许多英国纳税人并不支持与中国的鸦片贸易，要说服他们“赔偿鸦片走私者的损失，很可能会让巴麦尊沦为笑柄，或狼狈下台”。但巴麦尊和内阁其他大臣认为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中国来赔偿损失，毕竟，他们销毁的是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损失的是英国人的财产。[51]

235

尽管对于鸦片贸易剑拔弩张的形势，巴麦尊身后的辉格党政府曾奉行所谓的不干涉政策，现在终于决定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度。[52]在 1840 年 2 月 20 日给中国皇帝的照会中，巴麦尊表明了英国政府的看法和行动计划，“看来（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一些英国人进行的非法鸦片交易。中华帝国法律似乎禁止鸦片进口，宣称流入中国的鸦片都会被没收”（和其他英国政客一样，巴麦尊熟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法令，了解这才是切中要害之处），并批评中国皇帝未能有效地让自己的臣民遵守法令，却要求外国人遵守，称中国“无权让自己的国民违反法律而免于责罚，而对同样行为的外国人却严惩不贷”。巴麦尊提出，禁止鸦片贸易的规定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而突然间，在没有足够提示的情况下，又开始极为严格地实施”（虽然事实是中国多年来已尝试禁绝鸦片交易，只不过收效甚微）。巴

麦尊称，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禁烟法律落实，就应该从惩戒自己的官员开始，因为是他们让走私行为逍遥法外，甚至暗中相助，中饱私囊，因此难辞其咎。

但巴麦尊也不希望让皇帝认为英国默许鸦片交易。“英国女王希望进入外国的臣民也遵守当地法律，如有违反，女王陛下也无意保护。”（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英国政府一方面长期对英商故意违反中国法律置若罔闻，一方面还笑纳因此流入英国的财富。至于女王希望臣民恪守他国法律，虽大体属实，但显然在中国鸦片问题上却并不如此）[53]巴麦尊补充说，“如果中国政府事先发出通知，决定认真执行帝国法律，查封和没收违法输入中国境内的所有鸦片，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有怨言。中国政府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靠自己的官员这样做。”他说，相反，中国人“并不是查封走私的鸦片，而是逮捕平和的英国商人，软禁他们，撤走了中国仆役的协助，以饿死相威胁。这种对待英国公民，特别是对王室正式代表义律的野蛮做法“违反了国际法”，逼迫英国采取行动。“女王陛下不允许她的臣民在外国受到暴力、侮辱和不公。如果遭遇不幸，女王希望他们能得到补偿。”

在呈送皇帝的照会中以及巴麦尊给义律的私人指示中，都明确阐明了所谓“补偿”的性质。主要的诉求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应当退回鸦片，如果已经销毁，则应该赔偿损失；第二，对待英国政府代表、全权商务代表应当“符合文明国家的做法，并尊重英国皇室的尊严”；第三，中国应当向英国政府提

237 供一处或多处沿海岛屿，作为“英国臣民居留和贸易之所，免受人身干扰，确保财产安全”；第四，英国公民不再只限于和行商交易，而应能在中国大陆多处口岸和任意人等开展贸易；第五，所有合法进出口货物应征收固定的税费；第六，在华犯罪的英国人将按英国法律审理及处罚，而非中国法律（即所谓治外法权）。

尽管英国并未正式向中国宣战，战争还是打响了。巴麦尊的照会是由义律的堂兄、海军上将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的强大海陆军队递交，包括 16 只战舰、载炮 540 门、4 艘蒸汽战船、27 艘运输船、4000 名士兵，全部从印度出发。为确保中国满足英国的要求，懿律获得授权，可以封锁中国港口，俘获中国船只，控制中国领土，“直至英国政府的要求得到完全满足”。至于由谁来承担英国入侵的庞大费用，巴麦尊的照会称，中国需要为此赔偿。

从 1839 年末到 1840 年初，巴麦尊制订政府的进攻计划时，刻意在议会面前隐瞒了幕后情况。他的算盘是等到远征军开赴中国，再进行公开辩论，尤其是，鸦片问题已成为争论的导火索，过早提出这一问题或许会打乱政府的计划。当议会的反对党人提出政府在中国的情况的问题，要求查看和广州事态有关

238 的文件，政府的回应依然含糊其词，并一再推延文件的交付。到了 3 月初，伦敦出现了政府将出兵的谣言，3 月 12 日，在野的托利党党员在议会直接质问政府代表：“有报道说，已经与中国宣战，此事是否属实？”[54]政府的回应是，并未正式宣战，

但已经向印度发出指示，做好行动准备，以备万一。

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消息的传播，这些指示的详情逐渐广为人知，托利党感到，对于出兵保护鸦片贸易和赔偿鸦片商的计划，公众更加不满，公开谴责辉格党政府处理中国局势不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从4月7日到9日，对议会下院的不信任投票持续了三个晚上，其中冗长的演讲持续达数小时之久。[55]托利党攻击的要点在于，辉格党政府连续多年未能控制快速膨胀的走私鸦片交易，也没能向义律提供足够的指示或权力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政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使英国面临如此可耻的境地，敌对情势出现，国家处于战争边缘，与中国的合法贸易也受到威胁。[56]

对鸦片交易不道德的问题抨击最力的是W. E.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30岁的托利党人，他本身就是个能言善辩的演讲好手，后来四度出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对于鸦片问题的关注不仅出于职业，也有个人因素。他的妹妹海伦把鸦片酊当成止痛药服用，结果不幸上瘾。

1840年4月8日，格莱斯顿激烈抨击了战争，他对议员说，“我无法判断战争会持续多久，但我可以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场战争比这次更加不义，给这个国家带来永久耻辱”。他说，英国国旗之所以能让每个英国人充满自豪，原因是“米字旗下，总是正义的事业，保护被压迫者，尊重国家权利，可敬的商业冒险”。但在广州，在巴麦尊的授意下，英国国旗“为保护臭名昭著的走私生意而升起”。尽管格莱斯顿同意，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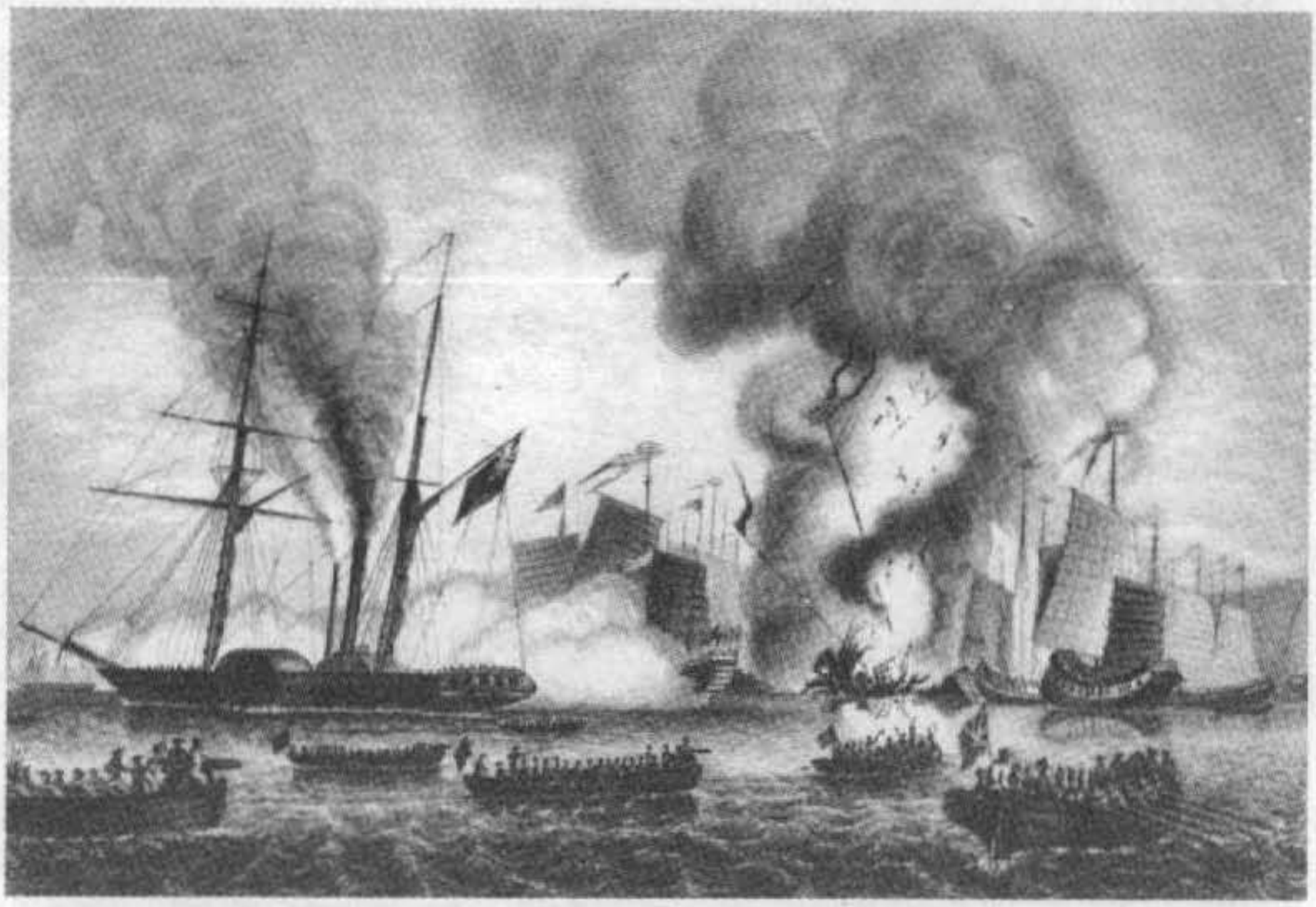
的“措辞荒唐、毫无自尊、行为过分固然有错，正义却在他们一边；这些异教徒和半开化的野蛮人有的是无可置疑的正义，我们虽是经过启蒙的文明基督徒，追求的却是和正义与宗教背道而驰的目标”。[57]

而辉格党则为政府在中国过去的行动辩称，并没有任何办法能避免现状。托利党指责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迫使中国人服用鸦片，战争国务大臣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回应说，“上帝禁止这么荒谬、糟糕的想法进入任何英国大臣的脑袋”。[58]相反，政府坚称动机高尚。与巴麦尊给义律的信中主题相呼应，政府说，英国使节和商人被围困，生命危在旦夕，而英国的妇女和儿童被迫逃往英国军舰寻求保护，当英国人的财产被没收，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保护英国的荣誉和尊严。不信任案投票结束，以9票之差未能通过。进攻中国的计划于是通过。[59]

* * *

1840年6月，英军到达中国海面，留下部分船只封锁广州，其余舰队和义律沿海岸北上，一路封锁重要港口与河流，并占领了舟山岛。[60]8月初，懿律抵达天津白河口，递送巴麦尊的照会。道光帝此时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派出最信任的总督琦善与英国和谈。同时，问罪林则徐，斥责他未能禁绝鸦片交易，将英国人引狼入室。道光谕称，（林则徐）“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61]不久之后，道光将林则徐革职，流放西北边疆。

琦善则告诉英国人，鉴于事端起于广州，也最好回到广州和谈，以便收集争议有关的证据。事实上，琦善只是想让英国人尽可能远离京城。然而谈判在割让香港的问题上破裂，英军于1841年1月7日攻击穿鼻炮台，造成大量死伤。琦善被迫让步，重启谈判，签订《穿鼻草约》（Chuanbi Convention），重新开放中英贸易，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600万银元，两国官方交往对等相待。



1841年1月7日，英国平底船“复仇女神”号在虎门附近击毁中国战船，G. W. 特里绘，G. 格雷特巴奇雕刻，约1854年

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告与琦善达成草约，但两国政府都大为不满。4月份，巴麦尊得知草约内容后，认为义律没有尽力遵守英国政府的要求，用兵不力，获利过少，将义律撤职。 241

草约未能确定固定商品税和废除行商制度，也没能建立治外法权的原则。巴麦尊对赔偿数额尤其不满，认为不足以支付鸦片成本和军费。巴麦尊向维多利亚女王汇报了战事情况，女王写信给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中国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生气……如果不是义律令人费解的举动，我们的所有要求或许已经实现……他完全违背了指示，似乎只求达成最低要求的条款。"[62]而在中国一方，道光认为琦善擅自同意赔款和割让香港，下令革职问罪，后减为流放。《穿鼻草约》被废，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次，英国派出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任全权代表，辅以规模更大的海陆军队，在与义律收到的内容大致相同的指示中，要求璞鼎查与皇帝签订条约。璞鼎查十多岁即从军，在拿破仑战争中崭露头角。1841 年 8 月初，璞鼎查抵达珠江口，发现情况已经恶化。在《穿鼻草约》的起草和璞鼎查到达这段时间里，义律仍然控制大局，直至璞鼎查将巴麦尊的解雇信交给他，义律方才正式知道自己已被解职。在这七个月中，英国和中国再次爆发两次冲突，英军最终摧毁了超过七十艘中国水师船，沿珠江缴获多门排炮，并控制了广州的部分地区。直至义律和中国官方签署草约时，冲突才终于停止，根据协议，中国将向英国赔偿 600 万银元，作为交换，英军将从城市和内河撤出。[63]

璞鼎查到达中国后不久，即率领英国舰队北上。英军装备精良，面对中国守军轻松取胜，在多处造成重大伤亡，并先后

攻占多个港口，包括厦门、舟山、镇海、宁波、吴淞、乍浦和上海。中国官员普遍严重低估英国的军事实力，因此目睹清军节节败退，十分震惊。1839 年林则徐给道光的信中就显示出对英国战斗力的无知，“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一年后，另一名中国官员说[①]，“英夷微不足道，实令人嫌恶，所依者坚船利炮耳；彼等经长途航行，所需之物必定难于供应。士兵一战，即装备尽失，意气消沉，必败无疑”。这位骄傲的官员说，由于枪支离水面太高，波浪将使他们难以对准，因此无法准确射击。因此中国炮台的枪炮可以轻松击毁进犯的英国船只。就算不行，中国人也可以烧船。他总结说，“固非轻敌，亦无足惧之”。[64]

英国人获胜完全在情理之中。中英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英国军队训练有素，指挥得当，补给充足，拥有最现代化的枪支与火炮，而中国军队则久疏战事，组织松散，主要的武器还是弓箭、长矛和过时的火绳滑膛枪。虽然中国水师船体积较大，但所配火炮数量少，口径小，根本不是装有大口径火炮的英国军舰的对手。而铁壳明轮平底船“复仇女神”号更是让英国舰队如虎添翼。这种船吃水较浅，因此能够尽可能接近海岸，利用 32 磅大炮和火箭弹实施毁灭性打击。此外，中国炮台对英国人来说也不足为惧，除了规格较小，由于都被固定，因

① 以下引文未见原文，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持弓的中国士兵，J. 奥克特洛尼绘，约 1844 年

此只能向一个方向开火，如果目标移动，这一缺陷将尤为明显。

更糟糕的是中国军队的落后。由于朝廷数十年忽视军备，军事预算不足，加上腐败丛生，通货膨胀之下军饷多年未变，不仅使得军队战力不足，更缺乏为皇帝而战的动力。中国本来也可以扩大兵力，在数量上压倒对手，从而弥补上述缺陷，但也同样没能做到。虽然清军名义上数量庞大，据说有八十万大军，但实际能投入战斗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而且由于分散于帝国各地，仓促之间无法立刻召集。因此在许多战役中，清军人数相对较少，即便有时人数超过英军，对扭转战局却是杯水车薪。更糟糕的是，在英军发动攻击时，中国军队往往不战而逃。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毫不奇怪，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说："在鸦片战争中，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的大臣，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军队无药可救。"[65]

虽然中国军队对英军未能构成严重威胁，疾病却给英国军队带来不少麻烦。登上中国土地作战和驻扎的英国士兵遭遇恶劣的天气，缺乏新鲜的补给品，结果军中屡屡爆发疟疾、痢疾、发热。例如，从1840年7月到12月，英国的第一支远征军占领舟山岛时，5329名士兵染病，其中448人病死。[66]

1842年7月初，73艘船只的英国舰队开入长江。一名军官对面前的景象惊叹道："这里风景十分优美。扬帆起锚的几分钟内，白云逶迤，在长江远际缓缓升起。水手爬上桅杆松开船帆，操纵升帆索和帆脚索。船顺风前进，密集的桅杆随白云渐次出现。"[67]当月20日，舰队停泊镇江，近7000人登陆，原以为

携先前破城之势，不会遭遇多少抵抗。孰料 3000 名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寸土不让”。最后还是战死于装备更先进的英军手下。[68]

持矛的中国士兵，J. 奥克特洛尼绘，约 18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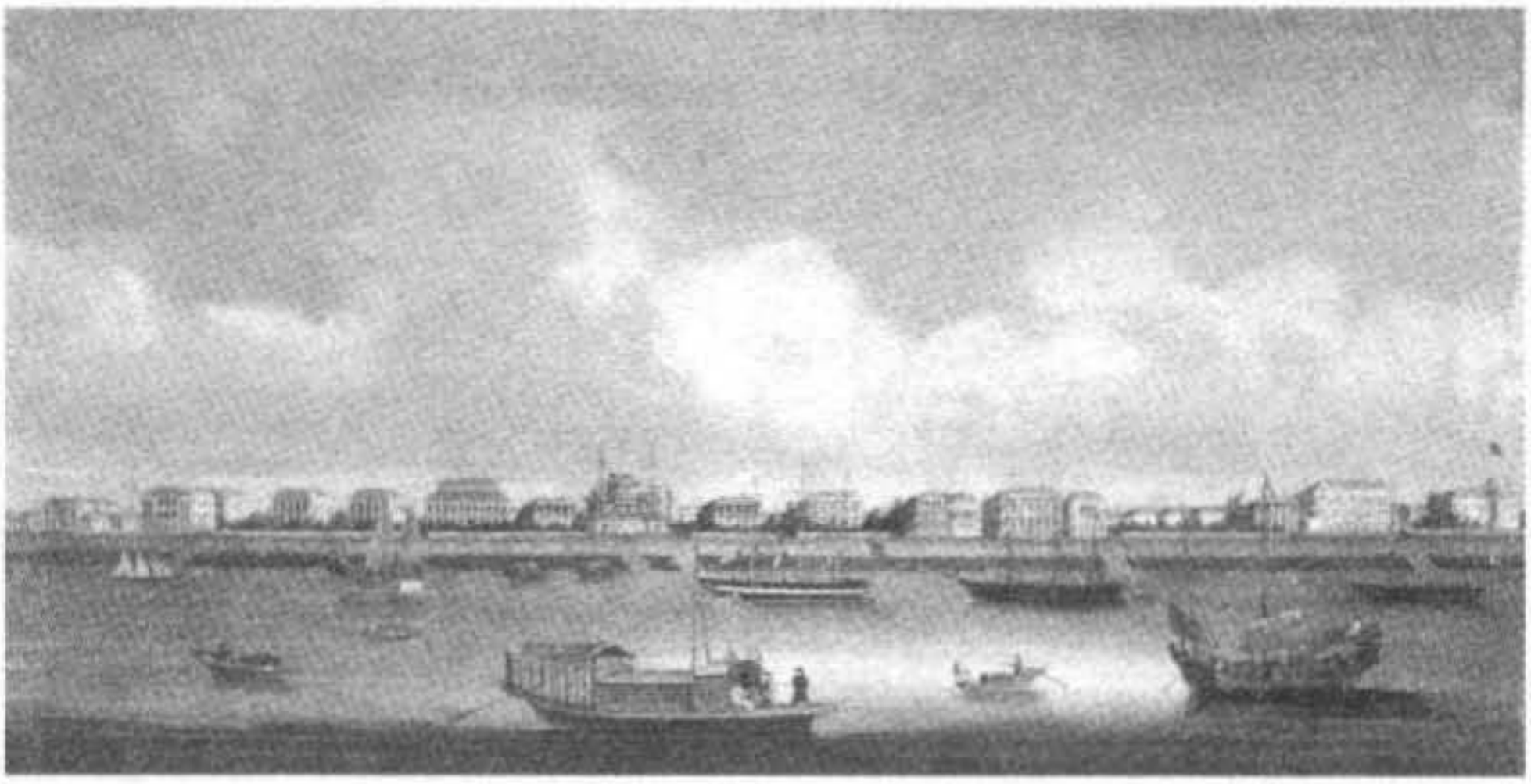
战斗持续大半天后，英国人以损失30人的代价占领镇江。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城中官民看到大势已去，许多人自尽乃至举家自杀。当时一位美国人记录中写道，“许多满洲人关门闭户，但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妇女被割喉，孩童被推入井中……虽然这是出于对入侵者的恐惧和憎恶所为，每个满人都选择抵抗、自杀或反击，绝不投降”。[69]自杀的不仅是城中居民，璞鼎查称，中国都统退回房内，命仆役点火烧房，投火自焚。[70]

镇江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之处。据此战略要地，英军便封锁了中国交通和通信的两条大动脉。随着英国舰队北上直逼前朝国都南京，清廷面临的形势更加险峻。道光对英军一路攻城略地深感恐惧，担心再遭惨败，战火逼近京城，遂命钦差大臣与英军谈判议和。[71]

1842年8月29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所谓的“谈判”很难说名副其实，条约的条款都是英国在枪炮威胁之下口述给中方。英国人的目标终于达到。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向英国赔偿2100万银元，作为对焚毁鸦片、军费及行商累欠英商债务的赔偿；废除广州贸易的公行垄断；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口岸，贸易通商无碍；割让香港岛给英国；确立统一的进口、出口税费；两国官员通信平等往来。在次年签订的续约（《虎门条约》）中，英国又取得两项重要特权。一是英人犯事交由英官（而非按清朝律例）收办，即所谓治外法权；二是向英国授予最惠国待遇，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得一体均沾。[72]

247

248



上海，中国画家（佚名）绘，约 186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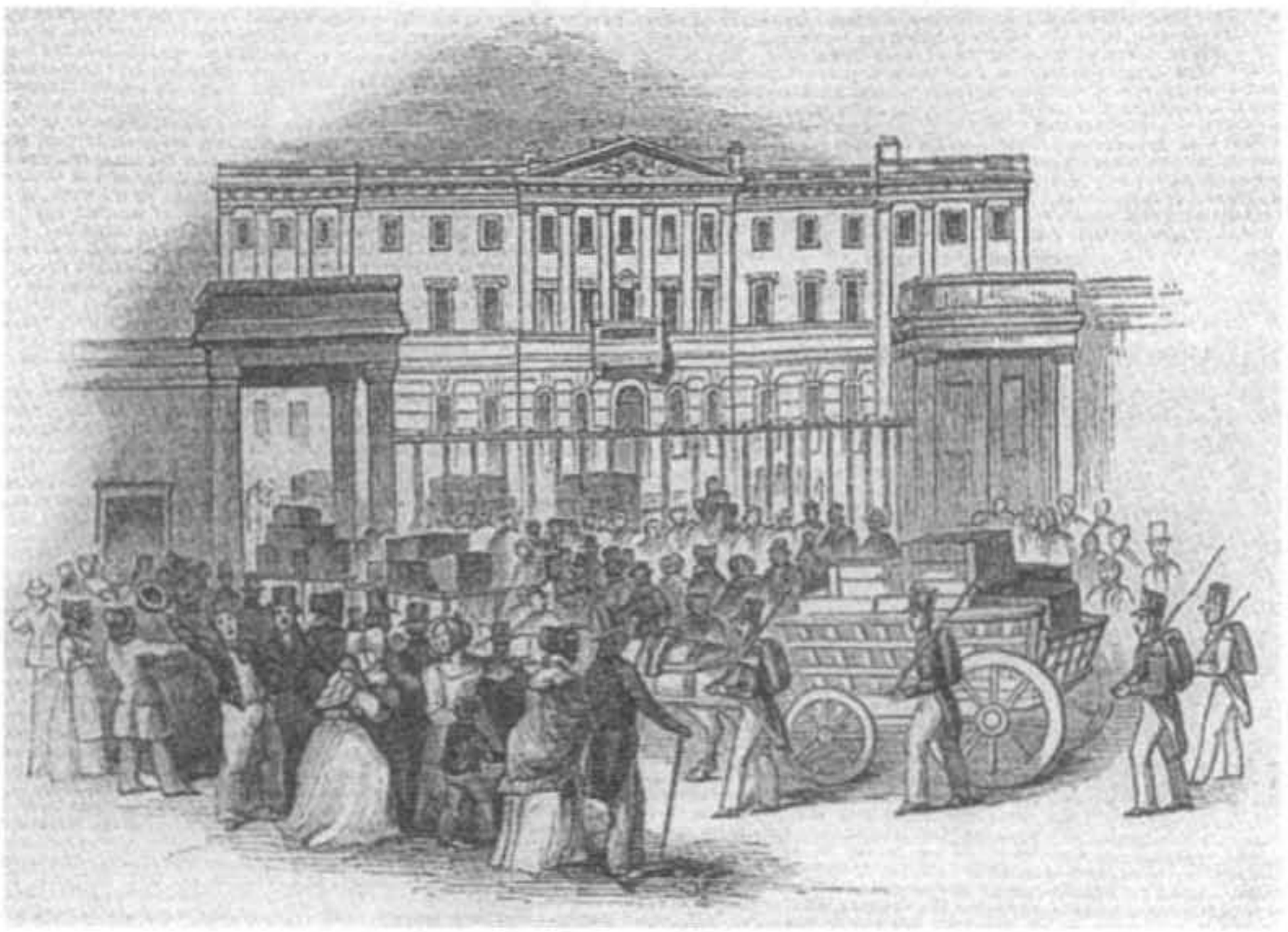
虽然条约中提到鸦片的唯一一处是中国赔偿销毁的鸦片，但谈判中已讨论了更广泛的鸦片交易问题。巴麦尊指示璞鼎查敦促中国将鸦片合法化，原因有三：中国无力禁绝鸦片交易，英国也不会停止从印度出口鸦片，而如果依然维持非法状态，只会导致更多走私和冲突。但巴麦尊也表示，璞鼎查仅可以敦促为限，因为女王的态度是，英国“没有权利”要求中国将鸦片合法化。中国皇帝如果愿意，完全有权禁止鸦片进口，而“参与走私贸易的英国人也必须承担相应后果”。[73]

璞鼎查尝试提起这些议题，他委婉地表示，这些问题是“引发战争的骚乱根源”，但中方官员坚决拒绝，直至他担保只会作为“私下谈话的内容”，而不在正式谈判中提及。中国官员想知道，英国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禁止”在自己属地的鸦片种植，从而“有效杜绝这项毒害人类的走私生意”。

璞鼎查表示，禁止种植与英国法律有冲突，况且即便英国这么做，交易也不会停止，其他国家的商人照样会取而代之。接着，璞鼎查把责任指向中国人。他说，停止鸦片交易“完全在你 249
们。如果你们的人民品行高尚，就不会去抽大烟；如果你们的官员廉洁奉公，也没有鸦片能流入贵国”。而如果中国政府不能管住人民吸食，那么，“不管有什么法令，他们总有办法取得鸦片”。有鉴于此，璞鼎查认为，让鸦片合法化，消除走私的祸患，或许会更好。中国谈判代表听及于此，中止了谈判，称皇帝“绝不会再听此事”。[74]

在英国，战争的结束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南京条约》得到了广泛支持，英国人似乎对讨论战争胜败已经兴趣不大，更在意的是这份大礼包给英国带来的利益。《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 News*）称，条约“确保了数百万元的利益，以及无尽的新鲜茶叶。将为贸易推波助澜，并将一个岛屿永久 250
割让给我们”，而伦敦《泰晤士报》收到的一封信则更为直接：“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或许从没有哪一次像与中国的战争结束后一样，能让社会各阶层都如此普遍地满意。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一个广大的帝国将向我国的工商业敞开大门。”[75]哪怕是一向反感英国的法国，也不情愿地支持这项条约。但一份法国报纸《世纪报》（*The Age*）还是成功地谴责了英国挑起战争，也表示了对清政府领导者的不屑：“英国人纯粹出于自私挑起战争，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动机却十分卑鄙；但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让生活在狡猾、不道德的

政府控制下的中国人沐浴欧洲文明的先进，也将对人道事业大有裨益。”[76]



中国根据《南京条约》被迫向英国支付的银元，正送往英国造币厂，1842 年

英国和中国的这一系列冲突常被称为“鸦片战争”，这一说法不无原因。无疑，是鸦片的破坏性影响使两国关系剑拔弩张，迫使中国皇帝采取行动。英国方面，由于政府长期鼓励鸦片贸易，使英国商人能不断将鸦片输往中国，造成争议并引发敌对。而英国要求中国赔偿收缴的鸦片更是让鸦片成为问题的核心。

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许多英国人相信，鸦片是引发战争的

关键因素。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却坚持认为，鸦片并非战争的主因，那不过是个“意外”或“擦枪走火”，相反，政府指出了巴麦尊给义律和璞鼎查的指示中重点提出的若干因素，维护英国的荣誉，保护英国国民，赢得中国的尊重，获得被收缴的英商货物的赔偿，开放中国的贸易机会，或者用当时的说法，“自由贸易”。[77]

在英国政府的很多人看来，鸦片战争是英国长期被中国人侮辱轻视的历史积累的结果。战争前夕，“休斯夫人”号的痛苦回忆还历历在目，同样的还有英国使团在中国遭遇的尴尬境地——1792～1793 年的马戛尔尼使团、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两个使团都希望在中英两国间建立更广泛的贸易联系，然而都无功而返。虽然马戛尔尼不对天子叩头一事引起轩然大波，但他还是得到了觐见皇帝的机会，不过，除了两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所有要求），他一无所获。其中一封信显示了中国的优越感之高，“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78]即便如此，马戛尔尼的遭遇也比阿美士德好得多，后者只因为拒绝叩头的争议和错误的时机，连面见皇帝的机会都没得到。

另外一次轻慢的事件是所谓“律劳卑之败”（“Napier's Fizzle”）。律劳卑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专营结束后的首任驻华商务总监。1834 年夏，律劳卑抵达广州，无视广州体制的贸易规则，试图要求中国人将他当作英国王室代表对等相待。未能如愿之后，他威胁中国人将使用武力。律劳卑的无礼举动引起

中国人的激烈反应，包括关停贸易，软禁律劳卑及随从，并向律劳卑召集到珠江的英国护卫舰开火。最后，律劳卑屈从于中国的压力，离开广州赴澳门。由于为中英纠纷一事操劳，律劳卑染上疟疾，抵达澳门后未几即病逝。虽然律劳卑行为轻率，无视遵守中国律例、避免动武、不冒犯中国人的指示，英国政府还是对自己的代表受到这样的待遇感到愤慨，甚至有议论要对华开战，维护英国荣誉。[79]

对于英国政府，这些情况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贸易制度的规则，在英国人眼中，明显不公平且充满羞辱意味。更糟糕的是中国令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这一点时常让英国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野蛮人，而是当时最强大、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的一员。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说："英国人习惯与别国平等往来。对他们来说，在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皇帝附庸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式规则，是无法容忍的。"[80]

关于鸦片战争的主因是中国对待英国人的态度和英国人的遭遇，当时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并非出于英国人，而是美国第六任总统 J. Q. 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841 年 11 月，当时还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的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发表了关于这次战争的演讲。他说：

> 我认为，有一种普遍但错误的观点是，争执纯粹是因为英商向中国输入一些鸦片被中国政府以触犯律例而扣押。

这只是纠纷的一个小插曲，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正如波士顿港的倾茶并不是北美独立战争的根源……战争真正的原因在于叩头！——中国自大而又毫无根据的自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交往中，他们依据的并不是平等互惠，而是像主子和仆人一样侮辱性的关系。

虽然亚当斯过于轻视鸦片在其中的作用，但关于英国人不满对华贸易的状况这一点则确有道理。这种不满，加上对英国国民受到的待遇和销毁英国人财产的愤恨，就是英国政府眼中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81]

而在美国人看来，虽然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和美国的矛盾，但作为旁观者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明确态度。许多美国对华贸易商曾希望，通过统一的武力展示，避免敌对。在美国商人1839年5月提交给国会的请愿书上，他们宣称反对继续进行鸦片交易，并请国会向中国派出海军。他们认为，美国以及英国、法国船只的出现将可以“不必流血”也能达成双方互惠的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商业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他们构想的联合出兵从未实现，战事爆发后，许多美国商人认为英国的举动完全正当，因为中国的态度和行为也让他们一样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应该给中国点教训，即便他们并不想诉诸武力。但也有一些美国商人反对开战，有人就说，“无论中国人有什么缺点（他们并非没有缺点），外国商人受到的不公待遇并非他们所为，在我看来，和英国人的矛盾中，他

们在对的一方”。[82]

另一名反对战争的美国商人是 C. W. 金（Charles William King）。就像他作为合伙人设立的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一样，金一直以来都坚决反对不道德的鸦片交易。在外国人被困广州期间，他曾写信给义律，激动地谈起造成英国与中国冲突的这种非法行径：

> 近四十年里，英国商人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带领下，从事着一项违反中华帝国最高律例和利益的交易。走私如此猖獗，令中国货币秩序大乱，官员腐化，损害无数人民的健康，渗入这个国家的政治，显示出难堪和恶劣的征兆；渗透进刑法典；更进入人民的身体，毁坏财产、道德、荣誉和幸福。从皇帝到卑微的村民，都深受其苦。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底层的衰落，而朝廷的公报则表明，甚至在皇室中受害者也不乏其人。

金希望英国选择“利用危机”，当成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摈弃鸦片，只从事正当的贸易。金还警告义律，如果英国选择开战，他们不仅会战败，还会进一步疏远中国民众。

> 借口中国人采取行动阻止英国的不当行为，而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公义所不容。即使在走私盛行的情况下，因为利益驱动，与中国间的合法、有用的贸易也不

会继续进行。利益更警告不得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不义地使用武器。即使大英帝国非常强大，但无论有多么无法抗拒的开战理由，如果她与三四亿中国人民的良知和道德对立并吹响战号，她将无法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甚至无法全身而退。[83]

美国传教士对战争的态度举棋不定。一方面，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谴责卑鄙的鸦片交易和给中国人造成的恶劣影响，认为这是劝服中国人皈依的严重障碍。1839 年末，就在英国人撤退到澳门之时，美国在广州的传教士提交了一份报告给美国公理会差会，称鸦片的“罪恶与蓄奴和酗酒放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可悲的事实，即外国人、文明国家和基督徒是提供这种毒品的主要代理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传教士却认为战争是必要甚至是天意注定的一步，如果成功，中国的门户将打开，他们的足迹也能够突破广州，将基督教传到更辽阔的内陆。1839 年 8 月，美国第一位来华女性传教士叔何显理（Henrietta Shuck）写信给父亲称，“这些困难令我振奋！我认为英国政府会被激怒，上帝可以用他的神力打破障碍，让基督的福音进入中国”。不久之后，另一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真地写道，“（我）希望，中国信仰解放的日子加速到来……两个国家的第一次冲击对中国是灾难性的，但是将她从空想的和平安逸中唤醒，沉重的打击在所难免”。一年之后，正当璞鼎查的军

队抵达，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美国新教传教士、《中国丛报》创办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乐观地期待战后的转变，“我们处于一个新纪元的前夜，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我们总是哀叹身边的罪恶与荒凉。福音是唯一的救赎。现在，我们相信，上帝将为在全世界布道的人打开一条大路”。[84]

而在美国本土，除了传教士痛斥鸦片的邪恶，与英国两场鏖战的敌意还在延续，美国人因而多数反对英国的行动，认为鸦片是两国交恶的根本原因。这一点的证据来自对亚当斯演说的回应。事件发生前几天，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演讲中的观点和此时此地的普遍偏见格格不入，我想，风暴很快就会向我袭来”。他的预言很准确。媒体上广泛抨击亚当斯的论点，似乎只有一份出版物《尼尔国家纪事报》（*Niles' National Register*）认为应当全文刊出他的演说，以便公众充分了解他的意思。《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也慑于公愤，违反了公布演说词的约定。得到《北美评论》胆怯的拒绝后，亚当斯说，“公众的激愤和这份演讲激发的感受之强烈，远远超出我的想象”。[85]

和美国公众意见一致的还有《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的编辑 F. 亨特（Freeman Hunt），他说，“这场战争是强权毫无根据的行为，违反永恒正义的普遍原则，任何明智之士和基督教世界都应当郑重反对”。类似的谴责来自马萨诸塞州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当被问及美国加入英国参战的可能性时，他严厉地

驳斥了这种想法。他说："在广州的美国人，已经证明了对于中华帝国法律和公共权利的尊重，和英国人的粗暴、不驯形成鲜明对比……上帝不会容忍我试想与英国政府合作，支持贪婪和暴力，野蛮地违反世俗和神圣的律法，而这恰恰是英国人在中国鸦片问题上的卑劣行为。"当然，美国人，包括顾盛代表的许多人，多年来也深入参与到鸦片贸易，因此对违反中国法律和权利感到愧疚，但是，当美国人反对战争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同胞令人厌恶、不可原谅的角色视而不见。顾盛本人就是如此，他的家族曾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甚丰，只不过后来洗手退出。[86]

无论对待战争持论如何，美国人倒是急切希望分享英国人的胜利。从"中国皇后"号首航开始，美国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就采取了几乎不干预的政策。除了制定优惠的关税和任命了权力相对有限的领事，政府在促进对华贸易或建立更深远的对华关系上极少作为。现在，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英国人已经得到了想要的条约，美国官员也希望能签订同样的条约。为此，泰勒总统派出以顾盛为首的外交使团，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中国派出使团。

顾盛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索尔兹伯里，是哈佛出身的律师，文笔极佳，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精于文学、植物学和矿物学，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在进入国会前，他曾做过地方报纸编辑、州代表、纽伯里波特议员、马萨诸塞州最高上诉法院的法律顾问。这些经历帮他练就了高超的谈判能力，

令他在新职中如虎添翼。[87]

出发前几个月，在波士顿法尼尔大厅为邦克山之战的新纪念碑举办的宴会上，顾盛公布了他即将起程的消息，“我很荣幸带着和平的使命，被赋予拉近新旧世界的重任……这个东方国度的知识和学问曾经照耀了文明世界，然而现在时易世变，知识从西方流入东方，我们已经青出于蓝。我将代表文明……出使中国”。[88]

虽然顾盛十分看重这次出使，但其实在美国政府看来，出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争取和英国一样乃至条件更优厚的利益。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顾盛的训令中表示，“要使中国的政府和民众完全相信，你的到访纯粹是和平的，无意树敌或干扰，你是从美洲最强大的国家前往亚洲最大帝国的和平使者，为的是展现尊重和好意，建立友好交往的渠道”。韦伯斯特向顾盛强调，如果能获得和英国同样口岸的通商权，会给美国带来莫大的商业利益，“这些港口属于清帝国最富庶、最多产、人口最多的省份，很有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商业要地”。韦伯斯特认为，如果美国的船只能以和英国人同等的条件进入这些口岸，美国商人就可能不必在采购中使用伦敦汇票或银币，而能够销出更多的美国产品。顾盛应争取在京城面见皇帝，如果不能，则应当与其他能够在皇帝面前进言的高级官员商议。顾盛应该表现出适度而平等的礼貌、恭敬、坚定，而不是一个朝贡者。韦伯斯特还强调中国人长期以来对美国自治地位的混淆，以及美国对自己世界地位的敏感，补充说，“你应当让别人知道，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多年前就已摆脱束缚，经过七年浴血奋战宣告独立，现在，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美国都已与英国平起平坐”。[89]在向顾盛给予这些训令之前的几个月，韦伯斯特向一名同僚透露，这次出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能是空前绝后的”。[90]

总统给了顾盛两封信件转交皇帝，一封介绍顾盛，另一封则是美国总统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在国书中，泰勒从历史写起，不吝赞美，并提出对未来的希望。他列出了治下的所有州府，“美国二十六州与中国面积相仿，而人口较少。太阳升起时照耀中国的高山大河，日落时照耀美国同样高峻宽阔的山河。我们的领土从一个大洋延伸到另一个大洋，我国西部和贵国之间也只有海洋的阻隔”。泰勒说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希望能互相尊重。“中国人喜欢和我们做生意，卖出茶叶和丝绸，换得银币或其他商品。”但如果这种贸易要继续，就必须建立在双方共同接受的商业规则上。泰勒希望顾盛与皇帝商谈的条约应当“公平，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颇的优势”。对于鸦片贸易，总统说，美国“将不再成为作恶者的一员，也不支持他们违反贵国法律”。泰勒的落款十分家常，“你的好友”。[91]

1843 年 8 月 5 日，顾盛和韦伯斯特的儿子弗莱彻以及四名随从，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出发，遭遇多次延期和灾祸之后，于 1844 年 2 月 24 日抵达中国。在出发前，顾盛购买了他所能见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在途中阅读，以便充分准备。顾

盛下榻于澳门的原总督府，一名美国居民说，这位“满大人”一样的使节建造了一个“微缩的宫廷，第一次出使中国的他们在殖民地造成轰动”。而顾盛和随同的五个年轻男士都是英俊的单身汉，更让他们在外国人的社区（其中有几名单身女性）中受到热烈欢迎。[92]

顾盛一行到来之后发现，中国人对于谈判并没有太多兴趣。由于已有圣旨将英国人在条约中的权利也授予了美国人，中国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和美国签订条约。在广州的美商看法也类似，有人说：“我在澳门时有幸见到仪容不凡的顾盛先生。虽然我挺喜欢这位先生，我还是衷心希望他在别处而不是这里，我和此地其他所有美国商人一样心有不安。作为美国人，我们现在和中国人交易的条件已经极为有利，既然我们希望和中国的唯一联系就是在商业方面，我看不出顾盛先生在这里可以有何作为。他并不能使我们的状况更好。”[93]

顾盛面见皇帝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钦差大臣耆英倒是愿意谈判，但他此时还在北京，三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不过这段时间也并非波澜不惊。顾盛给美国领事带来了一个带有箭头形风向标的旗杆。旗杆竖起来之后，却招来了一场风波。当时，许多广州人得了不明原因的疾病，当地人认为摆动的风向标就是罪魁祸首，指责邪恶的指针“严重影响了本地的康宁和好运”。5 月 6 日，美国人取下惹人不快的风向标，却遭到一群愤怒的中国人的攻击。地方兵备很快介入，当地士绅耆老十分关注争论，发布了一份布告平息公愤。文中表扬

了美国人纠正“错误”，希望从此以后，远道而来的美国人能得到同情。[94]

一些人显然没有领会布告的精神。6 月 16 日，一群“不法之徒”（按照顾盛的说法）进入美国花园，用棍棒袭击了美国人，美国人开枪还击。混战中，一个美国人射杀了一名中国人。此时已从京城返回的耆英告诉顾盛，当地人可能会要求以命抵命。但顾盛立场强硬。他已经在和耆英协商中美条约的条款，他所要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类似英国人获得的治外法权寻求保护，免于中国的起诉。顾盛告诉耆英，美国不会交出杀死中国人的凶手，而将由美国人自己组成陪审团审判。耆英和地方官都没有插手，审判在 7 月 11 日进行，结果，开枪者被认为是“正当防卫”而被判无罪。[95]

1844 年 7 月 3 日，顾盛向耆英知会裁决结果之前一周，两人同意达成《望厦条约》（Treaty of Wangxia），其中伯驾和裨治文的翻译功不可没。顾盛不辱使命，美国政府的要求全部达成。条约的基本内容和英国一样，除了割让香港岛，但这份条约更详尽，还加入了一些新要求。例如，居住在五个通商口岸的美国人不仅可以建房，还可以建“医院、教堂、墓地”，从而为扩大医生和传教士的活动打下基础。美国人雇佣中国人学汉语也不再是犯罪。治外法权不仅适用于民事案件，也适用于刑事案件。在英国人保持缄默的鸦片问题上，中美条约规定，贩卖鸦片的美国人将按中国法律判处，美国政府不予保护。条约还要求，“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

设法禁止”。最后一条则规定，条约应候十二年后重审，如有必要，应予重修。[96]

* * *

263 中国与美国商定的条约成为所谓旧中国贸易的丧钟。广州贸易体制宣告终结，这座城市也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1843 年 9 月 4 日，伍秉鉴去世，享年 75 岁，为旧中国贸易画上具有象征性的句号。他几乎是广州体制的化身。对浩官的过世，《新罕布什尔爱国者报》（*New-Hampshire Patriot*）将他称为一个“诚实的人”和“伟大的”商人，而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国报纸则断言：“我们认为，浩官完全可以比拟欧洲最著名的商人……果断、审慎、机警和精明都是他商人性格的明显特质。”[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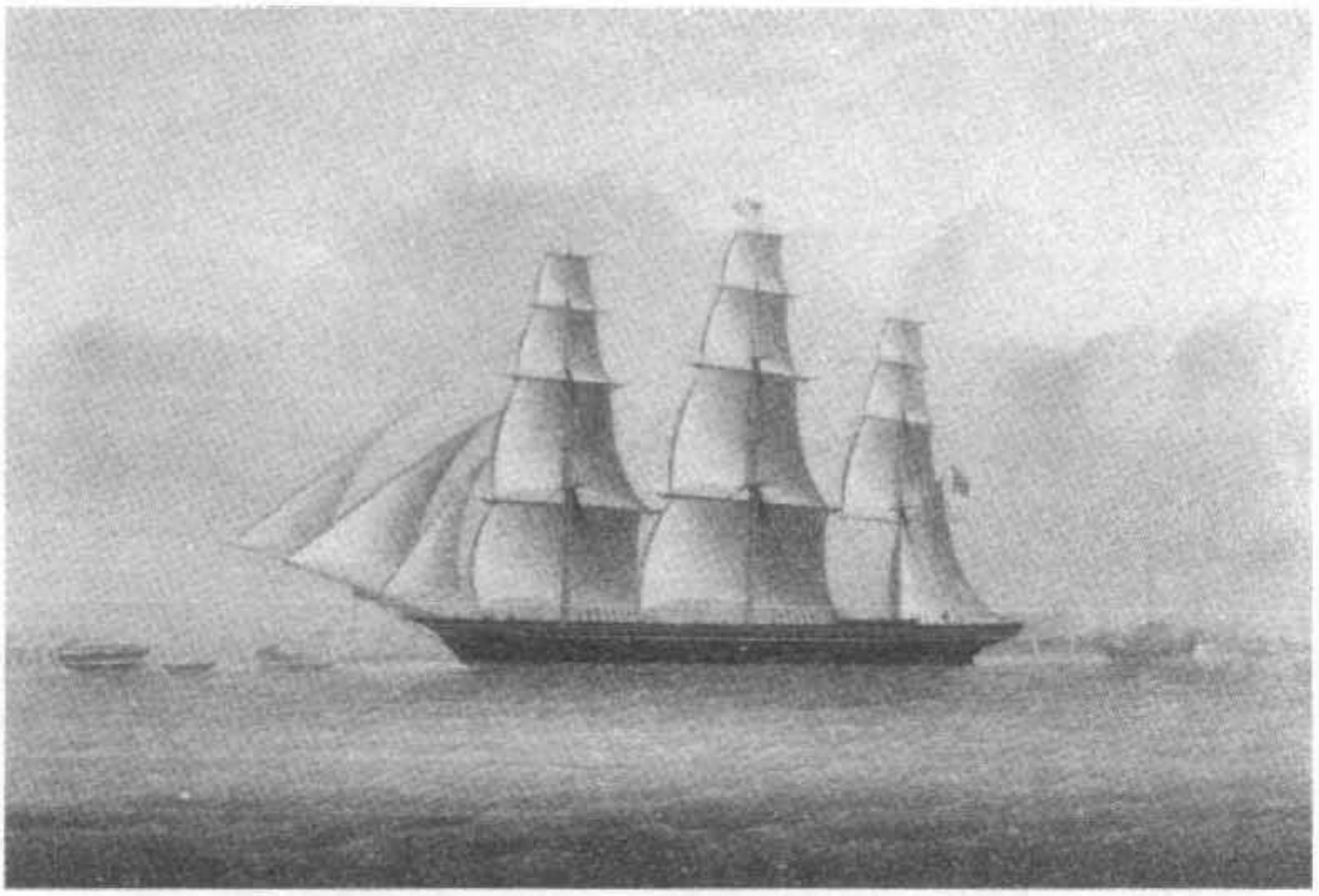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重创了本已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战前的五到十年里，多股力量不断动摇着中国的稳定。庞大人口的快速增长超过了农业用地的承载，粮食供应压力骤增，导致食品短缺，生活水准下降，贫民数量上升，反过来令穷人和富人间本已严重的差距更趋恶化，下层民众渐生怨气与不满。反清的秘密会社多次起事反叛，逐渐耗竭了政府的实力。文武官员中腐败普遍，进一步降低了当局的效率，民间非议不断。皇室用度奢靡铺张，镇压内乱的军事行动又耗去大量资金，国库也日趋枯竭。鸦片吸食和上瘾的人数越来越多，人民体质与社会经济都疲弱不堪。而面对如是问题的政府却软弱怕事，最上层的皇帝又常常举棋不定，优柔寡断，无法应对不断骚扰中国的各种问题。

因此，鸦片战争并不是造成了衰落，只是令中国本已脆弱的局 264
势更加颓败。

由于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多份条约都被称为“不平等条约”。历史学家徐中约指出，“这些条约并非对等协商，而是在战争结束后强加给中国，侵蚀中国的主权，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尽管鸦片战争是西方与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却并非最后一次。接下来的七十年里，中国和多个欧洲列强、日本乃至八国联军纷纷开战（义和团运动，1899～1901）。结果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清王朝的根基进一步瓦解，对这段时期内爆发的内乱和叛变疲于应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也逐渐动摇。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清王朝在 1911 年的倾颓，中华民国继之而起，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制。[98]

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些条约令中国人愤愤不平，美国人却乐见其成，认为新的贸易机会将会打开。《望厦条约》的签订确实使美国的对华贸易进入新的时期，对速度的追求成为焦点所在。

第九章　逐风而行



停泊在黄埔的飞剪船“海巫”号，中国画家（佚名）绘

1845年1月22日上午9时，纽约许多人聚集到司密斯－迪 266
门造船厂，庆祝新船“虹”号下水。船尾先滑进东河，溅起巨大的水花。约一周后，“虹”号已满载货物，整装待发，纽约市前市长P. 霍恩（Philip Hone）在船东之一S.S. 霍兰德（Samuel S. Howland）的陪同下参观了“虹”号。霍恩通过拍卖商船带回纽约的货物发迹，在2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这艘优美的船只今天早上将开往广州……无论是船型、对称性还是工艺，这都是本港出发的最精良的船只。在我看来，她就像一只领航船，或一匹赛马，造型修长，船体简洁，必定能像海鱼一样速度飞快。”“虹”号的目的地并不新鲜。她要走的远东财富之路早在61年前已由“中国皇后”号开辟。不同的是，“虹”号本身就独一无二。看到她下水或离开东河的人们，见证了美国航海史的一个新纪元，飞剪船（Clipper Ship）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海上快船堪称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帆船，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书写了对华贸易历史中最色彩斑斓的一章。[1]

在这一时期，速度成为竞争的关键所在。“虹”号和中国航线后来所有飞剪船的设计目的都是快速往来于中国和美国，原因就在于茶叶。无论保存得多妥当，茶箱封得多紧，从采购到销售的时间越长，茶叶质量下降的风险就越高。质量越低，也就难以卖出好价钱，商人们当然竭力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对速度的要求还有另一个原因：最先到港的船只往往可以收获最高的价格，随着到来的船只逐渐增多，行情就会走低。因此，每个对华贸易商都不惜重金提高船速，力争让自己的船只带着

最新鲜的茶叶最早回来。现在，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扩大茶叶贸易的前景激动人心，每个商人都希望造出最快的船只。为此，纽约霍兰德和阿斯平沃尔公司聘请造船工程师 J. W. 格里菲斯（John Willis Griffiths）设计了“虹”号。

格里菲斯眼光独到，利用他的数学专长拟定计划，制作模型和水箱来验证自己的构想，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极不寻常。格
267 里菲斯决意要造出一艘前所未有的船只，能够像刀片一样切水而行。但“虹”号并非全新产物。飞剪船的第一位编年记录者 C. C. 卡特勒（Carl C. Cutler）指出，“本质上，美国飞剪船的发展是渐进式而非突变式”。[2]在设计“虹”号时，格里菲斯曾翻阅史料，寻找灵感。他注意到，美国在独立战争开始，曾造过一批“轻快的上桅横帆纵帆船”巴尔的摩式飞剪船。[3]其中，他研究最深入的是“安·麦金姆”号，这艘船由商人 I. 麦金姆（Isaac McKim）在 1832 年制造，以其妻姓命名。当时公认“安·麦金姆”号速度非常快，而经过计算和测试，格里菲斯认为某些设计因素牵制了它的速度。与商船传统的粗船头相比，“安·麦金姆”号船头较细，因此速度较快，但格里菲斯认为，船头还可以收得更细，速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相比起来，格里菲斯认为“安·麦金姆”的船尾过细，如果造型更圆，将会减少一些阻力。而对于向下倾斜的龙骨，格里菲斯认为也可以加以改进，做得较为水平。最后，整条船的长度可以增加，并略微呈锥形，船体最宽处则更靠近船尾。[4]

1843 年初开始，司密斯 - 迪门造船厂开始以格里菲斯的新设计为蓝本建造新船。然而，动工开始不久，争议就随之而来。传统的造船者、设计者、水手认为“虹”号下水后必定贻笑大方。船头太窄，凹进去的船首看上去像是“内侧外翻”。有人认为，“虹”号没法像传统的船只用鳕鱼头一样的粗大船头破浪而行，倒可能被海浪淹过，倾倒覆没，沉于深渊。还有人说，桅杆太高，帆桁过宽，一遇到强风，过大的船帆会让船索失去控制。最尖锐的批评则将“虹”号称为“阿斯平沃尔的败笔”。

虽然格里菲斯从未对自己的设计失去信心，但船东受到批评的影响，已经开始改变主意。因此，他们邀请了伦敦的造船师作为顾问，并通过了修改方案，但格里菲斯和司密斯 - 迪门造船厂寸步不让，最后，工程还是按照格里菲斯的计划继续。这艘 757 吨的船只完工后，长 159 英尺，宽 31 英尺 10 英寸，高 18 英尺 4 英寸。虽然桅杆的数据已经遗失，但无疑一定高高矗立于甲板之上。[5]

如果要认定“虹”号是第一只真正的飞剪船，或人们有时所称的“极速飞剪船”，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种船。对于飞剪船的定义，并没有具体的参数或公式可以引用。而名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海洋学作者 A. B. C. 惠普尔（A. B. C. Whipple）说：“飞剪船（clipper）这个词脱胎于‘clip’，意为‘节奏’，表示‘以良好的节奏前进’。”[6]因此，这个词只是速度的同义词，此外，巴尔的摩飞剪船和 19 世纪 20

年代晚期英国使用的小型鸦片船（这种船每年多趟往返印度和中国走私鸦片）也都用这个词，因此，光靠名字本身并不足以表明这艘船的独特性。卡特勒注意到飞剪船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造型修长，目的是为了快速航行而不是留出更多的货舱空间；其次是桅杆极为粗大，以便比同样大小的船只展开面积更大的船帆。"[7]

一名"航海机修工"则给出了更详尽的定义，1855 年，他写道：

> （飞剪船）像香鱼一样简洁、修长、平稳。船身方面，船头尖锐，船首凹陷，侧舷突出，船尾浑圆轻量。加上高笋的铁制主桅杆，逐渐细小的副桅杆和长长的横杆，构成整个轮廓。船上可以展开牢固的桅杆，张开云一样的巨大船帆……船身更宽更长，无论遇上狂风还是巨浪，都能安然通过。[8]

但这样的定义仍欠明确，让人觉得，定义飞剪船与否的依据似乎较为主观。这也就是水手和历史学家对于哪只船是第一艘飞剪船争论不休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个称号应该给予"Houqua"号［与浩官（howqua）一字之差］，这是在 1844 年从纽约开往广州的快船，和"虹"号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人则认为第一的荣誉应该给"安·麦金姆"号。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虹"号才实至名归。[9]

虽然从名义和实际表现来看，“虹”号都具备飞剪船所需的要素，但1845年2月1日，疑问依然悬而未决：这艘船真的能开快吗？船长J. 兰德（John Land）很快回答了这个疑问，他仅耗时102天即抵达香港，回程则用了105天，加上在中国的装货时间，往返程只花了7个月又17天，刷新了对华贸易纪录之余，还为船东带来了两倍于造船成本（22000美元）的利润。然而，这一段旅程也遇到很多问题。在途中，兰德在遇到一次大风时收起了顶桅，但还是被打散了架。由于航行的时机不利，往返程都正面遭遇季风，到了回程，所有的船帆都已成为碎片，花了近两周才修复完毕。

兰德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1845年，“虹”号再度起航。这次的航行，去程用了99天，回程仅用了84天，往返程合计6个月又16天，新纪录比这条航线的常规时间缩短了一半。连一贯谦虚的兰德也难掩兴奋，夸道：“‘虹’号是海上有史以来最快的船，此外，没有别的船能胜过它。”[10]但“海巫”号的出现却证明天外有天。

* * *

在霍兰德及阿斯平沃尔公司，才华出众的船长并不止兰德一人。R. H. 沃特曼（Robert H. Waterman）在1845年初吸引了股东的注意。当年，沃特曼驾驶该公司的“纳奇兹”号，在漫长迂回的去程之后，以创纪录的78天时间满载茶叶从香港返回纽约。“纳奇兹”号并非飞剪船，更像是新奥尔良式班轮，130 270

英尺长，吃水线较浅，加上一路少见的顺风，成就了这次历史性的航行。媒体对这次旅程大肆渲染，称之为“令人震惊的航行”。[11]霍兰德及阿斯平沃尔也对此大为震惊，就在“虹”号从首次中国航行回来不久，他们认为，沃特曼也需要自己的飞剪船来证明他的勇气。因此，公司委托格里菲斯制造了“海巫”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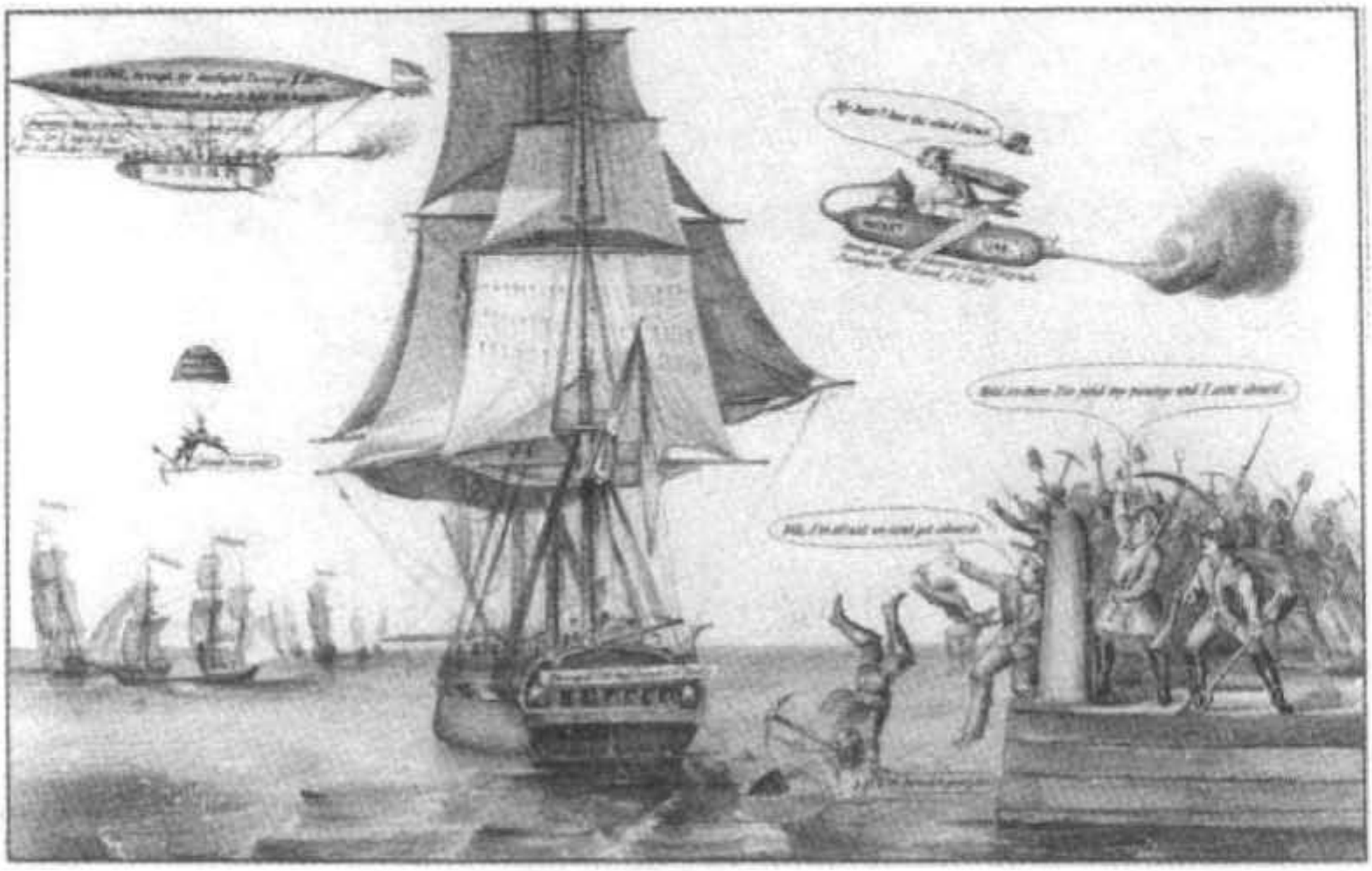
自“海巫”号从司密斯－迪门造船厂成形，对这种不寻常的设计，已经不再有人唱反调。“虹”号开始的成功有力地驳斥了怀疑的声音。1846 年 12 月 8 日，刚刚完工的“海巫”号开进东河，一名当地记者称之为“无与伦比的船，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目睹的纽约造船业的标杆之作”。[12]“海巫”号重 907 吨，长 170 英尺 3 英寸，宽 33 英尺 11 英寸，高 19 英尺，比“虹”号更大，船首更尖，主桅杆直耸天空，高达 140 英尺，携带的“船帆比三倍于其大小的 74 炮军舰都要多”。格里菲斯相信，船首的雕像“代表了整只船的精神”，“海巫”号的船首像——一只造型如匕首的盘尾中国龙——无疑恰如其分。这只船气势十足，强悍有力，随时准备好和海上的一切困难险恶搏斗。[13]

几周之后，“海巫”号离港，沃特曼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纳奇兹”号的纪录。他的第一次航行就接近了目标：他于 1847 年 7 月 26 日抵达纽约，用时 81 天，以一声炮响向纽约市民宣告他们的到来。不到两周后，沃特曼再次出发，此次更是快马加鞭，一路疾驶，77 天内就从香港返回，刚刚打破“纳

奇兹”号的纪录，一家当地报纸为此称“海巫”号是“世界上最快的船”。然而，这还并非高潮。1849 年 3 月 25 日，沃特曼驾驶“海巫”号第三次从中国返回，纽约的港口边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他将香港到纽约的航行时间改写为 74 天又 14 小时，此后，再也没有其他帆船能够打破这一纪录。[14]

“虹”号和“海巫”号相继成功，激发了其他商人投资制造飞剪船，投入对华贸易。1845 ~ 1855 年，共有大约十艘此类大船驶往香港、广州、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开放口岸。与此同时，数百艘其他船只也投入对华贸易，尽管这些船并非专门为此制造。这就是著名的加州快船，这一次，黄金取代了茶叶，成为背后无形的推手。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向国会的年度咨文中，J. K. 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告诉美国同胞，源自加州的传言确属事实。他说：“该地区富含金矿，储量之高，若不是政府官员的真实报告证实，几乎让人不敢相信。”[15]就这样，加州已然兴起的淘金热席卷了东海岸。很快，数百艘船只从东部港口不远万里竞相前来，他们绕过危险的合恩角，将上万渴望暴富的人带往旧金山。此地曾经是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到 1849 年底，人口一下膨胀到 2 万人，并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批人中真正掘到黄金的极为有限，但满足他们需求的人则无疑做到了。由于快速的货运更具优势，淘金热催生了飞剪船的黄金机会。



淘金热漫画：码头挤满了拿着锄头和铲子的人，人们从码头跳上离港的船只。挤满人的飞艇，一人在飞向天空的火箭上，一人带着锄头和铲子从飞艇上跳伞。N. 科利尔绘，1849 年

前往西海岸的第一批飞剪船开始时为对华贸易船。1849 年 4 月11 日，“门农”号率先出发，123 天后到达旧金山，在这段 15000 英里的航线上，相对于过去笨重船型一般需要的 150 ~ 200 天，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其他飞剪船也紧随其后，“海巫”号的速度最为惊人，从纽约出发后，仅用了 97 天就到达旧金山。更令人瞩目的是它可观的利润率。“海巫”号船东采购货物花了 84626 美元，但由于淘金热带来的物价膨胀，他们在旧金山收获了 27500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800 万美元），铁铲等在别处不过 1 美元的普通物品，在这里可以卖到 10 倍的价格乃至更高。[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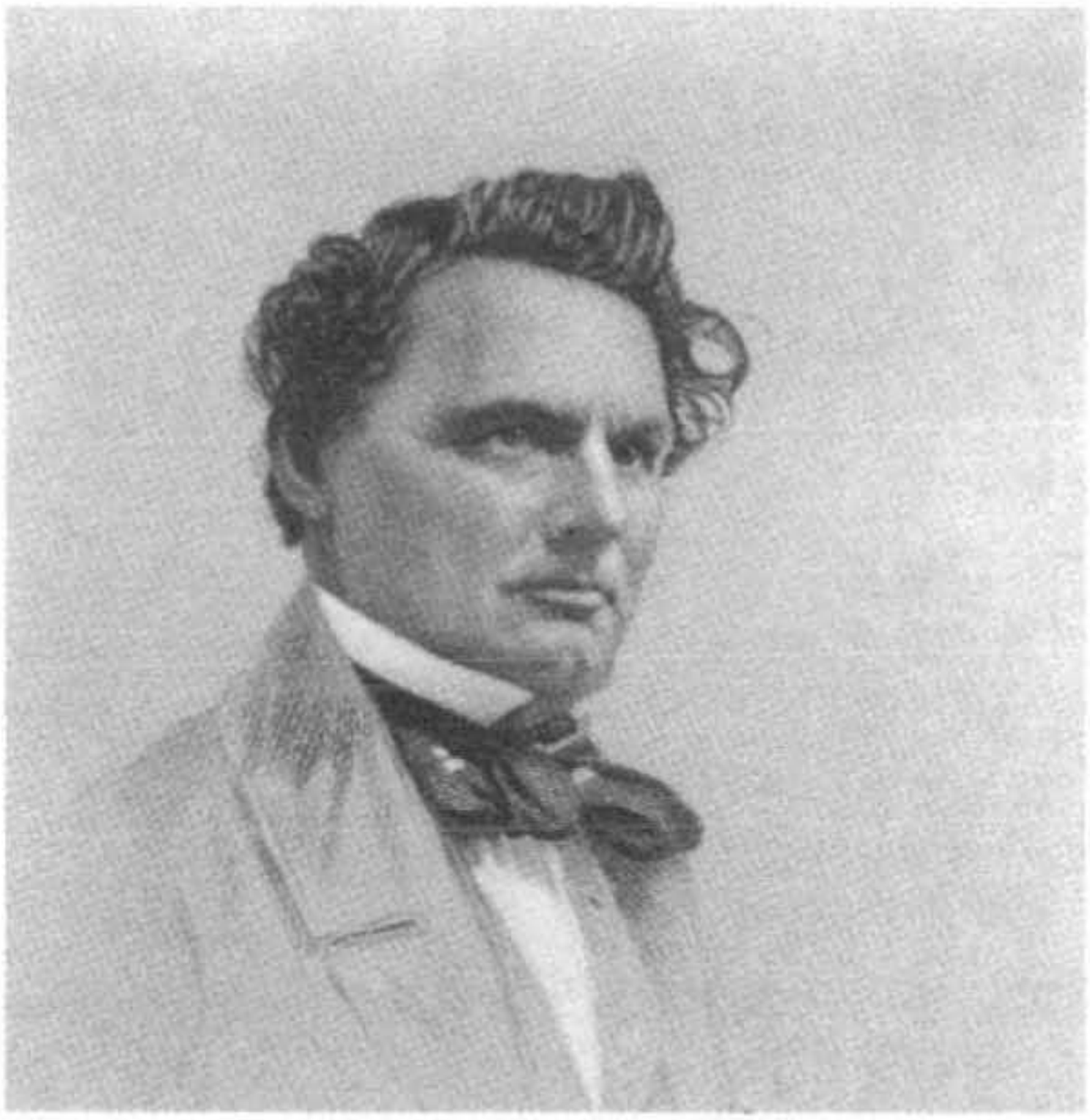
273

第一批飞剪船停泊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们见到一幅令人震惊的景象。水边已经成了船只的丛林，桅杆好似树干，帆桁犹如枝条。1850 年 11 月 20 日的《太平洋新闻》（*Pacific News*）报道："进入港口的船只数量蔚为壮观。到星期天晚上的 48 小时内，近六十艘船只涌入金门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昨天抵达的船只也有二十到三十只。"[17]随着船上人群奔向金矿，这些船只中的大部分很快就会成为在水中静静摇摆的空船。

由于对华贸易所用的飞剪船数量极少，无法满足向加州快速往来的需求，东部的商人纷纷开造新的飞剪船。从缅因州到马里兰的东海岸各个造船厂都开足马力。无论是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大城市，还是纽伯里波特、密斯提克、巴斯、达马里斯科塔、朴茨茅斯等小城镇，源源不断的飞剪船投入航行。大多数从全国海上贸易的枢纽纽约装货，也有许多从波士顿离港。由于参与了新一波造船热，这些城镇的居民充满了成就感。纽约的一份报纸就说，"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我们的飞剪船外形简洁、美观，让远方的国家为之震惊……在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星条旗也在纽约制造的船只上飘扬"。[18]

这一时期，杰出的造船师不断改进飞剪船，使之更大、更快、更稳定。其中，最著名的造船师要数 D. 麦凯伊（Donald McKay）。麦凯伊出生在新斯科舍约丹福斯的渔村，对水上和在陆地一样熟悉，曾用自己和弟弟造的小帆船在沿海航行过无数次。1826 年，16 岁的他离开家乡，来到纽约，开始做造船学徒。先后为当时行内顶尖的几位造船师，包括 I. 韦伯（Isaac

Webb）和 J. 贝尔（Jacob Bell）工作过后，在布鲁克林海军码头担任过领班，之后又前往马萨诸塞州。在那里，他先是在纽伯里波特的科利尔造船厂工作，后来结识了成功的波士顿商人 E. 特雷恩（Enoch Train），后者借了麦凯伊一笔钱，在东波士顿建立他自己的造船厂。[19]



D. 麦凯伊，W. G. 杰克曼绘

麦凯伊利用自己的经验，加上和好友兼同事格里菲斯的多次讨论，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只飞剪船，226 英尺长的“猎鹿犬”号。从敷设龙骨到下水，刚好用了 100 天，1850 年 12 月 7 日，船厂领班用一瓶梅德福朗姆酒给它命名，大声喊道，“猎鹿犬!

你的名字叫猎鹿犬!”[20]12 月 21 日，向纽约出发前几天，《波士顿每日地图报》（*Boston Daily Atlas*）报道，“所有见过的人都对这艘无与伦比的船只惊叹连连……‘猎鹿犬’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商船更长，船体更流畅……船只的所有设计要素都是为了提高速度”。[21]不过，对于“猎鹿犬”号的前景，也有人并不看好。一名保险商向“猎鹿犬”号船长 J. 理查德森（Josiah Richardson）表示，“我想，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想到船身如此细削，载货这么多，你多少会有些紧张”。船长的回答很坚定，“我不会。如果一只船会让我想到成为我的棺材，我根本就不会上船”。[22]

结果，保险商还是说中了一些。从纽约离港 6 天后，“猎鹿犬”号的主中桅掉落，三个上桅杆也随之掉落。经过修复，“猎鹿犬”号依然绕过了合恩角，在 4 月 8 日到达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在这里，理查德森写信给船东：“经过 66 天的行程到这里，是目前为止第二快的速度，如果不是桅杆折断，我们无疑会是最快的。能够击败‘猎鹿犬’号的船只还没出现。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优异表现。我已经爱上这艘船，这是我开过最好的船。”此后，“猎鹿犬”号继续北行，从纽约出发 108 天后到达旧金山；考虑到途中的意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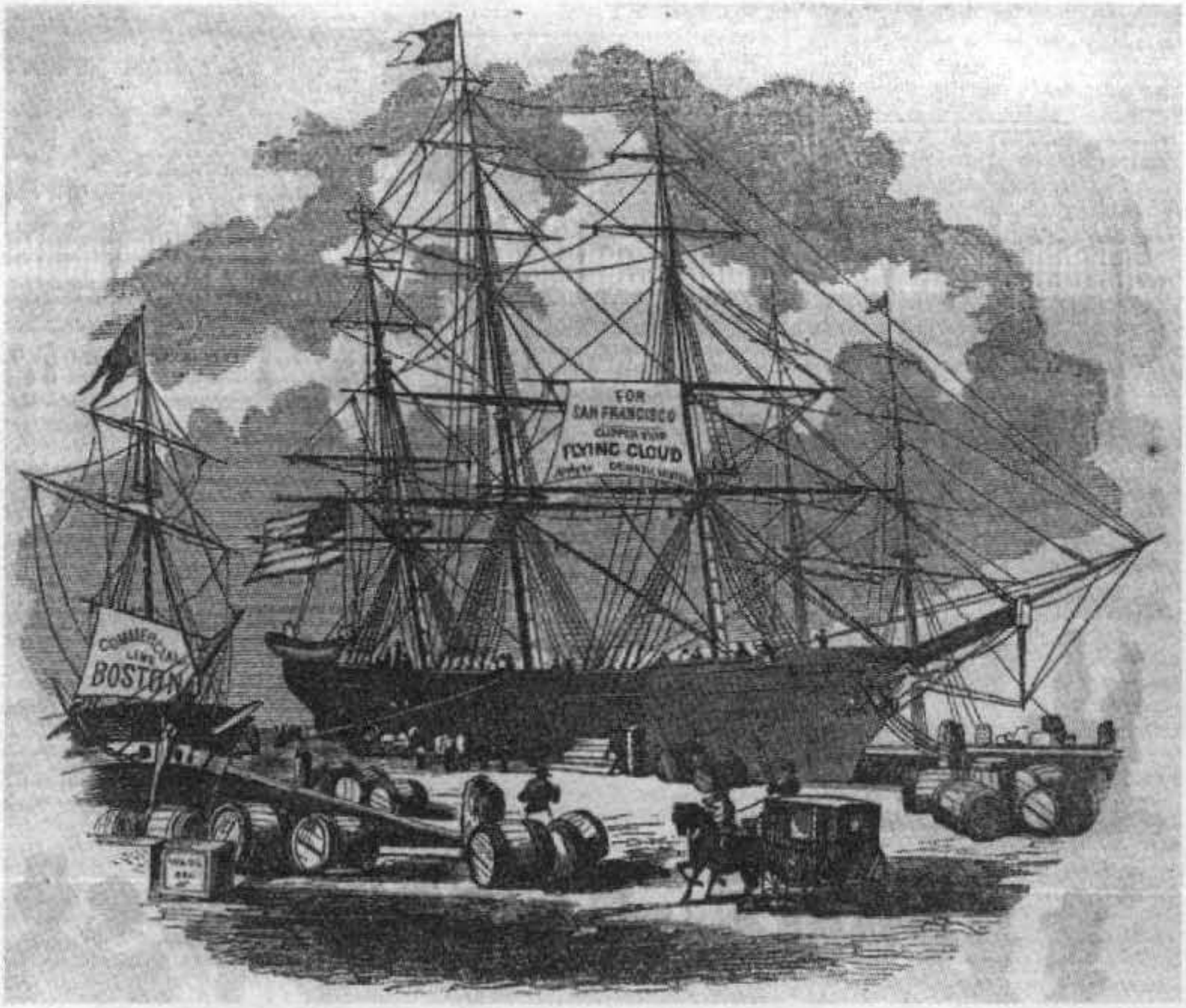
在后来的多年里，麦凯伊并未停步，终于成为第一流的飞剪船设计师和造船师。1852 年 11 月，《波士顿每日地图报》称，“他在这份崇高的职业中出类拔萃，为求成功，不

计辛苦或成本。他的雄心造出了全世界最好、最优美、最快的飞剪船”。关于最后一个说法，麦凯伊实至名归。在单日航行超过 400 英里的 13 艘飞剪船中，12 艘出于麦凯伊之手。[24]

麦凯伊对速度的追求正吻合了淘金热风靡全国时的市场需
276 求。加州快船和之前的对华贸易飞剪船一样，都是为速度而生，船长们经常暗暗较劲，书写到达旧金山的速度纪录。每年加州快船都会互相比赛，船东们也经常下注赌最先到达加州的船只，赌注时常高达 1 万美元。而这项纪录的保持者是麦凯伊所造的“飞云”号，船长是来自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的 J. P. 克里西（Josiah Perkins Creesy），其妻埃莉诺担任他的高级导航员，1854 年，他们的船只从纽约到旧金山只花了 89 天又 8 小时。[25]

有“海上探路者”之称的 M. F. 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曾出版过世界所有大洋的详细风向和水流图，他说，纽
277 约和加州之间的航路是“伟大的海上竞技场……人类技术的结晶——现代飞剪船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纷纷出发，与自然搏斗，超越蒸汽船，令世界为之震惊”。许多飞剪船船长凭借莫里绘制的海图加速前进，无疑让莫里对这些成就更加自豪。[26]

加州快船的兴起对美中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达旧金山卸下货物和乘客后，大多数飞剪船会继续前往中国采购茶叶。许多船只最后回到纽约，也有一些受英国商人雇佣前往当时世



飞剪船“飞云”号，1851 年 6 月从纽约到旧金山首航前装货

界最大的茶叶市场——伦敦。这样的航程即便在几年之前也难以想象，因为英国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长期以来只允许本国船只进口茶叶，到了 1849 年，此类限制被废除，美国人的势力也随之壮大起来。

从第一艘美国飞剪船到达中国开始，那里的英国商人就以颇为复杂的心态看待他们，既钦佩，又嫉妒，还有些担心。英国曾长期主宰海上世界，对自己的商船更是自豪有加，现在，美国新贵已经超过了他们，制造出了速度最快的海船，还特别适合于茶叶贸易。随着《航海条例》规定的废除，利润至上的

英国商人也开始用新的态度对待美国飞剪船，将其视为优良的运输工具。

在这个背景下，“东方”号登场了。1849 年，J. 贝尔（Jacob Bell）受罗氏兄弟公司（A. A. Low & Brother）之托，在纽约造出“东方”号。这艘船为对华贸易而设计，造价 7 万美元，185 英尺长，36 英尺宽，21 英尺高。第一任指挥官是因南极洲出名的帕尔默，1849 ~ 1850 年，帕尔默驾驶“东方”号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但让世人记住“东方”号的，是 1850 年 5 月 18 日从纽约起程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一次的指挥官是帕尔默的弟弟西奥多。1850 年 8 月 8 日，西奥多驾驶的“东方”号以 81 天的最新纪录到达香港，英国商人已经在那里翘首以盼。

三个最大的英国贸易公司向担任“东方”号代理商的旗昌洋行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当时，来往中国和伦敦运输茶叶的船只一般运输每 50 立方英尺吨位的茶叶，可获得 3 英镑的报酬，而这几个英国公司很乐意开出每 40 立方英尺吨位 6 英镑的价格，来雇佣“东方”号，就是看中它能更快地将茶叶运往市场，从而弥补较高的成本，也确保茶叶更加新鲜。美国人欣然接受，“东方”号很快装满了 1618 吨上等中国茶叶，于 1850 年 8 月 28 日离开香港，97 天后抵达伦敦西印度码头，不仅创下航线的速度纪录，也为英国商人带来不菲利润。飞剪船时代的编年记录者 A. H. 克拉克（Arthur Hamilton Clark）称，“可以说，[“东方”号] 的到达……在英国激起的担忧和兴奋堪与茶党

1773 年在波士顿港的作为相比”。[27]

“东方”号在码头鹤立鸡群，好奇的人纷纷涌来一睹她的风采。这股冲击逐渐消退后，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了英国商船队面临的挑战：

> [“东方”号]的利润……无疑将傲视同侪。我们的船只面对完全一样的机会，尽管一开始，“东方”号的胜出让英国船只付出了代价，但长远来看，这应当是良性的刺激，而不是挫败。这仅仅是速度的竞逐，机会向英国和美国造船师同样敞开……我们必须和不受约束的强大对手一较高下。
>
> 我们必须用我们娴熟的技能、一贯的勤勉、坚定的决心来对抗美国的年轻、独创和热情。这是父辈与孩子的较量。我们别无选择，绝不能被打败。让我们的造船师和他们的雇主从时间中汲取教训……我们相信，同胞们不会被击败；设若不幸失利，我们应当知道，那也是自食苦果。[28]

英国海军部意识到“东方”号带来的威胁，向美国人要求将“东方”号退役，量取尺寸作为英国造船师学习的范本，美国人也同意了请求。坚定的英国人重新投入竞争，制造了他们自己的飞剪船，虽然规格略小，但依然快速。直至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和英国飞剪船分享了中国和伦敦之间茶叶贸易的惊人利润，自此之后，英国人在竞争中让美国人彻底

出局。

美国人用于对华贸易的飞剪船体量庞大，大多数吨位在1000吨以上，许多船只甚至超过2000吨。所有这些船只的性能都极其优秀，特别是在满帆时，硕大的船帆鼓风翻腾，细长弯曲的船首劈开波浪。这些船只的船长被称为“驱使者”不无原因，他们夜以继日地驱使船员，无论天气好坏，一切都为了最高要求——速度。虽然“海巫”号的惊人纪录令其他船只望尘莫及，对华飞剪船也普遍保持了较高的速度，许多船只在返回纽约的重要航程中，可以把时间稳稳地控制在100天以内，少数情况下持续船速可达到1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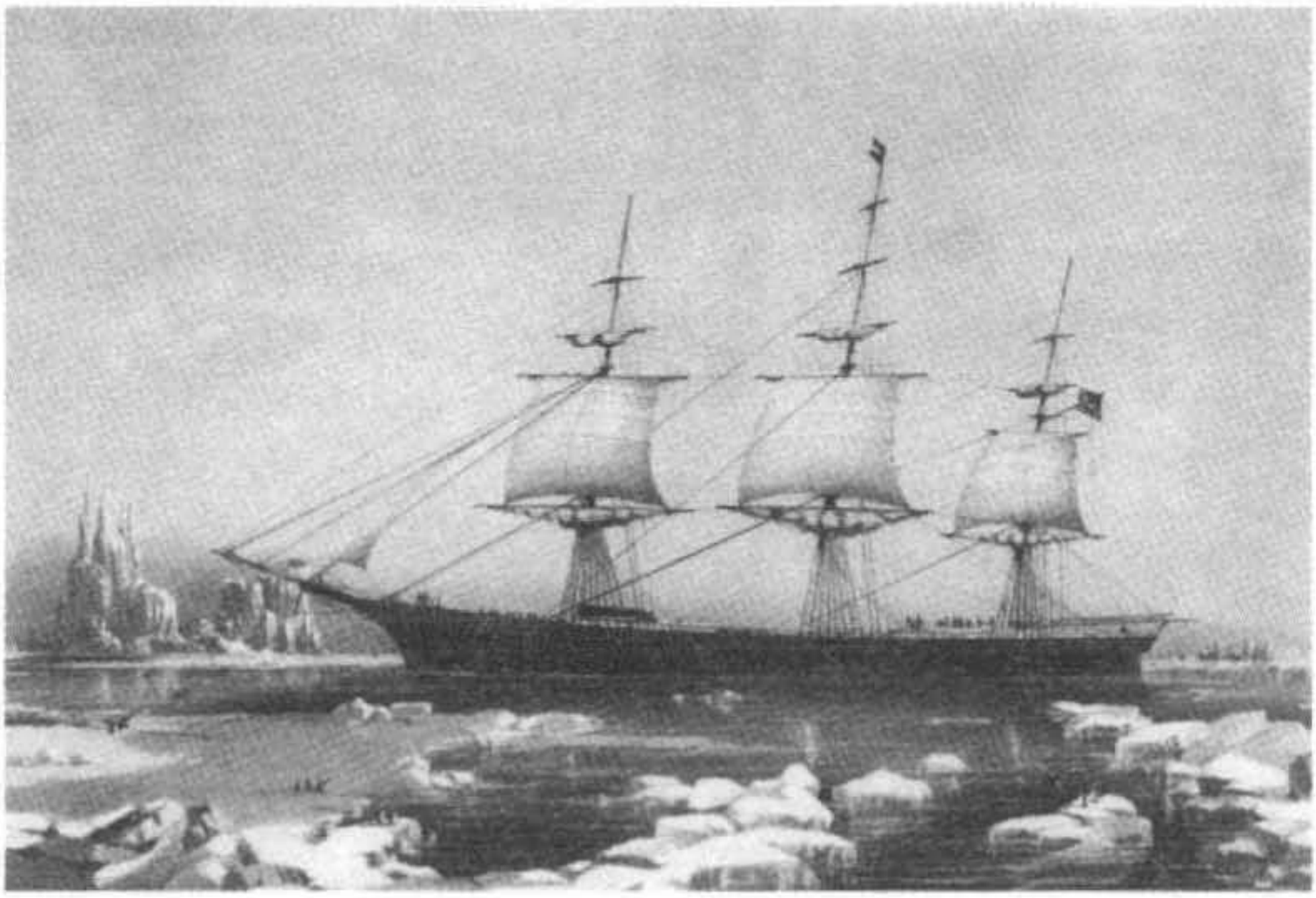
飞剪船的拥有者、设计者、驾驶者都非常自豪，他们也有理由如此。飞剪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海船。这些人盲目的爱国主义似乎捕捉到了美国人新生的自信和例外论，飞剪船的突然成功正值美国战胜墨西哥以及命定扩张论萌发之时。每次离港时，在旁人“飞鱼人”的呼喊下，船员们都相信，自己是与最快、最好的船只同行。1851年，“塞穆尔·拉塞尔”号飞剪船的一名船员发表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一封信准确地描述了他们高昂的信心：

> 我乘船前往中国时，在老船长帕尔默的带领下，经历了美妙的体验……许多和我们同样路线的船只经过大修，没能保持美国队在第一次美洲杯比赛中击败英国皇家舰队的轻松。当然，有些扬基兄弟也会造出好船，直到我们摆

脱它。但对于任何外国船，无论是英国、法国或荷兰，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上风。为什么会这样？上帝保佑你，先生，这真是世界上最没有悬念的比赛。[29]

飞剪船的名字也为速度增添了几分光彩，为美国在19世纪的繁荣添上了浪漫的一笔。比如，“飞云”号之后，有“飞箭”号、“飞鹰”号、“金腾”号、“彗星”号、“闪电”号，等等。19世纪50年代，一位美国商人对这种趋势讽刺道，“‘黎明之翼’号前天从纽约到来，但‘海上之霸’号还没听说过。我建议下一艘飞剪船可以来点变化，取名叫‘蜗牛’号、‘乌龟’号或‘懒人’号。我实在对这些‘永远更快一点’的飞剪船名字生厌”。[30]飞剪船设计者和拥有者对他们船只的自负甚至蔓延到船帆，他们给甲板上飘扬的各种帆取了许多梦幻色彩的名字，例如“揽月、扫云、摩天、观星，登峰造极的则是‘天使的脚凳’”。[31]

美国人对他们的飞剪船如此热爱与自豪，因此，当消息传来，称依照“东方”号的造型仅仅新造了两艘飞剪船的英国人夸口自己的飞剪船快过美国人时，后者自然感到愤愤不平。消息激怒了波士顿的美国航海俱乐部的成员，其中很多人是对华贸易商和飞剪船船东。既然英国人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就让他们证明看看。为了给英国人这次机会，俱乐部1852年夏天扔下了长手套，发起挑战，与“英国造船师比赛，从英格兰一港口出发带货往返一个中国港口”。各方以一艘船只出赛，制造者、



飞剪船“红杰克”号在霍恩角附近的冰块中，约 1855 年

船长和船员必须都是本国人。英国人还有权指定“船只的大小，只要在 800 到 1200 美国登记吨之间”，以及“每程应当装载的货物重量和体积”。胜者可以获得俱乐部提供的 1 万英镑奖励。

这份挑战书被许多英国刊物转载，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应战。于是，俱乐部提高了悬赏。1852 年 10 月初，英国体育杂志《贝尔生活》（*Bell's Life*）的编辑申明：“为吸引我们的造船师出战……如果三十天内无人接受挑战，美国航海俱乐部主席授权，允许英国船只提前十四天先于美国船只出发。同时，还允许我们的船员从熟悉英中航线的海员中挑选，而他们的船员只能选择对这条航线知之有限的海员。”此外，

美国人愿意将奖励加码到 2 万英镑，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更高。

由于挑战的条件很明显是对英国人的侮辱，暗示英国人：如若应战，取胜绝非易事，因此很难理解俱乐部何以认为新的刺激会奏效。《贝尔生活》的编辑总结了修改之后的挑战宣言，告诉读者，“美国人想要来一场比赛，不应战也多少是因为我们的骑士精神”。《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也加入呼吁维护英国荣誉的行列，尽管条件诱人，但挑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情形未免有点奇怪，因为就在挑战发出的同一年，在英国和美国飞剪船之间，已经在中国到伦敦的航线上展开了不少非正式的“茶叶竞赛”，英国人与美国人全力争胜，很多人也对竞赛的结果押下大笔赌注。或许，刚刚在第一届美洲杯被美国击败的英国人，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没有足够的勇气再度与美国人一比高下。[32]

19 世纪 50 年代的 10 年是美国飞剪船的黄金时代。不过，随着淘金热的冷却，运送劳力和货物到加州的需求日趋减退，飞剪船也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上的燃煤蒸汽船。这些船只将乘客和货物运到巴拿马，经由铁路穿过海峡到达太平洋一侧，再由蒸汽船运到加州。许多曾参与筑就黄金海岸的飞剪船现在一起绕过了美国西部的乐土，直奔中国运输茶叶。但是，由于英国飞剪船在伦敦茶叶航线上取代了美国飞剪船，许多其他船只又掌控了往返中美的航线，美国飞剪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末，剩余的美国飞剪船已是屈

指可数。多年高强度的快速航行让许多船只饱经风雨，破旧不堪，只能报废处理。另一些则成了飓风和暗礁的牺牲品，或由于雷击、粗心或内战时联邦军舰的攻击而葬身海底。还在服役的大多数飞剪船要么卖给其他国家，要么改造成运煤或运木船，对于曾经是美国商船之傲的飞剪船，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美国飞剪船的兴起与衰落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这段时期内，对华贸易的宏大叙事中，既有未克的期望，也凸显可怖的人性。

第十章　褪色的财富

“挪威”号甲板上愤怒的中国苦力

284 鸦片战争结束后，《望厦条约》的签订让许多美国商人对中国贸易的前景充满期待。对于条约确立的新秩序，著名的《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编辑亨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
285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商业革命之一”。他将中国开放门户与发现新大陆相比，认为两个地方都具有“人数众多、勤劳能干的人民”，他相信，中国人很快就会要求购买更多的美国货。[1]

亨特的乐观态度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人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数亿中国人释放出消费主义的浪潮，好赚个盆满钵满。然而，这一梦想并未成真。从 1844 年直到 1869 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确实有所增加，1860 年最高时达到约 2200 万美元，后来的近 10 年中平均贸易额也有大约 1500 万美元。但是，考虑到美国同期对外贸易量增长了近 3 倍，这一成绩很难说有什么亮点。这一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为 1300 万美元，仅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 2.5%，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名单上，中国大多数时间名列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古巴、巴西之后。因此，1844 ~ 1869 年期间的美国对华贸易，虽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也成为许多公司和个人的财富来源，却没能如人所愿，带来名副其实的经济利益增长。[2]

落空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对美国产品实在了无兴趣。虽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种类极多，包括铁、鲸油、枪支、煤油、猪肉、牛肉、烟草、玻璃、鞋子、皮革、木材，甚至从池

塘和湖泊凿下的冰块①，但所有这些产品的销量都很有限。美国出口到中国产品的大宗是棉织品，到了后期，小麦、面粉、西洋参、煤炭的数量也愈来愈多。在进口方面，情形也大抵相似。

虽然美国人小规模地进口许多中国货物，包括黄铜、染料、大黄、咖啡、稻米、瓷器、姜、亚麻籽油，唯一上规模的还是茶叶，还有数量稍逊的丝绸。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持续入超，备受约束。许多年里，美国进口的货物价值2倍于出口货物，差额主要靠伦敦汇票、银币和金银块来弥补。[3]

英国海关官员赫德（Robert Hart）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初在中国任职，他曾精辟地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面临的困境，自从西方想要染指中国市场开始，这一阴影就挥之不去。他说，“许多人认为遥远的中国人口众多，无论外国人带来什么东西，数量多少，都能畅销无阻”，而实情却是中国不靠对外贸易也能自给自足，因为“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丝、毛皮。拥有了这些产物和无数各地土产，他们连一个便士的外国货也不需要”。[4] 尽管赫德对于中国人可以自给自足的看法有失偏颇，中国进口的许多货物就是明证。但他的基本论点依然成立，中国人并没有无限的需求，而对于美国能提供的货物，中国人更是兴趣索然。

286

① 为防止冰块融化太多，会覆上锯末。

美国内部的冲突也是对华贸易相对疲软的原因之一。南北战争打乱了南方棉花到北方工厂的运输，因此成品棉织品的出口也受到影响。大多数美国商船被联邦军舰击毁，许多参与对华贸易的船只也付之一炬。其中损失的货物以及战争对商业环境的破坏都抑制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

中国淘金梦破灭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并不像许多美国商人想象的那样富有。财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除了少数富人，
287 绝大多数中国人极为贫困。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屡遭大规模内乱、叛变以及严重自然灾害（洪水、干旱、饥荒）打击，经济状况举步维艰。这种情况下，购买外国商品自然退居生存问题之后。[5]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时期，中国人手中也并非毫无余钱，只不过多用来购买鸦片。

鸦片战争后，这项贸易死灰复燃。[6]《南京条约》对鸦片只字未提，英国人自是求之不得，他们很快就运来创纪录数量的鸦片，并在中国沿海雇佣走私贩。鸦片的进口仍属非法，但中国当局刚刚遭受了因鸦片贸易而起的惨烈战争，当然不会积极打击鸦片交易，以免引来新的冲突，尤其是清朝统治者还疲于镇压叛乱。而条约的治外法权规定英国人只受英国法律约束，因此，至少在法律上，他们贩卖起鸦片就无所顾忌，况且这项生意还继续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每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已超过 5 万箱，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数量稳定在 7 万箱上下，其中 1855 年更达到 78000 箱，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英国人。美国商人

也步英国后尘。虽然《望厦条约》中载明，美国人若被发现走私鸦片则交由中国司法当局论处，美国国旗也不得用于掩盖走私活动，却并未明文禁止美国人贩卖鸦片。从事鸦片买卖的公司中，旗昌洋行和琼记洋行得利最多，以致美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夕声称，“无意看到鸦片战争再兴”。此时，美国船只的鸦片多数来自印度，而非土耳其，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参与程度远超美国，后者的年输入量从未超过5000箱，往往更少。虽然份额不高，美国人一年的收益最高可达到200万美元，这项进账都被用来购买中国货物。

鸦片贸易的动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发生变化，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自然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多份条约并未解决有关鸦片交易的矛盾，也没有改善签约国之间的关系。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多年里，英国、美国、法国常常因为中国未能充分实施协议中的某些条款而大为光火，而中国人对这种条约的极度不平等和羞辱性质以及迅速蔓延的非法鸦片交易也同样不满。这些年中，双方摩擦频繁，还发生多次暴力冲突。西方国家催促中国重新修订条约，纳入更加有利于外国人的条款，中国政府一概拒绝。而最具争议的要求出自英国，他们希望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要实现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诉诸武力。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导火索。1856年，广东水师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亚罗”号搜捕嫌疑的海盗。英国政府将之

视为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以此为由出兵中国。和英国一起的还有法国。促使法国参战的部分原因是一名法国传教士遭到逮捕并被斩首处死。美国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中国攻击美国军舰时也予以还击，炮击并占领了珠江口的中国炮台，在另一次战斗中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海军支持。

西方的联军再一次击败中国，洗劫并火烧了北京城郊外的圆明园，捣毁了数百处建筑，将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无价珍宝打碎或拖走。曾参与行动的一个英国船长写信给母亲，“你很难想象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精美宏大。烧了这里让人心痛，事实上，这里面积太大，我们时间很紧，只能草草抢点东西……对军队来说，这不光卑劣，更是堕落败坏。每个人都发了疯地抢东西”。[7] 而这次报复行为的起因，是为了对近四十名英国和印度战俘遭受的折磨还以颜色，他们中的一半遭酷刑而死。

1860 年，战争最终结束后签订的多项条约（最终也适用于美国）包含了更多新的条款，包括向外国人开放更多口岸；外国人持有有效护照，就可以在中国全境旅行；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收取鸦片税。西方人十分欢迎这些条约，而对于中国人，这是又一批不平等条约，践踏了中国的权利和主权，反映了帝国政府捍卫领土的无能。鸦片贸易合法化让鸦片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造成的伤害尤其深重。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鸦片输入量暴增，最高达到每年 93000 箱，此外，中国本土种植的鸦片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在鸦片交易合法化之后，由于其他外国商人经营成本更低，竞争加剧，美国的份额迅速降低。到了19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人已经完全退出鸦片贸易。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1860年之间，美国在鸦片贸易中依然是主力之一，这项贸易可 290
能已经成为销售美国货物的障碍，因为中国在鸦片上支出了高额费用，占用了中国人可用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购买西方产品。如福布斯指出，“如果能废除鸦片贸易，毫无疑问，制造品可以卖得更多，完全可以弥补损失，因为中国会有更多的可支配现金，也会有更多的产业去支付这些产品”。因此，虽然美国的鸦片贸易为美国商人带来了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白银，也使少数美国公司因此致富，但对于在中国出售美国商品却毫无帮助。[8]

美国商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参与的还不只是鸦片贸易，更恶劣的是在苦力贸易中扮演的角色。

拉丁美洲的种植园经济从16世纪晚期兴起，到了19世纪中期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几百年来，种植、收割蔗糖、烟草等作物的大量劳动力主要来自非洲黑奴，他们从故乡被强行拉来，运到这里的人间地狱。但到了19世纪早期，参与奴隶贸易的主要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美国纷纷禁止奴隶贸易。虽然奴隶交易并未停止，但经由大西洋输送的奴隶数量却大大减少，尤其是英国利用外交和海军优势积极实施新的限制。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决定释放本国的黑奴。禁奴以及奴隶解放运动造成拉丁美洲劳力严重短缺，同时，

291 对种植园作物的需求却在上升。雇主们加强了寻找新劳动力的工作，苦力贸易因此出现。[9]

英文“苦力”（coolie）一词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些人说这个词来自一个印度部落的名字 Kholees，这个部落的族人在印度被用来做粗活，或作为“荷担的人”。也有人认为，这个词是中文“苦力”的音译。无论哪种说法，这个标签首先是用在了英属毛里求斯的印度劳力身上。19 世纪 30 年代，他们被运往这个非洲东南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在甘蔗田工作。但这个词更多还是用来描述被送往拉丁美洲的中国人。据估计，1847 ~ 1874 年间，19 个国家的船只将 25 万中国苦力运往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美国。其中大部分人的终点是古巴和秘鲁。[10]种植园对吃苦耐劳的中国苦力需求量很大。一名经验丰富的蔗糖种植园老板在 1848 年写道：“在我知道的所有劳工中，进取心、精力、节制、智力、动手能力、体力、耐性、乐观、节俭这些特质总体而言，没有人能和中国人相比。”[11]

名义上，苦力属于合约劳工，自愿按固定的报酬工作特定的年限（一般是八年），直至合约结束，回到祖国。但事实上，他们的境遇无异于奴隶。尽管皇帝禁止出洋，但中国的招工者总是能轻松找到足够的人数，加上地方官员的漠视或暗中勾结，他们有很多办法让中国男人以及少数女性成为苦力。

一开始，招工者的手段只是简单的劝说和欺骗。大范围的旱灾和饥荒以及战争和内乱的破坏，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从

内地前往沿海城市谋生。招工者提供衣食和住处，吸引这些绝 292
望的贫民集中到“巴拉坑”（barracoons），即招工馆，等待出海。只要先付一笔小钱，招工者就能说服这些社会边缘的难民成为苦力，告诉他们，海外机会遍地，比中国好得多。作为服务的回报，运输苦力的代理商或船长按人头向招工者支付报酬。

随着对苦力需求的上升，招工的报酬也水涨船高，几乎和一名中等中国劳工的年收入持平。这大大刺激了招工者，但欺骗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他们于是想出了更多新花样，向内地的贫民许诺，未来的工作报酬优厚，还可能学习一门手艺。这一点十分有效，因为凋敝的经济造成大量底层贫民，为改善境遇，他们会急切地抓住眼前的机会。很多时候，招工者还兼具朋友或家人的身份，这让他们的言论更具说服力。然而，满怀希望的劳工们一到港口，招工者就会告诉他们，由于无法说明的原因，原先的工作都没了。接下来，招工者就会提出，从当地的代理商那里，为手足无措的寻工者安排贷款或预付款。当然，贷款一发放，代理商就会叫来寻工者，明知他们无力偿还，便帮助这些人“自愿”成为苦力，打工还债，许多人只得被迫同意。

此外，招工者还利用中国人好赌的特点设套。他们安排巨大的赌船停泊在主要港口的码头，雇佣人手到城中的穷人中拉生意，怂恿他们上船试试手气，还允诺提供赌金。如果不幸输光了招工者慷慨提供的赌资，就只能做苦力还债。也有的苦力

293 是在家族斗争中失败，被卖到这里。还有人则根本是被绑架而来。[12]

时间一长，巴拉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荷枪实弹的守卫经常殴打被关押者。巴拉坑内污秽不堪，中国人称之为“猪仔馆”，在等船的时间里，不少苦力因病或自杀死在这里。而在巴拉坑的悲惨处境还只是开始。上船后，他们像货物一样被丢在甲板夹层，在海上行程中鲜有走动的机会。虽然不像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上的非洲黑奴被链条锁住，中国苦力所处的环境也极其恶劣，在漫长的海上旅程中，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挤在同一个燠热拥挤、昏暗恶臭的空间里。苦力们睡在和船只长度一样的狭窄木架上，没有通道或其他东西隔开。船上提供的食物，虽然常常已是腐烂恶臭，分量也十分有限，几乎无法赖之存活。舱口的铁栅栏既是为了限制苦力的活动，也是为了防止他们拿取货仓的补给品。这里和船长与船员在上层甲板的起居舱用厚重的障碍隔开，在另一边，全副武装的船员们会警惕地防范着这边的乘客。苦力们偶尔会被允许上主甲板透风，尽管如此，也常常遭到鞭打，让他们保持列队前进。[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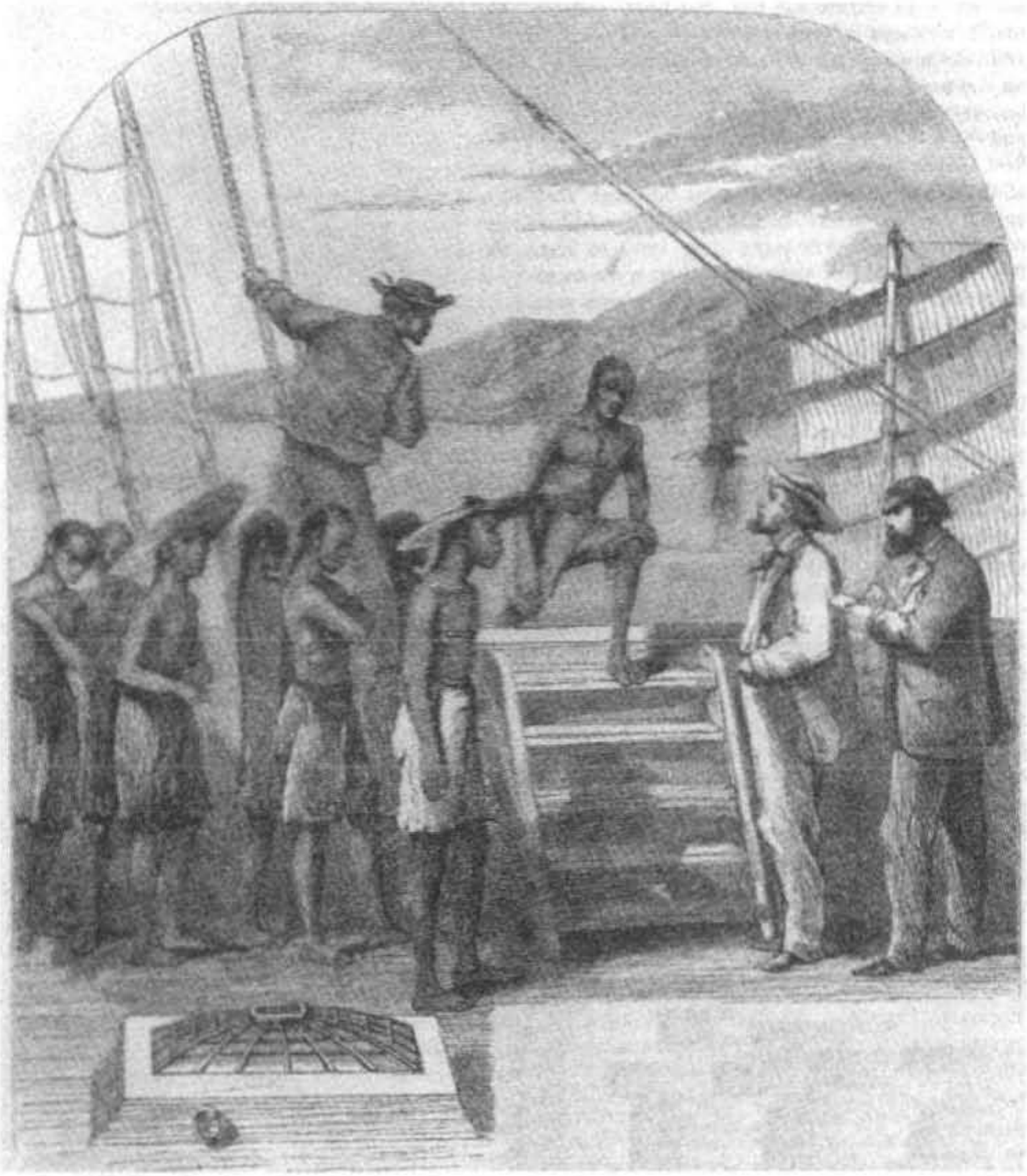
不少苦力背井离乡，却前路茫茫，看不到半点希望，以致沉海自尽。还有一些人采取了更激烈的反抗方式。1847～1874年间的736次航程中，发生了68次暴动，结果造成超过4000名中国人、12名船长和至少200名水手丧生。其中最悲惨的一次是发生在美国船只“威佛利”号的骚乱。[14]

1855 年 10 月 25 日，目的地是秘鲁的“威佛利”号载着 450 名苦力到达菲律宾马尼拉。船长已经在几天前因痢疾身亡，大副法兰奇则不愿在没有船长的情况下继续航行，于是临 294
时停留马尼拉。但地方当局担心痢疾传染，于是隔离了船只，并安排开往马尼拉 15 英里外的甲米地观察。10 月 27 日，法兰奇称，苦力厨师拒绝开工，除非拿到工钱。法兰奇的答复没能让华工满意，他们陆续走向船尾。法兰奇要求船员拿起武器，混乱中，四五名苦力中枪，其他人都被迫回到下面。当天晚上，法兰奇发现，苦力偷出了补给品，还打破水箱。暴怒之下，他射杀了一名“放肆的”华工。没过多久，苦力们试图打开前舱口，但法兰奇和船员们将他们击退，并用板条封锁了所有的舱口。入夜后，法兰奇从板条空隙灌入热水，想“吓吓他们”。

第二天，“威佛利”号代理商的代表登上船，命令法兰奇打开舱口。此时，已有近 300 名华工丧生，法兰奇却辩称是他们“互相杀害”，但真实的原因是窒息而死。法兰奇和其他船员被逮捕，等待调查，其余的苦力则被赶到一只德国船上，继续前往秘鲁的航程。[15]

更不光彩的事件则是发生在美国船“挪威”号上的暴动。[16]“挪威”号 3000 吨，有 60 名船员，从纽约出发后，先在中国海向美国海军中队交付了一批煤炭，于 1857 年抵达香港。这年一大半时间里，“挪威”号都停在港口，希望招到足额的苦力，同时，也在翻新船只，以容纳新招来的人。和所有运输苦力船

一样，“挪威”号停在距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以防潜逃，1037名苦力只得搭舢板上船。离港后不到24小时内，两名苦力自杀，一人被勒死，船方鞭打苦力之后，争斗爆发。



苦力登上“挪威”号

第三天，守卫平息了另一场暴乱，然而，事态并未就此平息。有人从厨子那里偷来切肉刀，猛打另一名男性，伤者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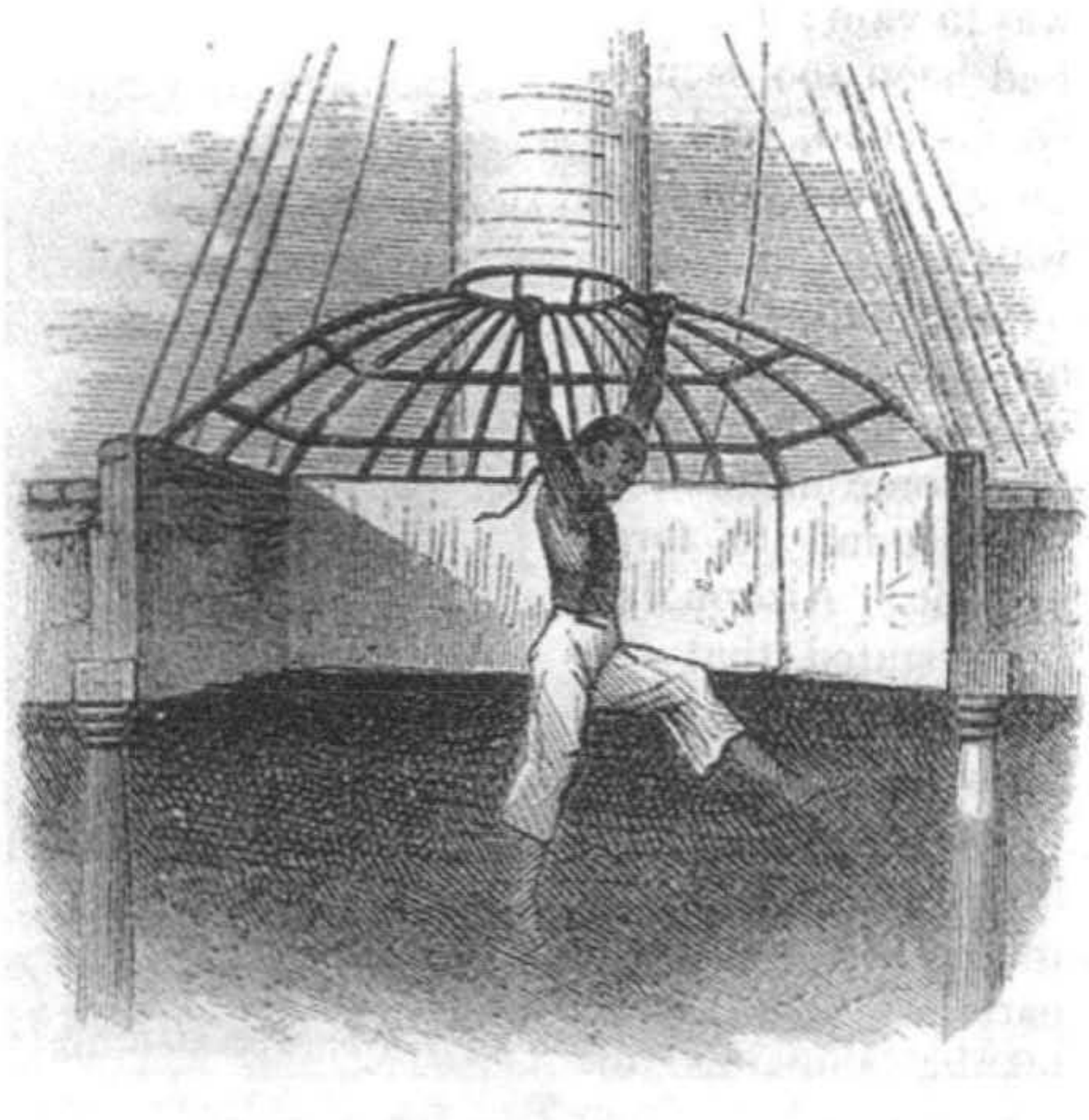
名挑起争斗的人被送到主甲板，船上的外科医生处理了伤者，后者要求和船长私下谈话。在翻译的帮助下，伤者告诉船长，有些中国人正谋划夺取船只，他们已经和带头发起暴乱的人交手。翻译对这一情况非常震惊，虽然确有其事，但船长却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平静的两天过去后，到了第三天的午夜时分。“突然间，前甲板闪出一道明亮的火焰，仿佛上万魔鬼的吼声震彻原本安静的夜晚。”船员立即拿起武器，锁上了主舱口。华工们用力 296
将舱门推开了一半，一名船员向带头的开枪，将他踢回下面，舱口再度关上，更严实地锁住。“一上来的挫败激怒了被困的华工，他们大喊着跑向一个个舱口，挥舞着点燃的木棍，试图拧开困住他们的铁条，一看到有人向下探头，就扔出螺丝和棍子。”

船员用油布盖住了一些舱口，并向舱内灌海水灭火。火焰熄灭后散发出浓烟，迫使华工们聚集到未被封住的舱口，但一露头，船员们就开枪射击。一整夜，火焰不断点起、熄灭。破晓时，船长发话，要求交出暴乱的带头人。华工则递出一份血书，写明他们的要求：“一次性允许三百名苦力登上甲板，操纵船只，开往暹罗，一部分人可在那里下船，这之后，船只可继续按原定路线航行。不得发出任何信号吸引其他船只注意。”他们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就会放火烧船。

船长断然拒绝要求，并放下船只的救生艇，以便需要时紧 297

急撤离，并警告华工，如果真的烧船，他们会窒息，与船同沉海底。第二天白天，风平浪静，到了晚上，华工再次发难，用纸点火送到舱口，试图驱散守卫。又过了一天，他们的意志终于崩溃，也不再幻想控制船只，并“请求宽恕”，“挪威”号继续开往古巴。在失败的暴动中身亡的七十名华工被扔下船，葬身大海。



“挪威”号上的苦力试图突破舱口

降临在苦力船的厄运还不只是暴动，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1859 年 10 月，载有 850 名苦力的美国飞剪船“花神殿”号从

澳门出发后不久就发生暴动。船长迅速镇压了事端。第二天，狂风大作，船不幸触礁。救生艇勉强坐下了 50 名船员，向 300 英里外的海岸划去。他们回望“花神殿”号，只见船只严重倾斜，海浪不断冲上右舷船尾，船上的华工都挤到上甲板。14 天后，5 艘救生艇中的 2 只到达法属交趾支那（今越南）的土恩（Touren）。船长立即请求一个法国舰队的司令搜寻失事船只并营救中国人。当法国人找到那块礁石的时候，已经无人生还，只留下船只的几块残片。[17]

然而，在去往南美的旅程中，中国苦力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还不是暴动或意外，而是疾病。据估计，痢疾、坏血病和其他疾病夺去了 26000 中国苦力的生命，加上死于其他原因的人数，使得苦力的死亡率达到 12%（而在 19 世纪通过“中央航道”运输的非洲黑奴中，死亡率为 10% ~ 15%）。苦力船因此常常被称为“漂浮的棺材”。[18]

* * *

苦力到达目的地后，境遇也未见好转。1874 年，前往古巴 298
调查的中国官员根据苦力提供的 1000 多份证词和 85 份诉状编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煎熬。

> 据各华工禀，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十居八九……迨装到夏湾拿[①]发卖为奴，其买在人家铺店者无几，业经受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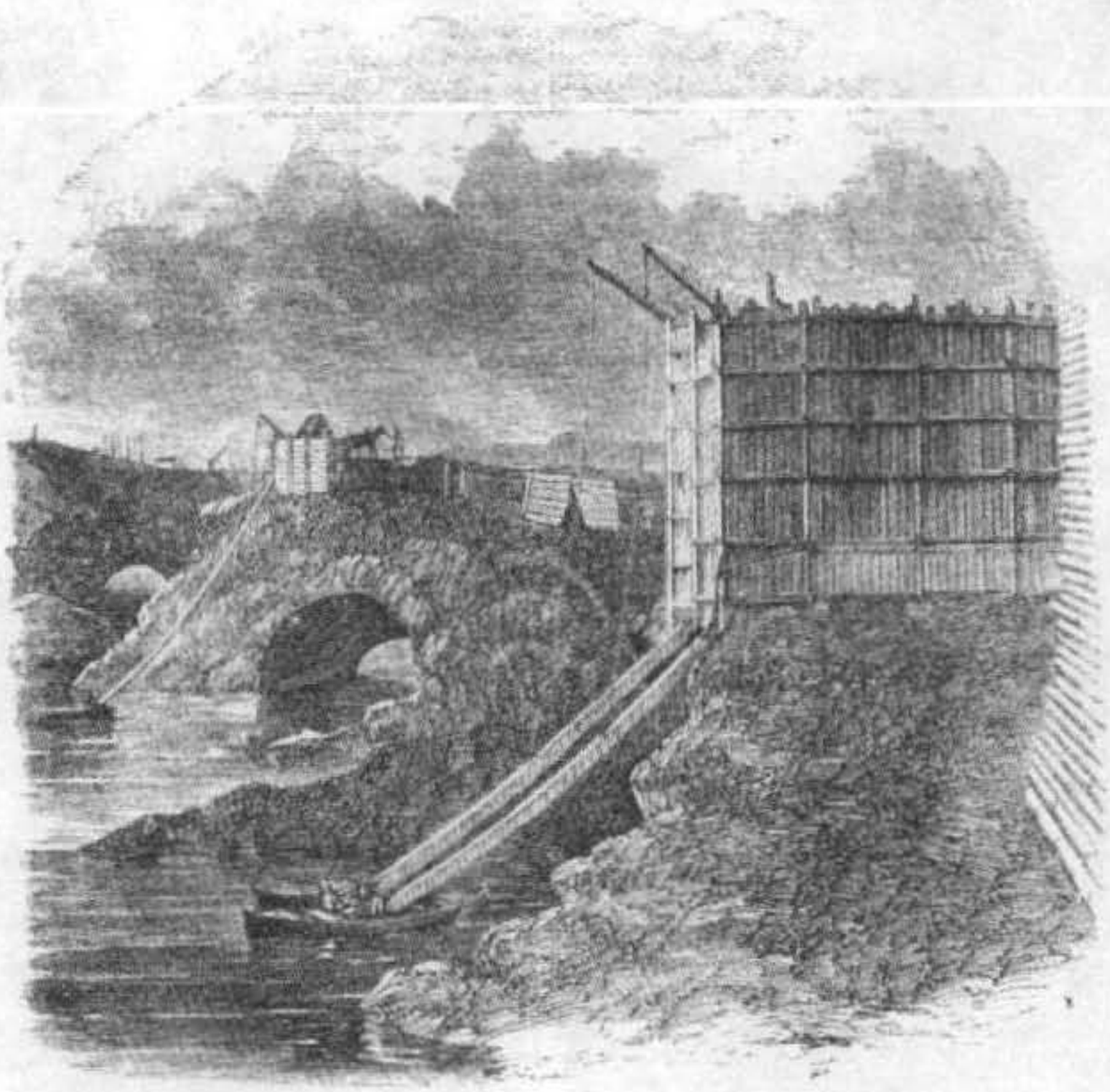
① 即哈瓦那。——译者注

> 至买入糖寮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工作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19]

到达南美洲的中国苦力中，绝大多数进入古巴的蔗糖和烟草种植园，秘鲁的蔗糖和棉花种植园，也有一些去往别处。大约有几千人被送往秘鲁沿海外约 13 英里的钦查（Chincha Islands）群岛挖鸟粪。从远古以来，钦查群岛的三个小岛就杳无人迹，于是成了无数飞鸟的天堂，包括鸬鹚、鲣鸟、海鸥。日积月累，这些鸟类的排泄物堆积的厚度可达 150 英尺以上。由于富含磷、氮和其他成分，鸟粪是优良的肥料，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就逐渐有船只（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来到钦查群岛，将这种散发着恶臭的货物运回本国，作为重要的肥料。在 1850 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高峰时期，1000 多万吨价值数亿美元的鸟粪从钦查群岛运出，其中大部分时间，鸟粪是秘鲁最重要的出口产品。随着规模的扩大，就需要更多的劳工，因此苦力被拉来填补空缺。[20]

即便和蔗糖、烟草、棉花种植园的劳工相比，挖鸟粪也堪称地狱般的工作。《纽约时报》（*New Yord Times*）记者 G. W. 派克（George Washington Peck）曾在 1853 年到访过钦查群岛，

记录下他的见闻，“这项工作极为繁重，更甚于我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他们被迫在烈日下努力工作，整天如此”。每名苦力，“无论强弱”，每天都要挖出五吨鸟粪，再用手推车运到四分之一英里外，倒入通往船只货仓的溜槽。由于岛上从未有过降雨，鸟粪非常“坚硬，像黏土一样，挖开之后则粉尘飞扬”，苦力经常会被呛到，眼睛、喉咙、肺部被灼伤。华工们在热带骄阳下每日几乎赤身劳作，“黑人司机”手持皮鞭站在他们中间维持秩序。生存条件之恶劣，以致每周都有一些苦力不堪痛苦而自杀，以求“逃脱命运”。[21]



鸟粪沿溜槽运到小船上，随后转送到在岸边等候的大船，约 1858 年

许多苦力则完全是劳累致死。据估计，古巴的半数苦力，以及秘鲁大陆的三分之二以上苦力，都在契约到期前死去。而在钦查群岛工作的华工中，这一比例则更高。对于契约到期还幸存的苦力，许多种植园主人根本无视契约，依然强迫他们照旧做工。有些人被安排签订新的契约，否则就会被监禁。还有一些人干脆逃走，不知所终。能够重回故土的人寥寥无几。[22]

美国从一开始就间接参与了苦力贸易。部分“贩奴”船即出自美国人之手，并凭借“外观和速度著称于世”，另外，美国也是蔗糖和鸟粪的主要市场。从1852年开始，美国直接投入到这项贸易。当年，“俄亥俄”号将300名中国人从中国运往秘鲁。接下来的10年里，共有62艘美国船只参与了苦力贸易，据估计，头6年里，美国船只总共运输了4万名中国劳工。这些船的所有者因此赚取了数百万美元。[23]

许多美国苦力船是和“花神殿”号一样的飞剪船。这些海上快船一度为美国商船专用，现在退而参与苦力贸易实为供需作用的结果。茶叶贸易中英国飞剪船的兴起，加上加州金矿的财富逐渐褪色，许多美国飞剪船失去了用武之地。精明的船东当然不想让船闲置在码头，于是将之投入苦力贸易。“西进”号、“飞车”号、“挑战”号、“白头鹰”号、“海巫”号这些一度显赫的名字也因为涉及可耻、不人道的人口贸易而光彩尽失。[24]

在美国直接加入苦力贸易前后，美国各界民众和政府官员都对这种行径加以斥责，其中最激烈的抨击来自以反对非洲黑

奴贸易闻名的废奴主义者。1855 年，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在发出第一份正式咨文时，深刻批评了苦力贸易。他说："过去几年里，美国和其他国家船只贩卖中国苦力，目无法纪，惨无人道，暴动频生，和早些年非洲黑奴贸易的情况如出一辙，有些情况之悲惨，更甚于'中央航道'。"尽管中国政府的法律禁止贩卖人口，规定对参与者处以极刑，但苦力"不仅被各种借口诱骗，对目的地一无所知，有些人还被暴力劫持到完全陌生的国度，永诀故土"。伯驾号召"所有美国公民停止这种既不合法，也不道德，美国政府也不赞成的交易"，并警告继续从事的人，他们将失去政府的所有保护，独自面对任何惩罚。[25]

伯驾的呼吁以及政府和媒体的广泛支持，触发了美国终止苦力贸易的立法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媒体站在伯驾一边，认为苦力贸易与非洲黑奴贸易等同。《纽约时报》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打击不道德的（苦力）贸易。为苦力贸易辩护的借口和黑奴贸易如出一辙。有人说苦力在本国受到压迫，到其他国家之后境遇得到改善。但这些借口经不起推敲，早已被人识破"。有些出版物则更尖锐地指出，多数运送苦力的船只并非是南方蓄奴州的公司所有，而是反奴情绪正炽的北方各州的商人所有。参与这项"新式奴隶贸易"［废奴刊物《解放者》（*Liberator*）所称］的商人，要么是伪君子，或者更恶劣，是南方（蓄奴）的支持者。[26]

1862 年 2 月 19 日，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利用美国

船只从事苦力贸易，并经林肯总统签署，美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禁止这项贸易的西方国家。而输往拉丁美洲的苦力贸易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真正结束，当时的中国政府和葡萄牙、西班牙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一起，采取了有效措施，最终废除了这项贸易。[27]

第一批中国苦力踏上拉丁美洲的土地不久，另一批几乎全是男性的中国人，受到加州发现金矿的吸引前往美国。[28]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寻梦者一样，数万中国人不远万里，满怀希望，来到这片他们称为“金山”的地方。同时代的人也把这些人称为中国“苦力”。但来到加州和去往拉美的中国人少有共同之处。几乎所有淘金者都是真正自愿而来。虽然有些引诱他们到加州的广告也免不了欺骗，描绘一夜暴富的捷径，但登陆加州的中国人很少面临拉美的同胞们经常遭遇的暴力招工。相反，前去加州的多数中国人或自筹费用，或利用所谓的“赊票制”。根据“赊票制”，华工到美的船费由另一人支付，通常是在香港或旧金山的中国商人，而这名华工则同意用在美打工所得偿还票款。债务还清后，这些华工就可以回中国，或留在美国寻找其他工作，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有些人确实靠淘金挣到了钱并且衣锦还乡，更多的同乡因此争相效仿，去加州碰运气。但在这一波以自愿为主的移民潮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性贸易”。中国女性被招工者诱骗或胁迫，甚至是被家人卖掉，来到加州之后，就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沦为妓女。

但这并不表示，在金矿工作的中国人可以轻松发财。到美国的旅程充满了悲剧，劣质的食物、拥挤的船舱或病死都属常见，每一程都会出现暴动。在加州的中国商人对华工十分恶毒，甚至为维持秩序施以体罚。虽然在淘金热的早期，中国人提供了急需的廉价劳力，因此多数情况下，至少能被接受，但随着金矿渐渐枯竭，他们的境况也迅速恶化，被白人工人视为竞争对手。华工很快便遭遇了各种形式的虐待。他们往往被排斥，报酬过低，税负过重，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毫无保障，还常常被雇主或煽动者骚扰或殴打。

此外，报纸杂志和寡廉鲜耻的政客也常常将他们妖魔化，说华工一有机会就会抢了美国劳工的饭碗，跟白人通婚玷污白人的血统，宣扬自己的宗教，损害基督教的纯正。19 世纪 60 年代，华工作为重要的劳动力修筑横贯大陆铁路时，类似的问题和争论也不时出现。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早期，美国对中国人的敌意不断上升，并随着 1882 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颁布达到顶点。这部法案规定，十年内中国劳工不得进入美国，也成为第一部根据种族或国籍禁止外国人入境的美国法律，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此类法律。

虽然这段时期来到美国的华人遭遇令人同情，但比起被送往南美的苦力，还是大有不同。除了被迫卖淫的女性，到美国的华工不必像奴隶一样工作。他们也没有将自己视为奴隶，而是为了改善境遇、赡养国内的家人而寻找机会的自由劳工。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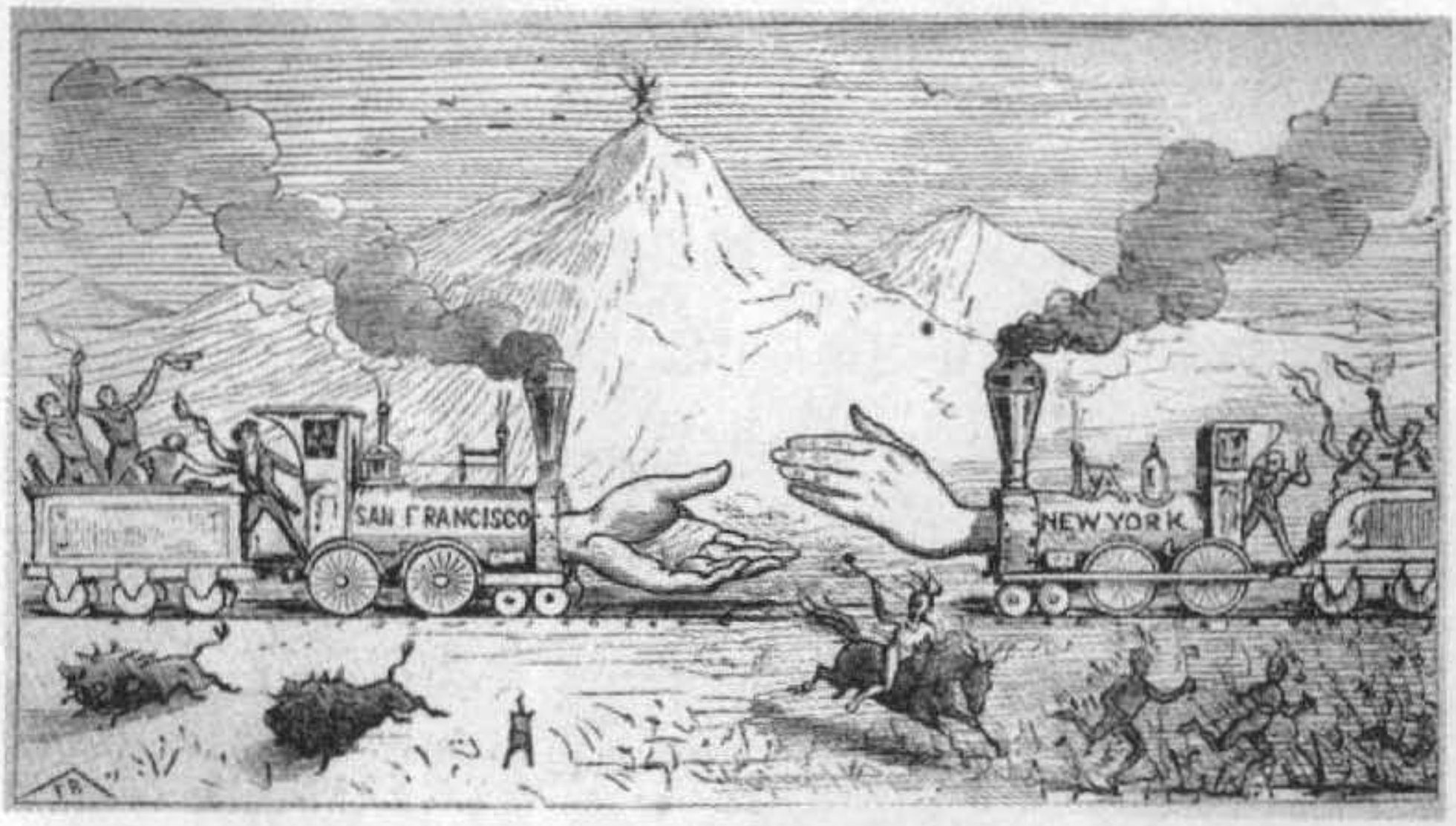
们并不像苦力那样被当成商品买卖。正因为苦力贸易和赴美华工之间的不同，苦力贸易才成为美国对华贸易长河中的一章，而后者则不在此列。

1869 年 5 月 10 日，犹他州普瑞蒙特瑞峰金钉子[①]正式敲入，宣布了横贯大陆铁路的竣工，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又一个转折点。改变的契机部分来自这条铁路本身，以及在北美大陆快速运转货物的机会。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深信，开启这样一条商业通道将改写美国的对华贸易。A. 怀特尼（Asa Whitney）是第一个预见到这种新局面的美国人。怀特尼早年靠对华贸易起家，很早就倡议修建横贯大陆铁路。1845 年，他提出从密歇根湖到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一条铁路线。为了说服国会拨给铁路所需的公地，他计算了从纽约市到中国厦门的全程距离，先横穿大陆，再经过太平洋，总里程为 9200 英里。

306 怀特尼对国会说："这段路程如果走海路，长达 17000 英里，耗时 100 到 150 天，如果有了通往太平洋的铁路，再用蒸汽船到中国，只需 30 天就可到达。这样，康涅狄格州、罗得岛、马萨诸塞州的棉布和美国的其他产品就可以在一个月内运到中国，反过来，中国的茶叶和华丽的丝绸也可以在 30 多天里抵达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纽约、波士顿。"[29]

---

① 当日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交会，连接成第一条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为了永久纪念这一成就，在两条铁路最后的接合处，钉上了一根特制的金钉子。——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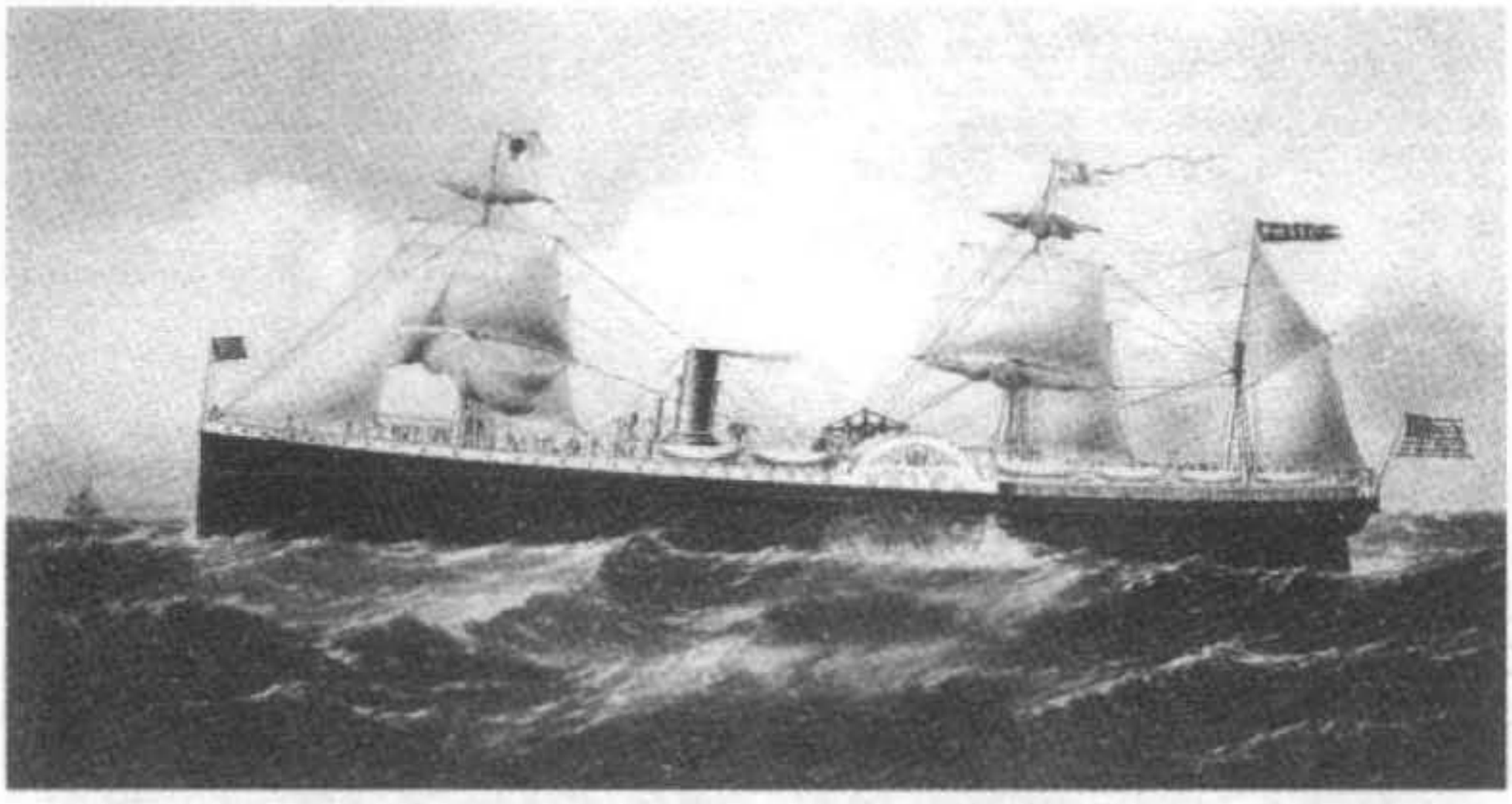
寓意画：犹他州普瑞蒙特瑞峰横贯大陆铁路连通，F. 莱斯利的《图片报》（1869 年 5 月 29 日）

多年以来，许多人成为怀特尼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密苏里州议员 T. H. 本顿（Thomas Hart Benton），西进运动的坚定推动者，他对美国的天命扩张坚信不疑。在倡议修建到太平洋铁路的同时，他也特别提到扩大对华贸易的因素：

> 从北美洲西海岸到亚洲东海岸的贸易都会走上正轨，不仅我们将得利，子孙后代也将受益……美国通往印度的路线也可以为欧洲人所用。欧洲商人和美国人可以横穿美 307
> 国大陆，直抵中国。亚洲丰富的商品也将经过我国的交通枢纽流通。这些商品流经之处，就会带来财富，建立统治……对于参与的国家和民众，亚洲贸易永远都能带来最高的财富和实力。[30]

除了横贯铁路的完工，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转折点还另有原因。怀特尼在演讲中就提到另一个关键因素蒸汽船。这条铁路竣工之际，帆船航海的时代已经没落，蒸汽船在全球的贸易往来中逐渐取代了帆船的地位。虽然帆船并未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依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输送着商品，但这股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蒸汽船能够始终保持高速航行，无论天气如何，因此已成为未来潮流所向。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最重要的单项产品仍是茶叶，其中近半数是由使用风帆作为辅助动力的蒸汽船输送。



蒸汽船“中国”号，1867年下水，360英尺长，3800吨，太平洋邮轮公司所有。从旧金山运送乘客和货物至横滨和香港，并带回茶叶、稻米、丝绸和其他亚洲货物，以及数千名日本和中国移民。Endicott公司石版画，纽约，约1867年

许多人和怀特尼的看法一样，认为铁路加蒸汽船的组合无出其右，对华贸易也将凭借这两种交通方式，在多年稳定增长后最终爆发。然而这些希望并未成真。相反，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尽管美国的对华贸易有了大幅增长，美国的对外贸易整体发展速度更快。对华贸易在美国的国际贸易份额中降至2%以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始终倾向中国这一边。[31]不过，这段故事以及20世纪到21世纪的美中贸易史，已非本书旨趣所在。

后记　历史的回响

马萨诸塞州米尔顿福布斯之家博物馆。这座希腊复古式宅邸是 1833 年由 R. B. 福布斯和 J. M. 福布斯为其母 M. P. 福布斯所建。

回望历史之时，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出发。考察过去对 309
现在的影响，以及今日与往昔之不同，有两种方式最具启发。
首先，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历史阶段无疑与当下息息相关。漫
步美国各地，我们都可以发现见证美国早期对华贸易史的丰
富实物。许多美术馆和历史博物馆都藏有从中国远道而来的
精美器物。无数美国人的珍藏之中，都不乏可以溯及 19 世纪 310
甚至更早的中国物品。重要的对华贸易商营造的宅第已成为
当地的景观名胜，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包括马萨诸塞州米尔
顿的福布斯之家博物馆，罗得岛新港的舒墨别墅。这些豪华
宅第中有些已向公众开放，生动地展现了早期贸易利润之丰
厚。所有这些有形的实物都展示了对华贸易是如何影响了美
国人的审美和文化趣味，其中中式美学对于增进理解与欣赏
功不可没。

对华贸易曾经作为掘金之路而改变了美国人。许多最重要
的对华贸易商透过各种商业冒险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也
帮助美国奠定了 19 世纪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其中，最受青睐的
投资机会是横跨大陆并连接各州的铁路。比如，R. 本内特
（Robert Bennet）的兄弟，著名对华贸易商 J. M. 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出资修建了密歇根中央铁路以及芝加哥、伯灵
顿、昆西铁路，并参与管理。福布斯兄弟和其他对华贸易商以
及当时的商业大亨，包括怀特尼、斯特尔吉斯、阿斯特、布朗、
顾盛、德拉诺、帕金斯、罗素、罗伊等人，广泛投资于地产、
银行、矿业、纺织和保险公司。[1] 无论是修建基础设施还是积累

财富，这些投资都为美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许多商人乐善好施，身后留下了不朽的遗产，最令人钦佩的要数在“杰克逊时代”的1831年过世的吉拉德。在遗嘱中，他吩咐将总价值750万美元的房地产用于各项事业，包括支持弱者和残疾人，建设他挚爱的费城。他还从财富中拨出200万美元（这是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私人慈善捐款）为“贫穷的白人男孤儿”建立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现已成为一所私立住宿学校费城吉拉德学院，为所有种族家境困难的单亲（或监护人）家庭的男女学生（1年级到12年级）提供全额奖学金。[2]

然而，了解这些美国人的财富及善行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他们攫取这些财富造成的伤害。正如我们所见，许多美国对华贸易商财富的一大部分来自道德和法律上都不可原谅的鸦片贸易。虽然美国人并未参与鸦片战争，但仍应当对同流合污承担责任。

尽管这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永远的污点，美国大多数民众却对鸦片战争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中国人从未遗忘过这场战争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愤怒依然强烈。这两次战争（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中国人所共知，甚至成为中国人共同身份的一部分。林则徐被视为英雄，不仅是因为坚持原则，也是因为抵抗外国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普遍将鸦片战争视为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西方国家漠视中国权利和主权的明证。虽然有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已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并不仅仅是受害的一方，也应当对爆发冲突和

失败负起一定的责任，但普遍而言，这场战争仍被中国人视为惨痛的国耻。[3]

直到今天，鸦片战争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看待和回应西方的方式。当西方国家采取中国人眼中傲慢、自大甚至帝国主义的行径时，中国人的应对也深受这一悲剧性历史时期的影响。因此，西方人有必要熟悉鸦片战争，才能对中国人的顾虑更加敏锐，也更加客观地评价和回应中国人的行为。

这本书叙述的时代对今日世界影响显著，考察美国对华关系的种种改变也不无裨益。一方面，两国贸易空前重要。尽管到19世纪60年代，对华贸易之于美国也难以忽视，特别是在早期，但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所交易商品的经济价值和范围。但目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已是加拿大之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美国外贸总量的14%。曾经千万美元级别的对华贸易，现在的年交易量达到数千亿美元。此外，贸易品类也不再是早期的两大主导产品茶叶和丝绸，而是扩大到各类产品，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4] 虽然可以想象从共和时期开始到内战结束的美国社会可以没有中国产品，但几乎无法设想当代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中国产品将如何生活。因此，“中国制造”一度被视为劣质的代名词，如今却已经让现代生活许多必不可少的产品熠熠生辉。

在整个19世纪中期，对华贸易从未成为美国政策的重心。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忽视对华贸易，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和苦力贸易等问题甚嚣尘上之时，但也从不曾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放在

政策的核心（考虑到对华贸易对美国整体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有限，这一点也无可厚非）。

而在今天，对华贸易已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问题之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虽然这种担心是否成立还有争议，但对华贸易的这一特点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如此：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数额远高于对中国的出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为美国商品提供无限广阔市场的旧梦，依然未能实现。[5]

虽然当今的贸易赤字和以前类似，其他的经济状况却有了全新的面貌。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联系不再局限于进出口，而扩展到更深入的投资联系，包括企业、制造厂、资本的跨境流动。这些扩大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赤字一样，已经对美国造成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持有的美债金额以及美国公司搬迁海外造成的就业流失方面。无论如何，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相比以往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

密切的联系还凸显了美中关系的另一个变化。在对华贸易的早期，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现在已经大不相同。数十年的商业往来、合资企业和跨文化交流有力地增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近年来形成的关系比早期更加牢固。虽然美中关系中仍不乏分歧，许多问题依然横亘于两国之间，但客观地各自回顾历史，或许能让我们更加清楚自首次相遇之后，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并携手迈向未来之路。

致　谢

每本书的写作都是一段旅程，这一次有许多人陪伴我一起走过。这份名单上首先是对历史和事实进行记录或编年的作者和历史学家。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尾注和参考书目反映了他们的重要贡献。

审读和评价书稿的专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让这本书更加完善。为此，我想感谢 Bruce 和 Ann Belason、Rober Booth、Joan Druett、Caroline Frank、Ruth Rooks 以及 Lixing Sun。如有任何谬误，当由作者承担。

Liveright 出版社的编辑 Bob Weil 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为作者提供建议，改进作品，感谢他的工作。他很擅长塑造我的文章，鼓励我向深处挖掘，让故事更生动。我真诚感谢他对本书和我的信心。Bob 的助手 Philip Marino 和 Will Menaker 协助我完成了编写本书的许多步骤，过程得以顺利完成。

执行编辑 Nancy Palmquist 监督了本书的编辑和索引，安排 Sue Llewellyn 对本书做文字编辑，和《利维坦》（*Leviathan*）及《毛皮、财富与帝国》（*Fur*, *Fortune*, *and*

Empire）中一样，她娴熟、幽默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项目编辑 Don Rifkin 确保尽可能排除文中的瑕疵。艺术总监 Albert Tang 设计了漂亮的封面。我也要感谢 Able Illustrator 的 David Cain 绘制了书中华东和广州/澳门地区的精美地图。

我的代理人 Russ Galen 在写作、定位和出版方面给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指导。我很高兴成为他的客户，并得到他的意见和支持。

我还要感谢帮助本书成形的其他人，包括 Christine Bertoni、Dawn Bonner、Ellen McCallister Clark、Susan Drinan、Elizabeth Frengel、Jeanne Gambel、Pilar Garro，Keith Gervase、Alan Gehret、Florence Gillich、Frederic D. Grant，Jr. 、Carrie Hamel、Marie Henke、Elizabeth Laurent、George Lovely、Mary Elizabeth Nora、Lawrence Officer、Peter Parker V、Steve Potash、Rhys Richards、Joann Sacco、Doug Smith、Neva Sullaway、Robin M. Tagliaferri、Rodney Taylor、Giema Tsakuginow、Kathleen Wall、Louisa Watrous 和 Samuel Williamson。

我也要感谢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菲利普图书馆、马萨诸塞历史学会、阿伯特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 Adam Matthew Digital 的 Beth Hall 和 Lauren Edwards，他们慷慨地让我进入他们的在线资料库——“1793 ~ 1980 年的中国贸易、政治和文化”。

写作是孤独的艺术，但没有家人我也无法完成。我的兄弟 Stan 和 Ruth 总是很有耐心地倾听我最新的项目，并给我积极的

反馈。我可爱的孩子 Lily 和 Harry 总是让我开心，他们来到地下室——他们口中的“洞穴”——强迫我集中精力写作。对于我的妻子 Jennifer，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她有多重要，不只在我的写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最想感谢的人。为了让我写作，她付出了许多，没有她，我无法想象能成为作家。她是最棒的。

注　释

第一章　“追逐财富的冒险”

1 Philip Chadwick Foster Smith, *The Empress of China*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aritime Museum, 1984), 3 – 6, 74, 78; Samuel Shaw, *The Journals, The First Consul at Canton,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osiah Quincy* (Boston: Wm. Crosby and H. P. Nichols, 1847), 133 – 34, 137; and David M. Ludlum, *Early American Winters, 1604 – 1820* (Boston: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966), 64 – 67.

2 "New – York, February 26, *Salem Gazette* (March 4, 1784); and Smith, *The Empress*, 6.

3 "Charlestown, (South-Carolina) July 5," in *Continental Journal* (August 21, 1783).

4 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 – 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1), 108, 130, 174.

5 Charles Rappleye, *Robert Morris: Financier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7 – 10, 12; and Theodore Thayer, "Town into City, 1746 – 1765," in *Philadelphia: A 300 – Year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79.

6 Rappleye, *Robert Morris*, 13 – 14, 21 – 26,

7 Marla R. Miller, *Betsy Ro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0), 170; and Rappleye, *Robert Morris*, 71 – 74.

8 Rappleye, *Robert Morris*, 93 – 94, 227 – 277; Clarence L. Ver Steeg, *Robert Morris, Revolutionary Financier*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58 – 59, 65 – 77, 198 – 99; and Thomas M. 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236 - 40.

9 Ellis Paxson Oberholzer, Robert Morris, *Patriot and Financi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3), 91.

10 Ver Steeg, *Robert Morris*, 13 - 14, 29.

11 Ibid., 186 - 188; and Mary A. Y. Gallagher,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the China Trade: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odel," in *American Neptune* (Summer 1997), 204.

12 Jared Sparks,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John Ledyard, from his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1, 8, 12, 21 - 24, 30, 38 - 39, 46 - 47; James Zug, *American Traveler,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hn Ledyard, the Man Who Dreamed of Walk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1 - 34; Bill Gifford, *Ledyard, In Search of the First American Explorer* (Orlando: Harcourt, 2007), 3 - 55.

13 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 *Th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 vol. II (London: William Smith, 1842), 263.

14 Ibid., 232, 258 - 264; and John Ledyard, *A Journal of Captai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 and In Quest of a North-West Passage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76, 1777, 1778, and 1779* (Hartford: Nathaniel Batten, 1783), 70.

15 William Sturgis,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The Merchant's Magazine* (June 1846), 534; and James L. Bodkin, Sea Otter (*Enhydra lutris*), in *Wild Mammals of North America: Biology,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George A. Feldhamer, Bruce Carlyle Thompson, Joseph A. Chapman 辑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736.

16 Cook and King, *Th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 vol. II, 532.

17 Ledyard, *A Journal*, 70.

18 Zug, *American Traveler*, 129. 又见,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3.

19 Sparks, *Memoirs*, 173 - 174. 又见, Gifford, *Ledyard*, 129 - 133; Zug, *American Traveler*, 132 - 133; and Smith, *The Empress*, 14 - 18.

20 Smith, *The Empress*, 26 - 27; Howard I. Chapelle,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ailing Ships* (New York: Bonanza Books, 1949), 134, 138; and "A New York item," *Maryland Journal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 (March 5, 1784).

21 "Salem, August 21," *Salem Gazette* (August 21, 1783); "Salem, August 21," *Providence Gazette* (August 30, 1783); Smith, *The Empress*, 23 – 26.

22 Robert Morris to John Jay, November 27, 1783, in William Jay, *The Life of John Jay*, vol. II (New York: J. & J. Harper, 1833), 139. 又见, Smith, *The Empress*, 20 – 30, 43 – 50; and "Appendix 1, Early Records of Robert Morris's Involvement in American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 1781 – 1784: May 5 – December 31, 1783*, Elizabeth M. Nuxoll and Mary A. Gallagher 辑, vol. 8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857 – 64.

23 Sparks, *The Life of John Ledyard*, 197.

24 Smith, *The Empress*, 63, 87, 154 – 55, 239.

25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8), 25 – 26. 又见, James R.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How The East Indies Trade Transformed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1 – 32.

26 C.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 – 1837, vol. 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146. 又见 Pierre Jartoux, "Of a Tartarian Plant called Ginseng, etc.,"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From the Year 1700, to the Year 1720)*, 节选, Henry Jones 编纂, vol. IV, Part II (London: W. Innys, et. al., 1749), 314; and Kristin Johannsen, *Ginseng Dreams: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s Most Valuable Plan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6), 16 – 17, 29 – 30.

27 Jonathan Edwards to Mr. McCulloch, November 24, 1752,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A. M., With and Essay on His Genius and Writings*, by Henry Rogers, and Edward Hickman 修订, vol. 1 (London: William Ball, 1839), 195. 又见, Johannsen, *Ginseng Dreams*, 6; Smith, *The Empress*, 34 – 35; and "Philadelphia, July 27," *New-York Weekly Journal* (August 21, 1738).

28 Smith, *The Empress*, 31 – 42.

29 Oscar V. Armstrong, "Opening China,"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March 1982), 42.

30 Smith, *The Empress*, 53. 又见, Ibid, 151 – 55; and Sheldon S. Cohen, *Yankee Sailors in British Gaols: Prisoners of War at Forton and Mill, 1777 – 1783*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5), 51, 173, 200 – 02.

31 Shaw, *The Journals*, 110 – 111. 又见, Smith, *The Empress*, 60.

32 John Fiske,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1783 – 1789*, Seventh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1), 114 - 115; Smith, *The Empress*, 6; Mandell Creighton, *History of Rom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75), 23; 辛西纳提协会网站 http://www.societyofthecincinnati.org/history.htm，作者于2010年12月1日访问。

33 "New-York, July 5," *Virginia Journal* (July 29, 1784). 又见，Smith, *The Empress*, 23 - 25; William Weede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1620 - 1789*, vol. 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4), 820 - 21; and Gallagher,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the China Trade," 211.

34 "Friday, January 30, 1784," *Journal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From 1774 to 1788*, vol. IV (Washington: Way and Gideon, 1823), 333 - 34.

35 "John Green, "A Journal of an Intended Voyage on Board the Ship Empress of China, Bound from New York to Canton in India," entry for February 22, 1784, in Smith, *The Empress*, 78; ibid., 6 - 7; Shaw, *The Journals*, 133 - 34. James Riker, " '*Evacuation Day*,' *1783*, *its Many Stirring Events*: *With Recollections of Capt. John Van Arsdale* (New York: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883), 14 - 18; and "Extract from a Letter from New York, dated November 26," *New - Jersey Gazette* (December 9, 1783).

36 "New-York, Feb. 23," *New-York Packet and the American Advertiser* (February 23, 1784).

37 Samuel W. Woodhouse, "The Voyage of the *Empress of China*,"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63, No. 1 (January 1939), 24.

38 Philip Freneau, *The Poems of Philip Freneau, Poe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red Lewis Pattee 辑, vol. II (Princeto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1903), 262 - 63.

39 Woodhouse, "The Voyage of the *Empress of China*," 25 - 27. 又见，Smith, *The Empress*, 103; and "Journal of the Ship *Empress of China*," William Bell Clark 辑, *American Neptune* (April 1950), 83 - 84, 89 - 90.

40 引自 Shaw, *The Journals*, 153. 又见，ibid, 155; and Green's Journal in Smith, *The Empress*, 137 - 38.

第二章 中央王国

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fifth

edition (London: A. Strahan and T. Cadell, 1789), 20. 又见, William J.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 (New York: Grove, 2008), 8.

2 James Yates, *Textrinum Antiquorum: An Account of the Art of Weaving Among the Ancients*, Part 1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1843), 183. 又见, E. Jane Burns, *Sea of Silk: A Textile Geography of Women's Work in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9; "A Silk Dress," 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ly 1885), 240;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illiam Smith 辑, vol. V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4), 57a; and Frances Wood,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9.

3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John Bostock and H. T. Riley 译, vol. II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0), 36. 又见, Wood, *The Silk Road*, 29; and *Cyclopaedia of India and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Edward Balfour 辑, second edition, vol. V (Madras: Lawrence and Adelphi Press, 1873), 330 - 31.

4 Silvio Farago, "Sericulture," in Mary Schoeser, *Sil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0, 65; Premamoy Gosh, *Fibre Science and Technolgy* (New Dehli: Tata McGraw Hill, 2004), 97.

5 Colin Thubron, *Shadow of the Silk Road* (New York: Harper Perrenial, 2006), 4; Harry G. Gelber, *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2007), 36; *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Chinese Treatises upon the Culture of the Mulberry and the Rearing of Silk Worms*, Stanislaus Julien 译 (Washington: Peter Force, 1838), 77 - 78; and Mary Schoeser, *Sil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

6 *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Chinese Treatises*, 86 - 87, 99 - 102, 105, 113 - 114, 122. 又见, "Silkworm," *The British Cyclopaedia of Natural History*, Charles F. Partington 辑, s. v. "silkworm" (London: W. S. Orr & Co., 1837), vol. III, 685.

7 James Mease, "Letter from James Mease, Transmitting a Treatise on the Rearing of Silk-Worms by Joseph De Hazzi," Document 226, 2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 2, 1828 (Washington: Gales & Seaton, 1828), 10 - 14; Linus Pierpoint Brockett, *The Silk Industry in America* (New York: privately published for the 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876), 18 - 23; Schoeser, *Silk*, 20. 24; and Robert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03), 154 - 56. 有关查士丁尼和丝绸的故事或为伪说，此观点见 Schoeser, *Silk*, 26。

8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3, 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91 - 94; Wood, *The Silk Road*, 14, 26 - 27, 80; and Jean McClure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 - 1835*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62), 47 - 48.

9 A. 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8), 40, 192, 326. 又见 Laurence Bergreen, *Marco Polo: From Venice to Xanadu*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3 - 8, 92 - 97, 123, 141, 144 - 49, 157, 163 - 64, 168 - 69, 206 - 07, 224 - 28.

10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I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66), cxxiv. 又见, Bergreen, *Marco Polo*, 132, 326 - 332;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译,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1 - 38, 347 - 48;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II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217; and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3, 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16 - 23, 42 - 44, 58 - 62, 81 - 86, 89 - 94, 98, 103 - 19, 139, 149 - 51, 224 - 29.

11 Gelber, *The Dragon*, 12 - 13, 33, 123 - 4;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9.

12 引自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urth edition (948; repri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9 - 160. 又见, Gelber, *The Dragon*, 24, 33 - 34, 36.

13 第一处引自 Daniel J.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192; 第二处引自 Gelber, *The Dragon*, 89. 又见,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186 - 201; Gelber, *The Dragon*, 88 - 90;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99 - 103; and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49 - 51.

14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139 - 178; and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1 - 2.

15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156 - 78, 259 - 66;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 3 - 7, 9 - 11;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23 - 29, 67 - 69; Caroline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Imagining America: 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5, 38 – 42;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 – 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5 – 36; and Jack Turner, *Spice: The History of a Tempt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108 – 10.

16 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0), 474 – 87; Gelber, *The Dragon*, 94 – 98;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 14 – 30; and Giles Milton, *Nathaniel's Nutmeg, or, The True and Incredible Adventures of the Spice Trader Who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199), 318 – 42.

17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 – 1844 by An Old Resid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63 – 64. 又见, Gelber, *The Dragon*, 87 – 98;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hiladelphia: W. F. McLaughlin, 1805), 402; and 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405.

18 Robert Burts, *Around the World: A Narrative of a Voyage in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under Commodore George C. Read, by and Officer of the U. S. Navy*, vol. II (New York: Charles S. Francis, 1840), 288 – 90. 又见, Fitzgerald, *China*, 478, 552 – 553; Amaso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Comprising Three Voyages Around the World* (Boston: E. G. House, 1817), 530 – 31; and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 – 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16.

19 引自 Hunter, *The 'Fan Kwae'*, 53 – 54, 65, 99. 又见, Jacques M.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 – 1844*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 25, 74; and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 – 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 33;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Hong Kong: A. Shortrede & Co., 1863), 158; "Ship Anchorage at Whampoa," *American Penny Magazine, and Family Newspaper* (May 3, 1845), 202; and letter from Robert Morrison to Dr. Staughton, October 12, 1809, in *Panopolist, and Missionary Magazine United* (October 1810), 227.

20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28 – 30; and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121.

21 John Ayto,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90), 374;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 - 18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3 - 5; and Martin Booth, *Opium: A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1996), 4 - 7.

22 John Scarborough, "The Opium Popply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Medicine," in *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 Roy Porter and Mikulá? Teich 辑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又见, Booth, *Opium*, 11, 15 - 19; Pierre-Arnaud Chouvy, *Opium: Uncovering the Politics of the Popp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 4; and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 - 1950* (London: Routledge, 199), 14 - 17.

23 Xu Boling 言论引自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又见, Ibid, 12; Booth, *Opium*, 103 - 105; and Chouvy, *Opium*, 4 - 5.

24 Hunt Janin,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acFarland & Company, 1999), 41. 又见,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25 - 40, 46;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87 - 288; Fay, *The Opium War*, 7 - 9; and Charles C. Mann, *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1), 164.

25 Duncan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3), 245 - 246. 又见, Fay, *The Opium War*, 8 - 9; an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inth edition., s. v. "opium."

26 "The Opium Trade," in *Museum of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December 1839), 529. 又见, Nathan Allen, *The Opium Trade: Including a Sketch of Its History, Extent, Effects, Etc, as Carried on in India and China* (Lowell: James P. Walker, 1853), 34.

27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248 - 49.

28 Frank Dikotter, Lars Laama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London: C. Hurst & Co., 2004), 33 - 34. 又见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41 - 55; and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23 - 24.

29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1 - 7; Beatrice Hohenegger, *Liquid Jade: The Story of Tea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6), 4 - 8; and 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 *The Empire of Tea: 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the Plant*

That Took Over the World (Woodstock: The Overlook Press, 2004), 41 – 42.

30 Lu Yü, *The Classic of Tea*,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译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60, 77 – 111; and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4 – 5, 11 – 20; and Hohenegger, *Liquid Jade*, *12 – 13.*

31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484; Kakuzo Okakura, *The Book of Tea*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6), 34 – 35.

32 Joseph M. Walsh, *Tea: Its History and Mystery* (Philadelphi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892), 10. 又见,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5.

33 Carole Manchester, *Tea in the Eas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6), 54 – 55; Mary Lou Heiss and Robert J. Heiss, *The Story of Tea: A Cultural History and Drinking Guide* (Berkeley: Ten Speed Press, 2007), 187 – 189;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81 – 83;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23 – 29; and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108.

34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38 – 39; and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294.

35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29, 41 – 46; and John Phipp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London: William H. Allen, and Co., 1836), 98.

36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29 – 32; and Hohenegger, *Liquid Jade*, 69; and Robert Finlay, *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129.

37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41 – 46;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389 – 396; Macfarlane and Macfarlane, *The Empire of Tea*, 80 – 82; John Keay,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 209), 456; and Reginald Hanson, *A Short Account of Tea and the Tea Trade* (London: Whitehead, Morris & Lowe, 1876), 51 – 52.

38 Samuel Johnson, "Review of a Journal of Eight Days Journey from Portsmouth to Kingston Upon Thames," in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II (London: Luke Hansard & Sons, 1806), 390 and Benjamin Woods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5 – 6.

39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269 – 296;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123 – 24; and Hohenegger, *Liquid Jade*, 94 – 95;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186 – 208; and Luke Hebert, *The Engineer's and Mechanic's Encyclopedia*, vol. 2 (London: Thomas Kelly, 1836), 763 – 64.

40 Keay, *China*, 456. 又见,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32, 77;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I, 397, 436 – 48; Henry Hobhouse, *Seeds of Change: 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 (Berkeley: Shoemaker & Hoard, 2005), 112, 134 – 38; Heiss and Heiss, *The Story of Tea*, 338; Jane Pettigrew, *The Tea Companion: A Connoisseur's Guide*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Books, 2004), 47 – 53;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66 – 71;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Jean Kane 辑 (Indianapolis: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1987), 191; and Rodris Roth, "Tea Drinking in 18th-Century America: Its Etiquette and Equipag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Bulletin 225* (1961), 84.

第三章 中国梦

1 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 vol. II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360 – 61. 又见, Washington Irving, *A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utch Dynasty* (London: John Murray, 1820), 179 – 82; Elisabeth Paling Funk, "Netherlands' Popular Culture in the Knickerbocker Works of Washington Irving," in *New World Dutch Studies: Dutch Arts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America, 1609 – 1776*, Roderic H. Blackburn and Nancy A. Kelley 辑 (Albany: Alban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t, 1987), 88; Jane Pettigrew and Bruce Richardson, *The New Tea Companion: A Guide to Teas Throughout the World* (London: National Trust Enterprise, Ltd., 2005), 22 – 23;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49; Esther Singleton, *Dutch New York*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09), 115, 132 – 33; and David Sanctuary Howard, *New York and the China Trade* (New York: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1984), 20 – 21.

2 Israel Acrelius, *A History of New Sweden: or, The Settlements on the River Delaware*, William M. Reynolds 译 (Philadelphia: Publication Fund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1874), 158. 又见, T. H.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4 – 305;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49 – 51; and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97 – 98.

3 Justin Winsor, *The Memorial History of Boston, Including Suffolk County, Massachusetts, 1630 – 1880*, vol. II (Boston: James R. Osgood and Company, 1881), 454.

4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50 – 51; Edward Hagaman Hall, *The Catskill Aqueduct*

and Earlier Water Suppli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The Mayor's Catskill Aqueduct Celebration Committee, 1917), 32; Gilbert Barkley, "*The Memorial of Gilbert Barkly, merchant, in Philadelphia, in North America, who resided there upwards of sixteen years, and who i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consumption of that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article of Teas, &c.,*" in Francis S. Drake, *Tea Leaves: Being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Shipment of Tea to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Year 1773, by the East India Tea Company* (Boston: A. O. Crane, 1884), 200;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41; Hohenegger, *Liquid Jade*, 229; and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60), 756.

5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1 – 4, 55 – 59, 116 – 26 – 133 – 42. 又见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35, 40, 52 – 53, 185, 304.

6 John Trusly,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New-York Weekly Journal* (April 22, 1734). 又见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171;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 – 188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and "Chinoserie", in *The Grove Encyclopedia of Decorative Arts*, Gordon Campbell 辑,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 v. "chinoiserie," vol. 1, 237 – 39.

7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4 – 8; and Susan Gray Detweiler, *George Washington's Chinawa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82), 30.

8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27 – 55;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88; and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11.
Donald John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Policies, 1784 – 1899*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3.

9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88; Jonathan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682 – 1846: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Attitudinal Effects*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 – 19;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7;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41; Benjamin Labaree, *America's Nation-Time, 1607 – 1789*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98; 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 – 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77 – 78.

10 分别引自: Andrew Coe, *Chop Suey: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 Jean Baptiste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hird Edition, vol. I (London: J. Watts, 1741), preface, not numbered, and 2; and M. De Voltaire, *A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vol. II, second edition (London: John and H. L. Hunt, 1824), 151.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56 – 157.

11 George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41, 42, 43, 44*, Richard Walter 据安森的指示编纂, vol. II (1748; reprint, Edinburgh: Campbell Denovan, 1781), 231 – 32, 255. 又见, Ibid, 118 – 38; Gelber, *The Dragon*, 158 – 59; an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20 – 21.

12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vol. I (Dublin: G. and A. Ewing, 1751), 156. 又见, Ibid 153 – 55; and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146 – 48.

13 Charles Thoms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Held at Philadelphia,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 vol. I, second edition (Philadelphia: Aitken & Son, 1789), xvii, xix. 又见 Ellis Paxson Oberholzer, "Franklin's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March 1902), 432.

14 Alexander Hamilto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I, Harold C. Syrett and Jacob E. Cooke 辑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384; and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17 – 18.

15 "Colonist's Advocate: X," *Public Advertiser*, Feb. 19, 1770, in *Benjamin Franklin's Letters to the Press, 1758 – 1775*, Verner W. Crane 辑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0), 206; and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109.

16 关于"为什么是茶叶"这个问题的下述大部分讨论基于以下著作: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and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17 "To Our Ladies," *Boston News-Letter*, in *Songs and Ballad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y Frank Moor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56), 48 – 50; Thomas O'Connor, *The Hub, Boston Past and Present*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50, 73, 80;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300; Roth, *Tea Drinking in 18th-Century America*, 66 – 67; and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18.

18 Sydney Greenbie and Marjorie Barstow Greenbie, *Gold of Ophir: The China Trad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ilson-Erickson, 1937), 18.

19 Edmund Burke, "Speeches in the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in *Speeches of the Managers and Counsel in the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vol. I, E. A. Bond 辑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15.

20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90 – 103;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42;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298 – 301; and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1, 52 – 53, 78.

21 A Mechanic, "To the Tradesmen, Mechanics, &c.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broadside, December 4, 1773, 2011 年 1 月 19 日作者在国会图书馆浏览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网站：http://memory.loc.gov/ammem/index.html. 又见，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188; Labaree, *The Boston Tea Party*, 58 – 79, 89 – 91; and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42.

22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306.

23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17. 又见，Ibid, 18 – 30.

24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300, 304. 又见，Ibid, 305 – 31; and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1, 57 – 65.

第四章　"生番"

1 Green 言论引自 Smith, *The Empress*, 159. 又见，Shaw, *The Journals*, 162, 211 – 12.

2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86. 又见，*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VIII (London: C. Bathurst, 1781), 120; Greenbie and Greenbie, *Gold of Ophir*, 160 – 61.

3 Shaw, *The Journals*, 163 – 164.

4 Pierre le Poivre, *Travels of a Philosopher: Or, Observations on the Manners and Arts of Various Nations in Africa and Asia* (Glasgow: Robert Urie, 1770), 139 – 42.

5 引自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108 – 109; and Shaw, *The Journals*, 178 – 79;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6 – 33; *The Chinese Traveller,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collected from the works of various authors*, vol. I (London: E. And C. Dilly, 1772), 37 – 38; Charles Tyng, *Before the Wind: The Memoir of an American Sea Captain, 1808 – 1833* (New York: Viking, 1999), 33 – 34; 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281; Shaw, "The Drone", *New-York Magazine*

or Literary Repository (January 1796), 3, 5; Charles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211-12, 307-8; and Richard J. Cleveland,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vol. I (Cambridge: John Owen, 1843), 46.

6 Shaw, *The Journals*, 179-80, 183, 199-200.

7 斯威夫特原话引自 Smith, *The Empress*, 154. 又见, Ibid, 155; and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 Swedish Supra Cargo, at Canton, to his friend in London, dated 25th Feb. 1785, per True Briton," *Independent Ledger and the American Advertiser* (February 13, 1786).

8 Shaw, *The Journals*, 176-77, 185.

9 所有引文来自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99-105. 又见, Shaw, *The Journals*, 186-195, 339; and Letter from Thomas Randall to Alexander Hamilton, August 14, 1791,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9, Harold C. Syrett 辑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50; "East India Intelligence," *Gentleman's Magazine* (August 1785), 655-56; and "Riot At China," *The Times* (July 8, 1785)

10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99-105.

11 Shaw, *The Journals*, 195.

12 Li Chen, "Law, Empire, and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Sino-Wester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Lady Hughes Controversy in 1784," *Law and History Review* (Spring 2009), 作者于 2001 年 2 月 1 日访问下述网站: www. historycooperative. org/journals/lhr/27. 1/chen. html.

13 Smith, *The Empress*, 172-73; Shaw, *The Journals*, 200-13; and "New-York, May 12," *Connecticut Courant* (may 16, 1785).

14 Shaw, *The Journals*, 337, 341.

15 Denne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7-8.

16 Thomas Jefferson to Count de Vergennes, October 11, 1785, in *Memoir, Correspondence, and Miscellanies from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辑, vol. 1 (Charlottesville: F. Carr, and Co., 1829), 337-38.

17 尽管"中国皇后"号回程的背景故事也饶有趣味, 包括支持者之间的财务和法律纠纷、威胁、互相指责和多年的讼争, 但已无关本书主旨或此次航行对美国历史的最终影响。如想深入了解, 可参考 Smith, *The Empress of China*, 84-88, 115-26 和 220-50。

18 "Elizabeth Town, May 18," *Political Intelligencer and New-Jersey Advertiser* (May 18,

1785）. 又见，"New-York, May 14, *Independent Journal* (May 14, 1785)；"Philadelphia, May 13," *Pennsylvania Evening Herald* (May 14, 1785)；Shaw, *The Journals*, 218；and Robert Morris to John Jay, May 19, 1785, in William Jay, *The Life of John Jay*, vol. I (New York: J. & J. Harper, 1833), 191；"India Goods," *Political Intelligencer* (May 25, 1785)；"Hyson Tea," *Columbian Herald* (July 6, 1785)；and "Theodosius Fowler," *Connecticut Courant* (July 11, 1785).

19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n English gentleman in New-York to his friend in England, Jun 2," *London's New-York Packet* (January16, 1786).

第五章　中国热

1 James Fenimore Cooper,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 Picked up by a Traveling Bachelor*,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16；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Henry Reeve 译, (New York: George Adlard, 1838), 402.

2 "From the New-York Gazetteer Reflections on a Trade to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Chronicle,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Historical* (August 25, 1785)；and John Adams to John Jay, November 11, 1785, in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Definitive Treaty of Peace, 10th September 1783, to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March 4, 1789*, vol. II (Washington: Blair & Rives, 1837), 533－534.

3 Greenbie and Greenbie, *Gold of Ophir*, 34.

4 Rhys Richards, "United States Trade with China, 1784－1814," Special Supplement to vol. 54 of *The American Neptune* (1994), 9－66；and Rhys Richards, "Re-Viewing Early American Trade with China, 1784－1833," in *Mains'l Haul: A Journal of Pacific Maritime History* (Spring 2003), 18－19.

5 Henry Carter Adams,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9－1816, vol. V－VI," i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rbert B. Adams, editor (Baltimore: N. Murray, May and June 1884), 70.

6 *Independent Chronicle*, 引自 Hamilton Andrews Hill, *The Trade and Commerce of Boston, 1630－1890* (Boston: Damrell & Upton, 1895), 89－90.

7 Thomas Randall to Alexander Hamilton, August 14, 1791, in Harold C. Syrett,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1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54.

8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22 - 27, 39 - 45; Denne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7 - 8; Nancy Ellen Davis,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1784 - 1844: Products for the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Ph. D.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15, 1987), 10 - 11; Alexander Hamilton, "Trade with India and China," February 10, 1791,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III, John C. Hamilton 辑 (New York: John F. Trow, 1850), 188 - 189; John Steele Gordon, *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66; and John K. Fairbanks,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 - 12.

9 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vol. I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6), 129 - 63; 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or,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 (Paris: Baudry's European Library, 1836); Eric Jay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189 - 22; and Nathaniel Philbrick, *Sea of Glory: America's Voyage of Discovery, The U. S. Exploring Exp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2004), 4.

10 John Bach McMast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ephen Girard, Mariner and Merchant*, vol. 1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8), 1 - 48; Greenbie, *Gold of Ophir*, 144 - 148;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35; Goldstein, *Stephen Girard's Trade with China*, 40; and Jean Gordon Lee, *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 - 1844*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84), 104.

11 Robert E. Peabody, *The Logs of the Grand Turk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6), 1 - 104; Freeman Hunt, "Elias Hasket Derby," in *Lives of American Merchants*, vol. II (New York: Derby & Jackson, 1858), 17 - 56; Shaw, *The Journals*, 204, 208 - 209; Joseph B. Felt, *Annals of Salem*, vol. II (Salem: W. & S. B. Ives, 1849), 292; *Maritime Salem in the Age of Sail*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Park Servic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eabody Museum of Salem, 2009), 17; Doug Stewart, "Salem Sets Sail," *Smithsonian Magazine* (June 2004), 作者于2011年2月15日访问下述网站: 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archaeology/salem.html;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 - 186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1), 45 - 46, 85, 175; "New-York, January 28," *Independent Journal* (January 28, 1786); and "New-York, February 17," in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7, 1790).

12 Malcolm Gladwell,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8), 56 – 61. 又见, Robert E. Peabody, "The Derbys of Salem: A Study of 18th Century Commerce Carried on by a Family of Typical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Essex Institute*, vol. XLIV (July 1908), 217 – 218; and Axel Madsen, *John Jacob Astor: America's First Multimillionai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1), 1.

13 引自 Rappleye, *Robert Morris*, 507, 512. 又见, Ibid, 490 – 515; Oberholzer, *Robert Morris, Patriot and Financier*, 224; and Walter Lefferts, *Noted Pennsylvanian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3) 54

14 Ficther, *So Great a Proffit*, 27, 112 – 13; Edwin J. Perkins, "Financing the War of 1812," in *Encyclopedia of the War of 1812*, David S. Heidler and Jeanne T. Heidler 辑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182 – 84; Jerry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Armonk: M. E. Sharpe, 2002), 122; and Edward S. Kaplan,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44.

15 "New-York, April 24," in *The Worcester Magazine* (May 1787), 64; Paul E. Fontenoy, "An 'Experimental' Voyage to China, 1785 – 1787," *American Neptune*, vol. 55 (1995), 289, 294 – 5; "New-York, December 26," *The Pennsylvania Mercury and Universal Advertiser* (December 30, 1785); and Richards, "United States Trade with China, 1784 – 1814," 6.

16 均引自 Amasa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23, 25. 又见, Ibid, 21 – 40; William Hacket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Building of the Ship Massachusetts, at Braintree, 1787* (Salem: Reprinted from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1938); "For Canton, in China," in *Independent Chronicle* (January 7, 1790); and "Ship News," *Massachusetts Centinel* (March 31, 1790).

17 引自 Goldstein, *Stephen Girard's Trade with China, 1787 – 1824: The Norms Versus Profits of Trade* (Portland: MerwinAsia, 2011), 13. 又见, Timothy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James Eastburn & Co., 1817), 247 – 48; John Macgregor, *Commercial Statistics*, vol. III (London: Whitaker and Co., 1847), 816 – 817; and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2.

18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1), 215 – 216; and Milton Esterow, "The Many Faces of George Washington," *ARTNews* (October 2009), 作者于 2011 年 6 月 8 日访问下述网站:

http: //www. artnews. com/issues/article. asp? art_ id = 2760.

19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1, 26, 56 - 81; and 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 - 18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20.

20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vol. II (London: Black, Parry, and Co., 1813), 485.

21 Wood, *Empire of Liberty*, 202. 又见,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17), 248; John Macgregor, *Commercial Statistics*, vol. III (London: Whitaker and Co., 1847), 816; and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65 - 67.

22 Nathaniel Portlock, *Voyage Round the World;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Performed in 1785, 1786, 1787, and 1788, in the King George and Queen Charlotte, Captains Portlock and Dixon* (London: John Stockdale and George Goulding, 1789), 37, 42. 又见, Michael A. Jehle, *From Brant Point to the Boca Tigris: Nantucket and the China Trade* (Nantucket: Nantucket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4), 52 - 54; Eduoard A. Stackpole, *The Sea Hunters: The New England Whalemen During Two Centuries, 1635 - 1835*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53), 183 - 188; James Kirker, *Advenures to China: Americans in the Southern Oceans, 1792 - 18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9 - 11.

23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Sea Lions; or, The Lost Sealers*, vol. 1 (New York: Stringer & Townsend, 1849), 46. 又见, R. Henry, "Seals as Navigator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1900, 33 (1901), 439.

24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306; and Ebenezer Townsend, "The Diary of Mr. Ebenezer Townsend, Jr., the Supercargo of the Sealing Ship 'Neptune,' on Her Voyage to the South Pacific and Canton," in *Papers of the New Haven Colony Historical Society*, vol. 4 (New Haven: Printed for the Society, 1888), 35 - 36

25 Kirker, *Adventures in China*, 74 - 75. 又见, Ibid, 52 - 91; and Townsend, "The Diary of Mr. Ebenezer Townsend, Jr.," 47 - 48.

26 Kirker, *Adventures in China*, 8 - 9, 71 - 72, 167. 又见,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306 - 307; Edmund Fanning,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China Sea, North-West Coast, Fiji Island, South Shetlands, &* (New York: William H. Vermilye, 1838), 341; Briton Cooper Busch, *The War Against the Seals: A History of the North American Seal Fishery*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 – 36; James R. Gibson,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 – 184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252 – 253; and Benjamin Morrell, *A Narrative of Four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Ocean, Chinese Sea, Ethiopic and Southern Atlantic Ocean, Indian and Antarctic Ocean* (New York: J. & J. Harper, 1832), 130;, 393 – 404; Richard Ellis, The Empty Ocea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3), 155.

27 Sparks, *Memoirs*, 193, 196 – 197, 201 – 05; and Gifford, *Ledyard*, 153.

28 David Lavender, *Land of Giants, The Drive to the Pacific Northwest, 1750 – 1950*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8), 23.

29 Mary Malloy, " '*Boston Men*' *in the Northwest Coast: The American Maritime Fur Trade 1788 – 1844* (Kingston: The Limestone Press, 1998), 26; and William Sturgis,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536. 又见, Gibson, *Otter Skins*, 36 – 61, 299 – 318; 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53;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139 – 43; and Adele Ogden, *The California Sea Otter Trade, 1784 – 18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1), 2.

30 McCracken, *Hunters of the Stormy Sea*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38 – 39, 55 – 58; and Agnes C. Laut, *Pioneers of the Pacific Coast, A Chronicle of Sea Rovers and Fur Hunters* (Toronto: Glasgow, Brook & Company, 1915), 36 – 37

31 "The Fur Trade Between the N. W. Coast of America and China,"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March 18, 1843), 40. 又见, William Sturgis,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536; Gibson, *Otter Skins*, 57 – 58, 199 – 203, 317; Ogden, *The California Sea Otter Trade*, 32 – 65; Glenn Farris, "Otter Hunting by Alaskan Natives Along the California Coa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ains'L Haul* (summer/fall 2007), 20 – 33; Rodney J. Taylor, "The Log of the Brig *Betsy*, 1799 – 1801," in *Mains'L Haul* (summer/fall 2007), 70 – 87; and John Boit, Jr., *Log of the Union, John Boit's Remarkable Voyage To the Northwest Coast and Around the World, 1794 – 1796*, Edmund Hayes 辑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xviii – xxiv, 88.

32 除文中引述的以外，关于檀香木的背景还参考了下述文献：Fanning,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54, 57 – 63, 121 – 123; Kirker, *Adventures in China*, 111 – 43; Ernest S. Dodge, *Islands and Empires: Western Impact on the Pacific and East As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60 – 65; Gibson, *Otter Skins*, 253 – 58;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43 – 44;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3 - 4, 174 - 5, 219; Ernest Dodge, *New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3 - 54, 86; and Ronald Albert Derrick, *A History of Fiji*, vol. 1 (Suva: Government Press, 1957), 39 - 46; and Gavan Daws, *Shoal of Time: A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 49 - 50.

33 分别引自，Fanning,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61 - 62; and Alan Gurney, *The Race to the White Continent: Voyages to the Antarctic*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29.

34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December 13, 1968), 1243 - 1248; Dodge, *Islands and Empires*, 59 - 64; Malloy, " '*Boston Men*' *in the Northwest Coast*, 37 - 39; Ann Fabian, *The Skull Collectors: Race, Science, and America's Unburied Dea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34; Gibson, *Otter Skins*, 315; and Sturgis,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536.

35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 - 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6 - 9;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1, 67 - 68, 291; Trocki, *Opium*, 42 - 43; Immanuel Chung Yueh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6; and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1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 23.

36 Edmund Backhouse and John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4), 325 - 26.

37 Joanna Waley-Cohen, *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92 - 97.

38 Teemu Ruskola, "Canton is not Boston: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 in *American Quarterly* (September 2005), 868

39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 - 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04 - 10.

40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1, 215 - 216;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77;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 - 1860*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rno Press, 1981), 3,

5; Trocki, *Opium*, 44 - 45, 48 - 52, 81; Shaw, *The Journals*, 238;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125 - 27; Booth, *Opium*, 113;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08 - 9, 116;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26; and R. M. Dane, "Historical Memorandum," Appendix B in *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 *Proceedings*, vol. 7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895), 61.

41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326 - 327, 344 - 46. 又见,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127 - 29.

4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08 - 9, 114 - 17, 121 - 25; Dane, "Historical Memorandum," 61; James, B. Lyall, "Note on the History of Opium in India and of the Trade in it with China," Appendix A in *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 *Proceedings*, vol. 7, 18;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88 - 90;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0, 110 - 12; and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120 - 34

43 Fairbank,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15. 又见,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 215;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77 - 8, 326 - 27; Hsin - 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19; and Henry Moses, *Sketches of India: With Notes on the Seasons, Scenery, and Society of Bombay, Elephanta, and Salesette*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1750), 67 - 69.

44 Paul E. Fontenoy,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An Early American Connection," part 1, *Mains'l Haul* (Winter 1996), 23.

45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15. 又见,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54;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19 - 20; and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72 - 73.

46 Timothy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Haven: Durrie & Peck, 1835), 303; Richards, "Re-Viewing Early American Trade with China," 15 - 18; Shü-Lun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New York: China Trade Bureau, 1924), 9; and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05 - 07; and Lawrence H. Officer, *Between the Dollar-Sterling Gold Points: Exchange Rates, Parity and Market Behavi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 - 20, 147.

47 Edward Sanderson, "Rhode Island Merchants in the China Trade," in *Federal Rhode Island: The Age of the China Trade, 1790 - 1820*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1978), 44; and Gertrude Selwyn Kimball, "The East-India Trade of

Providence, From 1787 to 1807," in *Papers from the Historical Seminary of Brown University*, Vol. VI, J. Franklin Jameson 辑 (Providence: Preston and Rounds, 1896), 5 - 6.

48 Gabriel Franchère, "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Years, 1811, 1812, and 1813, or the First Settlement on the Pacific," in *Early Western Travels 1748 - 1846*, vol. VI, Reuben Gold Thwaites 辑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0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4), 289 - 92; 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or,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 (Paris: Baudry's European Library, 1836), 64 - 70; and James P. Ronda, *Astoria & Empi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235 - 37.

49 引自 James Jackson Jarvis,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Honolulu: Charles Edwin Hithcock, 1847), 76 - 77. 又见 Hiram Bingham, *A Residence of Twenty-One Year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or the Civi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ose Islands* (Hartford: Hezekiah Huntington, 1847), 39 - 40; Townsend, Jr., "The Diary of Mr. Ebenezer Townsend, Jr., 59 - 60; Gavan Daws, *Shoal of Time: A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 33 - 34; and Kirker, *Adventures in China*, 148 - 50.

50 Gibson, *Otter Skins*, 156.

51 John R. Jewitt, in collaboration with Richard Alsop, *Narrative of the Adventures and Sufferings of John R. Jewitt* (Middletown: Seth Richards, 1815), 114. 又见, Gibson, *Otter Skins*, 159 - 75; Malloy, "*'Boston Men' in the Northwest Coast*, 35; and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156 - 61.

52 斯特吉斯言论分别引自 Charles G. Loring, *Memoir of the Hon. William Sturgis* (Boston: John Wilson and Son, 1864), 24; and Gibson, *Otter Skins*, 158. 又见, William Sturgis, "*A Most Remarkable Enterprise*," *Lectures on the Northwest Coast Trade and Northwest Coast Indian Life by Captain William Sturgis*, Mary Malloy 辑 (Marstons Mills: Parnassus Imprints, 1997), 77.

53 分别引自 Robert Bennet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s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2), 392 - 93; and William Elliot Griffis, "Our Navy in Asiatic Waters," 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October 1898), 739. 又见, *Other Merchants and Sea Captains of Old Boston* (Boston: State Street Trust Company, 1919), 51 - 53; Edmond S. Meany, "Book Review,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and the Indians of the Oregon Country*, by William Sturgis, in *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October 1920), 304 - 05; and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61.

54 Dodge, *Islands and Empires*, 60 – 65.

55 Fanning,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59.

56 Dodge, *Island and Empires*, 64; Derrick, *A History of Fiji*, 43 – 46; Peter Dillon, *Narrative and Successful Result of a Voyage in the South Seas, Performed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 to Ascertain the Actual Fate of La Pérouse's Expedition*, vol. I (London: Hurst, Chance, and Co., 1829), 1 – 19, 27; and Kirker, *Adventures in China*, 132 – 37.

57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139. 又见, Stackpole, *The Sea-Hunters*, 240 – 44; and Thomas Boyles Murray, *Pitcairn: The Island, the People, and the Pastor*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59), 104 – 06.

58 Phineas Bond to Lord Carmarthen, May 17, 1787,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6*, vol. 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7), 535; and Phineas Bond to Lord Carmarthen, July 2, 1787, in Ibid, 540 – 42. 又见, Phineas Bond to Lord Carmarthen, December 29, 1787,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555 – 56; Phineas Bond to Lord Carmarthen, October 2, 1788, in Ibid, 578; and Phineas Bond to Lord Carmarthen, December 2, 1788, in Ibid, 590; and Greenbie and Greenbie, *Gold of Ophir*, 83 – 86.

59 Edmund Burke, *Burke's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Charles R. Morris 辑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5), 14, 21 – 23, 103. 又见, Stanley Ayling, *Edmund Burke, His Life and Opin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80.

60 分别引自: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December 21, 1787, in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Definitive Treaty of Peace, 10th September, 1783, to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March 4, 1789*, vol. VII (Washington: Francis Preston Blair, 1834), 469; and A.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7.

61 Townsend, "The Diary of Mr. Ebenezer Townsend, Jr.," 87 – 88.

62 Richard Henry Lee to Samuel Adams, May 20, 1785, in *The Letters of Richard Henry Lee*, vol. II, James Curtis Ballagh 辑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360; "Dublin, May 31," in *The Providence Gazette and Country Journal* (August 4, 1787); William Bentley, The Diary of William Bentley D. D., Pastor of the East Church Salem, Massachusetts, vol. 2, Joseph Gilbert Waters, Marguerite Dalrymple, and Alice G. Waters 辑 (Salem: The Essex Institute, 1907), 192; and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n American gentleman in London, to his friend in

Philadelphia," *Public Advertiser* (September 18, 1807).

63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45, 56;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184, 193, 205, 256, 266, 278, 294, 311, 322, 348, 358, 389, 401;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2, 27, 55, 77, 101, 131, 158, 175, 206; Tench Coxe to Alexander Hamilton, August 1791,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 1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143;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486; Foster Rhea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0), 209 - 11; and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17), 247 - 49.

64 Greenbie and Greenbie, *The Gold of Ophir*, xiii. 对华贸易在美国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是作者根据下述资料计算得出：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35), 303 - 306;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2 (Washing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904 - 907. 又见，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207;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27, 77, 131; and United States Senat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Fina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c. No. 31 (February 6, 1826), 9.

65 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1806*, vol. I,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译自德文 (London: John Murray, 1813), 332 - 33; Gibson, *Otter Skins*, 28 - 35; Latourett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6 - 47.

66 Benjamin W. Labaree, William M. Fowler, Jr., Edward W. Sloan, John B. Hattendorf, Jeffrey J. Safford, and Andrew W. German, *America and the Sea: A Maritime History* (Mystic: Mystic Seaport, 1998), 198; and Robert Leckie, *The Wars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230 - 31.

67 除另有说明，本节关于 Pinqua Winchong（有些地方也写为 Winchung）的背景信息还参考了下述文献：Porter, *John Jacob Astor*, vol. I, 142 - 50; and Greenbie and Greenbie, *Gold of Ophir*, 103 - 08.

68 "Washington Cit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uly 25, 1808).

69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July 25, 1808, in Thomas Jeffers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Albert Ellery Bergh 辑, vol. XI (Washington, D. C.: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7), 106 - 07.

70 分别引自：Porter, *John Jacob Astor*, vol. I, 147; and Madsen, *John Jacob Astor*, 70. 又见，untitled article, *The North American, and Mercantile Daily Advertiser* (July 28,

1808)

71 "The Ship Beaver and the Mandarin," *New-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 (August 13, 1808).

72 "Notice to Mandarins," *New-York Gazette & General Advertiser* (August 13, 1808). 又见, untitled article, *The North American, and Mercantile Daily Advertiser* (August 13, 1808).

73 Walter Barrett, *The Old Merchants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arleton, 1866), 9 - 10.

74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August 15, 1808, in Thomas Jeffers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Albert Ellery Bergh 辑, vol. XI (Washington, D. C.: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7), 133 - 34. 又见, Albert Gallatin to Thomas Jefferson, August 5, 1808, in *The Writings of Albert Gallatin*, Henry Adams 辑, vol. I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9), 400.

75 Untitled article, *Portland Gazette and Maine Advertiser* (August 19, 1808).

76 Frances Ruley Karttunen, *The Other Islanders: People Who Pulled Nantucket's Oars* (New Bedford: Spinner Publications, 2005), 146.

77 另一种说法是，Wingchong 可能是个小商人，目的是确保山茂召和兰道尔欠他的债务得到支付，见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41 - 42。

78 Labaree et. al., *America and the Sea*, 207.

79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vol. 2, 486; Richards, *United States Trade with China*, 9, 49 - 58, and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52.

80 Peter Auber, *China: An Outline of the Government, Laws, and Policy: 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 and Intercourse With, That Empire* (London: Parbury, Allen, and Co., 1834), 241 - 42. 又见,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214 - 19.

81 引用自吉拉德的言论，摘自 McMast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ephen Girard*, 216 - 217. 又见, Ibid, 214 - 15, 218 - 20; and Stephen Simpson, *Biography of Stephen Girard, with his Will Affixed* (Philadelphia: Thomas L. Bonsal, 1832), 122。

第六章　金街

1 Robert Waln, Jr., from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123; "A Review of Charles Gutzlaff's,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in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835), 140. 美国对华贸易金额由作者根据以下来源计算：J. Smith Homans, *An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 P. Putname & Co., 1857), 181;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5, 534 - 44; and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35), 299 - 301.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349 - 57; John Tyler, "Sandwich Islands and Chin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 doc. 35, 27th Cong., 3d sess. (December 31, 1842), 3; and Yen-P'ing Hao, "Chinese Teas to America-A Synopsis," in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Ernest R. May and John K. Fairbank 辑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 23.

2 S. doc. 31, Committee on Finance, 1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ruary 6, 1826);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43 - 220, 364 - 366;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61; Goldstein, *Stephen Girard's Trade with China*, 85 - 91; and John Denis Haeg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and Fina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0 - 231; and Howard, *New York and the China Trade*, 27 - 28.

3 "The Discovery," *The American* (September 22, 1820)

4 Busch, *The War Against Seals*, 22 - 25;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92 - 93; Stackpole, *The Sea Hunters*, 355 - 60; J. A. Allen, "*Fur-Seal Hunting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Proceedings of the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Convened at Paris Under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Concluded at Washington February 29, 1892*, vol. 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398; and "The Discovery," *The American* (September 22, 1820).

5 分别引自：John Randolph Sears, *Captain Nathaniel Brown Palmer: An Old-Time Sailor of the Se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42 - 75. 又见 Philbrick, *Sea of Glory*, 14 - 16; William H. Goetzmann, *New Lands, New Men: 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 Viking, 1986). 253 - 56; Busch, *The War Against the Seals*, 23 - 24; Stackpole, *The Sea Hunters*, 355 - 68.

6 David Starr Jordan, *The Fur Seals and Fur-Seal Islands of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part 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9), 313.

7 Gibson, *Otter Skins*, 315.

8 David Porter, *Journal of a Cruise Made to the Pacific Ocean by Captain David Por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Essex in the Years 1812, 1813, and 1814*, second edition, vol. II

（New York：Wiley & Halsted，1822）．又见，I. C. Campbell，*A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61－62；

9 除文中摘录的资料外，本节有关夏威夷檀香木的内容还参考了下述文献：Dodge，*New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s*，81－83；Dodge，*Islands and Empires*，61－62；Walter Muir Whitehall，*George Crowinshield's Yacht*，Cleopatra'S Barge（Salem. MA：Peabody Museum，1959），3，5，7，11－13；Ralph Simpson 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1778－1854，vol. 1（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1938），88－89；Norris W. Potter，Lawrence M. Kasdon，and Ann Rayson，*Histor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Honolulu：Bess Press，2003），26－28；William Ellis，*Narrative of a Tour ThroughHawaii*，*or*，*Owhyee*（London：H. Fisher，Son，and P. Jackson，1826），375－76；Ralph S. Kuykendall and A. Grove Day，*Hawaii*：*A History from Polynesian Kingdom to American State*（Englewood：Prentice-Hall，1961），41－43；and Mo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262.

10 Yunte Huang，*Charlie Cha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onorable Detective and his Rendezvous with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W. W. Norton，2010），13.

11 Paul Forsythe Johnston，"A Million Pounds of Sandalwood：The History of *Cleopatra's Barge* in Hawaii，" *American Neptune*（Winter 2002），5－10.

12 Walter A. McDougall，*Let the Sea Make a Noise*：*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New York：Basic Books，1993），181.

13 引自 Gibson，*Otter Skins*，61. 又见，William Sturgis，"The Northwest Fur Trade，" *Hunt's Merchant Magazine*（June 1846），536；and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54－55.

14 Dodge，*Islands and Empires*，290；G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50－51；Phipps，*A Practical Treatise*，313；Stelle，*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32；and Robert Bennett Forbes，*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China Trade*（Boston：Samuel N. Dickinson，1844），27；and Downs，*The Golden Ghetto*，124－28.

15 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120. 又见，"China，Cohong Address，" *The Literary Panorama，and National Register*，vol. 8（London：Stimpkin and Marshall，1819），463－464；"On Further Interferences with the East-India Company's Privileges of Exclusive Trade，" *The Asiatic Journal*（December 1821），526；and "Murder & Piracy，" *Boston Palladium*（December 18，1817）.

16 Downs，*The Golden Ghetto*，119.

17 除文中摘录的资料外，本节有关特拉诺瓦事件的内容还参考了下述文献：Jacques M. Downs，"The Fateful Case of Francis Terranova：An Incident of the China

Trade," *Mains'l Haul* (Spring 2003), 4 – 13; "Account of the trial and fate of the sailor belonging to the American ship *Emily*, executed by the Chinese of Canton," *Republican Chronicle* (April 3, 1822); and " Execution of an Italian at Cant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uary 1835), 58 – 68.

18 "Account of the trial and fate of the sailor belonging to the American ship Emily."

19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87.

20 "Opium Trade with China," *Providence Patriot* (December 21, 1822); and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121.

21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26.

22 Phyllis Forbes Kerr, *Letters From China: The Canton-Boston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Bennet Forbes, 1838 – 1840* (Mystic: Mystic Seaport Museum, Inc., 1996) .14 – 15; Maurice Collis, *Foreign Mud: The Opium Imbroglio at Canton in the 1830's and the Anglo – Chinese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original published in 1946), 2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20 – 121; and Robert Bennet Forbes, et. al., "Memorial of R. B. Forbes and Others," (January 9, 1840), *House Doc. 40*, *2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2.

23 John Tyler, "Sandwich Islands and Chin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Document No. 35,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December 31, 1842), 8 – 10; Untitled, S. doc. 31, Committee on Finance, 1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ruary 6, 1826); and Forbes, *Remarks on China*, 27 – 28.

24 " Sea Cucumber," *The International Wildlife Encyclopedia*, Maurice Burton 辑 (Tarrytown: Marshall Cavendish Corporation, 2002), 2271 – 2272; and Charles Darwin,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Company, 1909), 468. 除另有说明，本节有关海参贸易的背景还参考了以下文献：Dodge, *New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s*, 86 – 100; William S. Cary, *Wrecked on the Feejees* (Nantucket: The Inquirer and Mirror Press, 1949; reprint of original, published in 1887), 46 – 53; and Mary Wallis, *The Fiji and New Caledonia Journals of Mary Wallis, 1851 – 1853*, David Routledge 辑 (Salem: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1994), xviii – xx。

25 Frederick J. Simons, *Food in China: A Cultural Historical Inquiry* (Boca Raton: CRC Press, 1991), 435.

26 James Oliver and William Giles, *Wreck of the Glide with Recollections of the Fijis*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8), 34 – 36.

27 本节几乎所有背景信息和引述内容均来自 Oliver and Dix, *Wreck of the Glide*, 13, 27 – 38, 45 – 46, 67 – 71, 75 – 79, 84 – 90, 202 – 3. 又见 Dodge, *New England and the South Seas*, 96 – 98。

28 Homans, *An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81;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35), 303;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73; Hao, "Chinese Teas to America," 24 – 25; Freeman Hunt, "Commerce of China," *Hunt's Merchant Magazine* (December 1840), 476;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08 – 112; and "Exchange in China," *Farmer's Register* (March 1834), 618.

29 引自 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Fate and Fortun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7), 144. 又见, Paul E. Fontenoy, "Ginseng, Otter Skins, and Sandalwood: 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 *Northern Mariner*, vol. 7, no. 1 (1997), 1 – 4;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Patron of History* (July 19, 1820); and "Trade Beyo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New-York Columbian* (February 6, 1819).

30 Hunt, "Commerce of China," (December 1840), 477 – 79; and Tyng, *Before the Wind*, 75.

31 Walter Barrett, *The Old Merchants of New York City*, vol. 1 (New York: Thomas R. Knox & Co., 1885), 39 – 45.

3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85.

33 Fairbank,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14.

34 除文中另有说明，本节关于福布斯的大部分内容及全部引文均来自以下资料：Robert Bennet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8), 1 – 5, 14 – 27, 30 – 31, 81, 124, 131 – 41。

35 Margaret C. S. Christman, *Adventurous Pursuits: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 – 1844*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4), 113.

36 均引自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43 – 44.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41 – 43, 76; and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61.

37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48;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80 – 82; Chrisman, *Adventurous Pursuit*, 85.

38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88 – 89.

39 引自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Boston: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106 – 107.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44 – 45; and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81 – 82.

40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25 – 26; and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106 – 07.

41 "China and the Chinese,"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July 1847), 17. 又见, Christman, *Adventurous Pursuits*, 95.

4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49 – 50.

43 本节哈里特·罗伊的所有引语均来自以下文献: Harriet Low, *My Mother's Journal: A Young Lady's Diary of Five Years Spent in Manila, Macao,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Katherine Hillard 辑 (Boston: George H. Ellis, 1900), 28, 32 – 33, 44, 38, 64 – 65, 77 – 85, 119 – 120, 236. 又见, Christman, *Adventurous Pursuits*, 96 – 105。

44 Wang Ping, *Aching for Beauty: Footbinding in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3 – 12; and Tiffany Marie Smith, "Footbinding," in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ociety*, Jodi O'Brien 辑, vol. 2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331 – 32.

45 Wang Ping, *Aching for Beauty*, *3 – 12*, *55*; Spenc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39; Eileen H. Tamura, Linda K. Menton, Noreen W. Lush, and Francis K. C. Tsui, *China: Understanding Its Pas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4 – 15; and Smith, "Footbinding."

46 Robert Bennet Forbes to Rose Forbes, November 22, 1838, in Kerr, *Letters From China*, 70. 又见,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88, 118 – 132; Christman, *Adventurous Pursuits*, 127 – 140; and Chi-Chao Chan, Melissa M. Liu, and James C. Tsai, "The First Western-Style Hospital in China," *Archives of Ophthalmology* (June 2011), 791 – 97.

47 "China and the Chinese,"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July 1847), 15.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9.

48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48; and 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47 – 48.

49 本节关于广州大火的背景信息来自以下文献: "China: Chinese Proclamation Respecting the Late Fire in Canton," *Asiatic Journal* (July 1823), 99; "An Account of the Fire of Canton, in 1822," i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Compiled by his Widow*, vol. II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Appendix, 33 – 39;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V, 64 – 66;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I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6), 110 – 11; and "Great Fire in Canton," *New England Farmer* (March 22, 1823)。

50 "An Account of the Fire of Canton, in 1822", appendix, 34 – 35。

51 "China: Chinese Proclamation Respecting the Late Fire in Canton," 99.

52 W. W. Wood, *Sketches of China* (Philadelphia: Carey & Lea, 1830), 65.

53 George Nugent Temple Greenville,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Trade with India; and the Policy of Continuing the Company's Monopoly (London: T. Cadell, 1807), 115; and John Crawfo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vol. III (London: Hurst, Robinson, and co., 1820), 252.

54 "East-India Trade," *Columbian Centinel* (October 2, 1813).

55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55, 175, 185 – 6;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 344 – 345;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V, 20 – 22, 67 – 68, 84 – 86, 99 – 100, 118 – 119, 139 – 140, 158 – 159, 181 – 182, 195 – 196, 248 – 249, 271 – 272, 339 – 340, 369 – 370; "British and India Trade," *Louisiana Advertiser* (May 27, 1820); "East India Trade," *New-York Daily Advertiser* (March 29, 1820); and "Opening of the China Trade—Government of India," *Salem Gazette* (May 7, 1833); and "China Trade," *St. Louis Inquirer* (December 18, 1819)

56 Letter from Meriwether Lewis to Thomas Jefferson (September 23, 1806), in *The 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Reuben Gold Thwaites 辑, 1905 年出版, vol. VII, Part II, appendix LXI (Scituate, Massachusetts: Digital Scanning Inc, 2001), 335 – 336. 又见,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152 – 54, 284 – 85, 292 – 93; and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55 – 57.

57 John Floyd, "Occupation of the Columbia River," in *Abridgment of the Debates of Congress, From 1789 to 1856*, vol. VII, Thomas Hart Benton 辑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58), 392, 394. 又见, Ibid, 78; and Hubert Howe Bancroft, The Works of Hubert Howe Bancroft, vol. XXVII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 Company, 1884), 419 – 20.

58 Fred Wilbur Powell, "Hall Jackson Kelley—Prophet of Oregon," in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June 1917), 174, fn 15.

59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57; 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32 – 34; Newman, *Empire of the Bay*, 510 – 511; Robert H. Ferrell, "Oregon Controversy,"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West*, 833 – 834; Skinner, *Adventures of Oregon*, 262 – 64.

第七章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1 Ezra Stiles, "Dr. Stiles Election Sermon, 1783: The United States Exalted to Glory and Honor," in *The Pulpi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Period of 1776*, John Wingate Thornton 辑 (Boston: Gould and Lincoln, 1860), 463 - 64.

2 John Rogers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s to China in U. S. Culture: 1776 - 1876*, Chapter 2. 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通过古登堡计划网站 http://www.gutenberg-e.org/haj01/index.html 的电子书访问。又见 Ping Chia Kuo, "Canton and Salem: The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upon New England Life during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New England Quarterly* (January 1930), 435 - 41.

3 Wood, *Sketches of China*, viii. 又见 Shaw, The Journals, 167 - 68. 关于外国人对中国狭隘视野的另一幕，见 Robert Waln, Jr., *China: Comprehending a View of the Origin, Antiquity, History, Religion, Morals, Government, Law, Population, Literature, Drama, etc.* (Philadelphi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823), 133.

4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542. 又见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124; Greenbie and Greenbie, *Gold of Ophir*, 178 - 79;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76 - 83; and Frederick W. Drake, "Bridgman in Chin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Neptune* (Winter 1986), 34 - 42.

5 Wood, *Sketches of China*, x - xi;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2; and Thomson, et al,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25.

6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25. 又见, James C. Thomson, Jr., Peter W. Stanley, and John Curtis Perry,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81), 13 - 15.

7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25 - 26. 又见, Jacques M. Downs, "Fair Game: Exploitive Role-Myths and the American Opium Trad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May, 1972), 143.

8 Shaw, *The Journals*, 183 - 84.

9 Wood, *Sketches of China*, 232. 又见, "Article III: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January 1835), 417 - 28; and "Glimpses of Society and Manners, by a Cosmopolitan," *New-England Magazine* (April 1835), 275.

10 "For the Port Folio—On China," *The Port Folio* (February 1819), 111; and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72 - 73; 又见, "Military skill and power of the Chinese; actual state of the soldiery, forts, and arms; description of the forts on the river of Canton; army and navy of China; modes of warfar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rms," *Chinese Repository* (August 1836), 177 - 78; and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33 - 34.

11 Edmund Roberts, *Embassy to the Eastern Courts of Cochin-China, Siam, and Muscat; in the U. S. Sloop-of-War Peacock, David Geisenger, Commander, During the Years 1832 - 3 - 4*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7), 159.

1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33, 36; William Samuel Waithman Ruschenberg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n Embassy to Muscat and Siam, in 1835, 1836, and 1837*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Blanchard, 1838), 430; and Roberts, *Embassy to the Eastern Courts*, 151.

13 Jessica Lanier, "The Post-Revolutionary Ceramics Trade in Salem, Massachusetts, 1783 - 1812" (M. A. thesis, Bard College, 2004), 114.

14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85 - 86, 133 - 36; "The Food of Various Nations," *American Masonick Record and Albany Saturday Magazine* (October 10, 1829), 291;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3; John N. Reynolds, *Voy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Potomac*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5) Reynolds, 340 - 41; and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 - 1882*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27 - 28, 67 - 68.

15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107; 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New York: J. Abeel Williamson, 1836), 86 - 88; Fitch W. Taylor, *The Flag Ship: Or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Columbia*, vol. II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840), 175 - 176; and Howard Malcolm, *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Embracing Hindustan, Malaya, Siam, and China*, vol. II (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1839), 150 - 51.

16 "China," in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 (Boston: Perkins & Marvin, 1836), 73; Thomson, Stanley, and Perry,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15 - 16; Downs, "Fair Game," 142; Murray A. Rubenstein, "American Board Missiona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Opinion Toward China, 1830 - 1860," in *America Views China: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 Jonathan Goldstein,

Jerry Israel, and Hilary Conroy 辑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77; and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57 - 82.

17 Downs, "Fair Game," 142, fn21 on 141. 又见, Collis, *Foreign Mud*, 178.

18 Untitled article, *Independent Chronicle & Boston Patriot* (June 4, 1823). 又见,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03. 根据这些资料，已知最早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三个人——阿信、阿春、阿聪（音译，Ashing，Achun，Accun）。三人是 1785 年从中国返回的巴尔的摩船只"帕拉斯"号的船员。三人登陆后的情况并无记录。见 Him Mark Lai, Joe Huang and Don Wong, The Chinese of America, 1785 - 1980 (San Francisco: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1980), 12。

19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97 - 99.

20 Ibid., 106.

21 Untitled article from the Boston Patriot, reprinted in the *Baltimore Patriot & Mercantile Advertiser* (August 21, 1829).

22 Irving Wallace and Amy Wallace, The Two: The Story of the Original Siamese Twi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59.

23 "The Siamese Boys," *Boston Galaxy*, reprinted in the *Newburyport Herald* (September 15, 1829)

24 Wallace and Wallace, The Two, 15, 17 - 29.

25 Ibid., 301 - 2;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106 - 13; J. N. Moreheid, *Lives, Adventures, Anecdotes, Amusements, and Domestic Habits of the Siamese Twins* (Raliegh: E. E. Barclay, 1850, 9 - 15.

26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3, *Pursuing the China Effect*; Krystyn R. Moon, *Yellowface: Creati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Performance, 1850s - 1920s*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59 - 62; "The Chinese Lady," *New Hampshire Patriot and State Gazette* (November 11, 1834); and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101 - 106.

27 Untitled reprint from the *New York Gazette*, *New Hampshire Patriot and State Gazette* (November 24, 1834).

28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3.

29 Moon, *Yellowface*, 60 - 62.

30 M. L. E. Moreau de Saint-Mery,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Subseqeunt to that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Several Parts of the*

Chinese Empire, Unknown to Europeans; Taken from the Journal of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vol I (London: Lee and Hurst, 1798), 238 – 39. 又见, Lee, *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 81 – 82; and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1.

31 Saint-Mery,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xiii, 298 – 324.

32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1; William W. H. Davis, *History of Bucks County, Pennsylvania*, vol. I (New York: The Lewis Publishing Company, 1905), 97; and Lee, *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 82.

33 Caroline Howard King 言论引自 Walter Muir Whitehill, *The 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 and the Peabody Museum of Salem: A Sesquicentennial History* (Salem: Peabody Museum, 1949), 44 – 46. 又见 Ibid, 3; and Mary Malloy, *Souvenirs of the Fur Trade: Northwest Coast Indian Art and Artifacts Collected by American Mariners, 1788 – 1844* (Cambridge: Harvard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2000), 61 – 63.

34 Charles Coleman Sellers, *Mr. Peale's Museum: Charles Wilson Peale and the First Popular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Art*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273.

35 Brantz Mayer, "A Nation in a Nut Shell," *Baltimore Literary Monument* (October 1839), 275.

36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Chapter 4.

37 Nathan Dun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Printed by Nathan Dunn, 1839), 3.

38 Mayer, "A Nation in a Nut Shell," 273.

39 Dun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13, 75 – 76.

40 Enoch Cobb Wines, *A Peep at China, in Mr. Dunn's Chinese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Printed for Nathan Dunn, 1839), vii – viii.

41 "China and the Chinese,"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July 1847), 7 – 8. 又见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32 – 36; and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49 – 50.

42 Dun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119.

第八章　鸦片战争

1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136 – 137. 又见, 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8), 12 - 20; Fay, *The Opium War*, 128 - 29, 138 - 39, 142; "Crisis in Opium Traff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pril 1839), 610; and W. Travis Hanes III, and Frank Sanello, *The Opium Wars: The Addic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 (Naperville: Sourcebooks, 2002), 37.

2 Hosea Ballou Morse 提供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有限论述。"Ever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quantities of opium consumed in China appears to differ from every other statement."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11. 这些数字我也参考了下述文献: ibid., 209 - 210; and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223. 又见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29, 149.

3 Fay, *The Opium War*, 58 - 60; Greenberg, *The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24 - 31; Charles William K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Charles Elliot, Esq.* (London: Edward Suter, 1839), 53 - 54; and Samuel Warren, *The Opium Question*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0), 52.

4 "War with China, and the Opium Question,"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March 1840), 381. 又见, Robert Bennet Forbes, 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China Trade (Boston: Samuel N. Dickinson, 1844), 50 - 51; Samuel Warren, *The Opium Question*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0), 125; Phipp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viii; Hanes and Sanello, *The Opium Wars*, 157; Collis, *Foreign Mud*, 262; and H. B. Morse,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s of the Trade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0), 83.

5 R. k. Newman,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October 1995), 765 - 94;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289; Chang, *Commissioner Lin*, 34 - 36;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171 - 72; Fay, *The Opium War*, 129; Trocki, *Opium*, 90 - 91; "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being a rejoinder to the second letter of a Reader, published in the Repository For March, 1837," *Chinese Repository* (April 1837), 565; Allen, *An Essay on the Opium War*, 22; and Wood, *Sketches of China*, 206 - 7.

6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49; Chang, *Commissioner Lin*, 41; Trocki, *Opium*, 98; "Commerce and Finances," *De Bow's Review* (August 1853), 206 - 7; and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25.

7 "Memorial recommending that tea, rhubarb, and silk, be sold to foreigners at fixed prices: imperial reply to the same," *Chinese Repository* (October 1838)

8 Wood, Sketches of China, 206.

9 "Memorial from Hwang Tseotsze, soliciting increased severity in the punishments of the consumers of opium; and the imperial reply,"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September 1838), 271 - 80.

10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72 - 73.

11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44 - 45. 又见, "*Art. II.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stinies of Ultra-Malayan Asia, From a Correspondent. (Conclusion of Article ii. No. I, vol. vi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June 1838), 80 - 81.

12 Robert Bennet Forbes to Rose Greene Smith Forbes, March 10, 1839, in Kerr, *Letters from China*, 101.

13 Jan Pottker, *Sara and Eleanor: The Story of Sara Delano Roosevelt and her Daughter-in-Law, Eleanor Roosevelt* (New York: St. Martins, 2005), 15; and Geoffrey C. Ward and Frederic Delano Grant, Jr., "A Fair, Honorable, and Legitimate Trade," *American Heritage* (August/September 1986), 49 - 64.

14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133; Booth, *Opium*, 35 - 46; and *A New Family Encyclopedia*, Charles A. Goodrich 辑 (Philadelphia: T. Belknap, 1831) 146 - 47.

15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335.

16 K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Charles Elliot*, 60 - 61; Collis, *Foreign Mud*, 255 - 56; and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The Times* (August 7, 1839).

17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1 - 3.

18 Fay, *The Opium War*, 129. 又见, ibid, 119 - 27.

19 除文中摘录的以外，以下关于 12 月 12 日骚乱的议论参考了以下文献：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73 - 77（均引自本文献）; Collis, *Foreign Mud*, 186 - 90; Fay, *The Opium War*, 133 - 134; "China: The Opium Traffic," in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May 1839), 40 - 41; "Captain Elliot to Viscount Palmerston (December 13, 1838),"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T. R. Harrison, 1840), 324; Kerr, *Letters From China*, 76 - 77。

20 "Crisis in Opium Traff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pril 1839), 610.

21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23 - 25.

22 Ibid, 28 - 31, 93. 又见, Fay, *The Opium War*, 143, 206;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rom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and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requiring interdiction of opiu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39), 9 - 12;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rom the high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and his colleagu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February 1840), 497 – 503; and "The High Commissioner's Second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The Times* (June 11, 1840).

23 "Crisis in Opium Traffic,", 610 – 19.

24 除文中摘录的以外，以下关于林则徐和外国人在销烟之前冲突的背景信息参考了以下文献：Fay, *The Opium War*, 142 – 61;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0 – 52;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35 – 49;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136 – 45;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45 – 49; and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35 – 37; and Henry Charles Sirr,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vol. II (London: William S. Orr, 1849), 332 – 33; and K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Charles Elliot*, 17 – 25。

25 Collis, *Foreign Mud*, 205 – 7. 又见，"Chinese Affairs," *The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840), 301.

26 Fay, *The Opium War*, 140; Forbes, *Letters from China*, 98; and Samuel Warren, *The Opium Question*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0), 5.

27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48.

28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143 – 44.

29 Forbes, *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China Trade*, 49.

30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44 – 46, 49.

31 旗昌洋行书信引自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36.

32 Robert Bennet Forbes, et. al., "Memorial of R. B. Forbes and Others," 2. 又见，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61 – 62.

33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49 – 50.

34 除文中摘录的以外，下文英中双方穿鼻海战前的紧张关系参考了以下文献：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30 – 57; Captain Elliot to Viscount Palmerston, November 5, 1839, in *A Digest of the Despatches* [sic] *on China*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0), 168 – 71; 9 – 10; Fay, *The Opium War*, 165 – 79; Collis, *Foreign Mud*, 229 – 50; and Chang, *Commissioner Lin*, 189 – 08。

35 "Journal of Occurrences," *Chinese Repository* (August 1839), 223.

36 "Proclamation calling on the people to arm themselves, to resist parties of English landing on their Coasts,"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40 – 1841*, vol. XXIX (London: James Ridgeway and Sons, 1857), 1067.

37 "Captain Elliot to the Officers at Kowloon,"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40 – 1841*, vol. XXIX (London: James Ridgway and Sons, 1857), 1057.

38 Chang, *Commissioner Lin*, 203.

39 Captain Elliot to Viscount Palmerston, November 5, 1839, in *A Digest of the Despatches*, 169.

40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57.

41 Kerr, *Letters from China*, 162, 168.

42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ses*, 155.

43 Fay, *The Opium War*, 176.

44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1.

45 Fay, *the Opium War*, 168 - 169; and,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rno Press, 1981), 83.

46 Fay, *The Opium War*, 192 - 193.

47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4; and Harry G. Gelber, "China as 'Victim'? The Opium War that Wasn't,"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136, 2011 年 6 月 29 日访问下述网站所见: http://www.ces.fas.harvard.edu/publications/docs/pdfs/Gelber136.pdf。

48 分别引自："Private Correspondence," *The Times* (November 1, 1839); and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The Times* (September 27, 1839). 又见 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London: Picador, 2011), 103 - 5;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The Times* (August 7, 1839); and "London, Wednesday, October 23, 1839," *The Times* (October 23, 1839).

49 Algernon S. Thelwall, *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William H. Allen and Co., 1839), 173, 177.

50 *Brief Observations Respecting the Pending Disputes with the Chinese, and a Proposal for Bringing Them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0), 1 - 15;" London, Wednesday, December 25, 1839," *The Times* (December 25, 1839); and "Chinese Affairs, Art, VIII," in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840), 294 - 319.

51 分别引自：Alain Le Pichon,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 - 18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7; and Collis, *Foreign Mud*, 256 - 257. 又见，Fay, *The Opium War*, 190 - 193; Collis, *Foreign Mud*, 250 - 56;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41, 107; Chang, *Commissioner Lin*, 192 - 93; and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The Times* (August 7, 1839).

52 巴麦尊信件的所有引文见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621 - 30.

53 H. G. Gordon to different East India Associations in Great Britain, June 3, 1839, in

John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nd Events in China* (Canton: Canton Register Press, 1839), 142.

54 Collis, *Foreign Mud*, 259. 又见 ibid, 256 - 57; and "Express from Indi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China," *The Times* (March 12, 1840)

55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Session of 1840, vol. 3, John Henry Barrow 辑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0), 2385 - 424, 2431 - 70, 2485 - 545.

56 Collis, *Foreign Mud*, 260 - 61; Lovell, *The Opium War*, 107.

57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Session of 1840, vol. 3, 2460 - 61. 又见 ibid., 2485 - 543; "The Opium War," *Tait's Edinburgh Magazine* (July 1840), 474 - 75; "The Opium War with China," *The Times* (April 25, 1840); and Hanes and Sanello, *The Opium Wars*, 78.

58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Session of 1840, vol. 3, 2407.

59 Ibid., 2401 - 8, 2494, 2527 - 43; Collis, *Foreign Mud*, 274; "War with China, and the Opium Question,"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March 1840), 372; Gelber, "China as 'Victim'?"; "The Opium Trade," *Museum of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533 - 34; and "House of Commons, Thursday, April 9," *The Times* (April 10, 1840).

60 除文中另有说明，本节关于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的背景信息参考了下述文献：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55 - 83;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4 - 56; Fay, *The Opium War*, 213 - 76; and Li Chien-Nung,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 - 192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37 - 38。

61 Chang, *Commissioner Lin*, 212.

62 "Queen Victoria to the King of the Belgians," April 13, 1841, in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vol. I,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and Viscount Esher 辑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26.

63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80 - 91; Fay, *The Opium War*, 277 - 307; and Hanes and Sanello, *The Opium War*, 134.

64 分别引自：Collis, *Foreign Mud*, 180; and 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vol. I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2), 11 - 12.

65 Loveall, *The Opium War*, 115. 又见 ibid., 111 - 15, 184 - 91, 205; Fay, *The*

Opium War, 261, 344 – 47; Haines and Sanello, *The Opium Wars*, 31; Hunt Janin, *The India-China Opium W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9), 109 – 110; and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86.

66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53 – 54.

67 Sir Henry Keppel, *A Sailor's Life under Four Sovereigns*, vol. 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9), 269.

68 Alexander 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244.

69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II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562. 又见,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394 – 406.

70 "China,"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December 31, 1842). 又见, 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The History of China*, vol. II (London: W. Thacker & Co., 1898), 130;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95 – 96; and Fay, *The Opium War*, 351 – 53.

71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88 – 97; an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6 – 57.

72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98 – 318;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58 – 62; .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190.*

73 Lord Palmerston to Henry Pottinger (May 31, 1841), in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658 – 59.

74 Granville G. Loch,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The Operations in the Yang-Tze-Kiang;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John Murray, 1843), 173 – 74.

75 Fay, *The Opium War*, 366 – 67; and "The Chinese Treaty," *The Times* (November 26, 1842).

76 "London, Friday, November 25, 1842," *The Times* (November 25, 1842)

77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53 – 54; Gelber, *The Dragon*, 188; and Collis, *Foreign Mud*, 260 – 74;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74;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192;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35 – 37; "The Chinese Question and the British," *New Hampshire Sentinel* (May 8, 1840); "Chinese

Affairs," *The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295 - 312 - 13, 316 - 17; "The Chinese Question," *New Hampshire Sentinel* (May 8, 1840); and Lord Macaulay, "China," in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Session 1840, vol. 3, 2407.

78 Backhouse and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331.

79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19 - 44; Fay, *The Opium War*, 67 - 79; and Collis, *Foreign Mud*, 108 - 72.

8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2), 277. 又见,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72 - 73; "China," in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Session 1840, vol. 3, 2422 - 33; and "The Chinese Trade," *The Corsair: A Gazette of Literature, Art, Dramatic Criticism, Fashion, and Novelty* (January 4, 1840), 684 - 85.

81 John Quincy Adams, "Lecture on the *War with China, delivered before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December*, 184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2), 281, 288. 又见,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182 - 83; Gelber, *The Dragon*, 188; and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106 - 8.

82 Augustine Heard 言论引自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40. 又见,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61; Robert Bennet Forbes, et. al., "Memorial of R. B. Forbes and Others," 2 - 3; Fay, *The Opium War*, 337 - 38; and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97 - 100.

83 K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Charles Elliot*, 49, 51.

84 分别引自: Michae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June 2006), 205 - 6; Jeremiah Bell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145 - 46; William Wells Williams, "Letter from Mr. Williams, Dated at Macao, Aug. 29th, 1839," *Missionary Herald* (April 1840), 115 - 16; and "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 *Missionary Herald* (January 1841), 43. 又见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120; Fay, *The Opium War*, 331.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s*, 100 - 2;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168; and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Wars They Want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Us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before the Opium War," *American Neptune* (Fall 1988), 271 - 82.

85 John Quincy Adams,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 to 1848*, vol. 11, Charles Francis Adams 辑 (Philade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6), 30 - 31. 又见, John Quincy Adams, "Lecture on the War With

China,"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January 26, 1842), 326 - 30;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68 - 71; "J. Q. Adams and the Opium War," *The Pittsfield Sun* (December 2, 1841); and "Mr. Adams and the Opium War," *Baltimore Sun* (December 20, 1841). 并非所有的报道均为负面，如，"Hon. John Quincy Adams," *The Daily Atlas* (November 24, 1841). 又见，Fay, *The Opium War*, 337 - 38;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102; and Howard Malcolm, *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Embracing Hindustan, Malaya, Siam, and China*, vol. I (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1839), 159 - 60; and "The Opium Trade," *The Farmer's Cabinet* (April 10, 1840)。

86 Freeman Hunt, "The Opium Trade—England and China,"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May, 1840), 413; and "Twenty-Sixth Congress—1" Session,"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March 21, 1840), 46. 又见，"The Opium Trade";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180 - 81;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February 1841), 151 - 52;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60 - 62;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106; and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96; and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105.

87 John Taylor, "Sandwich Islands and Chin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31, 1842," *House Document no. 35, United States Congress,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and *A Memorial of Caleb Cushing from the City of Newburyport* (Newburyport: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City Council, 1874), 101 - 4.

88 "The Dinner at Faneuil Hall, on the 17th Instant,"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July 1, 1843).

89 Daniel Webster to Caleb Cushing, May 8, 1843, in *The Diplomatic and Official Papers of Daniel Webst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48), 361 - 62, 364.

90 Robert V. Remini, *Daniel Webster: The Man and His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578.

91 John Taylor, "The President's Letter to the Emperor," in *The Diplomatic and Official Papers of Daniel Webster*, 367 - 68.

92 Stevens and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249 - 250. 又见，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90.

93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143.

94 "The American Flag - Staf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44), 276 - 77. 又见，John Watson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3), 91 - 92; and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96; and "The

Hon. Caleb Cushing, Commissioner to China," Daily Atlas (May 24, 1843).

95 第一处引自 1844 年 6 月 22 日顾盛致耆英书信［*The Chinese Repository* (October 1845), 491］。第二处引自 1844 年 7 月 22 日顾盛致耆英书信［*The Chinese Repository* (November 1845), 531］。又见,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27 - 28.

96 Treaty with China, in *The Public Statutes at Lar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1789 to March 3, 1845*, vol. VIII, Richard Peters 辑 (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46), 592 - 600.

97 "Howqua, ——The Hong Merchant," *New-Hampshire Patriot* (May 23, 1844); and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引自 "Howqua, the Senior Hong Merchant," *The Merchant's Magazine* (May 1844), 459 - 61.

98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192. 又见 ibid., 123 - 35;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39 - 48, 165 - 67; and Gelber, *The Dragon*, 154.

第九章 逐风而行

1 Philip Hone, *The Diary of Philip Hone, 1828 - 1851*, Bayard Tuckerman 辑, vol. II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889), 242. 又见,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Maritime History of New York* (1941: reprint Brooklyn: Going Coastal, 2004), 139 - 40; and "New Ships," *The New York Herald* (January 22, 1845).

2 Carl C.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Clipper Ship*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4), 50.

3 Howard Irving Chapelle, *The Baltimore Clipper,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Salem: The Marine Research Society, 1930), 3.

4 Addison Beecher Colvin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80), 23 - 24; and "Early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in New York," *U. S.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Journal* (September 1857), 438 - 39.

5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25 - 27; Basil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London: Century Publishing, 1984), 24; Robert Carse, *The Moonrakers: The Story of the Clipper Ship Me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43 - 44; and Arthur H.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An Epitome of Famous American and British Clipper Ships, Their Owners, Builders, Commanders, and Crew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66.

6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21.

7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44.

8 Mirror, "Dock Rambles of a Nautical Mechanic," *The Monthly Nautical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 (February 1855), 353.

9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61 - 62; Arthur H. Clark, "A Glimpse of the Clipper-Ship Days," *Harper's Monthly Magazine* (June 1908), 93;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23 - 29;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12 - 113;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24; and Leo Block, *To Harness the Wi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ail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101.

10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15, 120; Octavius T. Howe and Frederick C. Mathews, *American Clipper Ships: 1833 - 1858*, vol. II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86), 501;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29 - 30; and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24.

11 "Very Late From China - Astonishing Voyage," *The Weekly Herald* (April 5, 1845); and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30.

12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21.

13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31, 61. 又见, Howe and Mathews, *American Clipper Ships*, 569.

14 "The Fastest Vessel in the World," *Northern Standard* (July 15, 1848). 又见, "Eighty One Days From China," *The Constitution* (August 4, 1847); "One Week Later From China," *The Daily Picayune* (April 3, 1849);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34, 36, 41; and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37 - 38.

15 James K. Polk, Fourth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5, 1848, in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 - 1897*, vol. IV, James D. Richardson 辑 (Washington: Published by Authority of Congress, 1899), 636.

16 "Ho! For California," *The Weekly Herald* (January 13, 1849); Carse, *The Moonrakers*, 70;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43 - 144;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102 - 105; and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48 - 51.

17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48.

18 Frank Moss, *The AmericanMetropolis, from Knickerbocker Days to the Present Time: New York City Life in All Its Various Phases* (New York: Peter Fenelon Collier, 1897), 251.

19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51 - 54.

20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41.

21 "The New Clipper Ship *Stag Hound*, of Boston," *The Boston Daily Atlas* (December 21, 1850)

22 F. C. Mathews, "The Clipper Ship *Stag Hound*," *Pacific Marine Review* (March 1922), 153.

23 Ibid, 153 - 154.

24 "The New Clipper Ship *Bald Eagle*, of Boston," *The Boston Daily Atlas* (November 17, 1852); and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51 - 54.

25 David W. Shaw, *Flying Cloud: The Tru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Clipper Ship and the Woman Who Guided H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259 - 62; Octavius T. Howe and Frederick C. Mathews, *American Clipper Ships: 1833 - 1858*, vol. I (1962; reprint,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86), 190 - 195; Priscilla Sawyer Lord and Virginia Clegg Gamage, *The Spirit of '76 Lives Here: Marblehead* (Radnor: Chilton Book Company, 1972), 176 - 178; "The Clipper Race," *The New-Hampshire Gazette* (October 21, 1851); "Magnificent Clipper Race," *The Sun* (May 17, 1853); "Clipper Race," *Weekly Alta California* (December 1, 1854); and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212 - 13.

26 Matthew F. Maury,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5), 263 - 64; and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41 - 45.

27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97 - 98. 又见, Spears, *Captain Nathaniel Brown Palmer*, 207 - 208; and Howe and Mathews, *American Clipper Ships*, vol. II, 461 - 63.

28 "London, Thursday, December 5, 1850," *The Times* (December 5, 1850)

29 Cutler, *Greyhounds of the Sea*, 125. 又见, Carse, *The Moonrakers*, 78.

30 George Francis Train, *An American Merchant in Europe, Asia, and Australia* (New York: G. P. Putnam, 1857), 446.

31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21.

32 Clark, *The Clipper Ship Era*, 202 - 205;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103; and "Challenge from American Ship-Builders," *The People's Illustrated Journal* (July 10, 1852), 175.

第十章 褪色的财富

1 Freeman Hunt, "Monthly Commercial Chronicle,"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January

1845), 79 – 80. 又见, James Christy Bell, *Opening a Highway to the Pacific, 1838 – 18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 129 – 30 n4; and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74.

2 作者根据以下文献计算: Homans, *An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64, 181;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5, 534 – 44; and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22, 32. 又见, Peter Schran, "The Minor Significanc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50 – 1931," in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37 – 58。

3 关于进出口货物的范围, 参考了 19 世纪 40 年代到 19 世纪 60 年代多份报告中的资料, 包括美国财政部部长或美国国家统计局总长对于美国各年商业和航海的报告。如,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ransmitting a Report from the Register of the Treasu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1860* (Washington: George W. Bowman, 1860), 7 – 51. 又见,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20 – 43, 205 – 09, 329 – 31; Hao, "Chinese Teas to America," 16 – 31; Kang Chao, "The Chinese-American Cotton-Textile Trade, 1830 – 1930," in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04 – 05。

4 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1), 60 – 61.

5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72 – 283; Latourette, *The Chinese*, 280 – 87; and Whipple, *The Clipper Ships*, 112 – 13.

6 除另有说明, 本节背景信息来自以下文献: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79 – 81;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196 – 219;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67 – 437, 539 – 56; Gelber, The Dragon, 192 – 203;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87, 106 – 34;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240 – 43; Hunt Janin,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9), 70; "The War in China," *The Times* (December 15, 1860); and Hanes and Sanello, *The Opium Wars*, 3 – 12。

7 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Gord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6), 46.

8 Forbes, *Remarks on China*, 56. 又见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96 – 97, 106 – 09, 135 – 40; Gideon Nye, "Tea: And the Tea Trade,"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January 1850), 20; "Tea-Its Consumption and Cultur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February 1863), 118; Nathan Allen, *A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Boston: John P. Jewett, 1850), 12 – 13; Trocki, *Opium*, 109 – 110; and R. Alexander,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Opium*

Smuggling (London: Judd and Glass, 1856), 40 - 54;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Bulletin on Narcotics* 49 (2007), 18 - 20; and "The Opium Question,"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vol. 8 (London: Seeley, Jackson and Halliday, 1857), 89 - 90.

9 Arnold J.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Laborers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75; reprint, Bloomington, IN: XLibris, 2008), 27 - 41.

10 "The Word Cooli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June 29, 1867), 77; "Coolie," in *Mission Life*; or, *The Emigrant and the Heathen*, vol. IV, J. J. Halcombe 辑 (London: J. E. Adlard, 1867), 19;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30; and Jean Pfaelzer, *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25. 又见,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24 - 25, 29 - 30, 140 - 44, 148, 169 - 70;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49 - 50; and Evelyn Hu-Dehart, "Chinese Coolie Labor in Cub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ee Labor of Neoslavery," in *Black Studies* (1994) 39.

11 Leonard Wray, *The Practical Sugar Planter*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48), 83 - 84. 又见,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50 - 51; and "The Cuban Slave Trade," *Charleston Mercury* (December 23, 1856).

12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52 - 91; "The Chinese Puzzle," *Chambers'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 (August 8, 1863), 96; William Fred Mayers, N. B. Dennys, and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67), 228; "Coolie Slaves," *The Anglo-American Times* (July 21, 1866), 9; Lisa Yun, *The Coolie Speaks: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ers and African Slaves of Cub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 - 2, 8, 18, 21; and "The Coolie Trade," *Charleston Mercury* (October 9, 1856).

13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53 - 162; and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30 - 1.

14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79, 190.

15 United States Senat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Compliance With a Resolution of the Senate of April 24, Calling for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the Coolie Trade, Index to the Executive Documents, 1855 - 1856*, doc. 99 (Washington, DC: A. O. P. Nicholson, 1856), 8 - 10; "The Coolie Trade," *De Bow's Review* (July 1857), 33 - 34.

16 本节有关"挪威"号事件的背景信息和引文出自 Edgar Holden, "A Chapter on the Coolie Trade," 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864), 1 - 10. 又见 "Revolt of the Chinese Coolies," *Sun* (May 18, 1857)。

17 "The Ship Flora Temple: Shipwreck, and Loss of Eight Hundred and Fifty Liv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860); and "Later From China," *San Francisco Bulletin* (February 6, 1860).

18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63, 168 – 73; Hu-Dehart, "Chinese Coolie Labor in Cub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5; and Sharon A. Roger Hepburn, "Disease," in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Passage*, Toyin Falola and Amanda B. Warnock 辑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2007), 138.

19 G. Fitz-Roy Cole, "John Chinaman Abroad," *Fraser's Magazine* (October 1878), 451 – 452. 又见,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40 – 43.

20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222; Paul R. Ehrlich, David S. Dobkin, and Darryl Wheye, *The Birder's Handbook: A Field Guide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n Bird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263; Gregory T. Cushman, "The Most Valuable Birds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he Revival of Peru's Guano Industry, 1909 – 1965," *Environmental History* (July 2005), pp. 477 – 509; David Hollett,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The Story of the Peruvian Guano Tra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82; and W. M. Mathew, "Peru and the British Guano Market, 1840 – 187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70), 112 – 28; and Richard J. King, "The Most Valuable Bird in the World":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Cormorant," *Log of the Mystic Seaport* (2002 – 3), 24 – 25.

21 George Washington Peck, "Chincha Islands," *Littell's Living Age* (January 28, 1854), 213 – 214. 又见, George Washington Peck, *Melbourne and the Chincha Islands; With Sketches of Lima, and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54), 209; and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Guano Trade," *The Anti-Slavery Reporter*, vol. III (London: Peter Jones Bolton, 1855), 39 – 42.

22 Lisa Yun, *The Coolie Speaks: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ers and African Slaves of Cub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 – 32; Hu-Dehart, "Chinese Coolie Labor in Cub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6 – 47;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98, 100; W. W. Wright, "The Coolie Trade, or, the Encomienda Syste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 Bow's Review (January 1859), 296 – 322; and Charles Dickens, "The Coolie Trade in China," *All the Year Round* (July 18, 1860), 365.

23 Basil Lubbock 言论, 引自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49. 又见, ibid., 50;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45, 148; Daniel Henderson, *Yankee Ships in China*

Seas: Adventures of Pioneer Americans in the Troubled Far East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46), 185.

24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45; George Francis Train, *An American Merchant in Europe, Asia, and Australia* (New York: P. Putnam & Co., 1857), 78 - 79; and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28 - 31.

25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306 - 307. 又见,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283 - 84; U. S. House, Committee of Commerce, "Coolie Trade," 36th Cong, 1st sess, Report No., 443 (April 16, 1860), 7.

26 Editorial,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856); Moon-Ho Jung, *Coolies and Cane: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24; "A New Slave Trade Protected by the Stars and Stripes,"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2, 1856); "The White Slave Trade," *The Pittsfield Sun* (April 17, 1856); and "The Coolie Trade," *The Charleston Mercury* (October 9, 1856); and U. S. House, Committee of Commerce, "Coolie Trade," 5.

27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44 ~ 45, 286 - 94; and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olie Trade' by American Citizens in American Vessels," in *The Columbi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 ed. Franklin Od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24; and Najia Aarim-Heriot, *Chinese Immigrants, African Americans, and Racial Anx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8 - 8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77 - 79.

28 本节关于中国人在加州的内容参考了下述文献: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 - 132;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170 - 175; Pfaelzer, *Driven Out*, 3 - 6, 24 - 29; David Haward Bain, *Empire Express: Building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New York: Viking, 1999), 205 - 9;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136 - 39; "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a. k. a. Chinese Exclusion Act), May 6, 1882," in *The Columbi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 62;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 10; Stephen E. Ambrose,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The Men Who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1863 - 1869*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49 - 52; and "The Chinese Coolie Questio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December 16, 1859)。

29 Asa Whitne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uary 28, 1845," in *The Congressional Globe, Containing Sketches of 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wenty -*

Eight Congress, vol. 14 (Washington, DC: *Globe*, 1845), 218; and Robert V. Hine and John Mack Faragher, *The American West: A New Interpretive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0), 280.

30 Thomas Hart Benton, "Speech of Mr. Benton," in *Niles' National Register* (March 14, 1849), 171. 又见, William H. Seward, "Colonization in North America," (January 25, 1853), in *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Globe for the Second Session, Thirty-Second Congress*, vol. 27 (Washington: John C. Rivers, 1853), 127; and Bruce Cummings, *Dominions from Sea to Sea: Pacific Ascendancy and American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0 - 72.

31 "Mail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The Congressional Globe* (February 16, 1865), 828 - 31; United States House, "Causes of the Reduction of American Tonnage," 41st Cong., 2d sess, Report No. 28 (February 17, 1870), 48; Seth Low, "Tea", in *Johnson's Universal Cyclopaedia: A Scientific and Popular Treasury of Useful Knowledge*, ed. Frederick A. P. Barnard and Arnold Guyot (New York: A. J. Johnson, 1878), 751 "The New Route of Commerce to the Eastern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867); "America and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1869);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December 1, 1868), in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wo Houses of Congr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Fortieth Congr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9), 32; "The Pacific Railroad," *Engineering* (May 14, 1869), 324; Schran, "The Minor Significanc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238 - 247; and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30 - 43, 330 - 31; an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5, 534 - 44.

后记　历史的回响

1 Henrietta M. Larson, "A China Trader Turns Investor—A Biographical Chapter in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12 (1933 - 34), 345 - 58;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236 - 241.

2 Richard B. Westbrook, *Girard's Will and Girard College Theology* (Philadelphi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888), 145 - 72; 及吉拉德学院网站 http://www.girardcollege.edu/page.cfm?p=359，作者于2011年6月15日访问。

3 Lovell, *The Opium War*, 8 – 15, 333 – 61. 本书英文版开始编辑后不久，Julia Lovell 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出版。她在书中对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提出了极有见地的新看法，分析了中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与应对及其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的演变。必须注意，中国对于鸦片战争的解读包括在更加宏大的讨论背景中，即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历史，包括所谓的“百年国耻”（century of humiliation）——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这段时期与外国势力的较量中反复败退，被迫接受所谓的不平等条约。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本书并没有涵盖这一时期的其他战事。而中国政府对这些战争何以构成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倾向于将鸦片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断打击乃至征服中国的一章，直至中共解放了中国。

4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Top Trading Partners for the year ending December 2010,” 网站：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top1112yr.html, 2012 年 2 月 26 日访问。

5 费正清曾指出，“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总是混合着想象和希望”。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24。

参考书目

这份参考书目只是本书中所用资料的一小部分，供希望更多了解美中早期贸易史的大众读者延伸阅读。如想了解本书中的更多具体信息，可参考尾注。

Bernstein, William J.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 New York: Grove, 2008.

Booth, Martin. *Opium: A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1996.

Breen, T. H.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usch, Briton Cooper. *The War Against the Seals: A History of the North American Seal Fishery*.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Carse, Robert. *The Moonrakers: The Story of the Clipper Ship Me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ang, Iris.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2003.

Christman, Margaret C. S. *Adventurous Pursuits: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 – 1844*.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4.

Clark, Arthur H. *The Clipper Ship Era: An Epitome of Famous American and British Clipper Ships, Their Owners, Builders, Commanders, and Crew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Cutler, Carl C. *Greyhounds of the Sea,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Clipper Ship*.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4.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Dodge, Ernest S. *Islands and Empires: Western Impact on the Pacific and East As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Downs, Jacques M. *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 – 1844*.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Dulles, Foster Rhea. *The Old China Tra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0.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 – 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ay, Peter Ward. *The Opium War: 1840 – 18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Fichter, James R. *So Great a Proffit: How The East Indies Trade Transformed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orbes, Robert Bennet. *Personal Reminiscenc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8.

Frank, Caroline, *Objectifying China, Imagining America: 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Gelber, Harry G. *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2007.

Gibson, James R.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 – 184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Goldstein, Jonatha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682 – 1846: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Attitudinal Effects*.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 – 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Greenbie, Sydney and Marjorie Barstow. *Gold of Ophir: The China Trad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ilson-Erickson, 1937.

Hohenegger, Beatrice. *Liquid Jade: The Story of Tea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6.

Hunter, William C.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 – 1844 by An Old Resid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Kirker, James. *Advenures to China: Americans in the Southern Oceans, 1792 – 18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baree, Benjamin Woods. *The Boston Tea Par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Lee, Jean Gordon. *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 – 1844*.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84.

Malloy, Mary. "'*Boston Men*' *in the Northwest Coast: The American Maritime Fur Trade 1788 – 1844*. Kingston: The Limestone Press, 1998.

May, Ernest R. and John K. Fairbank, editor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eagher, Arnold J.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Laborers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Bloomington: XLibris, 2008; reprint of a Ph. D.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completed in 1975.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 – 1860*.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Richards, Rhys. "United States Trade with China, 1784 – 1814," Special Supplement to vol. 54 of *The American Neptune* (1994), 9 – 66.

—— "Re-Viewing Early American Trade with China, 1784 – 1833," in

Mains'l Haul: *A Journal of Pacific Maritime History* (Spring 2003), 14 – 19.

Smith, Philip Chadwick Foster. *The Empress of China.*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aritime Museum, 1984.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Tchen, John Kuo Wei.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 – 188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Temple, Robert. *The Genius of China: 3, 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Waley, Arthur.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8.

Whipple, Addison Beecher Colvin. *The Clipper Ships.* Alexandria: Time-Life Books, 1980.

Wood, Frances.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Yangwen, Zheng.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Zug, James. *American Traveler,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hn Ledyard, the Man Who Dreamed of Walk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关于作者

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州沿海附近长大，毕业于布朗大学，主修生物和环境研究。在耶鲁大学森林和环境研究学院获得环境管理硕士学位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环境政策和规划博士学位。

多林曾任美国环保署项目经理，在美国和伦敦从事环境顾问，还担任过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和国会山实习生，国家海洋渔业服务局渔业政策顾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推动科学大众媒体科学和工程学者”美国学者。

多林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他对野生动物、环境和美国历史的兴趣。他的作品包括《毛皮、财富与帝国：美国毛皮贸易史诗》（*Fur, Fortune, and Empire: 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 W. W. Norton）、《利维坦：美国捕鲸史》（*Lieviathan: The History of Whaling in America*, W. W. Norton）、《史密森国家野生动物难民之书》（*Smithsonian Book of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乌鳢：无水之鱼》（*Snakehead: A Fish Out of Water*）和关于波士顿港荒废与清理的《政治水域》（*Political Water*）。《利维坦》被《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普罗维登斯期刊》（*Providence Journal*）选为2007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之一。由于对捕鲸研究和历史的杰出贡献，该书也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2007年John Lyman美国海洋史奖，和新贝德福德捕鲸博物馆颁发的第二十三届年度L. Byrne Waterman奖。《毛皮、财富与帝国：美国毛

皮贸易史诗》被《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选为2010年最佳图书之一，被洛基山地图书馆选为2010年十大图书之一，还获得由新英格兰历史学会颁发的2011年James P. Hanlan图书奖，并在美国户外作家协会的卓越技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多林和家人目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马布尔海德。

索　引

（索引页码为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

A. A. Low & Brother（罗氏兄弟公司），277

acrobats（杂技），184

Adams，Henry Carter（H. C. 亚当斯），90

Adams，John（约翰·亚当斯），84，89

Adams，John Quincy（J. Q. 亚当斯），252－53，256

Adams，Samuel（S. 亚当斯），134

Admiralty，British（英国海军部），279

Africa（非洲），8，22，32，34，73

  slaves from（奴隶来自），293

agents（代理人），176，238，292

  inblockade of Canton（广州的封锁），224－26，224，236，239

  hong merchants' relationship with（行商的关系），173

  Lin's pressure on，to abandon opium trade（林则徐施压放弃鸦片交易），222

  see also specific agents（又见具体的代理人）

agricultural lands（农业用地），263

Alaska（阿拉斯加），*104*，110－11

alcohol（酒精），128－29，130，215－16

Alejandro Selkirk Island（马斯阿富艾拉岛），107

Aleutian islands（阿留申群岛），110，*111*

Alliance（“联盟”号），97

Allom，Thomas（T. 阿隆），26，45，73，183，208

Alta California（上加利福尼亚），110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公理会差会），255

American colonies（美洲殖民地）：

  British mercantilist policies toward（英国重商主义政策），5

  Chinese goods obtained by（获得的中国商品），5－6，58－61

  population of（人口），64

  taxation in（税），66，69

  tea in（茶），6，56－58，65－71，*70*

American factory（in Canton）（广州的）美国夷馆，76，155，177，181－82，223－24
American Navigation Club（美国航海俱乐部），281，282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美国学者学会），63－64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独立战争），16，17，55，59，65，68，91，94－95，133－34，267
causes of（原因），252，253
destruction of U. S. fleet in（美国船队被摧毁），97
economic effects of（经济影响），193－94
end of（结束），3，3，5
America's Cup race（美洲杯比赛），280，281－82
Amherst，Lord（阿美士德），251
Amoy，*see* Xiamen，China（Amoy，见Xiamen，China）
anchors（锚），123
Ann McKim（“安·麦金姆”号），267，269
Anson，George（G. 安森），63，73
Antarctica（南极洲），149－50
Aomen，*see* Macao（Aomen，见Macao）
Apootsae（阿保仔），128
Arabs（阿拉伯人），25，42
Archer，Henry（H. 阿彻），164－66
Argo（“阿尔戈”号），113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25
Armenia（亚美尼亚），176
Arrow（“亚罗”号），288
arrows（箭），244
art（艺术），xvii
Astor，John Jacob（J. J. 阿斯特），92－93，92，96，98，124，310
China trade abandoned by（放弃对华贸易），147
embargo and（封港令），138－43
wealth of（财富），96
western expeditions launched by（派出西部探险队），190－91
Astoria（阿斯特里亚），93，191
Atahualpa（“阿塔瓦尔帕”号），128
Atung，Mr.（阿东），201
Augustine Heard & Company（琼记洋行），287
Australia（澳大利亚），113－14，151
Austria（奥地利），36
axes（斧头），114

Baidarka（拜达卡），110－11，111
Bald Eagle（白头鹰），302
Baltimore，Md.（巴尔的摩），122，306
clippers built in（造出的飞剪船），273
bar iron（铁条），123
Barnum，P. T.（P. T. 巴纳姆），200
barracoons（巴拉坑），292
Barron，Samuel（S. 巴隆），138
Batavia（巴达维亚），100
Bath，Maine（缅因州巴斯），273
beachcombers（海滩流浪者），129
beads（珠子），130
Beauchene Island（博谢纳岛），105
Beaver（Astor's ship）（“海狸”号［阿

斯特名下]), 93, 140 – 43
Beaver (British ship) ("海狸"号[英国船]), 65 – 66
beaver pelts (海狸皮), 14, 190
bêche – de – mer (sea cucumbers) (海参), xvii, 160, 161 – 67, 161, 162
diving for (潜水), 162, 163
violence in trade of (贸易中的暴力), 164 – 67
beef (牛肉), 160, 285
beheading (斩首), 226
Beihe River (白河), 240
Beijing, see Peking (北京, 见 Peking)
Belgium (比利时), 200
Bell, Jacob (J. 贝尔), 274, 277
Bellingshausen, Fabian GottliebBenjamin von (F. G. B. 冯. 贝林豪森), 149
Bellisarius ("贝利撒留"号), 12
Bell's Life (《贝尔生活》), 282
Bengal (孟加拉), 118
Bennett, Joseph (J. 班尼特), 57
Bennett, Willian I (W. I. 班尼特)., 147
Bentley, William (W. 班尼特), 135
Benton, Thomas Hart (T. H. 本顿), 306 – 7
Beresford, John (J. 贝雷斯福德), 145
Betsey ("贝奇"号), 108
bills on London (伦敦汇票), 167 – 69, 259, 286
bing tea (饼茶), 53
bird's nest (燕窝), 123
black tea (红茶), 52 – 53
Bligh, Willian (W. 布莱), 131
boat racing (划船比赛), 185
Bogue, Treaty of the (虎门条约), 248
Bogue (Boca Tigris) (虎门), 37 – 38, 234, 241
bohea tea (武夷茶), 53, 95
Bombay (孟买), 211, 233
Bombyx mori, *see* silkwork (Bombyx mori, 见 silkwork)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 103
Bond, Phineas (P. 邦德), 132 – 33
bonds (保证书), 221, 227, 228, 229 – 30, 231
Boston, Mass.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xvii, 12, 13, 18, 19, 57, 90, 96, 99, 102, 103, 109, 110, 114, 122, 127, 128, 130, 134, 147, 167, 171, 195, 199, 202, 273, 274, 306
clippers built in (修造的飞剪船), 273
Boston Daily Atlas (《波士顿每日地图报》), 275
Boston Galaxy (《波士顿银河报》), 200
Boston Harbor (波士顿港), 66, 99 – 100, 252, 278
Boston Patriot (《波士顿爱国者》), 199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茶党), 56, 65 – 66, 68 – 69, 252, 253, 278
Bounty, HMS (英国海军"邦提"号), 131
Bowditch, Nathaniel (N. 鲍迪奇), 172
"Bowditches" ('鲍迪奇'), 172
bows (弓), 243, 244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 264

brandy（白兰地），14
brass（黄铜），285
Brazil，U. S. trade with（美国与巴西的贸易），285
Breen，T. H.（T. H. 布瑞恩），71
bribery（贿赂），120，217
Bridgman，Elijah Coleman（裨治文），255，262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英属东印度公司），103
Boston Tea Party against（茶党反抗），56，65 - 66，68 - 69，252，253，278
Canton War and（广州之战），81
charter of（的特许），188
Harriet's cargo purchased by，（购买的“哈莱特”号的货物），19
monopoly power of（的垄断），6，60，66，69，70，71，91 - 92，118，187 - 89，223，251
opium traded by（贩卖的鸦片），118 - 19，213 - 14，215，254
silver used for purchases by（购买所用的白银），116 - 17，120
Tea Act as bailout of（《茶叶法案》），67 - 68
tea imported by（进口的茶叶），50，51
on Terranova incident（特拉诺瓦事件），159
volume of Canton trade by（的广州贸易量），135
women attached to men in（女眷），181
British mint（英国铸币厂），249
British Navigation Acts（英国航海条例），277
British Northwest Fur Trading Company（英国西北皮毛贸易公司），93
British West Indies（英属西印度群岛），5
in ginseng trade（人参贸易），15
bronze（铜），29
Brown，John（J. 布朗），123 - 24，310
Brown，Mr.（sailor）（布朗先生（海员）），114 - 15
Browning，Elizabeth Barrett（勃朗宁），215
Bryant and Sturgis（布莱恩特和斯特吉斯公司），153
Buddha（佛像），206
Buddhist monks（佛教徒），48 - 49
Bullard，Charles（C. 布拉德），153
bullion（金银块），286
Bunker，Chang and Eng（昌和恩，邦克），198 - 200，199，201
Bunker Hill，Battle of（邦克山战役），257 - 58
Burgh，James（J. 博格），65
Burke，Edmund（E. 伯克），67，133

Calcutta（加尔各答），43，209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110
gold rush in（的淘金热），271 - 73，272，275 - 76，282，303 - 4
Canada，U. S. trade with（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285，312
candy（糖果），169

cannons（炮台），245
cannon shot（炮弹），123
Canton（广州），xvi，12，19，29，36－41，55，62，63，74，75－78，76，93，95，108，109，123，132，155，171，173，175，205，231，271
American community in（的美国圈子），176－77，177
artisan community of（的工匠群体），102
blockade of foreign area of（封锁外国使馆区），224－26，224，236，239，254
British blockade of（英国封锁），240
British capture of（英军缴获），242
British desire for leveling of（英国希望夷平），234
Cook's sea otter trade in（库克的海獭皮贸易），10－11
execution riot in（行刑骚乱），218－20
factories in（的夷馆），136，146，160，171，176，177，181，182－85，186，194，198，218－20，223－24
foreign life in（的外国人生活），182－85
foreign women banned from（禁止外国妇女），176－78，181
ginseng in（的人参），79－80
great fire of 1822 in（的1822年大火），185－87，185
hong merchants'loss of monopoly at（行商失去垄断权），247
invasion of American garden in（进入美国花园），261－62
knock－offs produced in（生产的仿品），170
Massachusetts's arrival in（“马萨诸塞”号抵达），100－101
number of U. S. ships sent to（美国出发的船只数量），135
opium addicts in（鸦片上瘾者），213
opium traded in（贩卖的鸦片），160
pelts traded in（交易的皮毛），190
Punqua Wingchong in（文钟），142
sandalwood trade in（的檀香木交易），113
silver used for purchases in（用于购买的白银），116－17，123，167
volume of British trade in（的英国贸易量），135
Canton（广州），90，96
Cantonese（广东话），38－39
Canton Packet（“广州包”号），171
Canton Press（《广州周报》），183
Canton Regatta Club（广州船赛俱乐部），185
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183
Canton Systen（广州体系），37－41，79，84，251
expiration of（终结），263
Canton War（广州之战），81－84
Cape Henlopen（亨洛彭角），145
Cape Horn（合恩角），xvii，12，13，148，204，271，280
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xvii，

13, 60, 204
Cape Town（开普敦）, 19, 95
Cape Verde（佛得角）, 22
Carmarthen, Lord（卡玛森爵士）, 132 - 33
Carnes, Francis（弗朗西斯卡恩斯）, 169 - 70, 201
Carnes, Nathaniel（纳撒尼尔卡恩斯）, 169 - 70, 201
Caroline（“凯罗琳”号）, 171
Carrington, Edward（E. 加灵顿）, 169
Carteret, Philip（P. 卡特里特）, 130
Catherine of Braganza, Princess of Portugal（葡萄牙凯瑟琳公主）, 50
Catholic churches（天主教堂）, 74
Cavite（甲米地）, 294
ceramics（瓷器）, 29, 54, 169
Ch'a Ching（Lu Yu）（陆羽《茶经》）, 47 - 48
Challenge（“挑战”号）, *xv*, 302
champagne（香槟）, 153
Chang, *see* Bunker, Chang and Eng（Chang, 见 Bunker, Chang and Eng）
Chapu, China, see Zhapu, China（中国乍浦）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英王查理二世）, 50
Charleston, S. C.（查尔斯顿）, 5, 306
Chateau - sur - Mer（舒墨别墅）, 310
Chen, Li（陈利）, 83
Chen-chiang, China, *see* Zhenjiang, China（Chen - chiang, China, 见 Zhenjiang, China）
Cheng Ho, see Zheng He（Cheng Ho, 见 Zheng He）
Chesapeake, USS（“切萨皮克”号）, 138
Chia-ch'ing, Emperor of China, see Jiaqing, Emperor of China（Chia-ch'ing, Emperor of China, 见 Jiaqing, Emperor of China）
Chicago, Burlington & Quincy Railroad（芝加哥、伯灵顿和昆西铁路）, 310
Ch'ien - lung, Emperor of China, *see* Qianlong, Emperor of China（Ch'ien - lung, Emperor of China, 见 Qianlong, Emperor of China）
China:（中国）
agricultural lands of（农业用地）, 263
American colonies in trade with（北美殖民地与中国的贸易）, 5 - 6, 58 - 61
American ignorance of（殖民地民众对中国的无知）, 61 - 62
amount of opium imported by（进口的鸦片量）, 120, 121, 154 - 55, 211, 212 - 13, 289, 347
amount of trade with U. S.（与美国的贸易量）, 90, 189, 312
antiquated military of（过时的军队）, 244 - 45
Boxer Rebellion in（义和团运动）, 264
Britain's demands to, on opium problems（英国对鸦片问题的要求）, 236 - 37
Britain's trade deficit with（英国与中国

的贸易赤字），116－17，120
British granted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by（向英国授予最惠国待遇），248
British military prowess underestimated by（英国军事实力被低估），242－44
cuisine of（中国菜），197
culture of（中国文化），30－31
currency policies of（中国货币政策），xv－xvi
Cushing's diplomatic mission to（顾盛的外交使团），257，258－62
dangers in traveling to（前往中国的危险），124－28
despotic government in（专制政府），197
droughts in（干旱），287，291－92
European trade with（欧洲与中国的贸易），24－26，28－29，34－35，45，54，55
Europe's dismissive view of（欧洲对于中国的轻视），62－63
famines in（饥荒），287，291－92
fifteenth century fleet of（15世纪的宝船队），32－33
floods in（洪水），287
food supplies of（食品供应），263
foreigners looked down on by（中国看不起外国人），31，34－35，62
foreign learning of language prohibited in（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38－39，262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人口增长），263
internal rebellions in（内乱），263，291－92
knockoffs from（仿制品），169－70
legal systen of（司法体制），80－84，156－59，196
literature of（中国文学），206
Marco Polo's trip to（马可波罗游历中国），24，29－30
maxims of（中国格言），206－7
military prowess of（军事实力），196－97
modern rise of（现代崛起），xv
opium banned in（禁烟），45，118，122，211，213，216－20，235
opium indemnity paid by（对鸦片支付的赔偿），240，241，242，247，250
origin of U. S. trade with（美国对华贸易的源头），4
population of（中国人口），64
poverty in（中国的贫困），286－87
Republic of（中华民国），264
right to trade with（与中国贸易的权利），32
sense of superiority of（中国的优越感），252
seventeenth-century opium imports of（17世纪的鸦片输入），45
taxation in（税收），213
trade deficit of（贸易赤字），121－22
U. S. as seen by（中国眼中的美国），78，259
U. S. curiosity about（美国对中国的

好奇），192
U. S. perceptions of（美国对中国的了解），194 - 98
U. S. trade deficit with（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xv，xvii，123，146，312 - 13
U. S. treaty with（美国与中国的条约），257 - 62
War of 1812 and（1812 年战争），143 - 44
in wars with European powers（与欧洲列强开战），264
in war with Japan（与日本开战），264
see also Opium War（又见“鸦片战争”）
China（中国），307
china（porcelain）（瓷器），29，60，96，169
China fever（中国热），92
China's Retreat（中国寓所），203 - 4
Chincha Islands（钦查群岛），xviii，298 - 300，299，301
Chinese Exclusion Act（1882）（排华法案（1882）），304 - 5
Chinese Museum（中国博物馆），205 - 7，208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3，229，255
Ch'ing Dynasty，*see* Qing Dynasty（Ch'ing Dynasty，见 Qing Dynasty）
Chinhai，*see* Zhenhai，China（Chinhai，见 Zhenhai，China）
Chinnery，George（G. 切纳利），179
chinoiserie（中国风），59
Ch'i-shan，*see* Qishan（Ch'i-shan，见 Qishan）
Ch'i-ying，*see* Qiying（Ch'i-ying，见 Qiying）
chophouses（关部），37 - 38，73
chopped dollars（戳记银元），39
Christian，Fletcher（F. 克里斯蒂安），131
Christie's auction house（佳士得拍卖行），204
Chuanbi，Battle of（穿鼻之战），230 - 31，349
Chuanbi（Chuenpee），China（中国穿鼻），230，240
Chuanbi Convention（《穿鼻草约》），240，242
Chusan，*see* Zhoushan（Chusan，见 Zhoushan）
Cincinnatus，Lucius Quinctius（L. Q. 辛西纳图斯），18
cinamon（肉桂），64，169
Civil War，U. S.（美国南北战争），283，286
Clark，Arthur Hamilton（A. H. 克拉克），278
Clark，William（W. 克拉克），190
Classic of Tea，The（Lu Yu）（陆羽《茶经》），47 - 48
Clayoquot Sound（格里夸湾），124，126
Cleopatra's Barge（“埃及艳后”号），153
clipper ships（飞剪船），xvii，266 - 83
coolies transported by（运输的苦力），301 - 2

design of（设计），268－69
end of U. S. domination in（美国主导地位的结束），279，282－83
in gold rush（淘金热），272－73，275－77
improvements to（改进），273－75
speed records of（速度记录），269，270－71，278
cloth（织布），114，130
coal（煤炭），285
Cochin China（交趾支那），297
coffee（咖啡），71，169，285
coffeehouses（咖啡馆），50－51，57
Coffin，Abel（A. 科菲），198－200
Coffin，Susan（S. 科菲），198
Cohong（公行），38，79，247
coinage（硬币），103
Coleridge，Samuel Taylor（柯勒律治），215
"Collective Justice"（"集义"），77
"Colonist's Advocate，The"（殖民地人民权益之倡导者），65
Columbia（哥伦比亚），110，190
Columbia Centinel（《哥伦比亚百年报》），103
Columbia Rediviva（"哥伦比亚瑞迪维瓦"号），109
Columbia River（哥伦比亚河），190，191，305
Columbus，Christopher（哥伦布），33－34
Comet（"彗星"号），281
Communist Party，Chinese（中国共产党），361
compradors（stewards）（买办），39，81，224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De Quincey*）（昆西《瘾君子自白》），215
Confucianism（儒家），195
Confucius（儒家），32－33
congo tea（功夫茶），53
Congress，U. S.（美国国会），227
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8，306
Connecticut River（康涅狄格河），9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28
fall of（陷落），33
Continental army（大陆军），18
Continental Congress（大陆会议），5，7，20
Continental Divide（北美大陆分水岭），190
Continental navy（大陆军海军），16
Cook，James（詹姆斯·库克），9－10，104，111，125
Cook Inlet（库克湾），110
Cook Islands（库克群岛），164
coolies，coolie trade（苦力，苦力贸易），xviii，284，290－303，295，296，312
mutinies of（暴动），293－97
suicides of（自杀），301
Cooper，James Fenimore（J. F. 库珀），89，106
copper（铜），64，213
cordage（绳索），14
Corey，Hill（H. 科里），129
Corps of Discovery（探险队），190

corruption（腐败），217，245，263
Corunna，Spain（西班牙科伦那），171
cotton goods（棉织品），xvii，116，123，124，160，168，285，286，299
  change in Chinese consumption of（中国消费习惯的改变），168－69
Cowpland，William S.（W.S. 考普兰），157
Cratey，Andrew（A. 克雷提），58
credit（贷款），167－68
"credit-ticket system"（赊票制），303－4
Creesy，Eleanor（埃莉诺），276
Creesy，Josiah Perkins（J.P. 克里西），276
crews（船员），97
cricket（板球），226
crimps（招工者），291－93，304
Crowninshield，George，Jr.（小G. 克洛文希尔德），153
Cuba（古巴），200，301，389
coolies in（苦力），291，298
coolies on ships of（船上的苦力），291
U.S. trade with（美国贸易），285
cumshaw and measurement（规礼和船钞），39－40
Currier，Nathaniel（N. 科利尔），272，280
Currier yards（科利尔造船厂），274
Cushing，Caleb（顾盛），258，310
  as head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China（为首前往中国的外交使团），257，258－62
  Opium War denounced by（抨击鸦片战争），256－57
Cushing，John Perkins（J.P. 库欣），171
customs fees（海关费用），97
Cutle，Carl C.（C.C. 卡特勒），267

Damariscotta，Maine（缅因州达马里斯科塔），273
Daniel Parker & Company（丹尼尔·帕克公司），12－13
Daoguang，Emperor of China（道光皇帝），157，213－14，220
  legalization of opium rejected by（拒绝鸦片合法化），249
  Lin blamed for Opium War by（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被问罪），240
  Palmerston's letter to（巴麦尊照会），235－37
  Pottinger's negotiations with（璞鼎查谈判），242
  Qishan's draft agreement denounced by（琦善的草约被宣布无效），242
Dartmouth（达特茅斯），65－66
Darwin，Charles（达尔文），161
Davis's Strait（戴维斯海峡），133
Dawe，Phillip（P. 大卫），70
decapitation（斩首），196
Decker，Cornelis（C. 德克尔），50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7，89，94，134
Delano，Amasa（A. 德拉诺），99－100，101，131，195，310
Delano，Warren（W. 德拉诺），II，215

Delaware Bay（特拉华湾），145
Denmark（丹麦），36，74，81，136
Dent，Lancelot（颠地），223
De Quincey，Thomas（T. D. 昆西），215
Derby，Elias Hasket（E. H. 德比），92，94－96，94
  wealth of（的财富），96
Derby，Joshua（J. 德比），166
Derby，Richard（R. 德比），94
diamonds（钻石），64
disease（疾病），128，130，297
Doney，T.（T. 多尼），258
Downs，Jacques M.（J. M. 唐斯），156，198，216
dragon's blood（血竭），64－65
drivers（驾驶者），279
Duer，William（W. 杜尔），8
Du Halde，Jean-Baptiste（杜赫德），62，63
Dunn，Nathan（N. 邓恩），204－5
Dunn，Samuel（S. 邓恩），22
Dutch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群岛），131
Dutch West Indies（荷属西印度群岛），61
duties（税），237，241，257
dyes（染料），285
dysentery（痢疾），245，294

Eagleston，John H（J. H. 伊戈斯顿），163
East China Sea（东海），246
East India House（东印度公司），67
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东印度海洋协会），204
East Indies（东印度群岛），11，21，89
East River（东河），4，270
Edward（“爱德华”号），4
Edwards，Jonathan（J. 爱德华兹），15
Egypt（埃及），28
Eight Regulations（《八条章程》），40－41，185
Eleanor（“埃莉诺”号），65－66
Eleanora（“埃莉诺拉”号），105，125，126
Eliza（“伊莉莎”号），129
Elliot，Charles（义律），223－25，237，254
  action by Palmerston on China desired by（要求巴麦尊对中国采取的行动），232
  British traders ordered out of Canton by（要求英国商人离开广州），228
  on Chinese treatment of Kowloon（中国人在九龙的处置），229
  Opium War blockades instituted by（发起的鸦片战争封锁），240
  Opium War draft agreement announced by（宣布的鸦片战争草约），241
  Palmerston's instructions to（巴麦尊的指示），236，238，250－51
  Palmerston's removal of（巴麦尊被免职），242
  promise to reimburse merchants made by（承诺补偿商人的损失），225，233，234
Elliot，George（懿律），237

Elliot, John M. (J. M. 埃利奥特), 199
embargoes (封港):
over Terranova incident (对特拉诺瓦事件), 158
U. S., on foreign trade (美国对外贸易封港), 136, 138–43
Emily ("艾米丽"号), 156–59, 196
Empress of China ("中国皇后"号), xvi, 71, 72, 89–90, 91, 95, 96, 97, 109, 122, 134, 192, 257, 266, 328
arrival in China (抵达中国), 72–74
cargo of first voyage of (首航的货物), 14–16, 80
christening of (命名), 12
earnings from (收益), 86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of (向中国人介绍), 19–20
in journey to China (航向中国), 22–23
in leave from port (离开港口), 20–22
planning of expedition of (计划远征), 11–13, 17, 18
in return to U. S. (回到美国), 84
sale of items from (货物的销售), 84–87, 85
trade with China initiated by (开启的对华贸易), 4
Endicott & Company (安迪考特公司), 307
Eng, *see* Bunker, Chang and Eng (Eng, 见 Bunker, Chang and Eng)
England (英格兰), 200
Far East trade of (远东贸易), 34, 36
silk production in (产丝) 28
tea drinking in (饮茶), 49–51
see also Great Britain (又见 Great Britain)
Enterprise ("进取"号), 93
Essex, USS (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 151
Europe (欧洲), 8
China's dim view of (中国人对欧洲的印象模糊), 31, 34–35
Chinese trade with (中国与欧洲的贸易), 24–26, 28–29, 34–35, 45, 54, 55
as dismissive of China (轻视中国), 62–63
opium addiction in (鸦片上瘾), 43, 215
trade barriers to U. S. of (对美国的贸易障碍), 8
execution riot (行刑骚乱), 218–20
exotic plants (外来植物), 169
Experiment ("实验"号), 95–96, 98–99
extraterritoriality (治外法权), 237, 241, 248, 262

Fabius ("费比乌斯"号), 23
factories (夷馆), 40, 41, 76, 78, 136, 146, 171, 176, 177, 182, 186, 194, 198, 218–20, 223–24
blockade of (封锁), 224–26, 224, 236, 239

in great fire（大火），185－87
opium in（鸦片），160
women banned from（禁止妇女进入），181
Fair American（“美丽的阿美利亚”号），125
Fairbank，John K.（费正清），122，171，216，361
Fairhaven，Conn.（康涅狄格州费尔黑文），149
Falkland Islands（马尔维纳斯群岛），104，105，148
Faneuil Hall（法尼尔大厅），257－58
Fanning，Edmund（E. 范宁），114，129
fans（扇子），170
Favorite（“幸运儿”号），142
Fawn（“小鹿”号），167
felt（毛毡），108
female infanticide（杀女婴），197
fever（发热），245－46
Fichter，James R.（J. R. 费彻），70
Fiji Islands（斐济群岛），113－14，126，127，129－30
bêche-de-mer harvested in（收获的海参），161，164－67
fireboats（火船），230－31
Fitzgerald，Charles Patrick（C. P. 菲兹杰拉德），35
Flora Temple（“花神殿”号），297，301
flour（面粉），8，285
Floyd，John（J. 弗洛伊德），191
Flying Arrow（“飞箭”号），281
Flying Cloud（“飞云”号），276，281
Flying Eagle（“飞鹰”号），281
Folger，Mayhew（M. 福戈尔），130－32
Foochow，China，see Fuzhou，China（Foochow，China，见 Fuzhou，China）。
foot binding（裹脚），178－81，180，197
foot races（竞走），226
Forbes，H. A. Crosby（H. A. C. 福布斯），102
Forbes，John Murray（J. M. 福布斯），309，310
Forbes，Margaret Perkins（M. P. 福布斯），309
Forbes，Ralph Bennet（R. B. 福布斯），171
Forbes，Robert Bennet（R. B. 福布斯），171－72，172，214－15，309，310
on abolition of opium trade（废除鸦片贸易），290
on blockade of Canton（封锁广州），226
in dispute with Elliot（与义律的争议），228
as middleman for British and Chinese trade（作为英中贸易的中间人），231
Forbes，Rose（罗丝），215
Forbes House Museum（福布斯之家博物馆），309，310
“foreign devils”（番鬼），36，62，182，205

Foreign Mission School（外国教会学校），198
"foreign mud"（洋土），121，211，216
Formosa，see Taiwan（Formosa，见 Taiwan）
Fort George（乔治堡），20－21
fortune-tellers（算命），184
forty-niners（1849 年淘金者），271－73，272，275－77
Four Seas（四海），217
Fox（"福克斯"号），93
foxes（狐狸），206
France（法国），74，76，81，82，136，176
in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独立战争），23
Cantonese trade of（广州贸易），36
coolies on ships of（船上的苦力），291
Opium War and（鸦片战争和），253
Siamese Twins' tour of（暹罗双胞胎之旅），200
silk production in（产丝），28
slave trade banned by（禁止奴隶贸易），290
U. S. embargo and（美国封港和），138，143
U. S. trade with（美国与法国的贸易），285
Frank，Caroline（C. 弗兰克），58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Frank Leslie 插图报》），306
Frankl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62，65
free-market philosophy（自由市场理论），91－92
free trade（自由贸易），188，251
French，Mr.（法兰奇），294
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103
French Wars（法国战争），122，137，242
Freneau，Philip（P. 弗瑞诺），21－22
Friendship（"友谊"号），166
Frothingham，James（J. 弗罗辛厄姆），94
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Dolin）（多林《毛皮、财富与帝国：美国毛皮贸易史诗》），xvi
furniture（家具），xvii，101，153，169
fur seal trade（软毛海豹交易），104－8，104，115，124，150－51，190
hunting methods in（猎杀方式），106－7
overhunting in（过度猎杀），xvii，115－16，130，148－49，151，160，154
profits from（的利润），107－8，123
fur trade（毛皮贸易），xvi-xvii，10，14，91，190，191，286
Astor in（阿斯特），92－93，124
Indians held hostage in（印第安人被扣作人质），126
see also sea otter trade（又见 sea otter trade）
Fuzhou，China（中国福州），248

Gallatin，Albert（A. 加勒廷），

139, 140
Gama, Vasco da（达伽马）, 34
gambling（赌博）, 197, 292 - 93
Gam Saan（Gold Mountain）（金山）, 303 - 4
Garraway, Thomas（T. 加拉韦）, 49 - 50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Du Halde）（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 62
General Washington（华盛顿将军）, 123 - 24
Genghis Khan（成吉思汗）, 30
Genoa（热那亚）, 30
George III, King of England（英王乔治三世）, 251
George IV, King of England（乔治四世）, 153 - 54
Germany, U. S. trade with（美国与德国的贸易）, 285
Ghent, Treaty of（《根特条约》）, 145
Gibson, James R.（J. R. 吉布森）, 126
ginger（姜）, 285
ginseng（人参）, xvii, 14, 15 - 16, 18, 103, 123, 160, 285
  price of（价格）, 79 - 80
Girard, Stephen（S. 吉拉德）, 92, 93 - 94, 96, 98, 122, 144, 310 - 11
  and capture of *Montesquieu*（和截获“孟德斯鸠”号）, 144, 145
  China trade abandoned by（放弃对华贸易）, 147
  wealth of（的财富）, 96
Girard College（吉拉德学院）, 311
Gladstone, Helen（海伦·格莱斯顿）, 238
Gladstone, William Ewart（W. E. 格莱斯顿）, 238 - 39, 250
glass（玻璃）, 65, 285
glass bottles（玻璃瓶）, 114
glassware（玻璃器）, 169
Glide（“格莱德”号）, 164 - 67
gold（黄金）, 29, 64
“Golden Ghetto”（金街）, 171, 186, 187
golden lotuses（golden lilies）（金莲）, 178, 180, 201
Golden Lyon（金里昂）, 51
Golden Rocket（“金腾”号）, 281
Gold Mountain（Gam Saan）（金山）, 303 - 4
gold rush（淘金热）, 271 - 73, 272, 275 - 76, 282, 303 - 4
Gothenburg, Sweden（瑞典哥德堡）, 18
government officials（政府官员）:
  corruption in（腐败）, 263
  as opium addicts（鸦片上瘾）, 213
Gowqua（鳌官）, 223
Grace（“格蕾丝”号）, 90
Grand Canal（大运河）, 247
Grand Chop（关文）, 40
Grand Turk（“大突厥”号）, 95 - 96
Gravier, Charles, comte de Vergennes（夏尔·格拉维耶［韦尔热纳伯爵］）, 86
Gray, Robert（R. 格雷）, 109, 190
Grayson, William（W. 格雷森）,

84 – 85
Greatbach, G. （G. 格雷特巴奇）, 241
Great Britain（英国）, 74, 81, 109
in Canton War（在广州之战）, 81 – 84
Chinese underestimation of military prowess of（中国低估英国军事实力）, 242 – 45
in competition with U. S. for China trade（与美国在对华贸易的竞争）, 189, 277, 279
coolies on ships of（船上的苦力）, 291
coolies transported by（运输的苦力）, 301 – 2
demands to China over opium problems（对中国在鸦片问题上的要求）, 236 – 37
in diplomatic war with U. S.（与美国外交战）, 189 – 90
granted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by China（获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 248
Hong Kong ceded to（刚让香港）, 240, 242, 248, 262
illnesses of soldiers of（士兵生病）, 245 – 46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inancial depression in（18 世纪晚期金融萧条）, 68
Lin's demand of sailors from（林则徐要求交出英国水手）, 229 – 30
losses in great fire of 1822（1822 年大火的损失）, 186 – 87
mercantilist policies of（重商主义政策）, 5
opium trade sanctioned by（制裁的鸦片贸易）, 216
in removal to Macao（撤至澳门）, 227 – 28
in sandalwood trade（在檀香木交易中）, 114
in sea otter trade（在海獭皮交易中）, 109, 110
Siamese Twins' tour of（暹罗双胞胎英国之行）, 200
slave trade banned by（禁止的奴隶贸易）, 290
in tea trade（在茶叶贸易中）, 135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与中国的贸易赤字）, 116 – 17, 120
turning over of opium to China by（将鸦片交给中国）, 225
U. S. embargo and（美国的封港和）, 138, 143
U. S. trade with（美国与英国的贸易）, 285
as wary of U. S. trade with China（对美中贸易警觉）, 132 – 34
see also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Opium War（又见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Opium War）
great fire of 1822, Canton（1822 年广州大火）, 185 – 87, 185
Great Fire of London（伦敦大火）, 186
Great River of the West（西部大河）, 190
Greece（希腊）, 25 – 26

Green, John, （J. 格林）4, 16 – 17, 19, 20, 22 – 23, 72 – 73, 74, 80
Greenberg, Michael （M. 格林伯格）, 118
Greenbie, Marjorie（M. 格林比）, 136
Greenbie, Sydney（S. 格林比）, 136
green tea（绿茶）, 52 – 53
Grenville, George Nugent Temple（G. N. T. 格伦维尔）, 188
Griffiths, John Willis（J. W. 格里菲斯）, 266 – 67, 270
Guangzhou, see Canton（Guangzhou, 见 Canton）
guano（鸟粪）, xviii, 298 – 300, 299, 300
Guan Tianpei（关天培）, 230
guns（枪）, 129, 130, 153, 161, 285

Haaheo o Hawaii, see Pride of Hawaii（Haaheo o Hawaii, 见 Pride of Hawaii）
Haddad, John Rogers（J. R. 哈达德）, 194
hair seals（粗毛海豹）, 105
hai-shên, see bêche-de-mer（hai-shên, 见 bêche-de-mer）
Hallet, Mr.（哈里特）, 19
Hamilton, Alexander（A. 汉密尔顿）, 64, 91
Hancock, Dorothy（多萝西．汉考克）, 96
Hancock, John（J. 汉考克）, 96
handkerchiefs（手帕）, 96
Hangzhou（Hangchow）（杭州）, 30
Hardin, Garrett（G. 哈丁）, 115 – 16
Harriet（“哈里特”号）, 18 – 19, 95
Hart, Robert（赫德）, 286
Hartford, Conn.（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 193
Hawaii（夏威夷）, 112
  bêche-de-mer harvested in（收获的海参）, 161
  sandalwood in（的檀香木）, 112 – 15, 151 – 54
  violence in（的冲突）, 124 – 25, 127
Hermit Bill（隐士比尔）, 107
Hero（“英雄”号）, 149 – 50
Hersilia（“艾西莉亚”号）, 148
Hindus（印度）, 291
Holker, John（J. 霍克尔）, 8, 12
Homer（荷马）, 42
Hone, Philip（P · 霍恩）, 265 – 66
Hong（Hog）Lane（公行）, 77 – 78
Hong Kong, China（中国香港）, 228, 231, 269, 270, 271, 278, 294, 307
  ceded to British（割让给英国）, 240, 242, 248, 262
  credit-ticket system in（的赊票制）, 303 – 4
hong merchants（行商）, 38 – 39, 52, 78, 79, 123, 171
  abolition of monpoly of（垄断的废除）, 247
  bills used by（使用的汇票）, 168
  British desire for abolition of（英国希望废除）, 237, 241
  house of（的宅邸）, 183

Lin's blaming of opium trade on（林则徐斥责鸦片交易），221－22
opium importation feared by（担心的鸦片输入），118，155
Terranova incident and（特拉诺瓦事件和），158
trust as important to（信任的重要性），173
Honuaula（霍奴奥拉），125
Hope（“希望”号），95，114
hoppo（custums official）（海部），39－40，80
Houckgeest，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A. E. v. B. 胡克吉斯特），202－4
Houqua（Houqua 号），269
House of Commons，U. K.（英国下院），238
no -confidence vote on Whig government in（对辉格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238－39
Howland，Samuel S.（S. S. 霍兰德），266
Howland & Aspinwall（霍兰德和阿斯平沃尔公司），266，270
Howqua（浩官），173－76，174，175，195，206，219，225
death of（之死），263
and execution riot（和行刑骚乱），219
foreigners requested to give up opium by（要求外国人放弃鸦片），222－23
generosity of（的慷慨），173－75
wealth of（的财富），175－76
Hsü，Immanuel Chung-Yueh（徐中约），264
Huangpu，China，*see* Whampoa，China（Huangpu，China，见 Whampoa，China）
Hudson's Bay（哈德逊湾），133
Hunt，Freeman（F. 亨特），256，284－85
Hunter（“猎人”号），115
Hunter，Robert（R. 亨特），199
Hunter，William C.（W. C. 亨德），176，209，210－11，214
and execution riot（和行刑骚乱），219
on in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attempts to ban opium trade（中国禁烟手段无效），216－17
hunting（围猎），226
Hussey，Benjamin（B·赫西），104－5
Hyacinth，HMS（“海阿新”号），230
Hyperion tea（锡伯龙茶），66
hyson tea（熙春茶），53，84，175

ice（冰），285
Idaho（爱达荷州），190
idol worship（拜神），197
iliahi，*see* sandalwood（iliahi，见 sandalwood）
impressment（强行征兵），137－38
India（印度），11，25，112，135，176，188，231
opium in（的鸦片），43，45，118，155，209，211，212，288
silk production in（产丝），28
Indian Ocean（印度洋），13，22，32，

34，60
Indians（Native Americans）（印第安人），15－16，110，124，126－27
in fur trade（皮毛贸易），126－27
indigo（靛蓝），64
inflation（通货膨胀），245
Ingersoll，Jonathan（J. 英格索尔），95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The（Thelwall）（A. 提沃尔《鸦片贸易在中国之罪恶》），233
Ireland（爱尔兰），200
iron（铁），64，160，285
iron nails（铁钉），125
Irving，Washington（华盛顿欧文），56－57
Isle of France（Mauritius）（法属毛里求斯），95，291
Italy（意大利），28
ivory（象牙），76
Izmir，Turkey（土耳其伊兹密尔），122
Jackass Point（牡驴尖），40
Jackman，W. G.（W. G. 杰克曼），274
jade carvings（玉雕），29
Jakarta（雅加达），100
Jamaica Plain（贾美卡平原），171
Jamaica spirits（牙买加烈酒），123
Japan（日本），11，37
Chinese war with（中日战争），264
in sea otter trade（在海獭皮贸易中），110
silk production in（产丝），28
tea brought to（茶叶带进），49
Jardine，Matheson & Company（渣甸洋行），234
Jardine，William（渣甸），234
Java（爪哇），22，32
Dutch landing in（荷兰人抵达），34
Jay，John（J. 杰伊），13，84，89，134
Jefferson（“杰斐逊”号），126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62，86，138－43
Jewitt，John（J. 杰维特），127
Jiaqing，Emperor of China（嘉庆皇帝），120－21
Jiulong，China，see Kowloon，China（Jiulong，China，见 Kowloon，China）
Johnson，Samuel（T. 约翰逊），51
Johnston，Robert（R. 约翰斯顿），16，17
Jones，John Paul（J. P. 琼斯），109
Jordan Falls，Canada（加拿大约丹福斯），273，274
Joy，Reuben（R. 乔），101
J. P. Sturgis（斯特吉斯洋行），173
junks（舢板），128
Justinian the Great（查士丁尼大帝），28

Kamakau，Samuel M.（S. M. 卡玛考），152
Kameeiamoku，Chief（酋长卡米亚末库），125－26
Kamehameha I，King of Hawaii（夏威夷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151－53，152
Kamehameha II，King of Hawaii（夏威夷国王卡米哈米哈二世），153－54
Kangxi，Emperor of China（K'ang-hsi）

（康熙皇帝），37
kaolin（高岭土），29
Kauai（考伊岛），153
Kealakekua Bay（凯阿拉凯库亚湾），125－26
Kelley，Hall Jackson（H. J. 凯利），191
Kholees（Kholees），291
King，Charles William（C. W. 金），254－55
kintledge（压舱货），54
Knight，Enoch（E. 奈特），166
Knox，Henry（H. 诺克斯），17，18，20，134
Kodiak islands（科迪亚克群岛），110
Korea（朝鲜）：
  silk brought to（丝绸带到朝鲜），28
  tea brought to（茶叶带到朝鲜），49
Kowloon，China（中国九龙），228，229
kowtowing（扣头），31－32，202，251
Krusenstern，Adam Johann von（A. J. 冯·克鲁辛斯特恩），137
Kublai Khan（忽必烈），30
Kwan Ato（关韬）184

Labrador tea（拉布拉多茶），66
Lady Hughes（“休斯夫人”号），80－84，159，196，228，251
Lady Washington（“华盛顿女士”号），109
Lafayette，Marquis de（拉斐特），23，203
Lafitau，Joseph-François（J. F. 拉菲托），15
Lakeba（拉克巴岛），113
Lamqua（兰夸），172，174，177
Land，John（J. 兰德），269，270
La Prudente（“普鲁登特”号），16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xviii，290－91，293，303，305
Latourctte，Kenneth Scott（赖德烈），252
laudanum（鸦片酊），215，238
Lavender，David（D. 拉凡德），109
lead（铅），14，65，116，160
leather（皮革），108，285
Leda（“勒达”），171
Ledyard，Isaac（伊萨克·雷雅德），109
Ledyard，John（J. 雷雅德），8－9，9，13，109
Lee，Richard Henry（R. H. 李），134
“Legend of Sleepy Hollow，The”（Irving）（欧文《沉睡谷传奇》），56－57
Lei Zu（Lei Tsu）（嫘祖），27
Leopard，HMS（英国皇家海军“利奥波德”号），138
Leopold，King of Belgium（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241
Lewis，Meriwether（M. 刘易斯），190
Liberator（《解放者》），303
Li Chen（陈利），83
Lightning（“闪电”号），281
Liholiho，King of Hawaii（夏威夷国王利霍利霍），153－54
Lincoln，Abraham（林肯），303
Linnaeus，Carl（卡尔·林奈），15
linseed oil（亚麻籽油），285

Lintin（“伶仃”号），173
Lintin, China（中国伶仃岛），160，171，173，181，233
Lin Zexu（Lin Tse-hsü）（林则徐），209－11，210
appointed high commissioner（被任命为钦差大臣），209－10
blamed for Opium War（因鸦片战争被问罪），240
British military prowess
underestimated by（低估英国军事实力），242－43
British sailors demanded for trial by（要求英国士兵受审），229－30
British trade from Macao forbidden by（禁止英国在澳门交易），228
as Chinese hero（被视为英雄），311
Kowloon desired blockaded by（切断九龙补给），229
letter to Victoria on opium from（致函维多利亚），220－21
merchants and foreigners blamed for opium trade by（谴责商人和外国人参与鸦片贸易），221－22
opium destroyed by（销烟），226－27
surrender of foreigners' opium demanded by（要求夷人将鸦片缴官），222－23，225
Lion（“狮子”号），16
London（伦敦），49－51
bill on（汇票），167－68，169，259，286
Great Fire of（大火），186
as world's largest tea market（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277
London Daily News（伦敦《每日新闻》），282
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新闻画报》），249－50
Lovell, Julia（蓝诗玲），245，361
Low, Abigail（阿比盖尔），178
Low, Harriet（哈里特·罗伊），178，179，180－82
Low, William Henry（W. H. 罗伊），178，181，215，310
Lucy Ann（“路西安”号），167
lumber（木材），285
Lu Tong（Lu Tung）（卢仝），48
Lu Yu（陆羽），47－48
Lynn, Mass.（马萨诸塞州林恩），99
Macao（澳门），134，144，160，173，182，217，223，260，261
British evacuation from（英国人从澳门撤离），228－29，255
British traders'withdrawal to（英国商人撤至澳门），227－28
Empress of China's arrivl in（“中国皇后”号抵达澳门），73－74，75
foreigners required to repair to（要求外国人去澳门），170
population of（的人口），73
Portuguese estabishment of base in（葡萄牙人建立基地），35－36
Praya Grande of（南湾），72，73，180
women allowed in（允许女性），177－78
Macao Roads（澳门水路），37，128

Macartney mission（马嘎尔尼），251
Macaulay，Lord（麦考利勋爵），239
Madeira（马德拉），124
Madison，James（J. 麦迪逊），85，139
Magdalen（“马达兰”号），93
Magee，James（J. 麦基），90
Magellan，Ferdinand（麦哲伦），34
malaria（疟疾），245
Malaysia（马来西亚），34，112
Malloy，Mary（M. 马洛伊），110
mandarins（汉语），211，212，218－19，229
manifest destiny（注定），279，306－7
Manila（马尼拉），164，294
Margaret（“玛格丽特”号），90
maritime commerce（航海贸易），133
Marquesas Islands（马克萨斯群岛），151，161
Más Afuera（马斯阿富艾拉岛），107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306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号），99－101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马萨诸塞历史学会），252－53
Maui（毛伊岛），125
Mauritius（毛里求斯），95，291
Maury，Matthew Fontaine（M. F. 莫里），276－77
Mbau（姆巴乌岛），129
Mckay Donald（D. 麦凯伊），273－75，274
Mckim，Isaac（I. 麦金姆），267
McPherson，Duncan（D. 麦佛逊），44，45
Meade，John（J. 米德），138
measles（麻疹），128
Mediterranean area（地中海地区），25
Meissen，Germany（德国梅森），54
Melbourne，Lord（梅尔波恩爵士），235
Memnon（“门农”号），272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256，284－85
mercury（水银），160
Metcalfe，Simon（S·麦特卡夫），105，125
Metcalfa，Thomas（托马斯），125－26
Mexico（墨西哥）279
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密歇根中央铁路），310
Middle East（中东），49，176
Middle Passage（中央航道），293，297，302
military，Chinese（中国军队）：
corruption in（的腐败），263
opium addiction in（鸦片吸食成瘾），213
milk（牛奶），53，57
Mill Prison（米尔监狱），16
Miltion，Mass.（马萨诸塞州米尔顿），310
Ming Dynasty（明朝），32
mirrors（镜子），114
missionaries（使团），183－84，184，197，207，233，255－57
Mississippi River（密西西比河），191
Missouri River（密苏里河），191

Mitchell, Samuel Latham (S. L. 米切尔), 138–39
molasses (糖浆), 8
Moluccas (摩鹿加), 34
Mongols (蒙古人), 30, 33
Montana (蒙大拿), 190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号), 94, 144–45, 144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德斯鸠), 63
Moon, Krystyn R. (K. R. 穆恩), 201–2
Morgan, John (J. 摩根), 72, 84
morphine (吗啡), 41–42
Morris, Mary (玛丽·莫里斯), 97
Morris, Robert (R. 莫里斯), 6–8, 6, 11–13, 18, 61, 109
  in debtor's prison (债务人监狱), 97
Morse, Hosea (Hosea Morse), 347
Mott, Lucretia (L. 莫特), 130
Moulton, William (W. 莫尔顿), 107
Mount Vernon (弗农山), 59
Mowqua (茂官), 222–23
Moy, Afong (梅阿芳), 193, 200–202
mules (骡子), 8
Mumbai (孟买), 211, 233
muskets (步枪), 161, 244
muslin cloth (棉布衣服), 96
Mystic, Conn. (密斯提克), 273
nails (钉子), 114
Nancy ("南希" 号), 90
nankeens (南京棉), 168
Nanking, Treaty of ("南京条约"), 247–48, 249, 249, 263, 264, 287
Nanking (Nanjing), China (中国南京), 247
Nantucket, Mass. (楠塔基特), 90, 142, 149
Napier, Lord (律劳卑), 251–52
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法国拿破仑皇帝), 103
Natchez ("纳奇兹" 号), 270–71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 U. S.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172n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 60
Navy, U. S. (美国海军), 8
Nei Lingding, see Lintin, China (Nei Lingding, 见 Lintin, China)
Nemesis ("复仇女神" 号), 241, 245
Neptune ("海王星" 号), 134
Nestorian monks (景教教士), 28, 54
Netherlands (荷兰), 34, 36, 36, 74, 78, 81, 100–101, 176
  coolies on ships of (船上的苦力), 291
  opium traded by (贩卖的鸦片), 45
  Siamese Twin's tour of (暹罗双胞胎荷兰之旅), 200
  slave trade banned by (禁止奴隶贸易), 290
  tea drinking in (饮茶), 49
New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 The (Bowditch) (《新美国实用航海学》), 172
New Bedford, Mass. (新贝德福德),

90，149
Newburyport，Mass.（纽伯里波特），273，274
New Directory for the East-Indies，A（Dunn）（A. 邓恩《东印度群岛新录》），22
New England（新英格兰），124，310
New-Hampshire Patriot（《新罕布什尔爱国者报》），263
New Haven，Conn.（纽黑文），149
New Netherlands（新尼德兰），57
New Orleans，La.（新奥尔良），306
Newport，R. I.（新港），171，310
New Spain（新西班牙），110
New York（纽约），57
New York，N. Y.（纽约），xv，xvii，3，4，11，12，15，16，22，56，59，72，84，86，87，90－92，98，105，108，114，138－41，147－48，147，149，155，170，195，201－2，205，265－66，270－76，276，278－79，281，294，305－6
British evacuation of（英国人撤离），20－21
clippers built in（修造的飞剪船），273，277
French craze in（法国热），170
South Street in（南街），147
tea－water pumps in（泡茶用水），57－58
New－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纽约商业广告人》），140－41
New York Gazette（《纽约公报》），201
New－York Gazette & Advertiser（《纽约公报和广告人》），140－41
New York Herald（纽约《先驱报》），280
New York Packet and the American Advertiser（《纽约信息和美国广告人》），21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300，302
Nieuhof，Johannes（J. 尼尔霍夫），36
Niles'National Register（《尼尔国家纪事报》），256
Ningbo（Ningpo），China（中国宁波），242，248
Norden，Nathaniel（N. 诺尔登），59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论》），256
Northwest Passage（西北航道），9
Norway（挪威），284，294－97，295，296
Nye，Gideon（奈伊），219

Odyssey（Homer）（荷马《奥德赛》），42
officers（高级船员），97
Ohio（“俄亥俄”号），301
oil（油脂），115
Oliver，James（J. 奥利弗），164－65，167
Olowalu（奥罗瓦鲁），125
Olyphant & Company（同孚洋行），155，254
Onico（“欧尼克”号），107
Ophthalmic Hospital（眼科医局），184，184
opium（*Papaver somniferum*），xviii（鸦片/罂粟），41－46，118－19，147，

174，209－64，212
addiction to（上瘾），43，44－45，120－21，213
amount imported by China（流入中国的数量），120，121，154－55，211，212－13，289，347
bills traded for（交易的汇票），167－68
cavalier attiude of traders in（商人对鸦片漫不经心的态度），214－16
China's banning of（中国禁烟），45，118，122，211，213，216－20，235
China's plans for dealing with（中国处理鸦片的计划），214
contemplated legalization of（提议鸦片合法化），214，217，248－49
as diverting Chinese capital from Western purchases（转移了购买西方产品的资金），290
Dunn's opposition to trade in（邓恩反对鸦片贸易），205，208
Elliot's surrender of, to Chinese government（义律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225
Gladstone's opposition to trade in（格莱斯顿反对鸦片贸易），238，250
history of（鸦片的历史），41－43
Lin's demand that foreigners surrender（林则徐要求外国人交出鸦片），222－23，225
Lin's destruction of（林则徐销烟），226－27
medicinal use of（鸦片的药用），215
missionaries' complaints about（传教士抱怨），197，233，255－57
price of（鸦片的价格），212－13，288
profits from（鸦片的利润），123，212，216
silver traded for（交易鸦片用的白银），213，221
smoking of（吸食鸦片），43－44
smuggling of（鸦片走私），121，122，159，160，215，217，220，232，240，249，287
tax on（鸦片税），289
U. S. banned by China from trading in（中国禁止美国贩卖鸦片），262
U. S. in exit from trade in（美国退出鸦片贸易），289
Opium War（鸦片战争），284，311－12，361
American involvement in（美国参与），253
American opposition to（美国反对），253－57
battles preceding（之前的战斗），229，230－32
British blockades in（英军封锁），240
British military supremacy in（英国的军事优势），244－45
British naval forces sent out to（派往参战的英国海军），237
casualties of（伤亡），240，242，245－47
causes of（起因），250－53
China weakened by（削弱中国），263－64

Chinese underestimation of British power in（中国低估英国实力），242－44
Gladstone's denunciation of（格莱斯顿谴责），238－39
Parliament's demand of documents on（议会要求有关文件），237－38
terms for ending（结束战争的条件），240－42
treaty ending（结束战争的条约），247－48，249，249
Opium War，Second（第二次鸦片战争），288－90，311－12，361
Ordelin，Captain d'（奥尔德林船长），23
Order of 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辛西那提协会），17－18，23
Orders in Council（“内阁政令”号），171
Oregon（俄勒冈），190
Oregon Territory（俄勒冈地区），189－91
Oregon Treaty（《俄勒冈协定》），189－90，191
Oriental（“东方”号），277，278－79，281
Ottomans（奥斯曼），33
Ouchterlony，John（J. 奥特隆尼），243，244
Ovalau Island（欧瓦罗岛），165，166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太平洋邮船公司），307
Pacific News（《太平洋新闻》），273
Pacific Northwest，xvii（西北部太平洋沿岸），12，93，109，125，189－90，191，204
paint（涂料），65
paintings（画作），101，102－3，170
Pallas（“帕拉斯”号），345
Palmer，Nathaniel B.（N. B. 帕尔默），149，277，280
Palmer，Theodore（西奥多），277－78
Palmerston，Lord（巴麦尊子爵），232，234，241
Chinese legalization of opium pushed by（敦促中国鸦片合法化），248
Elliot instructed by（指示义律），236，238，250－51
Elliot removed as lead China negotiator by（将义律从对中国的主要交涉者撤职），242
letter to Chinese emperor from（给中国皇帝的照会），235－37
opium merchants desired reimbursed by（鸦片商人要求赔偿），234－35
Pottinger instructed by（指示璞鼎查），248，251
Panama（巴拿马），283
Panax ginseng，see ginseng（Panax ginseng，见 ginseng）
Panax quinquefolius，see ginseng（Panax quinquefolius，见 ginseng）
Panic of 1837（1837 年经济大恐慌），214
Papaver somniferum，see opium（Papaver somniferum，见 opium）
paper（纸张），65
Paris，Treaty of（《巴黎条约》），3，4，5，13

Parker, Daniel（丹尼尔·帕克）, 12–13, 15–16, 17, 18, 213
Parker, Peter（伯驾）, 183–84, 184, 197, 262, 302
Parliament, British（英国议会）: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s monopoly removed by（废除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权）, 187–89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ppointed by（任命驻华商务总监）, 223
no-confidence vote on Whig government in（对辉格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238–39
Opium War documents requested by（要求鸦片战争文件）, 237–38
Tea Act passed by（通过《茶叶法案》）, 68
Pauli, Simon（S. 包利）, 50
Paz（"帕兹"号）, 145
Peabody, Joseph（J. 皮博迪）, 164, 215
Peabody Essex Museum（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204
"Peace and Quiet,"（"和平"）, 77
peacocks（孔雀）, 206
Peale, Charles Willson（C. W. 皮尔）, 6
Pearl River（珠江）, 23, 37–38, 40, 75, 76, 77, 105, 160, 230, 242, 252, 289
boat racing on（船赛）, 185
pirates at mouth of（珠江口海盗）, 128
pearls（珍珠）, 29, 64
Peck, George Washington（G. W. 派克）, 300–301
Peck, John（J. 派克）, 12
Pei-ho River, see Beihe River（Pei-ho River, 见 Beihe River）
Peking（北京）, 35, 202–3, 247
plans for banning opium discussed in（商议禁烟的计划）, 214
Western Gate of（西大门）, 208
pekoe tea（白毫茶）, 53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州）, 16
peppers（胡椒）, 64
"Perfect Concord,"（"全合"）77
perfumes（香水）, 170
Perkins, James, （詹姆斯·H. 帕金斯）171
Perkins, Thomas Handasyd（托马斯·H. 帕金斯）, 171, 172–73, 310
Perkins & Co.（帕金斯洋行）, 172–73, 215
Persian Gulf（波斯湾）, 25
Persians（波斯人）, 25, 28
Peru, xviii（秘鲁）, 291, 293, 301, 398
petroleum（煤油）, 285
pheasants（白鹇）, 206
Philadelphia, Pa.（宾州费城）, xvii, 7, 90, 147, 148, 306
Philadelphia Museum（费城博物馆）, 205–7, 208
Philippines（菲律宾）, 34, 176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Voltaire）（伏尔泰《哲学辞典》）, 62
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 38

pirates（海盗），23，35，60 - 61，128，155
bills not targeted by（汇票不会被海盗看中），168
Portuguese battles with（葡萄牙人与海盗交战），36
Pitcairn Island（皮特凯恩岛），130，131 - 32
Pitcher，Moll（皮彻），99
plants（植物），169
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25，26
Poictiers，HMS（英国皇家海军“普提尔”号），145
Polk，James K.（J. K. 波尔克），271
Polo，Maffeo（马菲奥），29
Polo，Marco（马可波罗），24，29 - 30，62
Polo，Niccolò（尼可洛），29
Pomone（“波蒙那”号），171
Pompey（“庞培”号），95
Pondicherry，India（印度本地治理），124
poppy cultivation（种植罂粟），248
porcelain（瓷器），xvii，6，58，58，64，101，116，169，170，285
pork（猪肉），285
Porter，David（D. 波特），151
Port Jackson（杰克逊港），129
Portland Gazette and Maine Advertiser（《波特兰公报和缅因州广告人》），141 - 42
Portlock，Nathaniel（N. 波特洛克），104 - 5
Portsmouth，N. H.（朴茨茅斯），273
Portugal（葡萄牙），28，34，73，82，176
coolies on ships of（船上的苦力），291，303
opium traded by（贩卖的鸦片），45
slave trade banned by（禁止奴隶贸易），290
tea brought to（输入葡萄牙的茶叶），49
pottery（陶瓷），130
see also porcelain（又见瓷器）
Pottinger，Henry（璞鼎查），255
Chinese，legalization of opium pushed by（敦促中国鸦片合法化），248 - 49
made plenipotentiary（成为全权代表），242
Palmerston's instructions to（巴麦尊对璞鼎查的指示），248，251
Praya Grande，Macao（澳门南湾），73，73，180
President Adams（亚当斯总统），90
press（媒体）：
opium dispute covered by（报道鸦片争议），233 - 34
Treaty of Nanking praised in（赞赏《南京条约》），249 - 50
pride of Hawaii（“夏威夷之傲”号），153
privateers（私掠船），60 - 61，143
Promontory Summit（普瑞蒙特瑞峰），305，306
Prospect of a Reun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The，（《英美重聚展

望》），86
prostitution（卖淫），75，197，304，305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91
Providence，R. I.，xvii（罗德岛普罗维登斯），147，169
Providential Gazette and Country Journal（《普罗维登斯公报和国家杂志》），134－35
Prussia（普鲁士），36，136
Qianlong，Emperor of China（乾隆皇帝），117，120，202
Qing Dynasty（清朝），207，245，287
weakening of（削弱），263，264
Qishan（琦善），240，241
Qiying（耆英），261－62
Rainbow（“彩虹”号），265－71
design of（设计），266－68
Ramusio，Giambattista（赖麦锡），49
Randall，Thomas（T. 兰道尔），74，75，78，79－80，81，84，94
Massachusetts and（“马萨诸塞”号和），99，100－101
in Society of Cincinnati（在辛西纳提协会），17
rattan（藤），169
Red Jacket（“红杰克”号），280
Red Sea（红海），25，32，60
reproductions（复制品），102－3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264
Resolution，HMS（“决心号”），9
Rhode Island（罗德岛），306
rhubarb（大黄），29，159，222，285
rice（稻米），285，286，307
Richardson，Josiah（J. 理查德森），275
river otter skins（河獭皮），127
Rome（罗马），2－65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F. D. 罗斯福），99，215
Rotch，Francis（F. 罗奇），104，124
Rotch，William（W. 罗奇），104
Rousseau（卢梭），94
Royal Navy（皇家海军），12，143
impressment by（强行征兵），137－38
U. S. fleet destroyed by（摧毁的美国船队），97
Royal Saxon（“皇家撒克逊”号），230
rubies（红宝石），29
rum（朗姆酒），14，95，124，153，160
rush（灯芯草），169
Russell & Co.（旗昌洋行），173，178，181－82，209，214－15，310
as agent for *Oriental*（作为“东方”号的代理商），278
opium traded by（贩卖的鸦片），237
in withdrawal from opium trade（退出鸦片贸易），227
Russia（俄国），37，149
in Boxer Rebellion（在义和团运动中），264
cirumnavigation of globe by（环球航行），137
in sea otter trade（在海獭皮贸易中），109，110
Rustichello of Pisa（比萨的鲁斯蒂谦），30

Sachem（“酋长”号），198
sailcloth（帆布），123
St. Paul, Alaska（阿拉斯加圣保罗），111
Salem, Mass.，xvii（马萨诸塞州塞勒姆），95，102，122，147，149，153，165，167，182，204
witch trials in（女巫审判），96
Salem Gazette（《塞勒姆公报》），12－13
Samoa（萨摩亚），114
samshoo（三白），78
Samuel Russell（“塞穆尔·拉塞尔”号），280
sandalwood，xvii（檀香木），104，112－15，113，151－52，165
battles over control of（争夺檀香木控制权的冲突），126，130
on Hawaii（在夏威夷），112－15，151－54
overharvesting of（过度砍伐），115－16，151，154，160，163
profits from（利润），115，123
Sandalwood Mountains（檀香山），152
San Francisco, Calif.（加州旧金山），271，275，277，307
credit－ticket system in（的赊票制），304
saucers（碟），53－54
Savage, Charles（C. 萨维奇），129－30
scalding（烫伤），196
Scotland（苏格兰），200
sea cucumbers, see bêche－de－mer（sea cucumbers，见 bêche－de－mer）
sea lions（海狮），105
Sea Lions, The; or, The Lost Sealers（《海狮，还是迷失的捕猎者》），106
seals, *see* fur seal trade; hair seals（seals，见 fur seal trade; hair seals）
sea otter trade（海獭皮交易），xvii，10－11，10，104－5，108－10，127，190
hunting method in（的猎杀方式），110－11
overhunting in（过度猎杀），xvii，115－16，154，160
profits from（的利润），111－12，123
Sears, Isaac（I. 希尔斯），18－19
Sea Witch（“海巫”号），265，269，270－71，272－73，279，302
Second Opium War（第二次鸦片战争），288－90，311－12，361
secret societies（秘密会社），263
Seneca（塞内卡），25
sericulture（蚕丝业），27－28
Severn（“塞文”号），93
sex trade（性贸易），304
Shanghai, China（中国上海），242，247，248，271
shanghaiing（绑架），293
shark fins（鱼翅），123
Shaw, Samuel（山茂召），17，17，73，74，75，78，79－80，196
“Canton War” and（“广州之战”和），81，83
on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British（与英国关系恶化），134
on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号），99－101

on opium trade（鸦片贸易），122
report to John Jay by（向 J. 杰伊报告），84
Sheffield，James P.（J.P. 谢菲尔德），148
Shennong（Shen Nung），Emperor of China（神农），46
shipbuilding（造船），xvii，97，99 *see also* clipper ships（又见：飞剪船）
ships，size of British vs. U.S.（英美船只大小对比），98－99 *see also* specific ships（又见具体船只）
shoes（鞋子），169，285
shops（商店），98
shroff（看银师），39
Shuck，Henrietta（叔何显理），255
Siamese Twins（暹罗双胞胎），198－200，199，201
Siberia（西伯利亚），49
Siècle，*Le*（*The Age*）（《世纪报》），250
silk（丝绸），xvii，6，24－25，54，64，76，92－93，116，153，169，170，231，232，260，286，306，307，312
destroyed in Canton fire（在广州大火中烧毁），186
production of（的生产），26－28，26
Silk Road（丝绸之路），24，25，28－29，33
silk slippers（丝绸鞋），180
silkworm（Bombyx mori）（家蚕），26，27
silver（银），xvii，39，64，101，103，116－17，120，122，128，155，167，260
bills traded for（兑换的汇票），167－68
as pieces of eight（八片银），14－15，14
traded for opium（鸦片交易用），213，221，232
silver dollars（银元），249
silversmiths（银匠），54
sing-songs（“自鸣钟”），40，80
Slater，Oliver（O. 斯莱特），113
slaves，slave trade（奴隶贸易），54，73，255，290－91，297
Smith，Adam（亚当斯密），24，91－92
Smith，Alexander（亚历山大·史密斯），131－32
Smith，George（史密斯），81，82
Smith，H.（船长史密斯），230
Smith & Dimon（司密斯－迪门造船厂），265，267，268，270
smouch（掺杂物），53
smuggling（走私），61，65
of opium into China（鸦片到中国），121，122，159，160，215，217，220，232，240，249，287
of tea into American colonies（茶叶到北美殖民地），66－67，68
Smyrna，Turker，*see* Izmir，Turkey（Smyrna，Turker，见 Izmir，Turkey）
snake charmers（耍蛇），184
Snow，Peter（士那），225
Society Islands（社会群岛），114
Society of Cincinnati（辛西纳提协会），

17 – 18, 23
Song Dynasty（宋朝）, 48, 180
souchong tea（小种茶）, 53
South America（南美）, 34, 148
South China Sea（南海）, 22, 32
South China Seas（南海）, 128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南方文学信使》）, 207
South Street（New York City）（纽约南街）, 147
Spain（西班牙）, 33, 63, 136
  coolies on ships of（船上的苦力）, 291, 303
  sea otters traded by（交易的海獭）, 110
  slave trade banned by（禁止奴隶贸易）, 290
Spanish pieces of eight（西班牙八片银）, 14 – 15, 14
spears（矛）, 244, 244
specie（硬币）, 14, 103, 123, 140, 142, 155, 167, 169, 259, 286
Spence, Jonathan（史景迁）, 213
spermaceti candles（鲸蜡）, 123
sperm whale teeth（抹香鲸牙齿）, 114, 130, 151
Spice Islands（香料群岛）, 34
spices（香料）, 29, 33, 34
spirits（烈酒）, 14, 123
Square（广场）, 76, 218 – 19, 223 – 24
Stadler, Joseph C.（J. C. 史达德）, 67
Stag Hound（“猎鹿犬”号）, 274 – 75
steamships（蒸汽船）, 308
steamship travel（轮船航行）, xvi
stiles, Ezra（E. 斯泰尔斯）, 193 – 94
Stonington, Conn.（康涅狄格州斯通宁顿）, 148 – 50
strangulation（绞刑）, 85, 158, 159, 196
  for opium smuggling（鸦片走私）, 217, 218, 224
Stuart, Gilbert（G. 斯图亚特）, 102 – 3
Sturgis, William（W. 斯特吉斯）, 110, 127, 128, 310
sugar（糖）, 8, 53, 54, 95, 169, 299
sulphur（硫磺）, 64
Sumatra（苏门答腊）, 22, 32
Sunda Strait（巽他海峡）, 22
Sung Dynasty, *see* Song Dynasty（Sung Dynasty，见 Song Dynasty）
supercargoes（随船大班）, 17
Supreme Judicial Court,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最高上诉法院）, 257
Swan, Joseph（J. 斯万）, 9
Sweden（瑞典）, 36, 136
Swift, John（J. 斯威夫特）, 22, 73, 80
Switzerland（瑞士）, 42
swords（剑）, 244
Swords, John E.（J. E. 索兹）, 102
sword swallowers（吞刀）, 184
Sydney, Australia, 129（澳大利亚悉尼）, 151
Sylph（“西尔芙”号）, 93
Syria（叙利亚）, 28

Table Bay（桌湾）, 95
Tahiti（塔希提）, 130

Taiwan（台湾），36
Tan Heung Shan（Sandalwood Mountains）（檀香山），152
Tao-kuang, Emperor of China, see Daoguang, Emperor of China（Tao-kuang, Emperor of China, 见 Daoguang, Emperor of China）
tar（焦油），123
Tarrytown, N. Y.（纽约塔里敦），56－57
taxation（税），66，69，91，213
Tchen, John Kuo Wei（陈国伟），196
tea（Camelia sinensis）（茶），xvii，46－49，47，64，92－93，96，134，159，175，222，228，231，232，260，270，283，306，307，308，312
adulteration of（掺杂），53
alleged virtues of（据说的优点），50
in American colonies（在北美殖民地），6，56－58，65－71，70
boycotts of（抵制），70，71
British trade in（英国茶叶贸易），135
Chinesse cultivation of（中国人种植茶叶），51－52
clippers needed for（茶叶贸易需要的飞剪船），266
destroyed in Canton fire（广州大火烧毁的茶叶），186
expansion of trade in after Opium War（鸦片战争后交易的增长），266
fragility of（容易变质），266
London as world's largest market of（伦敦为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277
origin of（起源）46
sugar and milk in（加糖和奶），53－54
types of（种类），52－53
U. S. consumption of（美国消耗茶叶），102，135，143
Tea Act（《茶叶法案》），67－68，71
teacups（茶杯），53－54
tea gardens（茶园），51，57
"tea money,"（"茶钱"），120
Tea Plant（"茶树"号），90
teapots（茶壶），54
tea sets（茶具），101
teaspoons（茶匙），53，54
tea-water pumps（茶水泵），57－58
technology（技术），208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一万件中国物品"）205－7，208
Terranova, Francis（F. 特拉诺瓦），156－59，196
Terry, G. W.（G. W. 特里），241
Thailand（泰国），199
Thelwall, Algernon（A. 提沃尔），233
Thirteen Factory Street（十三行街），76
Thomson, Charles（C. 汤姆森），63－64
Thorn, Jonathan（J. 索恩），124
"thousand cuts" torture（凌迟），128
Tibet（西藏），49
Tibetan Platean（青藏高原），246
Times（London）（伦敦《泰晤士报》），221，233，250，278－79
Timor（帝汶），131
tin（锡），116
tobacco（烟草），285，299

Tocqueville. Alexis de（托克维尔），89
Tonga（汤加），114，129
Tonquin（“东加”号），88，114，124
Topaz（“托帕兹”号），128－30
tortoise shell（龟壳），165
Tory Party（托利党），238
Townsend，Ebenezer（E. 汤森德），134
Townshend Acts（《唐申德法案》），65，66，67，68－69
trade，U. S. -China（美中贸易），8，88－89，90－91
  average of 1816－1839（1816－1839间平均额），146
  bills used in（使用的汇票），167－68，169
  British wariness of（英国人注意），132－34
  as nonmonopolistic（非垄断性质），188
  as source of wealth（财富的来源），97－98，135－36，146
trade，U. S. -China（continued）（美中贸易，续）
  Terranova incident and embargo of（特拉诺瓦事件和禁运），158
  in U. S. -Britain diplomatic war（在美英外交冲突中），190
  U. S. Civil War's effect on（美国内战的影响），286
  U. S.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美国政府的协助），91
  value of（价值），136，285
  war of 1812's effect on（1812年战争的影响），145
  see also China；United States（又见：中国；美国）
tragedy of the commons（自然界的悲剧），115－16
Train，Enoch（E. 特雷恩），274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横贯大陆铁路），xvi，305－7，306
Travels of Marco Polo，The（《马可波罗游记》），30
Treasury bonds，U. S.（美国国债），98
Treary of Ghent（《根特条约》），145
Treaty of Nanking（《南京条约》），247－48，249，249，263，264，287
Treaty of the Bogue（《虎门条约》），248
Treaty of Wangxia（《望厦条约》），262，263，264，284，287
trepang，see bêche－de－mer（trepang，见 bêche－de－mer）
Triton（“海王星”号），23，72－73
True American（“纯粹美国人”号），90
tuberculosis（肺结核），128
Turkey（土耳其），122，154，174，212，288
Turks（突厥），25
Twining，Thomas（T. 川宁），51
Tyler，John，257（泰勒总统），259－60

ukeke（ukeke），112
United States（美国）：
  in Boxer Rebellion（在义和团运动中），264
  Canton War and（广州之战和），81
  China as perceived by（美国对中国的看法），194－98，313

China's view of（中国对美国的看法），78，259
Chinese goods in（的中国商品），101－2
Chinese immigrants to（中国移民），304－5，307
in competition with Britain for China trade（与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竞争），189，277，279
coolie ships built by（修造的苦力船），301
as curious about China（对中国好奇），192
destruction of fleet of（船队被摧毁），97
in diplomatic war with Britain（与英国的外交冲突），189－90
early financial woes in（早期财政困境），7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conomic problems in（19 世纪初的经济问题），143
economic depression in early days of（早期经济萧条），5
embargo by（封港），136，138－43
European trade barriers faced by（面临的欧洲贸易障碍），5
in exit from opium trade（退出鸦片交易），289
first national bank in（第一个全国性银行），7
foreign trade of（的对外贸易），285
losses in great fire of 1822（1822 年大火中的损失），187
as middleman for British and Chinese trade（作为中英贸易的中间商），231－32
number of ships sent to Canton by（发往广州的船只数量），135
opium traded by（贩卖的鸦片），122－23，154－55
opium trade sanctioned by，（制裁鸦片交易）216
opium turned over to Chinese by（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225
Opium War involvement of（参与鸦片战争），253，311－12
opposition to Opium War in（国内反对鸦片战争），253－57
origin of Chinese trade with（对华贸易的起源），4
Panic of 1837 in（1837 年经济大恐慌），214
in Second Opium War（在第二次鸦片战争），288－89，311－12
slave trade banned by（禁止奴隶贸易），290
superiority in clipper ships of（飞剪船的优势），277，279
tea consumption of（茶叶消耗），102，135，143
trade deficit of（贸易赤字），xv，xvii，123，146，286，312－13
in treaty with china（与中国的条约），257－62
volume of trade with China（对华贸易量），90，189，312
in war with Mexico（与墨西哥的战

争），279
weak central government in（疲弱的中央政府），5
winter of 1783 – 1784 in（1783 – 1784 年的冬天），3 – 4
in withdrawal from opium trade（退出鸦片贸易），227
United States（“合众国”号），104
Valley Forge, Pa.（福奇谷），7 – 8
Valparaiso, Chile（智利瓦尔帕莱索），275
Vancouver Island（温哥华岛），10，88，124，126，190
Vanua Levu（瓦努阿莱武岛），164
venereal disease（性病），128
Venice（威尼斯），30
Vergennes,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夏尔·格拉维耶［韦尔热纳伯爵］），86
vermillion（朱砂），64
Victoria, Queen of England（英国女皇维多利亚），220 – 21，235 – 36，241
Vietnam（越南），297
Virginia（弗吉尼亚州），16
Volage, HMS（英国皇家海军“窝拉疑”号），230
Voltaire（伏尔泰），62，63
Voltaire（“伏尔泰”号），94

Wabash（“沃巴什”号），155 – 56，159
wallpaper（墙纸），101
Wangxia, Treaty of（《望厦条约》），262，263，264，284，287
Wangxia（Wanghia）（望厦），261
war junks（战船），229，230 – 32，241，242，244 – 45
War of 1812（1812 年战争），90，143 – 45，147，151，161，164，170
Washing, Captain（华生船长），169
Washington（“华盛顿”号），200 – 201
Washington, D. C.（华盛顿特区），306
Washington, George（乔治华盛顿），3，4，59，64，203
cash needed for war by（战争所需的现金），7 – 8
kingship declined by（拒绝称帝），18
New York reclaimed by（收复纽约），20 – 21
Stuart's painting of（斯图亚特绘制的画像），102 – 3
Washington, Martha（玛莎），59
Washington（state）（华盛顿州），190
Waterman, Robert H.（R. H. 沃特曼），270 – 71
Waverly（“威佛利”号），293 – 94
Wealth of Nations, The（Smith）（斯密《国富论》），91 – 92
weathervane, on US. consulate flagpole（美国领事馆旗杆上的风向标），261
Webb, Isaac（I. 韦伯）274
Webster, Daniel（D. 韦伯斯特），258，260
Webster, Fletcher（F. 韦伯斯特），260
Weddell, James（J. 威德尔），150
West, Ebenezer（E. 韦斯特），95
Western Gate（西大门），208
West India Docks（西印度码头），278
West Indies（西印度群岛），8，85，94

Westward Ho（“西进”号），301
whale oil（鲸油），104，285
whale's teeth（鲸牙），114，130
whaling（捕鲸），90，91，107，133
Whampoa，China（中国黄埔），38，39，74－75，74，77，80－81，82，95，100，144，217，218，265
Elliot's barring of British ships from（义律要求英国船只撤出），228
opium trade in（的鸦片交易），159
wheat（小麦）285
Whig Party（辉格党），238，239
Whipple，A. B. C.（A. B. C. 惠普尔），268
Whitney，Asa（A. 怀特尼），305－6，308，310
Wilcocks，Benjamin Chew（B. C. 威尔考克斯），156－57，174
Williams，Mr.（威廉），84
Williams，Samuel Wells（卫三畏），255
Willing，Charles（C. 维林），7，61
Willing，Morris & Company（维林和莫里斯公司），7，16
Willing，Thomas（托马斯），7
Wilson，Robert（R. 威尔森），144－45
wine（葡萄酒），14
Wines（E. 韦恩斯），Enoch，207
Wingchong，Punqua（文钟），138－43，198
Winged Racer（“飞车”号），301－2
witch trials（女巫审判），96
women（女性），176－81，197
first Chinese，in U. S.（到美国的第一位中国女性），200－202
foot binding of（裹足），178－81，180，197
wood（木），152
wood-and-lacquer boxes（木漆器），76－77
woolen cloth（羽纱），14
woolens（毛制品），116
Woosung，China，see Wusong，China（Woosung，China，见 Wusong，China）
Worcester Magazine（《伍斯特》杂志），98－99
Wu Bingjian，*see* Howqua（Wu Bingjian，见 Howqua）
Wu Ping-Chien，*see* Howqua（Wu Ping-Chien，见 Howqua）
Wusong，China（中国吴淞），242
Wyoming（怀俄明州），190

Xiamen，China（厦门），36，242，248，305
Xianggang，*see* Hong Kong，China（Xianggang，见 Hong Kong，China）

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193
Yangtze River（长江），194，246，247
Yellow Emperor（皇帝），27
Yellow River（黄河），194
Yokohama（横滨），307
Yongzheng，Emperor of China（雍正皇帝），45
Yorktown，Battle of（约克敦战役），7－8
Young，John（扬），126

Youqua（尤夸）, 74
Yung-cheng, Emperor of China, *see* Yongzheng, Emperor of China（Yung-cheng, Emperor of China, 见 Yongzheng, Emperor of China）

Zhapu, China（中国乍浦）, 242
Zheng He（郑和）, 32
Zhenhai, China（镇海）, 242
Zhenjiang, China（镇江）, 246
Zhoushan（舟山）, 36, 240, 242, 246
Zhujiang, see Pearl River（Zhujiang, 见 Pearl River）
Zion's corner（圣郠山的角落）, 155

插图来源

前　言

第 001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一章　“追求财富的冒险”

第 001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005 页：©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 Park

第 007 页：Ledyard National Bank.

第 016 页：Samuel Shaw, *The Journals, The First Consul at Canton,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osiah Quincy* (Boston: Wm. Crosby and H. P. Nichols, 1847)

第二章　中央王国

第 023 页：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第 025 页：Thomas Allom and George Newenham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vol. III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3)

第 028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80322. A - C

第 040 页：Lithograph after W. S. Sherwill, reproduced in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82)

第 043 页：The Stapleton Collection / Art Resource, NY

插图来源

第 045 页：Robert Sears,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in Nature, Art, and Mind* (New York: Robert Sears, 1843)

第三章　中国梦

第 053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056 页：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E81592. 10

第 067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四章　"生番"

第 069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4806

第 071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r. Russell Sturgis Paine, 1958, M9751. 1

第 072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M4468

第 074 页："Some Account of the City of Canton," *The Saturday Magazine* (April 1837)

第 075 页：Robert Elliot, *Views in the East: Comprising India, Canton, and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vol. I (London: H. Fisher, Son, & Co., 1833)

第 081 页：*Political Intelligencer and New-Jersey Advertiser* (June 1, 1785)

第五章　中国热

第 084 页：Edmund Fanning,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China Sea, North-West Coast, Fiji Island, South Shetlands*, & (New York: William H. Vermilye, 1838)

第 089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092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the Derby Family, 1824, # M353

第 101 页：Mike Boylan,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第 102 页：Edmund Fanning,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With Selected Sketches of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Oceans, China,*

etc. (New York: Collins & Hannay, 1833)

第 106 页：George Henry Mason, *Costumes of China: Illustrated by sixty engravings; with explana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 (London: W. Miller, 1804)

第 109 页：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第 111 页：Elizabeth Twining, *Illustrations of the Natural Orders of Plants with Groups and Descriptions*, Vol. II

第 116 页：Lithograph after W. S. Sherwill, reproduced in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82)

第 134 页：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8680

第 142 页：Girard College History Collections, Philadelphia, PA

第六章　金街

第 144 页：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 – 1844 by An Old Resid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第 150 页：Otto Von Kotzebue, *Voyage of Discovery in the South Sea and the Behring's Strait* (London: J. and C. Adlard, 1821)

第 159 页：Christian Horace B. Alfred Moquin – Tandon, *The World of the Sea* (London: Cassell, Petter, and Galpin, 1869)

第 160 页：of Eric Jay Dolin

第 161 页：*The Treasures of the Deep*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876)

第 170 页：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第 172 页：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第 173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5256

第 175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1931 A. Heard Collection, # M3793

第 177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with partial funds donated by The Lee and Juliet Folger Fund and Joan Vaughan Ingraham, 2001, M18709

第 179 页：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第 182 页：Thomas Allom and George Newenham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vol. II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3)

第 184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with funds donated anonymously, M22764

第七章　美国人中的中国

第 190 页：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第 197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201 页：Thomas Allom and George Newenham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vol. III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3)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 206 页：Lithograph after W. S. Sherwill, reproduced in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82)

第 208 页：Alexander Murray, *Doings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第 210 页：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第 220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9708

第 241 页：William Freke Williams, *England's Battles by Sea and Land;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Lond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54)

第 238 页：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第 240 页：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第 242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r. Robert J. Clark, 1960, M10565

第 244 页：*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ember 12, 1842)

第九章　逐风而行

第 258 页：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 M5162

第 266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268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271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276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十章　褪色的财富

第 279 页：Edgar Holden, "A Chapter on the Coolie Trade,"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864)

第 290 页：Edgar Holden, "A Chapter on the Coolie Trade," 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864)

第 292 页：Edgar Holden, "A Chapter on the Coolie Trade," 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864)

第 295 页：© Mystic Seaport, Photography Collection, Mystic CT, #1994. 107. 1. 20

第 301 页：Library of Congress

第 302 页：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Collection of Stephen J. and Jeremy W. Potash. (steve@ PotashCo. com)

后　记　历史的回响

第 304 页：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彩色插页来源

前环衬：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1993, M25794

后环衬：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Collection of Stephen J. and Jeremy W. Potash（steve@ PotashCo. com）

1.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2. Library of Congress
3. Library of Congress
4.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5256
5.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80322. A - C
6. The Mount Vernon Ladies' Association Collection
7. Elizabeth Twining, *Illustrations of the Natural Orders of Plants with Groups and Descriptions*, Vol. II
8. M. A. Burnett, Plantae Utiliores, or Illustrations of Useful Plants, Employed in the Arts and Medicine, vol. I (London: Whittaker & Co., 1842)
9.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Rare Book Collection
10.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 Park
11. Historic New England, gift of Constance McCann Betts, Helena W. Guest, and Frasier W. McCann, #1942. 4655
12. Girard College History Collections, Philadelphia, PA
13.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the Derby Family, 1824, # M353
14.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M8255

15.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r. Russell Sturgis Paine, 1958, M9751. 1
16.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M4468
17.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9708
18.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E78680
19.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1931 A. Heard Collection, # M3793
20. 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21. 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22. Library of Congress
23.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iss Amy Curtis and Miss Clare Curtis, 1952, E82553
24.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rs. Emory W. Johnson, 1923, E19144. 12
25.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E81592. 10
26.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with funds donated anonymously, M22764
27.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useum purchase with partial funds donated by The Lee and Juliet Folger Fund and Joan Vaughan Ingraham, 2001, M18709
28. 江苏禁毒展览馆
29. 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30. Library of Congress
31.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Gift of Mr. Robert J. Clark, 1960, M10565
32. Library of Congress
33.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M5162
34.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 124724
35. Peabody Essex Museum, Gift of Mr. Louis Pappas, 1961, # E82881
36. Forbes House Museum, photograph by Benjamin Wigh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美）多林（Dolin，E. J.）著；朱颖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97-5066-7

Ⅰ.①美… Ⅱ.①多… ②朱… Ⅲ.①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 Ⅳ.①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365 号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
——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

著　　者／〔美〕埃里克·杰·多林
译　　者／朱　颖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冯立君
（010）59367004　　责任校对／李　惠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　阳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3.37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1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81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97-5066-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7013 号
定　　价／5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朱颖 专职译者，古典文学专业，喜爱阅读历史与文学

新浪微博：peterontheroad

电子邮件：peterzhuying@gmail.com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010-59367108

装帧设计／宋　涛

尽管背景设定于18-19世纪，《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却不乏预见性，对我们今日与中国的关系可堪镜鉴。这也是几十年以来第一部全面透视早期美中贸易的历史专著。

——黄运特 《陈查理传奇》作者

本书节奏紧凑，研究深入，对美国与中国长期竞争与合作并存历史感兴趣之人不可错过。

——德比·阿普尔盖特 普利策获奖作品《最著名的美国人》作者

飞剪船掠过公海，残忍的海盗出没，故事引人入胜，深刻反思了至今仍困扰我们的国际关系。新颖，扣人心弦，如海洋一样深邃。

——詹姆斯·法洛斯 《中国航空》作者

关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关系，无一不深受过去的影响。只要对中国的雄心、记忆和敏感抱有兴趣，本书都值得一读。

——马克·科兰斯基 《鳕鱼》作者

多林对早期中美关系的叙述令人着迷，当今的现实正发轫于两个老对手的旧事。《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趣味盎然，让我们对今日之局更添新知。

——柯克·威维斯·斯温哈特 《破屋》作者

茶叶、鸦片、不羁的人物，应有尽有。多林不仅填补了历史文学的空白，更以极富张力地文字，引出或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洲际竞赛。

——肯尼思·C.戴维斯 《你应该知道的美国历史》作者

叙事高手多林将美国的商业天才及其与美国勃兴的密切联系娓娓道来。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克朗凯特》作者

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多林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构思精巧、异彩纷呈。一部航海史的杰作。

ISBN 978-7-5097-5066-7

ISBN 978-7-5097-5066-7

定价：56.00元

www.ssap.com.cn